

黄金秘档

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始末

吴兴镛博士 (Sing-yung Wu, M.D., Ph.D.)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蘇
興
鏞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金秘档——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始末/吴兴铺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12

ISBN 978-7-214-06078-5

I. 黄… II. 吴… III. 金圆券—史料—1949 IV. F82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04099号

- 书 名 黄金秘档——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始末
著 者 吴兴铺
责任编辑 戴亦梁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毫米 1/16
印 张 26 插页3
字 数 356千字
版 次 2009年12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2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6078-5
定 价 48.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杨天石学部委员序

2008年,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阅读蒋介石日记,来了位清癯的高龄华人,也在阅读日记。相谈之下,得知他是原国民党联勤总部预算财务署长吴嵩庆的公子,他的父亲原是国民党撤离大陆时为蒋介石押运国库黄金去台湾的经手人。这引起了我的强烈兴趣,于是相偕到附近的镇上,找了家中国餐馆,把酒续谈,了解到更多情况。

早在1948年,蒋介石鉴于在和中共的军事较量中频频失败,即在做迁移台湾的准备。当年11月底,蒋介石制定下月“大事预定表”,其第15条即为“中央存款”之处理。同年12月1日午夜,在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主持下,第一批260万两黄金、400万块银元自上海运往台湾。1949年1月,蒋介石在中共的军事进攻和桂系逼宫的困境中下野。下野前,蒋介石为避免“代总统”李宗仁和立法院、财政部的“干扰”,继续指挥军队,密令吴嵩庆与财政部及中央银行订立“军费草约”,将原来作为金圆券准备金的国库资金全部转运到财务署,以“预支军费”的名义“保管”。此后,吴嵩庆曾奉令分两批将约值1.5亿至2亿美元的黄金、银元、外汇运往台湾。当年5月18日,又由汤恩伯经手将第四批黄金19.5万两运离大陆。据估计,前后四批,总值约黄金700万两。这笔资金对国民党迁台初期的财政和新台币的稳定显然具有重要作用。

吴兴镛先生习医,在医学方面卓有成就,但他对历史有强烈的爱好。2007年,他曾利用其父留下的日记和对当事人的访问等珍贵数据,写成《黄金档案——国府黄金运台·一九四九年》一书,在台湾出版,详述



1948至1949年蒋介石将国库资金运台的经过。其后,兴镛先生又利用刚刚开放的蒋介石日记(1946—195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台北“国史馆”等处收藏的数据,检验并更新自己的观点,写成《黄金秘档——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始末》一书,交大陆出版,其热情和精神均极为可嘉。

中国近代史虽然是昨天的历史,但是,其中歪曲、讹误之说颇多,模糊影响之说更多,只有像吴先生这样勤勉不懈,务求真相不止,才有可能逐渐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为我们的民族提供一部真实可信的中国近代史。将吴先生的前后两书加以比较,也可以发现,后书较前书更准确、更全面,数据更详备,考证更精细,堪称迄今为止关于此一专题最好的学术著作。在历史研究中,我们也必须具有这种精进不已,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的精神。

吴先生书成,从大洋彼岸来电来函,并且寄来打印稿,希望我为本书写一篇小序,我对于黄金运台事件缺乏研究,各事丛杂,但为吴先生的精神感动,因乐为之序。

杨天石

2009年10月写于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

(杨天石先生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王世真院士序

吴兴镛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两年前,他寄赠我一本他写的用繁体字印的《黄金档案——国府黄金运台·一九四九年》。他的厚重的历史感和责任感,严谨的写作态度,以及书中翔实的历史资料,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本书很快被朋友借去传看,它受欢迎的程度可见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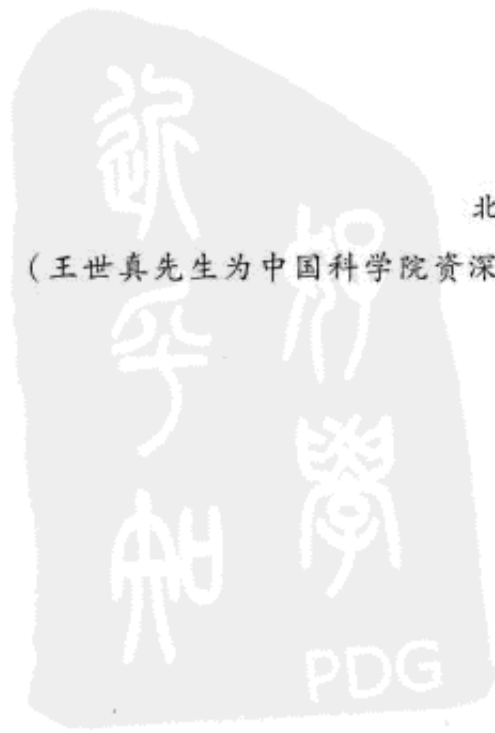
近年来,吴兴镛先生又多方查阅有关档案,采访有关人士,收集了许多可信的新资料,使本书内容更加充实。如今,新版《黄金秘档——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始末》即将在国内付梓。我相信,它问世以后,一定能够帮助关注、研究这一重要史实的人们了解全部真相。至于吴兴镛先生所提的设立“中华世纪黄金教育基金”的倡议,不论能否实现,都足以表明他的殷殷赤子情,是十分可嘉可敬的。

王世真

2009年10月15日于

北京中国科学院暨协和医科大学

(王世真先生为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教授)



自序

海峡两岸，一国分治 60 年，其中虽然国内国际因素复杂，然而两岸有血统上、文化上、历史上及物质上的紧密联系，未来的互动是乐观的。

血统上，不论闽南客家及其他各省，几全是黄河长江珠江流域中原血脉，不容分割；文化上，台湾之宗教、习俗、建筑、儒学道教等等，都是华夏传承；历史上，虽然曾有异族入侵，但为时短暂，媚外忘祖之徒是极少数，也望以开放宽恕对待并以深厚的中华文化感化之。

物质上，两岸数百年来越黑水沟互通有无。尤其是抗战胜利之后至 1949 年底，大批文物运到台湾，包括难以计数的珍贵文物和古董，完整地保存在台北近郊的“故宫博物院”，为展示中华文化的世界观光胜地。此外，另一深染两岸人民血泪的“物质”，就是 1948 年至 1949 年，上海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国库集中来自各省市大量的金银外汇，然后在机密的运作下转移到台湾，其中更为秘密的军费部分曾储藏在厦门鼓浪屿。这批钱在蒋介石日记里称作“现金”，是在蒋介石下野（1949 年 1 月 21 日）前后密运台湾、厦门，当年共值约 4 亿美金，包括 400 余万两黄金，其中 140 万两回运大陆各地，80 万两用于军事，60 万两用为政费。此外，还有近亿的银元及数千万的美元外汇都耗于内战的最后一年。

漫长的岁月长河流过了一甲子，此一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尚无系统的撰述。笔者以医学教授为专业，由于有当年掌管国民党政府军费的先君吴嵩庆所遗留手记，及有幸采访先父同事与运金有关人士，十余年不断追踪寻觅，频频横越太平洋，往返洛杉矶、上海、厦门、南京及台北，试图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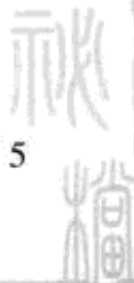


原运金史实与路线。并于2007年在台北先推出《黄金档案——国府黄金运台·一九四九年》一书，颇得海内外好评。但自觉仍须补充史料，因而在过去两年里继续追寻史实档案，参阅最近“启封”的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所藏蒋介石日记（1946—1955）、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典藏民国档案、厦门大学和上海图书馆藏书及台北“国史馆”的大溪档案及其他各方有关资料等等，汇成此书。

完成此书之后，深觉此批金银外汇原是1948和1949年国币“金圆券”的准备金，属于全中国人民，其中大部运到台湾后奠定了“新台币”初发行时的币信，稳定了国民党政府在大陆惨败后的台湾金融。当年这笔现金约相当于台湾800万军民每人平均分到一英两黄金或50美元。台湾有人说大陆没有多少或根本没有黄金运来过，是因为当年包括台湾省的军费及米糖等的“代垫款”，已经“抵销”了相当多数量的黄金，这是那些搞意识形态的政客认为这三四百万两都是还欠款的，就宣称根本没有黄金运来台湾。但如果没有这笔黄金及等值的纯银及外汇，那么台湾1949至1950年用什么来支付军饷民薪、购买军实米粮、进口汽油零件及填补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一百的年预算赤字？如仅靠印刷钞票，台湾早就为通货膨胀的洪流所淹没，今日的台湾究竟是何光景是任谁都难说得准的。可是，有一点应无异议：台湾必已经过一场血淋淋的大灾难。

台湾本岛未遭战火，主要拜赐于朝鲜战争与这笔巨金。笔者能在台湾完成大学教育，能负笈来美国深造，回首四十余年，虽然是自己独立奋斗得来的成果，但饮水思源，幸得在台湾安定求学（1949至1963年），不能不说是间接得益于这笔资金。从另一角度来看，海峡两岸的亿万中国人民则是受害者，无数百姓因金圆券的剧烈贬值而倾家荡产。

笔者以一海外医学专业者的身份，不揣短末，让证据说话，来还原此史实。在此或许略可告慰两岸百姓的是，这笔运台厦的巨额现金，除数千两黄金用于开办一家报纸，进入私囊外，其他全作公费用度，剩余部分仍存台北“国库”。当然这也不能标示此整个事件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但至少比此国家资金被大量贪腐掉要聊胜一筹。在这新世纪里，或应抛弃内战时的恩怨旧隙，在重温史实外，也展望中国未来。笔者捐出此书稿



费所得,如愚公移山的第一刨土,创立“中华世纪黄金教育基金”来抛砖引玉,尤其希望在海外同笔者相似的、来自台湾的华侨学子,群策群力共襄胜举,冀以此增进以两岸教育与交流为宗旨的“黄金教育基金”,来弥补近史前愆于万一。也切望台湾当局及社会诸贤达,能考虑把“剩余”黄金的现值所滋生利息,加入到此基金里,经由增进教育树人,来共创迈越汉唐、黄金般的中华世纪。

此书能在此运金事件 60 周年出版,应感谢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郭必强研究员、无锡张满达教授、西雅图陈士翰博士、加州大学汪燮先生、台北董德成老先生和崔企川先生及已故《传记文学》社创办人刘绍唐先生夫妇和内人吴于艳秋医师,当然也要铭谢北京、南京、厦门、台北、上海、斯坦福大学、洛杉矶等地不能一一列举的友人的协助及资料提供。更希望有读者能发掘出新的史料,尤其是有关内战时银元、纯银和外汇的使用档案,来补正缺失和作进一步的探讨,让此一影响深远的重要事件的大拼图更臻于清晰完整。





参考消息

CANKAO XIAOXI 新华社主办

1998年5月1日

星期五

第1432期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48 参考消息报社出版

【香港《亚洲周刊》4月27日一期文章】题:南京到台北 海空运黄金(作者:董博群)

原文摘要 国民党政府败退守台湾前夕,将中央银行库存黄金白银运往台北,过程在史料中,至今仍属历史悬案,当年押运的文书官员董博群详述。

吴景庆逝世五周年祭奠墓前

1948和1949年,国民政府从大陆撤退台湾前夕,当时国民党总统蒋介石下令将大陆中央银行黄金分运到台湾,为台湾早期币制的稳定、经济的发展,作出很大的贡献。对于黄金如何运送,外界所知不多,有的也是断章残篇。一年多前,美国加州大学医学院教授吴景庆在纪念吴景庆逝世30周年的纪念文中,对这段历史进行了翔实的考据,作了完整的叙述。

吴景庆是当年的国军财务署长,在地任职的19年间(1947至1965年),正逢国共内战激烈及台湾危机重重,国家军费支出一度占总预算40%以上,此间大军费均掌握在他手中,被称为“吴军需”,是吴景庆失旧属,机

要秘书董博群的回忆,蒋介石亲自下命令,要吴景庆将中央银行黄金白银、美元及外币现款运往台湾。从近代史料看,央行黄金运台共分三次。据防务总监办公室主任李俊指出,第一次是在1948年12月1日,用美国军舰“海晏”号,从上海运到基隆,计有黄金200吨及白银100多吨,吴景庆派派,他父亲当时人在南京

外表都用牛皮纸包好,金包内装满,箱外有封条,写上重量及数目,箱内均没有汽车,金包的运送全靠交通银行雇来的挑夫,由他们把这些沉重的箱子挑上交通银行主厦门,再装上“海晏”军舰。

有一部分黄金则运往台湾。李光烈说,他印象中至少三次以军机押送黄金到台湾,最多一次曾运15万两,分别由

司令往水运南京和运,当年全在大陆当兵的台湾兵随船回台湾。

当时国军为什么不直接将黄金白银运到台湾,而要先存放在厦门鼓浪屿?李光烈表示,蒋介石当时打算向西撤打游击,根本没想到要退守台湾,可是兵败如山倒,国军一下就被共军打得溃不成军,才不得不撤退到台湾。

香港《亚洲周刊》载文披露 解放前夕国民党如何将黄金运往台湾

董博群参与第一批黄金运台之事,但第二次、第三次金运运台,都有参与。

李光烈掌管黄金运台

1948年前后,国共内战白热化,金元券狂贬,财务署遵照国民党总裁蒋介石指示,对主要作战部队发放黄金、银元。解放军攻下武汉后,上海中央银行印钞80万(约合2000万)黄金,无数的银元运至南京,存放在数小时的交通银行地下仓库,吴景庆任财务署长的时,担任财务署副署长的李光烈告诉《亚洲周刊》,他接到到厦门、基隆支付军费方面黄金、银元的指示。

黄金白银运台全靠挑夫

李光烈回忆,黄金块有大、有小,

在10个木箱里,他记得那次任务,只有他一人负责押送,其他三四个空军人员,包括飞行员等,都听他指挥。

中正纪念馆为藏金库

黄金运到台北后,交给台湾收支处长王水涛,由他负责验收、保管。李光烈说,黄金是存放在财各署的库房,也就是现在中正纪念馆的园地里,这里原来是日本管理军费的一个处,地下很深,面积约300平方米,银元则是存放在台湾银行仓库。

据博群回忆是军机运黄金,兵船运银元。李光烈指出,有一次军机就运800多吨银元,为了重量起见,还由海军总

上海第三金库运台,到是在1949年5月上海即将解放共产党手中时,吴景庆指出,当时金库保管员周令沛是伯父吴文斌军需老父将央行剩余的黄金运出。吴博群说,从他父亲遗留的档案发现,黄金银元的运出,完全由蒋介石一手掌握,财政部长陈继米无权过问。

至于当年运到台湾的黄金究竟有多少?中央银行前副总裁董博群表示,央行在台湾时存有部分资料已不可考,因此无法得知当初究竟从大陆运出多少黄金,央行目前库存黄金约400吨,其中仅30吨来自大陆。

责任归属 模糊

占总体黄金存量的7.49%,大部分黄金是50年代之后才购进的。

桑拿系列产品

国家一级企业
浙江浙大集团出品

电话:0571-892228 8148711881

天时代

中国总代理

浙江浙大集团出品

图 1.3 1998年5月1日北京《参考消息》转载的香港《亚洲周刊》访问李光烈一文也提及先父与笔者(此文由北京协和医科大学王世真院士提供)

及一点安慰;但如是假公济私(如作《联合报》的开办费),也只能秉笔直书,给近代史留下真实记录。

至于对这些国库资金数量的追踪,要提到先父老友周宏涛,他曾在1943—1958年担任蒋介石的机要秘书。2003年,他把在“侍从室”的资料交给一位职业撰稿人,出版了《蒋公与我》(台湾:天下远见出版社),把大溪的《蒋中正总统档案》(此即前曾提及的大溪档案,现收藏于台北“国史馆”,以下简称大溪档案)中有关国共内战时的重要事件,包括财经方面,择要公诸于世。书中特别提及1949年2月8日他奉命从奉化飞上海,去传达蒋总裁的指示,将上海央行黄金及其他资金“运至安全地区,以免落入解放军之手”。他在外滩的央行从刘攻芸(继俞鸿钧任央行总裁)处得知:“……目前全国黄金存量,运到台北260万两、厦门90万两(按:经财务署细点后才知是99万两),放在美国38万两,上海仅存28万两、承兑支用40万两……此外还有数千万银元。”这就是当年央行国库账面上的



(续表)

黄金 (批次) ^①	年/月/日 (由/运到)	中央银行档案 (及其他资料) (市两/吨)	大溪档案 (市两)	备注
	1950/9		2.3 万两	业库、银圆券准备金
			1.9 万两	日本赔偿(另银 18 吨)
合计	—	464.9 万— 486.7 万两 ^{②③}	299.1 万两	两档案数量差别主要在绝密军费黄金第二、三批

① 从上海运黄金到台湾共分四批,如包括美国的两批则为六批。

② 大溪档案 2 月 7 日的黄金是第一批,不是第三批里的,主要基于央行总裁刘攻芸在 2 月 8 日说:“运到台北 260 万两”。这是厦门运台湾的第一批里的余数,不属第三批。其次,刘还说央行还有 68 万两,这明示第三批的大部 8 日还在上海,不应在 7 日已进国民党政府的档案记录。

③ 第二、三批黄金,由财务署分别在厦门、台北保管,是蒋介石的秘密军费,下野的蒋总裁可直接分配调用(参见第 5 章)。

④ 全部运台湾黄金全数约 400 余万两,其中约 80 万两用于国共内战军费(据大溪档案电子档“厦门分行代付拨交联勤总部吴署长嵩庆黄金数量”是 786 540 两),另 60 万两回运大陆作国民党政府 8—12 月的行政费用,另加共值 350 万两黄金之外汇和银子,最后运存台湾“现金”总数约为 700 万两黄金之等值。

⑤ 1949 年 2 月 8 日刘攻芸(继俞鸿钧任央行总裁)称央行国库账面上总共有 456 万市两黄金。1949 年 6 月 27 日财政部长徐堪报告蒋总裁,当时(6 月 24 日)央行各地存金为 3 829 174 两(大溪档案),加上 6 月 21 日拨付台湾银行 80 万两作新台币准备金,总数则为 4 629 174 市两(见表 16.1 和图 1.4 及第 12 章),量较 2 月为多,或是因为厦门黄金突然在 6 月初多出了 9 万两(见第 12 章)。

行 銀 央 中		Gold Reserve
THE CENTRAL BANK OF CHINA		“GOVERNANCE”
運臺保管黃金收付及存餘數量表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二月四日)		
收入		
(1) 第一批由滬運台 (廿八年十二月四日)	2,006,459.506	純金市兩
(2) 第二批由滬運台 (廿八年二月四日)	556,386.896	*
(3) 第三批由滬運台 (廿八年六月四日)	192,029.713	*
(4) 第一批由美運台 (廿八年八月廿一日)	99,537.254	*
(5) 第二批由美運台 (廿八年八月廿一日)	99,537.354	*
(6) 尾差收入	31,526	*
總計	2,985,970.279	純金市兩

图 1.4 台湾“中央银行”档案记录的黄金收入(及付出),大溪档案,财政:金融,第四卷第二号(参见表 1.1,付出部分见图 13.7,表 16.1)

的军费金银,先父是直接奉蒋之命令行事的。不加入蒋介石日记的记载,任何试图“解密”国共内战末期国民党政府的政、军、经重大事件的努力,都将是“隔靴搔痒”,国民党政府资金运台湾及用于内战,就是蒋在1948至1949年最重要的布局之一,影响深远,造成60年后今日的台海现况。

笔者于2008年9月驾车由洛杉矶北上来回十五六个小时,专程趋访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蒋介石日记里多次提及先父,每次日期均与先父记载相合。但账没有记,仅提纲领。作为国家元首,日理万机,只会择要而记,是必然的。笔者在本书中原原整整地呈现蒋有关日记与先父记载于读者眼前,以供读者及近代史工作者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原始资料。

例如,先父1949年6月12日的日记(图1.6)中有那天进谒蒋介石后的记录(详见本书第12章),为“密藏”黄金军费90余万两作“最后之决定”的分配;查同日蒋介石日记(在高雄要塞):“……见雷震、(林)蔚文、(洪)兰友、许朗轩、吴署长(嵩庆)等解决各种问题……”比较之下,对运台黄金整个事件的前后,蒋日记的简略隐晦可见一斑,尤其是密藏在厦门的军费黄金,更是“机密档案中的最高机密”(见第5章),两岸的“中央银行”档案都在此“消声”,不仅外界不知,连国民党政府高层都“噤口不

六月十二日 星期日 107

晨偕法襄理报告, 即晚乘舟回厦
高航, 呈制新报告, 作最后之决定, 大
意① 溪坑拨款43万仍存厦
② 溪港款运台暂存
③ 银15万两交溪坑
其中8万为捐款
6万为经费
余即请求下午抵厦, 当晚即离, 连宿办公室, 次日再办一天, 但事务一
段落,

图 1.6 先父 1949 年 6 月 12 日的日记



目 录

杨天石学部委员序 / 1

王世真院士序 / 3

自序 / 4

第 1 章 黄金秘档浮出水面 / 1

第 2 章 1948 年——金圆券发行前后的中国形势 / 12

孔宋贪污渎职动摇国本 / 12

发行金圆券 / 16

军经崩溃——蒋介石作下野准备 / 21

第一批黄金准备运台湾 / 26

第 3 章 1948 年第一批(第一船次)国库黄金运台 / 28

外滩中国银行金库 / 29

国民党政府央行偷运黄金 / 32

黄金挤兑惨剧 / 33

银元又流通 / 34

海关缉私舰“海星”号运金 / 35

俞鸿钧奉蒋介石命令运第一批黄金去台湾 / 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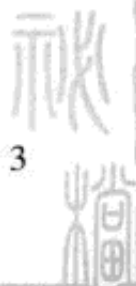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中央银行档案记录 / 40



- 第4章 俞鸿钧——第一批国库黄金运台主持人 / 46
- 俞鸿钧的生平 / 46
 - 哪些中央银行档案沉海底? / 49
- 第5章 1949年1月第二批国库黄金运台 / 53
- 蒋介石下野前夕的内战形势 / 53
 - “预支军费案”:先支半数 / 55
 - “订(草)约事,告一段落” / 57
 - 财务署机要秘书詹特芳的回忆 / 60
 - 蒋介石密藏厦门军费的用途 / 65
 - 第二批军费黄金运出时间与交通工具 / 67
 - 厦门是金银转运重镇 / 69
- 第6章 1949年2月第三批国库黄金空运台北 / 77
- 蒋介石决定引退 / 77
 - 宋子文、俞鸿钧密电与第三批黄金空运台北 / 81
 - 中央银行上海黄金存量(1948年11月—1949年5月) / 87
- 第7章 1949年5月第四批国库黄金运台 / 92
- 第8章 吴嵩庆——1949年“预支”军费的负责人 / 108
- 先父的教育 / 111
 - 服务国民党政府及与蒋介石夫妇的渊源 / 113
 - 出任财务署长管内战军费(信任而不“亲”) / 123
 - 在台湾的工作 / 124
 - 唐荣耕耘12年 / 129
 - 一次小小的中共统战 / 130
 - 从唐荣钢铁公司退休之后 / 132
- 第9章 四批上海国库金银运台的运输及见证人 / 136
- 最重要的证人应该是蒋介石! / 136
 - 沪台海关见证人 / 137



- 沪台中央银行众多证人 / 144
- 国民党军队财务署的经手人 / 147
- 运送金银的军方人士 / 152
- 为什么还会有人否认有金银运台湾呢? / 158
- 第 10 章 1949 年上海国库金银运存厦门鼓浪屿探详 / 162
- 蒋介石为何将厦门作为黄金白银的转运地点 / 162
- 两度专访厦门鼓浪屿寻觅运金路线 / 164
- 地下金库已拆除改建仅存遗迹 / 167
- 第 11 章 1948—1949 年国民党政府国库金银总数 / 171
- 1948—1949 年国民党政府的黄金储备 / 171
- 黄金大部分来自美国 / 174
- 1949 年 2 月 8 日央行总裁刘攻芸所报国库存金量 / 179
- 除上海以外,运台厦金银究竟有未来自其他地方? / 181
- 第 12 章 1949 年 6 月之国民党军队军费日志(一) / 188
- 1949 年国库有亿两纯银 / 189
- 蒋介石庆幸有人替他遮盖秘密军费与安排发行新台币 / 190
- 秘密军费黄金凭空多出 9 万两 / 192
- 徐堪呈蒋介石报告及广州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困境 / 201
- 台湾军费“代垫款” / 208
- 第 13 章 1949 年 7 月之国民党军队军费日志(二) / 214
- 蒋介石直接掌控秘密军费及中央与台省的财政冲突 / 214
- 军费分拨款、发金及银三类 / 224
- 第 14 章 1949 年 8 至 10 月之国民党军队军费日志(三) / 229
- 宁夏、关中、浙台闽的军费 / 229
- 厦金运台及蒋介石认陈诚“言行病态” / 232
- 一次“违旨”运黄金到广州 / 235
- 俞鸿钧弃职赴港与财政部长下台 / 241



厦门弃守与金门之战 / 243

第15章 1949年11—12月(大陆国共内战最后30天)之国民党军队军
费日志(四) / 252

“国民党政府”面临解散:资遣离职人员 / 252

“预算财务署长”亲自押运金银车队 / 255

蒋介石怒骂杨森 / 260

胡宗南部队最后一次的黄金饷 / 264

第16章 国民党政府上海国库资金运台湾后的流向 / 269

台湾“中央银行”档案及军费支出黄金数量(1949年5月—1950年
12月) / 269

第一批黄金:主要作新台币准备金及稳定新台币 / 272

上海国库“余金”在台湾的储存(2008年) / 283

第二批存厦门秘密军费黄金 / 284

国民党政府在国内外新铸银元 / 286

蒋介石下野期间(1949年1月下旬到1950年3月1日)的总裁办公
费 / 290

《联合报》拿去了多少黄金?——看蒋介石“亲信”如何打军费黄金
外汇的主意 / 293

第三、四批运离上海的黄金纯银 / 299

内战结束时“财务署”保管军费还剩多少? / 301

黄金支出总账 / 303

第17章 自述——旁观运金的岁月 / 306

幼年与教育 / 306

漫长学医历程 / 313

甲状腺学研究36载 / 319

1975年的台北“国建会”与洛杉矶加大:W复合物的发现 / 320

“中华世纪黄金教育基金”的构想:如何释出海峡两岸间善意 / 325



第 18 章 国民党政府国库资金运台时期有关人物小传 / 330

(一) 财务署同仁之一: 詹特芳、董德成、于德昌 / 330

(二) 财务署同仁之二: 李光烈、赵志华、王逸芬 / 339

(三) 陈良、俞济时、赵聚钰、赵抡元 / 343

(四) 徐堪、刘攻芸 / 348

(五) 陈舜畊与叶良光 / 350

(六) 王东原 / 359

(七) 母亲吴林培与三舅林国珪(围棋名人林海峰的父亲) / 361

附录 1 黄金、银元重量换算, 海空运输工具与银行建筑历史 / 365

附录 2 大事记(1948 年 1 月至 1950 年 12 月) / 372

附录 3 吴嵩庆先生年谱 / 380

附录 4 名词简介 / 383

主要参考资料 / 389

人名索引 / 397

郑
晓
PDC



第1章 黄金秘档浮出水面

笔者由于家境寒素,经过漫长崎岖的路程,年近中年才在美国完成习医素愿,专心医学教育与研究三十余年,对政治是敬而远之。但历经乱世,负笈国外数十年,对中华文化、历史及未来却是十分关切的,这也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来自台湾的海外留学生的一般通情。

70年代回台湾探亲父母兼度假,在台北衡阳路或台湾大学对面的一些小书报摊上总想找到一些大陆和在台湾当地遭监禁过的作者写的值得一读的“禁”书,偶尔也翻翻有“文化太保”(按:“太保”一词,在50年代的台湾是指一群爱滋事、耍流氓的中学生)之称的李敖写的书。李跟笔者台大同寝室同班的好友王尚义(60年代台湾校园文学名作家,去世于1964年,年仅27岁)相熟,并与王的大妹生了一个女儿。看看李敖的书,也是想知道有没有关于王尚义的故事。有一天翻到一本李敖编著的《蒋介石



图 1.1 1981年笔者与父亲吴嵩庆(右)摄于台北家中

研究》，不料却看到一整页先父吴嵩庆的肖像，并称他为“蒋介石的总账房”，说先父是除俞鸿钧以外，另一位在1949年前后“盗窃”大陆国库资金运到台湾的重要人物。该书资料仅是引跟随先父三年的一位湖北人詹特芳在大陆发表的一篇文章，詹在1948至1949年当过先父的机要秘书。

看过《蒋介石研究》后，也仅是暂时埋在脑后头，笔者在海外的医学工作实在太忙，除临床、教学外还做研究，每天工作时间长，哪能顾及父亲过去所做过的事。更何况父子相聚时短，他从来不谈公事，所以也没有问过他有关的事。

只是有一年，大约是1990年，洛杉矶的一位记者朋友陆大声凑巧也在台北，一天请他来家早餐，介绍跟先父认识。陆是见识广的记者，对近代史的人与事都娴熟于心，临行前提问先父：“可否请教一下吴老先生有关上海‘沦陷’前中央银行黄金运出的过程？”先父略迟疑后断然说：“此事我不清楚。”

1991年9月父亲第一次回镇海老家探亲两周，返台北当天即逝世，享年90。母亲当年91岁，身体欠佳，我即星夜赶返，在准备丧事及等候大陆几位兄弟来奔丧期间，母亲指着书房的先父手迹说：“快把这些寄去美国，由你保管吧。”那时海峡两岸刚开通不久，她考虑到父亲早些年的工作多少牵扯到国民党政府的机密，他不止曾经担任国民党军队的财务、军需总监达15年（1947—1962）之久，而且每周参加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及财经两



图1.2 先父着便装与蒋介石（左前）及蒋经国，父亲身后为年轻时之郝柏村（右后一，1990—1992年曾任台湾“行政院长”，现任台北市长郝龙斌之父）



次最高机密会议。如果给从没离开过大陆的儿子们看到这些资料,也会影响他们在海峡那边的生活,至少会带来些困扰。他们业已过古稀之年,还是少知道些“不该知道的事”为好。

办完丧事后,回美国依然为生活奔波忙碌,转眼到了1996年先父去世五周年的前夕,台北《传记文学》社长刘绍唐先生是先父老友,鼓励我写篇纪念文章。在这前后我也看了他生前的两本自传《嵩庆八十自述》(《中外杂志》社1981年版)及《嵩庆九秩散记》(1991年),里面完全没提黄金的事,于是就去翻他的遗档,才发现他1949年的记录,这应是除2008年所公布的蒋介石日记(1946—1955)(斯坦福大学馆藏)以外,记录国共内战时有关军费日志的第一手数据,是黄金“秘档”。先父的记载与詹特芳的回忆相合,可以说詹在大陆没乱说,也没有夸张,这可能与新中国实事求是的精神有关,另一方面,在“坦白从宽”的政策下,詹也没有夸夸其谈的理由与胆量。

1996年9月笔者在《传记文学》上发表《家父吴嵩庆将军逝世五周年纪念》一文,率先提出上海国库三批黄金运台的史实:俞鸿钧经手在1948年12月1日至1949年1月3日,用海关船运出上海的260万两为第一批;先父掌管的99万两军费黄金为第二批,1949年1月用军舰先运至厦门;5月,解放军逼近上海,汤恩伯又取走20万两(或40万两),是最后一批。但是,笔者在过去的一年里又发现新的一批,那是1949年2月7至9日用军民航机运去台北的约60万两黄金,在时间上应是第三批,5月上海解放前的最后一批就是第四批了。这第三、四批也算是军费,但是第二、三批黄金是蒋介石不想让“代总统”李宗仁知道的军费秘账,没有公开支出记录,仅有大溪档案的略账(“厦门分行代付拨交联勤总部吴署长嵩庆黄金数量”,有别于第一、四批及以后1949年8月从美国运回的第五、六批,在两岸的“中央银行”档案及蒋的大溪档案里明明白白记着一笔笔的支出)。这里当然牵扯到当年国民党内部的斗争。

在1949年上海解放前的半年里,国民党政府也不断用商船军舰运出大量白银及银元,总量在3000吨以上,连起义的“重庆”号巡洋舰上也装

有30万块银元。1949年后半年里，“嫡系”国民党军队的薪饷就是发银元与黄金。因而，笔者也提出了白银（数千万以上的银元及近亿两的银锭）及在国外新铸的银元，在国民党政府军费及国共内战时所充当的重要角色。

纪念先父逝世五周年一文发表后不久，又幸得机会访问了先父旧属李光烈，他在1949年奉派去厦门鼓浪屿负责提调军费黄金银元，用一本密码与先父单线联系，也是詹特芳提到过的人。笔者1997年4月在《传记文学》上发表《上海中央银行黄金从厦门转运台湾的补充及一点建议》，此“一点建议”就是提议台湾当局以部分运台“剩余”黄金所值的利息，来设立“中华世纪黄金教育基金”，主要为增进两岸善意互动，也是对大陆许多由于这些“现金”运台而导致金圆券狂贬、受损的老百姓的一点象征性的“补偿”——此“现金”是当年国币金圆券的准备金。同时，也切望当年的直接受益者，如以大量此黄金及外汇为开办费的私营企业台湾《联合报》[含《世界日报》（美洲版）]，能出钱出力，共襄盛举。

李光烈后来又接受香港《亚洲周刊》访问，并被北京《参考消息》（如图1.3）转载，此为继李敖、詹特芳之后，先父经手的黄金军费部分更广泛地为国人所知。文中还提到，台湾“中央银行”的负责人承认，当时台北的文园“国库”尚存有大陆运来的“剩余”黄金近100万市两，占总库存量的7.99%（如图1.3中文末）。

之后，笔者又访问了当年代表台湾当局，在台北把“剩余”军费黄金，于1949—1950年兑换为新台币发作国民党军队军饷的赵志华，并发掘出此军费金银也曾提作蒋介石下野期间（1949年1月至1950年3月），从溪口、广州、重庆、成都到台北的“蒋介石总裁办公室”的经费，这里面还包括了蒋在1949年7至8月访问菲律宾季里诺总统与南朝鲜李承晚总统的费用。于是，我继续写了《从一张借据说起——谈上海中央银行黄金运台后的流向及引退后“蒋总裁办公室”的经费来源》（《传记文学》1997年12月号）一文。由于赵志华往来“财务署”及台湾银行，也导引笔者对运台后这笔黄金的流向开始注意。如全是用于正途，奉于公众（如作军饷、政费、买军民粮食），也可给两岸人民一个明确交代



参考消息

CANKAO XIAOXI 新华通讯社主办

1998年5月1日

星期五

第14321期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48 参考消息报社出版

【香港《亚洲周刊》4月27日一期文章】题:南京到台北 将空运黄金(作者:蓝博洲)

原文摘要 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前夕,有中央银行库存黄金白运往台北,这被众说纷纭,是令世人为之悬念,当年押运的官员更是鲜有详述。

黄花岗五周年纪念暨

1948和1949年,国民政府从大陆撤退台湾前夕,当时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下令将大陆中央银行黄金分批运往台湾,为台湾早期币值的稳定、经济的发展,作出很大的贡献。对于黄金如何运往,外界所知不多,有的也是新闻战报,一年多前,美国加州大学汉学教授蓝博洲在台北南京路庆建50周年的纪念文中,对这段半世纪的珍贵历史,作了完整的叙述。

蓝博洲是当年的国军财务署长,在他任职的18年期间(1947至1963年),正当国共内战激烈及台湾危机重重,国军军费支出一度占总额90%以上。此

时大军费均掌握在他手中,被称为“钱军需”。蓝博洲是国民党中央银行,机

要职务特殊的副记,蒋介石亲自下条子,要蓝博洲向中央银行总库金库黄金、银元及外币即随军运去台湾。从近代史料看,央行黄金运台共分三批。据前海关总税务司李度指出,第一次是在1948年12月1日,用海关特准“海星”号,从上海运到基隆,计有黄金的90%及白银120多吨。蓝博洲表示,他父亲当时人在南

外,都用牛皮纸包的,金包内装箱,箱外有封条,写上重量及数目,箱内均没有汽车、金包的运途全靠交通银行雇来的挑夫,由他们把这些沉重的箱子挑上交通船去厦门,再装上飞机或军舰。

有一部分黄金则运往台湾。李光烈说,他印象中至少三次以军舰押送黄金到台湾,最多一次曾达13万两,分批改

司令桂永清亲自押送。当年也有位到大陆当兵的台湾兵随船回台湾。

当时国府为何不直接将黄金白运到台湾,而要先存放在厦门鼓浪屿?李光烈表示,蒋介石当时原打算到西康打游击,根本没想到要退守台湾,可是兵临如山倒,国军一下就被共军打得溃不成军,才不得不撤退到台湾。

上海第三战金库运台,则是在1949年5月上海即将落入共产党手中前夕,蓝博洲指出,当时在沪秘密准备由国台港蓝博洲以军警名义将央行剩余的黄金运出,蓝指出,从他父亲遗留的档案发现,黄金运台的过程,完全由蒋介石一手掌控,财政部长陈布雷无从插嘴。

蓝下当年运到台湾的黄金究竟有多少?中央银行副总裁许善权表示,央行在台式金时有一部分资料已不可考,因此无法确切知道究竟从大陆运出多少黄金,央行目前库存黄金约420吨,其中仅33吨来自大陆。

蓝博洲表示,黄金运台的过程,完全由蒋介石一手掌控,财政部长陈布雷无从插嘴。蓝下当年运到台湾的黄金究竟有多少?中央银行副总裁许善权表示,央行在台式金时有一部分资料已不可考,因此无法确切知道究竟从大陆运出多少黄金,央行目前库存黄金约420吨,其中仅33吨来自大陆。

香港《亚洲周刊》载文披露 解放前夕国民党如何将黄金运往台湾

蓝博洲表示,他父亲当时人在南京,未参与第一批黄金运台之事。据第二、第三批金库运台,都有参与。

李光烈掌管黄金提调

1949年初,国共内战白热化,金元券贬值,财谷署遭国民党总裁蒋介石指示,对主要作战部队发放黄金、银元。解放军攻下武汉后,上海中央银行印钞80万(约合28%的黄金),无数的银元运平壤,存放在数倍于的交通银行地下仓库。蓝博洲在时务署任职时,曾向时任财务署署长李光烈告诉《亚洲周刊》,他随部队到厦门,掌管支行军费方面黄金、银元的提调。

黄金白运运途全靠挑夫

李光烈回忆,黄金块有大、有小,

在13个木箱内,他记得那次任务,只有他一人负责押送,其他三四个空军人员,包括飞行员等,都听他指挥。

中正纪念馆成为藏金库

黄金运到台北后,交给台湾收支处长王东原,由他负责收收、保管。李光烈说,黄金是存放在财务署的库房,也就是现在中正纪念馆的旧地,这里原来是日本管理军费的一个处,底下很深,面积约230平方米,李光烈是存放在台湾银行仓库。

蓝博洲的弟弟是军机运黄金,兵船运银元,李光烈指出,有一次军舰曾运400多两银元,为了慎重起见,还由海军总

精英系列产品
国策二编企业
研经东方集团
电话:027-88020 118020

天时代
天时代
天时代

图 1.3 1998年5月1日北京《参考消息》转载的香港《亚洲周刊》访问李光烈一文也提及先父与笔者(此文由北京协和医科大学王世真院士提供)

及一点安慰;但如是假公济私(如作《联合报》的开办费),也只能秉笔直书,给近代史留下真实记录。

至于对这些国库资金数量的追踪,要提到先父老友周宏涛,他曾在1943—1958年担任蒋介石的机要秘书。2003年,他把在“侍从室”的资料交给一位职业撰稿人,出版了《蒋公与我》(台湾:天下远见出版社),把大溪的《蒋中正总统档案》(此即前曾提及的大溪档案,现收藏于台北“国史馆”,以下简称大溪档案)中有国共内战时的重要事件,包括财经方面,择要公诸于世。书中特别提及1949年2月8日他奉命从奉化飞上海,去传达蒋总裁的指示,将上海央行黄金及其他资金“运至安全地区,以免落入解放军之手”。他在外滩的央行从刘攻芸(继俞鸿钧任央行总裁)处得知:“……目前全国黄金存量,运到台北260万两、厦门90万两(按:经财务署细点后才知是99万两),放在美国38万两,上海仅存28万两、承兑支用40万两……此外还有数千万银元。”这就是当年央行国库账面上的

总共 456 万市两黄金及其大致储存地点(俞鸿钧 1949 年 1 月 28 日给蒋的一封信密电里记载的,较刘所说的黄金量要多 14 万两,即 470 万两)。周的任务在蒋介石 1949 年 2 月 8 日及 10 日两天的日记里都有记载。运到台湾的数量总结于表 1.1。

表 1.1 中央银行档案与大溪档案记载黄金量对照表

黄金 (批次) ^①	年/月/日 (由/运到)	中央银行档案 (及其他资料) (市两/吨)	大溪档案 (市两)	备 注
第一批 (1)	1948/12/1 (上海/基隆)	200.4 万两/62 吨	200.4 万两 (见图 1.5)	中央银行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下同)
(2)	1949/1/1 (上海/厦门)	57.3 万两/18 吨		中央银行档案
	1949/2/7 (上海/台湾)		55.4 万两 ^②	飞机运台
第二批	1949/1—2 (上海/厦门)	90 万两/33 吨 (国民党军队财务署 点收 99 万两) ^③		刘攻芸总裁告蒋介石秘书(1949/2/8)及“黄金军费秘档”(吴嵩庆/詹特芳)
第三批	1949/2/7—2/9 (上海/台湾)	60 万两/20 吨 (作军费) ^{②③}		宋子文、俞鸿钧密电,中央银行档案,以军机民航机运送
第四批	1949/5/19—6/5 (上海/台湾)	19.2 万两(《中央日报》宣称是 40 万两)	19.2 万两	中央银行档案,以军舰 105 号登陆艇运送
美国	—	38.0 万两		刘攻芸总裁告蒋介石秘书(1949/2/8)
(第五批)	1949/8/22 (美国/台湾)		9.9 万两	
(第六批)	1949/8/30 (美国/台湾)		9.9 万两	

(续表)

黄金 (批次) ^①	年/月/日 (由/运到)	中央银行档案 (及其他资料) (市两/吨)	大溪档案 (市两)	备注
	1950/9		2.3 万两	业库、银圆券准备金
			1.9 万两	日本赔偿(另银 18 吨)
合计	—	464.9 万— 486.7 万两 ^{②③}	299.1 万两	两档案数量差别主要在绝密军费黄金第二、三批

① 从上海运黄金到台湾共分四批,如包括美国的两批则为六批。

② 大溪档案 2 月 7 日的黄金是第一批,不是第三批里的,主要基于央行总裁刘攻芸在 2 月 8 日说:“运到台北 260 万两”。这是厦门运台湾的第一批里的余数,不属第三批。其次,刘还说央行还有 68 万两,这明示第三批的大部 8 日还在上海,不应在 7 日已进国民党政府的档案记录。

③ 第二、三批黄金,由财务署分别在厦门、台北保管,是蒋介石的秘密军费,下野的蒋总裁可直接分配调用(参见第 5 章)。

④ 全部运台湾黄金全数约 400 余万两,其中约 80 万两用于国共内战军费(据大溪档案电子档“厦门分行代付拨交联勤总部吴署长嵩庆黄金数量”是 786 540 两),另 60 万两回运大陆作国民党政府 8—12 月的行政费用,另加共值 350 万两黄金之外汇和银子,最后运存台湾“现金”总数约为 700 万两黄金之等值。

⑤ 1949 年 2 月 8 日刘攻芸(继俞鸿钧任央行总裁)称央行国库账面上总共有 456 万市两黄金。1949 年 6 月 27 日财政部长徐堪报告蒋总裁,当时(6 月 24 日)央行各地存金为 3 829 174 两(大溪档案),加上 6 月 21 日拨付台湾银行 80 万两作新台币准备金,总数则为 4 629 174 市两(见表 16.1 和图 1.4 及第 12 章),量较 2 月为多,或是因为厦门黄金突然在 6 月初多出了 9 万两(见第 12 章)。

<p>行 銀 央 中</p> <p>THE CENTRAL BANK OF CHINA</p>	<p>Bank Address</p> <p>“GOVERNMENT”</p>
<p>運臺保管黃金收付及存餘數量表</p> <p>(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四日至三十九年二月十四日)</p>	
<p>收入</p>	
<p>(1) 第一批由港運台(卅八年十二月四日)</p>	<p>2,006,459.506 純金市兩</p>
<p>(2) 第二批由港運台(卅八年二月七日)</p>	<p>550,396.896 “</p>
<p>(3) 第三批由港運台(卅八年六月四日)</p>	<p>190,009.713 “</p>
<p>(4) 第一批由美運台(卅八年八月十四日)</p>	<p>99,537.254 “</p>
<p>(5) 第二批由美運台(卅八年八月十四日)</p>	<p>99,537.354 “</p>
<p>(6) 尾差收入</p>	<p>22,526 “</p>
<p>總計</p>	<p>2,969,970.279 純金市兩</p>

图 1.4 台湾“中央银行”档案记录的黄金收入(及付出),大溪档案,财政:金融,第四卷第二号(参见表 1.1,付出部分见图 13.7,表 16.1)

2004年11月李登辉在新竹选举时,有否认黄金运台的公开言论,曾吸引了许多海内外人士的关注,这当然是弥天大谎。笔者在洛杉矶招待记者,驳斥李罔顾史实的滥言(见第9章)。蒋经国的日记及其手撰《我的父亲》一书中,明明白白地写着:“这一批黄金,是很顺利地运到台湾了”。但李登辉与一些“台独”分裂分子的谎言也居然能混淆视听,使人顿生“时不我与”之感,要赶紧把60年前的历史真相找出来,还原给海峡两岸的老百姓。

2007年11月《馆藏民国台湾档案汇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巨册问世,促使笔者出版《黄金档案》(台北,2007年),其中也收罗了一些与黄金运台无关的近作,书出来后,知道虽是孕育十余年,但还是有些早产。2007至2008年底,笔者由美国两次前往厦门,勘察黄金运送路线及鼓浪屿岛上的中国银行地下金库;三次去上海,查1948至1950年的旧资料及外滩银行建筑群;一次去台北和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寻求国民党政府流落的档案,特别是有关中央银行运台金银的原档。

2008年7月下旬,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首度公开蒋介石抗战后及内战时期1946至1955年的日记,此日记在胡佛研究院原本的齐全性,远非大陆或台湾的手抄本或分类本所能比。蒋当时是国民党政府最高元首,日记里每日毛笔字的工整与坦率是中国历史上所罕见的(见图1.5),他是央行“现金”运台的原始计划者与推动者,尤其是“密藏”厦门



图1.5 (左图)蒋介石日记手迹(载《先总统蒋公百年诞辰纪念图集》)(右图)1936年12月13日西安事变时的蒋介石日记(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收藏)



的军费金银,先父是直接奉蒋之命令行事的。不加入蒋介石日记的记载,任何试图“解密”国共内战末期国民党政府的政、军、经重大事件的努力,都将是“隔靴搔痒”,国民党政府资金运台湾及用于内战,就是蒋在1948至1949年最重要的布局之一,影响深远,造成60年后今日的台海现况。

笔者于2008年9月驾车由洛杉矶北上来回十五六个小时,专程趋访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蒋介石日记里多次提及先父,每次日期均与先父记载相合。但账没有记,仅提纲领。作为国家元首,日理万机,只会择要而记,是必然的。笔者在本书中原原整整地呈现蒋有关日记与先父记载于读者眼前,以供读者及近代史工作者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原始资料。

例如,先父1949年6月12日的日记(图1.6)中有那天进谒蒋介石后的记录(详见本书第12章),为“密藏”黄金军费90余万两作“最后之决定”的分配;查同日蒋介石日记(在高雄要塞):“……见雷震、(林)蔚文、(洪)兰友、许朗轩、吴署长(嵩庆)等解决各种问题……”比较之下,对运台黄金整个事件的前后,蒋日记的简略隐晦可见一斑,尤其是密藏在厦门的军费黄金,更是“机密档案中的最高机密”(见第5章),两岸的“中央银行”档案都在此“消声”,不仅外界不知,连国民党政府高层都“噤口不

六月十二日 星期日 107

晨偕法襄理抵台,即吃乘舟回
高雄,呈制新报告,作最后之决定,大
意中^①法襄理于43万仍在厦
②法港款运台暂存
③约15万两交法勤
其中8万两为粮款
6万两为经费
今午请求下午抵台厦门,当晚即离,
连夜办公事,次日再办一天,但拂光一
段落,

图1.6 先父1949年6月12日的日记



提”。只有先父在1950年2月2日的日记中提及在台北“立法院”军费会议上“财政部”要提用此秘密军费金银时，感叹道：“……盖保管款本属机密事，现成公开。”（见第5章）。最近，在大溪档案电子档“厦门分行代付拨交联勤总部吴署长嵩庆黄金数量”（见表12.3）及《尹仲容与台湾经济的重建（1949—1953）》（见书末主要参考资料）一文中，出现厦门密金的支出总数是786540两及拨款日期与数量，但无细账。此总数与笔者2007年所估计的厦金支出为80万两（见敝著《黄金档案》）相契合。

蒋介石1949年的日记里记载着许多有关财经的关键资料，如下文。

1月15日（下野前6日）：

约见（俞）鸿钧、席德懋指示中央中国两银行外汇处理要旨，总勿使两行外汇为后来者消耗于无形，略为国家与人民保留一线生机耳。

1月21日：

本日为余第三次告退下野之日，只觉心安理得……密告孙（科）吴（忠信）金融与外汇之处置与实数。对（李）德邻实告其政治、军事及人事之部署。（按：此日蒋辞国民党政府总统职，金融实数里也应包括上文2月8日央行总裁刘攻芸告诉周宏涛的黄金量。）

5月19日：

……督导青岛之撤退与厦门存金之移动……

6月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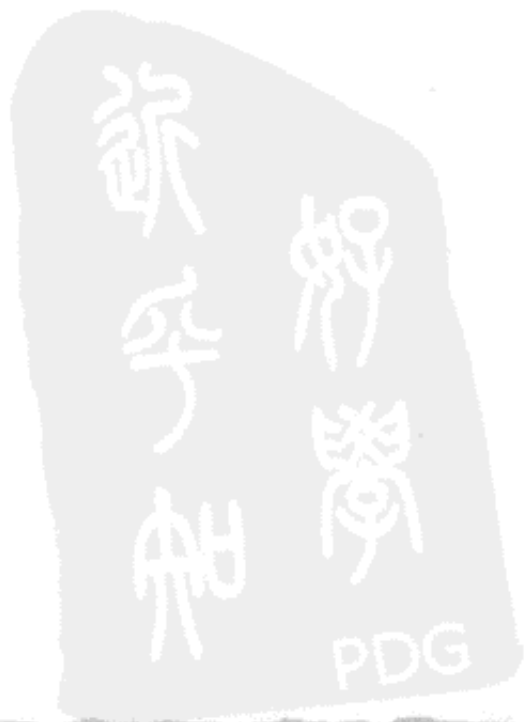
……台湾改革币制基金已经拨定，今后应以台湾防务为第一……鸿钧、（刘）攻芸、严家淦来见，报告外汇、头寸及台厦存金之支配，并指拨台湾银行基金共计五千万美金，此乃最主要之政策得以强勉实施为慰……[按：此基金就是两星期后发行的新台币准备金——80万两黄金（每两以50美元计算）与1000万美元外汇，此原为台湾省的地方货币，已稳固流通了60年。]

蒋介石日记里的用词如“存金”、“现金”、“现洋”、“现货”、“基金”等，是指黄金、白银及外汇，即国库资金的总称；另有国民党军队“抚恤基



金”，是1949年1月下野前夕，在南京拨给海陆空三军的数千万银元。先父日记里有关“现金”拨为军费案件则称作：“草约”、“手续”、“准备金案”及“绝密保管款”等。总之，巨额金银以百吨千吨计、辗转运送千里的事件，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空前绝后。1949年国民政府面临在大陆崩溃之际，此中国仅有的“现金”是万方瞩目的，不止李宗仁代总统覬觐（蒋介石5月2日日记：“李德邻留桂不来穗，其目的在要求军权与财权”），美国也以此借口拒绝援华（蒋介石7月3日日记：“美国务卿问顾（维钧）大使……‘何以不用台湾存金’”）。更重要的是，这是国家货币“金圆券”的准备金，是人民大众的财产，蒋就不得不隐讳其言，更要各位军政“领导”绝对保密，尤其是这密存厦门的黄金，更是绝对机密。60年过去了，此联结海峡两岸的巨大事件，应该到还原真相和解密的时候了。

这些年，笔者也在美国、台湾、中国大陆及网上搜集资料并继续访问与运金有关的耆宿，有先父旧时同事，包括海、陆、空、勤及新闻、财经等各界人士，颇有新“出土”的史料，这里要感谢许多位前辈与朋友的帮忙，当然缺失还是难免。本书把笔者十多年来追踪国民党政府“黄金档案”的真相及发掘先父的军费“密档”日记的来龙去脉，在“夕阳黄金之年”挥汗笔耕不辍，不容青史尽成灰，将此史实献给海峡两岸的百姓。



第2章 1948年——金圆券发行前后的中国形势

让时光回到1947年,那年3月国民党军队攻占延安(图2.1),10月进克张家口,但这是强弩之末,因为贪腐已深入国民党政府。外敌并不可怕,一棵巨木如从根烂起,不以贪腐为耻的时候,必会倾倒。



图2.1 蒋介石(前中)1947年8月7日巡视延安(前左为胡宗南)

孔宋贪污渎职动摇国本

就在对日抗战胜利的1945年7月,蒋介石查出行政院长孔祥熙“美金公债舞弊案”[蒋7月13日日记:“……而彼(孔祥熙)仍一意狡赖,可耻之至”]。为“安定国本”,蒋只能将孔之“中央银行总裁”职务撤去,由俞鸿钧继任,就把这大贪污案结了。也因而失信于民,从此国民党政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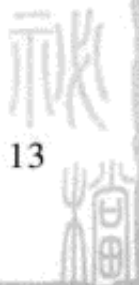
公债乏人问津,影响十分深远。另一方面,中央银行“始终不肯将实际存款数字”告知蒋,是换人的次一主要原因,但孔宋的心腹人员盘根错节,已渗透整个财经金融系统。不到一年,1946年3月到1947年2月,宋子文命贝祖贻(字淞荪,中央银行总裁)抛售黄金、外币,以回笼货币,稳定物价,共抛售350余万两黄金,并由孔宋两家的“孚中”、“扬子”走私套汇巨额美元。蒋在1947年1月31日的日记中写下:“……惟外汇基金日减,黄金减空,(宋)子文(图2.2)不学无术,败坏国事,不胜焦虑之至”。同时,法币剧烈贬值,1946和1947两年高达近500倍。



图2.2 (左图)宋子文与蒋介石(右图)1947年7月29日,《中央日报》登载孔宋集团贪污,由此可见国民党政府当年的新闻管制显然不够严密

打仗需要巨额财政支出,经济濒临崩溃,蒋心知“戡乱剿匪”胜算不高。军事上他也深知,国民党军队人数虽然庞大,但数目始终无法核实,即“吃空缺”普遍,许多将领不但腐败无能而且互相猜忌牵制。军令也不统一,非嫡系(杂牌军)受到军需及装备的不公待遇,因而士气及战力都十分低落;黄埔亲信则恃宠骄横,轻视解放军,认为有美式装备100个师以上,解放军是不堪一击。再者,党政组织庞大松懈,互相倾轧,争权夺利,左派及失意政客伺机兴风作浪,中共地下党渗透十分成功,重要军事情报泄漏殆尽,解放军有洞察机先之利。

1947年底,蒋介石在国事繁忙之际,又同时准备着两件事,一明一暗:暗的一件,是以他的亲信卫队为基础,成立一个“台湾警备旅”,为最后的



退路做长远准备；明的一件，是于12月准备召开国民大会，走美国式的政体，或想使中国永远是西方民主阵营的一员，但更重要的目的是，希望由这条路，能继续得到美国的大量军经援助。

但是，到了1948年，却是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大陆走向大崩溃的关键年。1947年底，先父离开武昌湖北省财政厅长的职务，被调到南京，担任国民党军队财务署署长。由蒋日记里得知，主要是蒋对旧军需系统已失去信心，要先父会同国防部与财政部协调，革新军中财务，核实国民党军队人数（即清除“吃空额”），以减少军费支出，降低巨额财政赤字。但这谈何容易？直到两年后，国民党政府败退到台湾，在50年代，先父才把蒋交代的任务完成（见第8章）。

这里让我们先看看1948年军、政、经、文四方面的大事件。

1月10日：蒋介石飞沈阳巡视并接见傅作义。一周后，设置“东北剿匪总司令部”，以卫立煌为东北行辕副主任，陈诚1947年8月起就兼任东北行辕主任。年初法币美元汇率已达200万：1（抗战初期为20：1），作为法币准备金的外汇与黄金已大半经由孔宋及财政金融界人士流失。



图2.3 蒋介石与李宗仁当选国民党政府首任正副总统，蒋未告蒋将着便礼服，让李穿军服，若蒋之侍从武官

2月1日：“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解放军攻击辽南。5日：行政院长张群向立法院报告，上半年国家支出为（法币）96万亿，收入是58万亿。7日：解放军攻占辽阳。8日：傅作义出任北平行辕副主任。25日：解放军攻占营口。

3月10日：国民党政府国务会议决定以4亿美元等值的金银外汇交中央银行作为法币准备金。16日：中国文物宝藏600箱由上海运台湾。26日：中央研究院选出萧公权等81位院士。

5月1日：蒋介石、李宗仁当选国民党政府民选正副总统（图2.3）。蒋介石于该年底的“反省录”中认为：

本年最大失败为政治,而政治失败之总因即在副总统主张党员自由选举之方式,尤其在选举前夕为李宗仁前来哭诉恳求,误信其被选后,彼不能有单独政治主张之诺言,于是支持孙科当选之决心动摇,对民青两党选票,任其选李,因之孙败,此乃余决心不坚。

13日:陈诚被免去东北行辕主任,后赴上海割治十二指肠溃疡。18日:国民党政府颁布“全国总动员令”(图2.4),表明“戡乱到底”之决策。24日:国民党政府翁文灏(图2.5)组阁,俞鸿钧为中央银行总裁。31日:王云五为财政部长。白崇禧为“华中剿匪总司令”。



图2.4 1948年5月国民党政府公布“全国总动员令”,7月行政院公布励行“全国总动员令”



图2.5 翁文灏(左)与蒋介石

6月15日:全国各地米价高涨,重庆发生抢米动乱。

7月3日:中美签订双边协定,美援4亿美元,美方保有随时停止援助之权。17日:解放军攻占襄阳。18日:中央银行发行最高额美金25万元(图2.6及2.7),等兑法币500万元。

8月8日: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发表半年剿“匪”战绩,解放军总人数达240万。现国共兵力为2:1,过去为3:1,国共兵力已开始逆转。法币美元汇率已达1100万:1,以美元计算,通货膨胀率每月达50%以上,民不聊生矣。



图 2.6 三张法币,从 1 分到 1 万(横排券法币最高为 1 万元),经过约十年,其间有全民御侮的八年抗战



图 2.7 两张直排为金圆券(1 元兑 20 元旧法币),是抗战胜利后的法币,1948 年 8 月为金圆券取代,25 万元(右)为最高法币金圆券

发行金圆券

8 月 19 日:国民党政府冀望于发行新币来挽救面临深渊的经济,起用王云五任财政部长,此日公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其要点为:准备发行金圆券,1 元合法币 300 万元,2 元兑银元 1 枚,4 元兑美金 1 元。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 21 日:蒋经国出任上海“经济管制督导员”。23 日:金圆券发行,以 5 亿美元等值的金银外汇交中央银行作为准备金(包括黄金 253 万市两,约值 1.4 亿美元,其余为银及外汇,见第 11 章),发行上限为 20 亿。由于金圆券发行仓促,来不及印刷新钞,就把库存的废券,即 1945 年由美国钞票公司印的 1 元(蒋介石像)、5 元及 20 元(林森像)、10 元(蒋介石像)、两种 50 元(孙中山及蒋介石像)及 100 元(蒋介石及林森像),及 1946 年由英国德纳罗印钞公司印的 1 角、2 角(蒋介石像),1948 年由国内中央印制厂印的 5 角,总共约 20 亿,正好用来当金圆券(图 2.8)。



图 2.8 这六张是全圆券初发行时(1948年8月23日)使用之钞票,由美国钞票公司印于1945年,原准备作法币用,但法币贬值太快,存库为“废券”

蒋介石 1948年9至12月日记择要如下。

9月4日:

蒋经国将沪上最大纱厂荣鸿元与杜月笙之子等拿交法庭,可谓雷厉风行。

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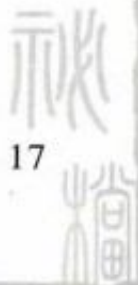
国家各银行外汇皆已集存中央银行,其总数约一亿余美元。

9日:

……商业银行李毓生等之奸诈,余欲严惩,而俞鸿钧则畏缩因循不敢任怨,故愤怒频作……

19日:

……改革币制与经济管制初见成效,而共匪又向我济南进犯,以余专事于经济之指导,而对于军事则反忽略,明知匪必进攻济南,本可早作准备一切,空运部队本定于一日开始,乃必为幕僚及前方将领浅见者所泥阻,未能实施,及至匪攻开始而机场被匪炮击,因之无法



空运,而东面阵地已为匪所突破,危急万状……

20日:

昨夜……接(王)耀武(图2.9)电,称第八十四师师长吴化文今晚投匪之报,不胜自惭。



图2.9 (左起)蒋介石、陈诚、王耀武

25日:

……昨日下午仍询济南战况,以至八时后气候恶劣空军无法飞济,终日愁闷。

26日:

……鉴于此次济南失陷……王耀武之败、夸妄不务事实而其工事方式之陈旧,且未一加演习与想象匪来攻之对策,可说疏忽荒唐极矣,此种军事将领,焉得而不败哉……

28日:

……今国防部各机构检讨济南失陷,各种之弊端与原因,最大者为高级司令部之人事与组织,中央不能控制与指导也。因之于济南第一,第三处长皆临变投匪,此为王耀武疏忽昏愚最大之罪恶……下午研究锦州战局,始报其机场已落匪炮弹,不能使用……锦州已入危局矣。



29日：

……近以济南失陷，美政府浅识官吏及其本来反华之徒，又生观望，可痛……



图 2.10 1938年9月29日毛泽东给蒋介石的亲笔信，仅仅过了十年，毛领导的中共已稳占优势

30日(蒋介石飞北平及沈阳“指导”锦州作战方略)：

……近日锦州战况深为忧虑，决飞北平指导……下午一时三刻到平与(傅)宜生商议作战方案……

10月1日：

……共匪将于双十节组织所谓“联合政府”，闻有推宋庆龄为主席……正午到西郊华北剿匪总部召集高级将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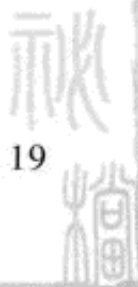
2日：蒋经国上海“经济管制”失败。

3日：

(在沈阳)召见廖耀湘、周福成……鼓励不成功便成仁。

4日：

……三年来，到沈(阳)三次，每况愈下……东北残败至此，皆由(美国)马歇尔致之，但余自胸无成竹，国家大政竟为外交牵累，不能自立，受制于人，因东北进驻大兵，而使整个国家陷此危境，诚不堪回



首,亦不堪设想矣……

5日,蒋介石登“重庆”舰(图2.11)。



图2.11 5270吨的“重庆”号巡洋舰

7日:

舰脏非常……严斥桂永清(图2.12)负责改正,惜乎所部更无海军人才,而彼以陆军将领来带海军不知负责学习,亦不知海军之常识,想念国事不胜忧闷之至。……[按:可见蒋对海军的失望,但桂是陈诚所推荐的。军统戴笠原也有野心想当海军总司令,抗战末就积极与美国海军情报机构合作,并在1945年9月把黄浦滩路(今中山东一路)29号划拨为美国驻华海军总部(图2.13),引发了美国海、陆军的内部斗争,而戴笠也于次年3月坠机身亡。]



图2.12 海军总司令桂永清



图2.13 1945年9月黄浦滩路29号被划拨为美国驻华海军总部(大门上有横幅布条)



8日：蒋介石赴上海。

9日：

……在沪朝课如常，经儿自无锡来见，在美亭中叙谈，听取其上海经济管制经过之报告，经济本为复杂……而上海之难，更为全国一切万恶诡诈荟萃之地，其处置不易可想而知。对于孔令侃（图2.14）问题，反动派更借题发挥，强令为难必将陷其于罪，否则即谓之包庇，尤以宣铁吾机关报攻讦为甚，余严斥其妄，令其自动停刊。访果夫病……访吴稚老于其寓所，狭陋黑暗，彼老乐如焉，召见吴国楨等，戒勉之……下午约会陈景韩、俞鸿钧、俞叔平等……（按：此日召见央行总裁俞鸿钧，应对国库的资金有所指示与安排，准备第一批黄金运台。）



图2.14 宋美龄与孔祥熙的子女在一起，左起为孔令杰、孔令伟（孔二小姐）、宋美龄、孔令侃



图2.15 着男装的孔二小姐

军经崩溃——蒋介石作下野准备

10月10日：

……锦州被攻甚急……太原危殆……令长春部队南下突围也……

秘



15日：蒋再飞沈阳，“督导各军激进赴援”锦州、长春。16日：解放军攻占锦州。

18日：

环境与局势虽甚恶劣，尤以高级将领，凡军长以上者，几乎多是贪污怕匪，以至军队枉然牺牲，而反加余之耻辱。思之无以自解，几乎无地自容，惟情势之黑暗，极有生以来未有如此之悲惨者，此时惟有天父之恩德……昨为旧历九月十五日余六十二生辰。

20日（蒋三赴沈阳）：

……上午九时半由平起飞，正午到达沈阳，即在飞机上与卫（立煌）杜（聿明）等检讨锦州方针……突围恐已绝望，为此心力交瘁，对部属与学生，已尽我职责，再无他道，听命而已，悲伤极矣。



图 2.16 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在 1949 年为蒋介石所信任（据蒋介石日记中显示，远超过总司令周至柔），是先父抗战前在航空委员会时的后辈同事，先父军费日志里常提到他

21日：

……下午接（王）叔铭（图 2.16）报告，称空军与郑洞国在长春上空通话，新七军官兵意旨全部动摇，与李鸿已失联络，该军已被缴械，惟郑仍在司令部正被围攻也，诚令人五中焚裂……

23日：解放军攻占包头、郑州、开封、长春。

30日：

昨晚李惟果携翁院长补充经济改革方案稿及其辞职书来见，经济改革计划与金圆政策似已完全失败，任何政策皆不能收效也……此军事经济同时失败崩溃在即之象……

当时左派报纸有以下报道（图 2.17）：（10月30



日)晚八时召见翁文灏、孙科、王云五、何应钦、于右任、张群等,表示东北军事已失败,问大家提出办法。



图 2.17 香港左派《华商报》1948年11月1日报道国民党政府内部10月30日晚的消息,而且似乎有预测相当准确的标题,令人惊讶,到次年1月21日蒋下野,刚好近三个月,其实这是蒋自己的评估

蒋介石的日记每周例有上星期反省录:

自本月十五日锦州失陷继之长春……各部队叛降,加之沈阳出击主力全军覆灭者,被匪消灭实有三十二师,此为我平生以来最大之失败,亦为余最大之耻辱,将帅非人,官长腐败,军纪扫地,只要粮款与空运物质,其实多为各级主管所中饱,政府以鞭长莫及,无权过问徒增全国军饷五分之二以上之负担,已为国家赘疣……

如上述,怎样减少40%的军费,是蒋交给先父的任务,但岂是一位财务署长就可一蹴而成的?国民党军队官长将帅的腐败,蒋介石自己心知肚明。何以致之?他也在反思,去台湾另起炉灶时已在脑中成熟,转移上海国库资金去台湾、厦门是必要的布置之一。

蒋介石10月的反省录认为:

数月来,以战事不利、经济拮据、外交艰窘,因之立法、监察各院之党员更形无法无天……可谓极人世之悲观。

10月31日(周日):

本日为余阳历生辰,忧患冷落为近年来此特有之风味。……沈

阳消息传说不一……

11月2日：解放军攻占沈阳。

3日：

本日美国杜鲁门当选总统而杜威落选，以后我国外交形势更为恶劣……

4日：

(经国报告)孔令侃囤积居奇，见其货单，痛愤之至……

5日：

……近军事经济形势险恶已极……甚至党报社论亦攻许我父子无所顾忌，此全为(孔祥熙)孔令侃父子所累，人心动摇，怨恨未有如今日之甚者……此日，美国开始撤退京沪侨民。

10日：王云五辞财政部长职，徐堪继任。傅斯年、王世杰等决定将伦敦故宫精品500箱，中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及中央图书馆之珍贵古物运台湾。

11日：蒋廷黻在联合国指责苏联扶助中共。

13日：陈布雷自杀于南京，更坚定了蒋介石转移上海国库资金去台湾的决心，作下野前的重要准备。22日：国民党军队第七兵团司令黄百韬将军(图2.19)碾庄兵败自杀。

24日：

党政军干部之自私、无能、散漫、腐败不可救药。若要复兴民族，重振革命旗鼓，能舍弃现有基业，另选单纯环境，缩小范围，根本改



图 2.18 1949年初的上海，在街上提着成网篮装的金圆券也不怕人抢，大家知道是不值得抢的



造,另起炉灶不为功,现局之成败,不以为意矣。

此一单纯的环境,缩小的范围,另起的炉灶,当然就是台湾,国库资金运送台湾也要开始了。

26日:国府翁文灏辞职,蒋总统提名孙科组阁。

黄百韬确已在碾庄之役自戕……呜呼尚有成仁之部属,悲感无已,而寸衷反为之一振也。

蒋为黄百韬之“忠心”所感动,更下决心要另起炉灶,继续奋斗。

28日:宋美龄飞美争取美援;30日:国民党军队放弃徐州。



图2.19 (左图)国民党军队第七兵团黄百韬司令官于1948年11月22日在碾庄兵败自杀,此为国共内战的转折点,对蒋也是一大刺激(右图)黄百韬曾获国民政府最高青天白日勋章,他去世后近十年,这枚勋章还救了他在台北犯杀人罪而被判死刑的儿子(黄孝先)一命

蒋介石日记1948年11月的大事记,其中:

14. 陆(军)大(学)移台湾,机械化部迁台。……17. (金圆券)基金监察会之召集与储存地点的宣布。18. 中央(银行)存款之处理。

这里提及基金监察会之召集与储存地点的宣布,就是命俞鸿钧将上海国库金银移到台湾。显见,把国库黄金移出上海,是蒋介石的计划,而不是《俞鸿钧传》所称是俞单独的“当机立断”。

从以上这些1948年里的大事件,可以看到中共在军事上开始取得绝对优势。蒋介石屡战屡败,对陆、海军将领的失望,经济的拮据、

外交的艰窘，立法、监察各院之党员之“无法无天”，使他感觉情势之黑暗，极他有生以来未有如此之悲惨，他此时已经在进行放弃大陆、积极经营台湾的准备。

第一批黄金准备运台湾

12月1日：上海国库金银开始运台湾，在1948年底前运的是第一批共黄金260万两及400万块银元，这一晚是第一船次200万两黄金运台湾基隆。

这里的部分黄金与银元是民间“搜括”来的。如前所述，在金圆券发行的第二天，以“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规定人民必须向政府“兑出私有黄金（1市两为200元金圆券）、美钞（1元兑4元金圆券）及银元（一块袁大头兑2元金圆券），逾期不得私藏”。为“拥护”政府或怕触法，有些老百姓排队兑换。据国民党政府所公布的资料，由中央银行在上海一地就收兑了美钞3400万，取得黄金110万两及银元500万块，占全国70%左右。面对一个组织松懈又无效率的国民政府，绝大多数老百姓刚刚亲历法币巨贬，不是傻瓜，会为一纸命令老老实实地把金银外币全部上缴吗？如后章所述，此搜刮的100多万两黄金（极可能低报）只是民间藏金的小部分。连蒋介石都知道这一点，1948年11月3日他记下：“自金圆券以来，中小级人民，皆以其所藏金银外钞依法兑券表示其爱国……”但中小级人民所藏金银究竟是少数。发行金圆券不到半年，最高面值钞票500万（图2.20右上）出笼，但其实际价值不及初发行时的5分钱。

如前所述，在金圆券发行后的两个月沈阳失守，东北全陷，国民党军队丧师30余万，解放军开始大举入关，压迫平津外围，“徐蚌会战”（中共称之为华东区淮海战役）开始，11月下旬黄百韬兵团覆没，到月底金圆券已贬值数百倍。

12月初，国府黄维兵团在双堆集瓦解，放弃徐州，到次年元月10日杜



图 2.20 金圆券发行五个月,1949年3月,5万元、10万元金圆券(中上)大钞即已上市。到4月,100万元(中下)及500万元(右上)巨钞出笼。解放军渡江进入南京时(4月23日),金圆券更是狂贬。到7月2日,广州、重庆在蒋介石的坚持下(见第6章蒋1949年4月24日日记)发行新币银圆券(右下三张),与现银元等值混用以减少银元支出,1元银圆券兑5亿元金圆券

聿明所率13万徐州剿总的余部在徐州西郊青龙集、张庙堂一带被围,邱清泉率国军主力(十二兵团)在陈官庄兵溃自杀,杜聿明被俘。而华中剿总白崇禧已连番要“实行和谈”,向蒋介石施加压力。到元月21日,蒋介石总统宣告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但蒋在下野前后,对于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国库的金银外汇早做了安排。



图 2.21 此两张是民国史上最高面值纸币,上为金圆券500万元,下面紫色币为罕见巨钞——新疆省币60亿元



第3章 1948年第一批(第一船次) 国库黄金运台

1948年12月2日凌晨,也就是1日夜晚,外滩全面戒严。英国记者乔治·瓦因(George Vine)住在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北楼)靠中国银行一边的客房。午夜过后,他向东望,虽在全面戒严下,从昏暗的路灯下依然可以见到岸边的“海星”号,甚至护航军舰;他向西望,可望到中国银行的侧门(今滇池路74号)及圆明园路口,挑夫或两人挑一箱,或一人挑两箱,从滇池路走向海边(图3.2,有树处),一艘500吨级的海关缉私舰(图3.1)停靠在黄浦江边上。做新闻记者的语不惊人死不休,他凭着专业的直觉,就断定所挑体积小而沉重的担子里,必定是贵重的黄金,便立刻从黄浦滩路20号的华懋饭店内,把中国银行内运出黄金的目击情况,向伦敦、向世界发出以下电讯:“……中国的全部黄金正在用传统的方式——苦力运走”[Sterling Seagrave, *The Soong Dynasty*(《宋氏王朝》), Harper Perennial, 1986, 第44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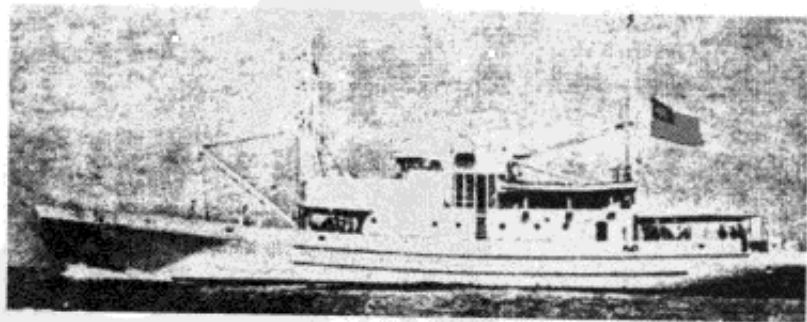


图3.1 1948年12月运第一批上海国库金银到台湾及厦门的500吨级(满载700吨)海关缉私舰“海星”号的同型舰



外滩中国银行金库

2006至2008年,笔者四次飞越太平洋来到上海,查找上海档案及实地勘察外滩,首先为解一个谜:为什么从旧黄浦滩路23号的中国银行里,运出24号中央银行(图3.2)的国库黄金?

由中国银行与和平饭店之间小路(今滇池路,图3.3)步入中国银行之后院,答案就浮现出来了。原来中央银行的国库黄金及银元存在中国银行后院地下室的金库里,现在有武警在外站岗,当然无法进去一探究竟。但其中有一部分开放给一般民众,我们沿着一个螺旋梯向下走去,下面豁然开朗,有存户在查看自己的贵重存物,玻璃门上写着“远东第一大库”,“始建于一



图3.2 中为中国银行(黄浦滩路23号),左侧为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北楼),与中国银行有滇池路相隔,右侧白色六层楼即原中央银行(24号)

一九三七年”,即是日寇全面侵华的那一年。中央银行的地下金库应该是在同一层附近。就像旧时修机场,一部分作“军用”,另一部分作“民用”。我们所能看到的大概是“民用”部分。登上和平饭店楼顶,向东面望,就可看到黄浦江(图3.4),现在是游客云集的外滩江边公园。当年(1948年)12月1日的午夜,缉私舰“海星”号就停泊在岸边,不远处还有一艘军舰“美盛”号(或“美朋”号)(图3.11)在巡航监视。从江边往西看(图3.2),23号(中国银行,17层)与24号(中央银行,6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日本正金银行)之间只有一条小巷子,从和平饭店北楼上面是看不见的。所以,那晚挑夫应该是由中国银行与和平饭店之间的小路(今滇池路)走向江边的(图3.3)。





图 3.3 由中国银行旁门(今滇池路)进入银行地下室,即原中央银行的国库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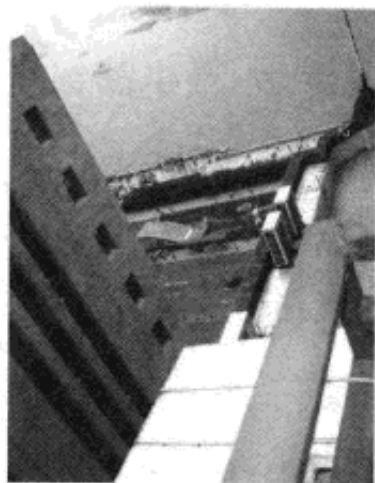


图 3.4 登上和平饭店北楼顶,向东面望就可看到黄浦江,其邻楼即中国银行



图 3.5 19 世纪末的上海外滩,右侧是黄浦江



图 3.6 1911 年辛亥革命时的外滩



图 3.7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的上海外滩



图 3.8 30 年代末,中国银行(最高方顶楼)已建成(1937 年),沿江都是码头,最左有尖塔的大楼为海关大厦



图 3.9 国民党政府运金时候的上海外滩。1948年年底、1949年年初，黄浦江码头边充斥着美国货，除了可口可乐的招牌外，图中间下方敞开门的新型普利茅斯轿车(Plymouth, 1948)也已越过重洋，停在路边。还有许多军车



图 3.10 今日外滩是江边公园



图 3.11 替运黄金的海关缉私舰“海星”号护航的“美盛”号及“美朋”号的姐妹舰“美益”号

国民党政府央行偷运黄金

乔治·瓦因发出电讯的次日,英国报纸就刊登了这条新闻,路透社也发布以下新闻:“国民党政府央行偷运黄金”。香港左派《华商报》(1948年12月3日)及其他报纸也转载了这条消息(图3.12)。



图3.12 路透社于1948年12月2日向全世界发表国民党政府央行偷运黄金的新闻[香港《华商报》(1948年12月3日)]

另据中央银行档案,几天以后,宋子文又命上海央行提银元1 000万元(共2 500箱,每箱4 000枚),也是从金圆券准备金里提出的,于12月8日利用淞沪警备部(司令陈大庆)夜间戒严时,以招商局的“海沪”轮运去广州[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党政府撤离大陆前向台北厦门密运现金一组资料》,载《民国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出版的季刊,下同)1989年第1期,第53页],但没被媒体、社会及一般民众注意到。

12月1日深夜的运金行动,不只轰动上海,也震惊了全中国,长沙的湖南省参议会首先通电全国:“这些金子都属于全国人民所有,是三个半月前(1948年8月19日)以发行金圆券强迫收购来的,来自民间,作为金圆券的准备金,随意移动会影响老百姓对金圆券的信心。”上海人心惶惶,没过几天



就在中国银行门前发生了震撼世界的黄金挤兑(Gold Rush)事件(图3.13)。国民党政府在中国银行以远比黑市价格低的纯金,有上百倍的利润及保值,让市民拿1000元金圆券(每日牌价上调)兑换黄金1市两,但每天限售1000两,先来先购,于是成千上万的市民都到银行外面去排队。

黄金挤兑惨剧

据上海《大公报》12月9日记载:“……中央、中国、交通、农民(银行)于11月21日起开始办理存兑至12月6日,共兑出黄金15617两(合金圆券10551万元),兑出银元941341(合金圆券9413100元)……”上海《申报》12月27日刊登:各地“国行所兑出金银,仅占库存廿分之一”,如以库存黄金400万两计,则兑出黄金全国为20万两(见表6.1,图3.13,3.14)。外滩拥挤成人海,让举世看国民政府的笑话,最后以挤死挤伤多人告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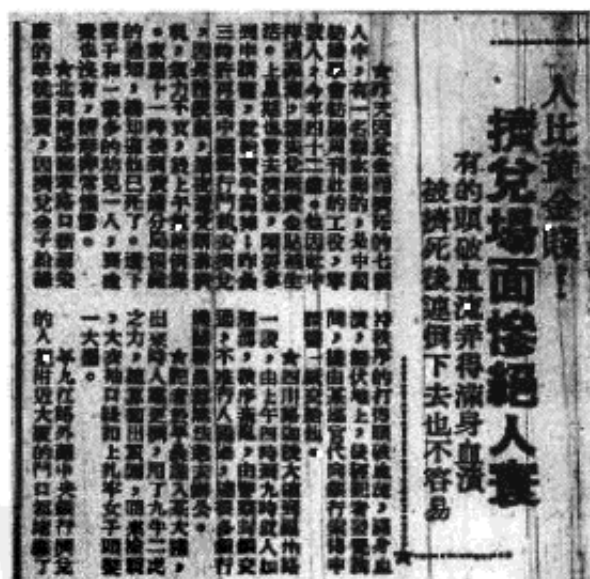


图3.13 1948年12月24日,上海《大公报》刊载黄金挤兑惨案,都是金圆券剧烈贬值惹出的人祸。如果当时台湾没有上海央行国库运来的数百万两黄金与数以千万以上之美元外汇及纯银,此惨剧也会于次年6月15日新台币发行后,在台北街头上演。在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或早为通货膨胀的巨啸在1949年底、朝鲜战争爆发(1950年6月25日)之前所冲毁淹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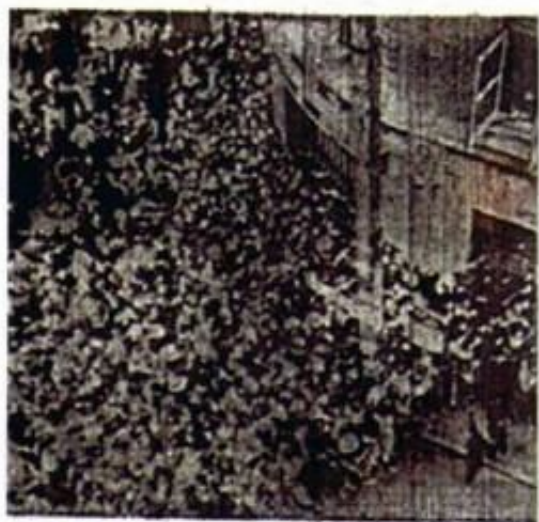


图 3.14 (左图) 1948 年 12 月 24 日上海《大公报》刊载黄金挤兑惨案场景 (右图) 中国银行后门 60 年后近影

图 3.14 (左图) 1948 年 12 月 24 日上海《大公报》刊载黄金挤兑惨案场景 (右图) 中国银行后门 60 年后近影

现在要从以下各点来试着还原历史的真相:首先是 12 月 1 日深夜,究竟有没有黄金由上海外滩运出? 英国路透社于 1948 年 12 月 2 日向全世界发表国民党政府央行偷运黄金的新闻是否可靠? 若是事实,这一次到底运出了多少两金子? 由何人决定运出? 其次,究竟由哪种方式运出? 从上海运到哪里?

从大陆撤退到台湾之最初二三十年,台湾当局对于黄金运台的事都噤口不言,而主持其事的人,包括先父在内,也绝口不提,因黄金运台的事情,从大陆民众观点来看是民怨极大的。

银元又流通

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失败,金圆券快速贬值(见图 2.21 最高面值国币金圆券 500 万元)。以银元(图 3.15)与金圆券的兑换率来看,到 1949 年 1 月,从开始的 2 元金圆券换一块银元涨到 1 000 元兑一块,到 4 月 23 日解放军攻进南京,已经超过 1 000 万元兑一块银元。8 个月来,通货膨胀超过 500 万倍,也就是说,如果家有 100 万美



金,换为金圆券后,8个月后,这400万金圆券,只能换回美金2角!而且,再过三个月,就不到美金1分钱了。这样,国民党政府如何还能不失信掉民心?

广东省(浙江、新疆、海南等地也曾印出地方银元兑换券)于1949年6月6日发行大洋票,以银元十足做准备金,用到10月12日解放军进广州。当时国民党政府在穗都使用银元(图3.15)发薪水。但是100块银元就重达2.7公斤,不是很方便。广东省银行发行大洋票填补这个空白。实际上使用不到一个月,因为7月2日国民党政府又发行了国币银圆券(见图2.20),大洋票就失去了流通的价值,剩余的就运去台湾,到2007年才在高雄销毁,但这些大洋票先早已充斥于旧币市场(见图16.10)。



图3.15 民国时期通用之银币:上左及上中为孙(中山)大头(或称船洋),1949年曾在旧金山新铸此银币3000万枚以上,因百姓信任银元,其价值高出当时银的成本二至三倍;上右为孙小头(开国纪念);下左及下中为袁(世凯头像)大头;下右为袁之半圆(中圆)



图3.16 民国时期通用之晚清银币,铸造于光绪及宣统皇帝时。左是1元(含银七钱二分),中为2角银币[重量相当于1949年新台币的5角银币(图16.6)],右为半圆的正反面(含银三钱六分)

海关缉私舰“海星”号运金

此外,当年参与金银外汇运台湾的军经人士都是替蒋介石总裁办事的人,蒋曾千叮万嘱要守密,在台湾谁敢随便谈此事?但是,国外与大陆

人士就可以尽量发表与发掘史实。1975年哈佛大学出版《中国海关总税务司(1868—1907)罗伯·哈特信件集》(*Letters of Robert Hart, Chinese Maritime Custom, 1868—1907*),由费正清教授等三人主编,由最后一任外籍总税务司美国人李度(Lester Little)做序,在此书第30页,他写道:

国民政府对海关的依赖(除了海关的收入之外)再一次显现在1948年末,国民党政府要总税务司以小小的缉私舰把80吨的黄金(按:约260万市两)及120吨银元,从上海国库转移到台湾。

这项记载被很多人引用,包括一位赵淑敏女士,她研究海关有年,在她所作的《中国海关史》中也有所提及。她在1985年给台北《传记文学》刘社长(绍唐)的信中就提道:

有人又说黄金是1949年5月某一深夜,由当时国民党政府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密派军舰,载运去台湾的。我不知哪一说是正确的。

现在,60年过去了,再来回顾此段史实,才知就如瞎子摸象,众说纷纭了,其实都对。在1948年12月(到1949年元旦次日,见下)用缉私舰运的两次,是第一批。第二批是先父吴嵩庆(当时担任国民党军队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简称联勤总部——的财务署长,掌管全国国民党军队费)经手的,是在次年(1949年)1月20日前后,约90多万两(大约33吨),是由海军运去厦门海军码头再转鼓浪屿(第10章),就是赵女士所提的“军舰密运”,但时间不是5月。另外,在2月7日至9日用中航(中国航空公司)及军机运的60万两到台湾是第三批。到5月运第四批的20多万两时,已是兵荒马乱,上海外滩码头上全是准备撤退的军队,哪需要“密派”军舰?

前中国总税务司美国人李度所提的80吨黄金是否正确,是历史上亟待证实的,首先要问谁有权把中华民国国库黄金转移库藏地点?答案是中央银行总裁,当然幕后是蒋介石在主持(见第2章1948年11月的大事记),1948年12月谁是总裁,是俞鸿钧。他是那年5月接张公权央行总裁位置的。这是俞第二次担任央行总裁,请看表3.1:



表 3.1 国民党政府在大陆时历任中央银行总裁、财政部长与行政院长

中央银行总裁	央行总裁接任时间 (开始于)	财政部长	行政院长
孔祥熙	1933年4月	孔祥熙	孔祥熙
俞鸿钧	1945年7月	俞鸿钧	宋子文
贝祖贻	1946年2月	俞鸿钧	宋子文
张公权	1947年3月	俞鸿钧	张群(蒋中正)
俞鸿钧	1948年5月	王云五	翁文灏
刘攻芸	1949年1月	徐堪	孙科
	3月	刘攻芸	何应钦
徐堪	6月	徐堪	阎锡山



图 3.17 翁文灏(中)、徐堪(左一)及黄仁霖(右一)(参见图 4.4 中俞鸿钧、王云五等财经界人士)

俞鸿钧奉蒋介石命令运第一批黄金去台湾

俞鸿钧第二次担任央行总裁是 1948 年 5 月 19 日。那年 5 月 1 日南京行宪国民大会选出蒋中正、李宗仁为正副总统后闭幕。该月底翁文灏内阁组成,以仅受小学教育、自修出身的王云五为财政部长,三个月不到,

就发行无足够准备金的金圆券,于8月19日深夜以“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的名义公布。其要点为: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

据台北王绍斋等著《俞鸿钧传》(第174至180页):

……上海央行黄金疏运来台,支持台湾渡过最艰险的时期……

……民国三十七年(1948)底,大陆军事逆转,局势迅速恶化。10月,整个东北九省沦于解放军之手,12月,徐蚌会战失利……举国上下,惶惶不可终日。便在这个国脉如丝,危疑震撼之际,俞鸿钧鉴于上海中央银行里库存的黄金是国家金融命脉,唯一重要资产,因此他毅然决然的做了一个决定……将中央银行库存黄金运到台湾,以策安全。当时俞鸿钧系以其亲信干部——央行秘书兼机要主任何善垣、央行秘书处处长陈延祚分司内外勤工作。由他亲自领导,组成了一个最机密的工作小组。由陈延祚负责对外联系交涉,调用海军舰只、部署沿途警卫、洽请实施戒严、安排驳运人手……内部,则在他的总裁办公室后面腾出一间小办公室,由他和何善垣食于斯,住于斯,撰拟、核可、缮校、用印于一切必要公文于斯,自始至终,足不出户。第一批黄金起运之夜,军方实施特别戒严,上海外滩一带断绝交通,行人车辆一律严禁通行。直到严密装箱的黄金一一安全运上海军巡逻舰,解缆启碇驶出吴淞口,外滩一带方始解除交通管制。然俞鸿钧又在办公室里焦灼紧张,绕室彷徨,惟恐解放军拦劫,或是途中万一有失。他一连几天几夜不眠不休,坐立不安。最后,终于接获台湾方面发来的密电,所运黄金全部平安抵达。他这才长长的吁一口气,如释重负的到上海北火车站去搭乘火车。这时候,国库存金已经有绝大部分运到台湾了。

……库存黄金运送台湾一事,完全是俞鸿钧个人鉴于时局逆转,默察形势,当机立断,所作的一项重大决定。因此他在黄金安然运抵台湾之后,必须由上海连夜乘车直驶南京,向最高当局当面报告。……两天后,上海第一大报申报出现了一则简短的消息,某夜中



国银行曾运出物资若干箱。是什么物资,一共运出了多少箱来?一概语焉不详。至于把中央银行错成了中国银行,那是因为两行本来就比邻而设,而且还共享一条巷子进出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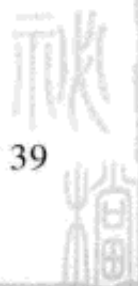
此书是1986年出版的,蒋介石已于1975年过世,强人时代已进入末期。台湾继任领导人蒋经国,糖尿病等慢性病缠身,风烛残年,于次年(1987年)10月毅然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并开放台湾民众大陆探亲。在这种时代的潮流下,《俞鸿钧传》的作者才能提到大陆黄金运台的敏感往事。

但是,这段记述中有些明显错误,首先,由俞本人单独作此当机立断的一项重大决定,这可能吗?这牵涉到中央银行之外的其他独立机构,像海关、陆海军,以央行总裁有权调动吗?其次,并非由海军的军舰运送,而是用海关缉私舰运送,军舰(“美盛”或“美朋”号)仅做护航的工作。如前述,此批黄金确如报载,是由中国银行运出,是“俞传”作者错了。

此件极为重要的关键决策,若无当时在南京的蒋介石总统在幕后决策,那位俞总裁就实在是太“胆大妄为”了,相信俞之能再任央行总裁,也是蒋刻意安排的!且看这一年的前几个月蒋的行踪及动作:5月18日,他颁布“全国总动员令”,表明“戡乱到底”之决策;9月27日,解放军攻克济南;10月2日,蒋巡视沈阳,已知东北整个局势恶化;10月5日,抵天津,了解整个华北也须做最坏打算。巡视完东北及华北后,10月8日到上海,10月9日召见俞鸿钧及蒋经国,极可能蒋于此日已指示俞应做最坏打算。照前述,蒋日记到11月里已决定把央行大部黄金转移“储存地点”,此“安全地点”就是隔海的台湾。

之前,蒋介石在1946年10月21日偕夫人宋美龄访问台湾,于27日在台北发表感想说:“以台湾教育的普及,社会基础的健全,三五年之后,必可成为中国之模范省。”虽是官方文告,可谓印象良佳,尤其中共打游击出身,没有海空军的基础,台湾海峡就可成为安全的天然屏障。

这种以台湾为未来国民党之“复兴基地”、逃亡之“避风港”,或正如他自己日记里所说:“缩小范围……另起炉灶”(1948年11月24日)。如前述,早在1948年2月,蒋以自己官邸卫队中的亲信官佐作为基础的一支“台湾警备旅”已经在台成军(俞济时:《八十虚度追忆》)。原任卫队副



的王惕吾[后以运台黄金开办《联合报》及《世界日报》(美洲版)]即担任其中第二团团团长。“台湾警备旅”在1950年普遍缩编的情势下,反而逆流扩编为一步兵师(郑为元,《撤台前后的陆军整编(1949—1958)》,载台北“国防部史编局”《军事史评论》1998年第12期)。

1948年11月初沈阳失守,东北全陷,国民党军队精锐的32个师完全丧失,解放军大举入关,淮海战役开始。该月下旬,黄百韬兵团覆没。11月28日,宋美龄飞美,争取美国给予紧急军事和经济援助,但遭杜鲁门总统之冷落(回顾她六年前也是同时节访美在参众两院演说的风光无限,能不令人浩叹?)。除战场上失利外,蒋此时又紧受李宗仁、白崇禧为核心的桂系的压力,要逼他早日下野。腹背受敌,他心知,央行这些金银美钞必须在下野前移送安全地点了。

至于运出的时间与国库金银的数量,就要从其他相关文件数据来作客观交叉查证。从10月9日得到蒋的指示,俞鸿钧已经开始做万全的准备工作。更有以下近期资料为证。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中央银行档案记录

2006年1月1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公布之《馆藏民国台湾档案汇编》,包括一项1948年11月29日中央银行发行局签呈:

谨密呈者:上周据台处沈代表祖同来局密洽,已奉钧座密谕,向职局接洽移动库存准备金项下之一部分黄金至台北存储,当经面请钧座核示移动办法。奉面谕,此项移动之船只,由沈代表及粤行丁经理负责办理。职局应先将库存内之黄金贰百万两,先行妥为装箱,备运台北,由台处沈代表祖同负责妥密保管,并飭指派押运人员及长川驻台北协助沈代表照料库储者二人,让沈代表指挥监督等因。自当遵守。兹已将黄金装箱手续完成,计共柒百柒十四箱,合纯金贰百万零四千四百五十九市两点五零陆。兹又据沈代表、丁经理通知,洽妥海关海星巡舰装载,海军总部美朋舰随行护航,准予十二月一日午夜装运,首途至基隆登陆转台北。职局拟派一等专员兼出纳科主任陈



舜、襄理何驥、调拨科主任瞿锦波、副主任刘光禄等四员，随舰押运。其中陈、瞿两员因在沪职务重要，押运到达目的地妥交后，仍即返局，何、刘二员拟属长川驻台，归沈代表指挥。监督服务。

上项黄金俟装出后，拟即在金圆券库存现金准备下付出，列记寄存台处户名列帐，并密报“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核审。所有奉命筹运情形，理合具签呈报。是否即装洽妥舰只运存台及拟派押运或留驻人员是否允当之处，统祈钧座核示，以便遵办为禱。谨呈

总裁

副总裁

发行局 密呈

卅七年十一月廿九日

附注 奉总裁批：照办 十一月廿九日

此处总裁是俞鸿钧，副总裁是刘攻芸，此一关键文件其实部分引自《民国档案》(1989年第1期，第51至52页)之《国民党政府撤离大陆前向台北厦门密运现金一组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并有以下来去电文摘录：

11月29日 代电警备部，告知戒严时装运人员活动地区，请加派警卫并协助(代总裁批发)。发电10784。

12月1日 代电驻台沈代表，告知妥密存储、负责保管，并为协助办事起见，派何襄理、刘副主任长川驻台。发电10783。

12月3日 函警备部包参谋长送还通行证、臂章等件(陈副局长私函)。发文5771。

12月4日 陈、瞿电复到基。

12月5日 抵台北进库。

12月8日 电告何襄理、刘副主任凭运送请单，另立纪录簿记帐，并填制收付报告表寄局。发电10889。

以上档案证实了美国人李度的说法，但不是80吨黄金，而是2004459市两，是62.64吨，连箱子也不可能将近80吨(纯金是69美短吨或61.65英长吨)。箱子是774箱，平均每箱装纯金81公斤(约178磅，



2 600市两),如每箱里是六块金砖,每块体积只有 650 立方厘米(乘以纯金比重 19.32 则近 400 市两一块)或 15 厘米长×10 厘米宽×4.4 厘米高,比一般砖墙的砖头还小些。

这里也点明,这些金子是“金圆券库存现金准备(金)”,还需要“密报‘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核审”。明显地,这批黄金是属于全中国老百姓的国币准备金,只是转移“储存地点”,大半流入台湾银行及台湾民间(详见第 16 章),但也支撑了台湾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的经济与军费,其余做了新台币的准备金,稳定了新台币,为开展台湾半世纪的经济发展和起飞打下了基础。到今日,台湾国库还存有当时大陆运来的“原金”约 100 万市两。

此外,据曾任中央银行副总裁的李立侠(原任稽查处长)回忆:

……午夜由上海装载,当时整个外滩戒严,这批总数为二百万四千余两,由海关缉私舰“海星”号装载,并由海军总部派“美盛”号护送,运至基隆登陆。第二批运走五十七万两千余两(按:约 18 吨),仍由“海星”号装运,“美朋”号护送,在厦门登陆。

此段李立侠的回忆,提到另外的 572 000 余两(《远望杂志》1992 年 2 月 1 日),在 1948 年年底运离上海。这 18 吨已经包括在李度所说的海关缉私舰所运 80 吨黄金里面了,运出上海时间是在 1949 年元旦夜(见下文中央银行档案)。但从哪个仓库运出却是一个谜,因为 12 月 1 日以后不久,上海滩的中国银行日日夜夜已受挤购黄金的群众所包围,应是由也存有国库金银的汇丰银行或四行储蓄会的仓库运出(见第 9 章中魏曾荫的回忆)。

据李立侠所知,1948 年 12 月 31 日俞鸿钧曾经向蒋介石报告:

……已妥运台北黄金 2 004 459 市两。又运出黄金 151 箱,合纯金 572 899 市两。银币 1 000 箱,合 400 万元,借用海关巡舰“海星”号装运,前往厦门。

据留在大陆的李立侠又说:

……仍有从南京等地劫掠到上海的黄金、白银来不及转运台湾,



陆续存入上海中央银行,待运台北和向广州等地疏散……

查《民国档案》(1989年第2期,第69页)中《国民党政府撤离大陆前向台北厦门密运现金一组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央银行发行局签呈(1948年12月31日):

谨密呈者:奉面谕应将现存准备金项下之金银设法装运履行保管。等因。自当遵办。兹已向海关洽妥“海星”巡舰一艘,准予明晚密为办理装运手续,计装黄金一百五十一箱,计重纯金五七二,八九九.四八七市两,银币一千箱,计四百万元。并请海军总部派“美盛”舰随同护运,职局派副主任刘华伦、魏曾荫、李友仁及办事员陈子豪随轮押运赴厦,除刘副主任华伦及办事员陈子豪拟即留厦归厦门吴经理指挥,会同该行主管课办理库务外,其余魏李两副主任拟俟任务完毕,即行返局。再,查该轮须于明日(元旦)夜间开始装船,翌日(二日)清晨启碇,所装金银在元旦例假日无法做帐,且因本月决算关系,故拟即在本月职局库存现金准备金项下付转“寄存准备金帐厦门户”。以上各节,是否可行,理合签请钧核示遵。谨呈

总 裁

副总裁

发行局 谨签

十二.卅一.

此处提到“海星”号(按:记录里,它由上海去过厦门一或两次)同时运18吨金子及120吨银元,“海星”号的全载重最高为200吨(详见附录1),应该足可装载。据厦门的资料,这批金银是短暂存在厦门的中央银行的金库,由分行经理吴本景负责看守,因是经由民用码头,运送时一个银元箱子跌破,而消息泄露,为新闻界知悉。

最近,2006年1月1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公布之《馆藏民国台湾档案汇编》也重复以上资料,黄金量都与李立侠回忆相符合。据台湾大溪档案称,在1949年2月7日有黄金555 000两运达台湾(表1.1),时间与数量应是这572 000余两的大部,但少了17 000多两。

这里李立侠的回忆及俞鸿钧 1948 年 12 月 31 日(按:从上述《民国档案》的数据看应是稍后几天)给蒋介石的报告是属于第一批里的第二船次,俞向蒋报告又运出 57 万多市两,先后这两次共达 2 577 000 多市两,也就是 80 多吨,如用英制长吨,就是 79.3 长吨,与李度的报告完全相符:共运出约 80 吨黄金。第一批由上海运出的黄金,分两次由海关缉私舰运送,那第二船次的 57 万两,应该是 1 个月内就由国民党军队的海空军运到台湾,即大溪档案所记载的在 2 月 7 日运达台湾入库(表 1.1)。此与蒋介石下野前后用军舰运往厦门的第二批由先父经手的 90 余万两的“军费黄金”没有混在一起,秘密军费金银经由海军码头,放在鼓浪屿的中国银行地下金库里(图 3.18),由蒋介石亲信部队看守,完全保密,其中大部支持大陆国民党军队作战。另外,如上述,那些银子也是由“海星”号同时运的。海关缉私舰“海星”号在那一个多月里一共跑了两次,一趟去基隆,一趟前往厦门。可确定的是,1949 年 1 月下旬以后,“海星”号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停泊在黄浦江,它的船员拒绝再为国民党政府运国库金银了。



图 3.18 厦门鼓浪屿岛上日光岩下的中国银行金库(黄色)曾藏国库黄金银元(1949 年 1 月至 8 月底),解放军于 1949 年 10 月中旬进入厦门,15 日夜国民党军队撤出鼓浪屿

李度所说的 120 吨银子,就是这 1 000 箱银元了(4 000 块银元或 108 公斤一箱)。收集民国银元的人都知道,每块“袁大头”(有袁世凯的头



像)重量在26.7克左右,如一块银元少于26.5克,则伪造机会很高。如果超过26.5克一枚,厚度又没增加,那真的成分就高了。因为银比铜、镍、铁都重(银比重是10.5,铜、镍是8.9,铁是7.9,而纯金是19.32),如以这400万枚银元乘以27克,那么120吨的银元重量就出来了!所以,李度以他海关内的保密数据,在1975年已经告诉了世人,由海关缉私舰在1948年年底前后30多天已经运出上海国库的金银大概数量。

此外,美国的情报,也与李立侠、俞鸿钧、李度以及《馆藏民国台湾档案汇编》(2007年)所公布的资料相合。当时的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在1949年1月28日晚10时收到上海总领事恰伯特(John M. Cabot)的一份电报:

……上海市长吴国桢于本日会谈中,明确透露,200万盎司黄金已转运到台湾。……上海尚存80万盎司,其中50万盎司以上正在运输中……

吴国桢只说了部分实话,另外那作为军费的近百万两黄金,也已于1月21日蒋介石下野前后开始运出,难道他不知道吗?此外,美国情报或许只靠亲美的吴国桢透露,而不知道吴并不在蒋的权力核心,今天从蒋的日记可知,吴国桢只是国民党政府给美国人看的一位亲美的“样板人物”(初到台湾让吴出任台湾省主席,以获取美国的军经援助)。海关的李度不知道第二批近百万两黄金的军费,是因为没用海关船舰运。此外,“尚存80万盎司”也是低估,如上文据留在大陆的李立侠说,1949年1月后,“仍有从南京等地劫掠到上海的黄金、白银来不及转运台湾,陆续存入上海中央银行,待运台北和向广州等地疏散”。另外,中央银行以外的公私银行的黄金并没有包括在这余下的80万盎司的数目内(详见第11章)。

这第一批分两次运出黄金、银元,应是由俞鸿钧秉承蒋介石的指示办理,俞如此尽心尽力,在蒋政权风雨飘摇之际实在令人刮目相看。他也是一位扭转乾坤的人物。现在我们就看看俞鸿钧是何许人也。



第4章 俞鸿钧——第一批国库黄金运台主持人

俞鸿钧的生平

俞鸿钧是广东新会人,生于1898年,卒于1960年。父廷桂在上海经管猪鬃工厂。他于1919年毕业于沪上圣约翰大学西洋文学系,在校英文造诣好,即留校担任助教,旋任陈友仁(1878—1944,是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的女婿)创办之英文《大陆晚报》记者。1926年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汉,由鲍罗廷(图4.1)鼎力支持的陈友仁在左派把持的汉口成立的政府里担任外交部长,俞被任为外交部秘书。



图4.1 1926年7月北伐出发前的照片,蒋介石与夫人陈洁如居中,其左旁依次为加仑将军、鲍罗廷、何香凝及鲍夫人,蒋前是10岁的蒋纬国、张静江(坐),前右旁便装依次是吴稚晖、谭延闿(扶手杖,陈诚的岳父)、宋子文(持白帽)、顾孟余(黄礼逊提供)



到了汉口,他才知道这是共产党员及国民党左派居多数的集团,如宋庆龄(图4.2)、邓演达等人。由于他与陈友仁共同办报多年的相知相识,而陈友仁是英属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华侨,是完全受英国教育的律师,不通中文,就把外交部和他自己的公私印章都交给了俞,“全权代拆代行,负责处理一切”。



图4.2 1927年3月10日汉口召开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参加者有宋庆龄(前排中)、宋子文(前右3)、孙科(前右5)、林伯渠(2排右1)及毛泽东(2排右2)

他于1927年元月协助陈友仁,收回汉口、九江的英租界。但3月北伐军攻克上海及南京,共产党员林祖涵即林伯渠(1886—1960)及亲共之程潜齐集南京,导致英、美军舰炮轰南京城,京沪一片混乱,鲍罗廷在汉口私寓开会决定趁机进占南京,俞鸿钧不愿参与,即将所经办之公务安排妥当,留下一纸辞呈回到上海,由此断绝与陈友仁几年来的师友关系。在人生的道路上,他作出了最终的决定,因为1927年7月汪精卫开始转向,与京沪合作反共清党,鲍罗廷与陈友仁从此一蹶不振,武汉政府也就风清云散。

北伐军打到上海后,俞鸿钧的老友周雍能出任上海市秘书长。周雍能(1895—1986,图4.3)与孙中山、蒋介石渊源都甚深,曾任职于蒋侍从室之前身——北伐总司令部秘书处,是蒋总司令之秘书兼文书科长[陈立夫



为机要科长,先父嵩庆公的挚友陈舜畊(见第18章)则在陈立夫之下任科员]。由周引荐,俞担任市府之英文秘书,兼任宣传科长,后代理财政局长,在吴铁城任市长时(1932年)任市府秘书长,从此进入国民党政府高层。1936年吴铁城转任广东省主席,俞即代理上海市长,旋真除,在上海前后达十年之久。日寇侵华,上海沦陷后,转任中央信托局常务理事,派驻香港办理外交事务,直到1941年宋子文邀他出任外交部政务次长。但当他飞抵重庆时,当时的财政部长孔祥熙突然宣布他为财政部政务次长,使他两头为难,至晋见蒋介石委员长时据实报告,得蒋指示任财政部次长职。从此,他转跑道到财经界,也奠定了他日后与蒋介石之深厚关系。不久,又兼任中央信托局局长。1944年继孔祥熙为财政部长,次年兼任中央银行总裁。1948年行宪内阁成立(翁文灏组阁,图3.17),他辞去财政部长职,专任央行总裁,把黄金密运台湾即在此时。



图 4.3 周雅能



图 4.4 1949年前后的国民党政府财经界人士:(前左起)严家淦、俞鸿钧、翁文灏、王世杰、王云五(最右)及徐柏园(后左)

赴台后,俞复任“财政部长”兼“央行总裁”,1953年出任台湾省“主席”,1954至1958年又担任“行政院长”,1960年因哮喘宿疾于6月病逝,享年仅63岁。蒋介石所颁褒扬令中提道:“……赤祸再起,凡域弗宁,乃能不避艰难,以非常果敢之精神,排除阻难,为国家保存元气,以奠财经再



造之基厥功尤伟。……”

这里的“保存元气”，就是把央行的国库黄金银元（银锭）及美钞运存台湾，奠定了新台币发行之足够的准备金，以及开创台湾傲视全球经济成就的基础。总的来说，俞鸿钧对蒋介石应该是功劳不小，但到台湾后，由于某项不明原因他被列入蒋之“不愿为之祝寿者”（台北《传记文学》2007年9月号），更难堪的是，俞鸿钧与陈诚是同年同月同日生，蒋介石每年替陈做寿而过俞门不入。民国史里无公开资料显示蒋为何对他印象变坏，但蒋介石日记1948年9月9日记下：“……商业银行李馥生等之奸诈，余欲严惩，而俞鸿钧则畏缩因循不敢任怨，故愤怒频作……”此外，蒋1949年9月日记：“……鸿钧不愿就任中行总裁，不辞而离穗赴港不胜为之嗟异，顿感悲戚矣……”10月1日：“……乃今经儿赴港挽之同来……”10月3日：“……正午鸿钧与经儿由港回来私心为之大慰……”等到台湾局势稳定后，蒋对俞在最艰难时期不辞而别或难以忘怀。

另外，是否与央行黄金账目不明也有关？尤其是作军费的90万两黄金，到了厦门经先父财务署同仁仔细一清点，竟然多出9万多两。先父一心只知涓滴归公，完全不懂其中深意（或许是上海商界的习惯，含一成佣金在内），还以为是央行糊涂。更糟糕的是，先父没领会到一番“好意”反而报告了蒋介石，如俞是因此而被列入“不愿为之祝寿者”，那么先父应该负部分“责任”。推想，蒋发现央行的“糊涂”恐不止军费黄金部分，如下文所述，第一批第二船次的黄金数，从公开的资料看就有两个数目（57万两与55万两相差近2万两）。第三批汤恩伯经手的30万两相差更大，另有40万两之说。更有甚者，1948年9至10月间，用金圆券收兑民间黄金、银元、外币的账册完全消失，而所公开的数目显然过低，这给了蒋介石可隐藏部分金银外汇作内战军费的机会。因而，央行黄金总账时到今日都无法全部公布，只有不完整的收入与支出略账（图1.4, 13.7及表16.1, 16.4）。

哪些中央银行档案沉海底？

据曾任台北“央行”发行局局长（1990—1999）的钟光新在2008



年11月告诉笔者，“央行”内部信息是，发行局的档案在1949年已沉入海底（按：此船即下文提及的“太平”轮，确有部分央行档案在1949年1月27日沉没）。但是否有关键档案，则尚有商榷之处。何以见得？请看以下资料：

中央银行副总裁刘攻芸条谕（1948年12月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党政府撤离大陆前向台北厦门密运现金一组资料》，载《民国档案》1989年第1期，第52页）：

照抄刘副总裁12月7日条陈

（一）除业发局贵重物品已另行密饬办理外，其他重要公物及卷宗、账册，应尽一星期内运出。

（二）先尽复员起至本年6月底止卷宗、账册运出，其余吨位，再装运复员前卷宗、账册，俟必要时，再装运6月以后卷宗、账册。

（三）6月底以前可装运台湾，6月底以后者装运广州。（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中央银行秘书处密函（1948年12月11日）：

关于疏散卷宗、账册技术方面，前经会商，拟定九项。

一、木箱向事务科凭领物证洽领（一百只以上预先通知）。

二、麦头（Matter，内容）由各单位自行缮写。

三、尽于本月16日以前，将运送木箱确数，分别重要、次要两种，报秘书处，仍暂存各单位，俟装运时，再由秘书处派车前往。

四、各单位自派押运员一人。

五、各单位尽于16日以前，将押运员姓名通知秘书处事务科，以便由科召集会洽，取得联系。

六、各单位箱数应自开清单，自行加封，区行主管凭封点收。

七、图书暂不装运。

八、报表及预决算书由会计处单独装运，其余单位不必再运。

九、自12月1日起，总行各单位主官如认为必要，得将重要文件抄副本寄区收存保管，其机密者，可加火漆密封，由区行原封保管。



经本处陈奉批：“可照办”。等因。相应函达，即希查照办理为荷。此致

梁局长必庭

秘书处处长 张度(盖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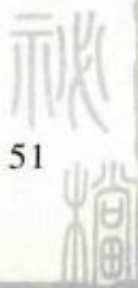
关系来去文摘录

12月16日 复秘书处本局应行装运卷宗、账册共87箱，并派周忠廷前往。(发文5921)。

这里尽量全文引述，因为这是中央银行档案中有关金圆券发行后“搜刮”民间金银的记录关键所在。此处提及，“(一)除业(物)发(行)局贵重物品已另行密飭办理外，其他重要公物及卷宗、账册，应尽一星期内运出。(二)先尽复员起至本年6月底止卷宗、账册运出……”这里，发行局账册87箱，包括复员(1945年8月)至1948年6月的账本，就在运台湾途中随“太平”轮沉于海。随同没于海的，除了发行局账册外，还有物资57箱及秘书处的文件200余箱、会计处文件账册近300箱、国库局文件账册200



图4.5 “太平”轮于1949年1月27日，在舟山群岛白节山南(图中央有黄色标记)，由上海去台湾的航道上与“建元”轮相撞沉没，船上有1200余箱央行档案(及少量银锭)，但是是1948年8月金圆券发行前的旧档，却被有心人用来作“央行档案和黄金都已沉没于海”的借口。图上左为上海市，下左为宁波市



多箱、业务局文件账册 200 多箱、人事处文件 47 箱及理监事会文卷各 3 箱,中央银行档案共约 1 200 余箱同为海水吞没。时在 1949 年 1 月 27 日,在舟山群岛白节山南,由上海去台湾的航道上与“建元”轮相撞沉没(图 4.5)。“各单位自派押运员一人”,六处局共六位在“太平”轮上押运,1 月 27 日海难,五位丧生。

但随“太平”轮沉于海的不是最重要的部分。1948 年 8 月发行金圆券后,以快速贬值的金圆券收购黄金、银元、外汇数量的账册最重要,应该运到广州了(“6 月底以前可装运台湾,6 月底以后者装运广州”),而没有沉入海中。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的档案应仅是部分,更完整的应在广州、重庆、成都或台北的“央行”内,除非在战乱时遗失或故意销毁,有待继续寻觅。

1954 年 4 月,有位记者在台北访问俞鸿钧,曾问他中央银行运台湾黄金究竟价值多少?俞筹思后回答:“很难以清点决定。”[《世界日报》(美洲版)2008 年 8 月 13 日]台湾当时的“立法院”、“监察院”及台北地方法院等都曾调查,却都不了了之。最近逐渐浮现的大溪档案的电子档(表 1.1, 16.1, 16.4 和图 1.4)中,黄金的数字,除了一笔约 60 万两的秘密军费



图 4.6 俞鸿钧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台北松山机场(1958 年 10 月杜勒斯访台同蒋介石会谈金门炮战危机)

黄金(第三批)外,大致都有记录,包括先父在厦门的军费黄金,但没细账。外汇与银元的资料尚缺。关于密藏的军费部分,先父因与央行的“军费草约”的规定,为蒋介石守密,背了黑锅。如此残缺不全的记录,自然无法让海峡两岸老百姓满意(见第 16 章最后一节)。

对国民党政府而言,俞先生是有功的;但对绝大多数因金圆券贬值而受害的中国人民来说,俞或有过。重要的是:将来如何将此金圆券的准备金(部分剩余的)回馈中华两岸,是一个严肃的课题!



第5章 1949年1月第二批国库黄金运台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下野前夕,国民党政府军事、财政、外交、行政及党务均陷入困境。

蒋介石下野前夕的内战形势

从1948年12月1日深夜俞鸿钧从上海运走200.4万两黄金(第一批第一船次)之后,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一筹莫展,继续丢疆失土。12月初国民党军队第十二兵团黄维兵团在双堆集瓦解,放弃徐州,到次年元月10日杜聿明(1905—1981,女婿是得过诺贝尔奖金的杨振宁博士)所率13万徐州剿总的余部在徐州西郊青龙集、张庙堂一带被围,邱清泉司令官(1902—1949)率国民党军队主力(第二兵团)1月10日在陈官庄兵溃自



图 5.1 (前排右起)杜聿明、徐源泉、黄杰、邱清泉(后排右一)及郑洞国(后中)





图 5.2 杜聿明与夫人、女儿
(杜致礼, 即后来之杨振宁
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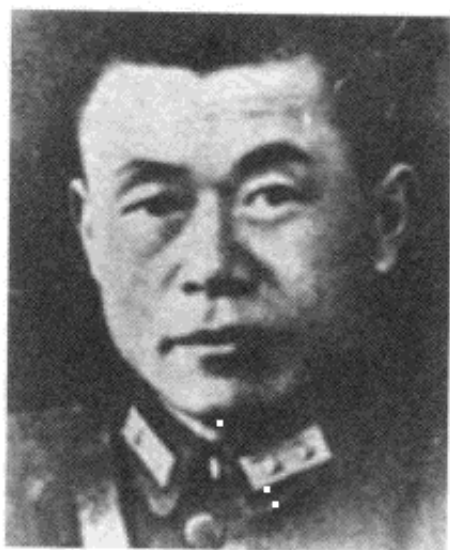


图 5.3 国民党军队第二兵团邱清泉司令官。有位公子颇肖其父, 1954 年在台北师大附中与笔者为高一同学, 为人沉默寡言, 初逢家中变故, 心情也可理解, 一年后即被送出国留学, 现居美



图 5.4 白崇禧将军与蒋介石夫妇

杀, 同日杜聿明被俘。华中剿总白崇禧(1893—1966)已连番要“实行和谈”, 向蒋介石施加压力。

到元月 21 日蒋介石宣告引退, 仅担任中国国民党总裁, 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但蒋在下野前对于央行余下的金银外汇做了以下安排, 让先父也被牵入此极具争议性的旋涡。请看先父是怎样记载此事件, 即“预支军费案”的。

“预支军费案”：先支半数

1949年1月8日先父日记：

为特别准备金事拟报告[按：即把中央银行国库的金圆券准备金拨作“预支”军费案(见下文蒋介石10日的日记)，这是蒋为即将下野在作重要准备]，送(郭忏)总司令核定，下午赴傅厚岗向徐部长(堪，字可亭，财政部)接洽，即由(徐)可公面报批准，六时许至主计部商定，即成定案，有此准备，差可放心……晚至新生社参加黄君宴会，并与周总司令(至柔)、(陈)舜畊、莘觉等玩桥牌，探知邱(清泉)部损失极大，前线甚危。

1月9日先父日记：

昨夜因“准备金案”，办理未妥，甚为焦急，嗣想即照规定，先支半数(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今晨即照此方案准备，征得(郭)总司令同意，即晚赴沪接洽。……今日空投社(聿明)部四千万。[按：此空投金圆券(约值10万银元)，为被围国民党军队所不满：“何不空投粮食？钞票有何用？”这是突围去台湾的人回忆当年在解放军包围圈里的感想。]

1月9日的日记里面有个关键字眼“先支半数”，应该是指黄金、外汇与银元，从最后所知的数字，这前两项分别是90万两与7000万美元，即是当时国库的“半数”。也就是说，1949年1月蒋下野前夕，上海国库还有黄金180万两及外汇1.4亿美元(或集各国家银行所存)和若干数量的银子。这显然不包括已运去台湾的260万两黄金。拿“半数作预支军费”，这是国民党政府总统下野前夕，财政部(徐堪)、央行(俞鸿钧、刘攻芸)与蒋介石之间的妥协方案。此时先父深感“焦急”，因为还未敲定，徐、俞、刘等尚未签字。

1月10日先父日记(图5.5)：

多时不坐夜车，眠未稳，晨(从南京)到沪，张主任来接，早点后即

赴襄阳南路徐(堪)府,接洽后,即驱车至央行与俞(鸿钧)刘(攻芸)(图 5.7)二总裁、发行局梁陈二局长、业务局王副局长等洽办,下午拟草约,再至徐府,知预支事已得谅解,甚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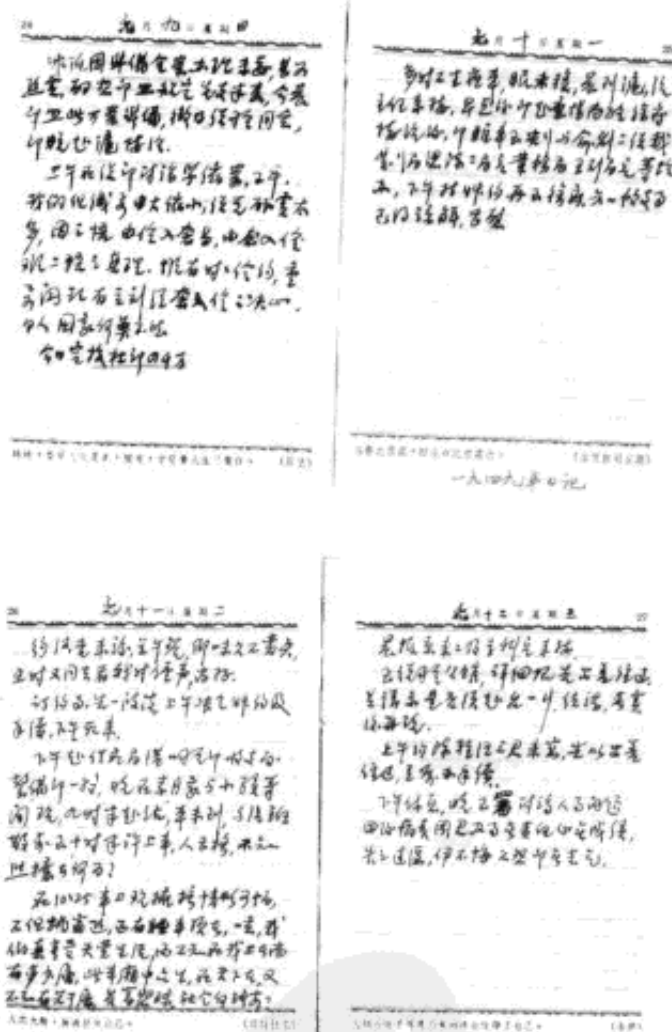


图 5.5 1949 年 1 月 9 至 12 日先父日记,与决定“草约”及手续有关

以上提到的徐堪当时是财政部长,是俞鸿钧的顶头上司,如果他反对把国库的大部金银外汇,即支撑“国币”金圆券的准备金,提出来“预支”作为军费,就算蒋介石下令,大概也行不通,至少会挡一挡,或许就会弄得全国皆知,闹得不可开交,蒋的下一步棋(下野)就很难走了。此项幕后沟通的任务就落在先父吴嵩庆的头上,那一天他两访徐堪。当然蒋也



一定会另外施压的,最后一定是徐屈服,而得到“谅解”,先父的角色可能是扮演白脸,因为徐也是他以前的上司(前任行政院主计长)。先父当时的职称是国民党军队的财务署长(1949年9月1日担任合并国防部预算局后扩编的预算财务署长,见附录3),是依照美军顾问建议所设立的职位,当时新设在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编制内,是二星中将职,也受行政院主计长监督。

1月10日,蒋介石也派蒋经国到上海,据经国先生1959年10月送给先父为纪念蒋介石73岁生日的《危急存亡之秋》一书中所记同日项下:

今日父亲(指蒋介石)派我赴上海访俞鸿钧先生,希其将中央银行现金(按:提出作为“预支”的军费)移存台湾,以策安全……

1月10日蒋介石日记:

……派经(国)儿赴沪慰勉(俞)鸿钧,指示移存现货要领(按:即将上海央行国库资金转移台湾、厦门,作为国民党军队军费)……

❧ “订(草)约事,告一段落”

所谓“草约”,就是把现存上海国库的金圆券准备金的半数,拨作“预支”军费“合法化”的一项作业,似是国民党军队财务署与中央银行订定的约,并得财政部长及主计长同意,但一旦上海资金被移出后,就再也没人提到,何况已“改朝换代”了。事后看,这或是蒋介石使用的一招“障眼术”,蒋预备在下野前搬空国库,而央行里的人犹豫(如俞鸿钧、徐堪)甚至反对(如刘攻芸、李立侠等),蒋一方面劝说施压(出动蒋经国与先父),最



图 5.6 1960 年先父(右)与蒋经国同游台湾东西横贯公路

后妥协,先父拟一“草约”只拿一半,等于通告央行领导人等:“不要你们负责,是我蒋总统命令国民党军队军费总监财务署长吴嵩庆同你们立约后拿半数出来转为军费的”。此约在次日办妥。

1月11日先父日记:

……订(草)约事,告一段落,上午决定草约及手续,下午取来。
……下午赴供应局、港口司令部、收支处、警备部一转。……九时半赴(火车)站(回南京)……

为什么要赶着去这四个单位?主要是安排陆上运输监管人力(供应局与财务署上海收支处)、海上运输(港口司令部)及保安戒严(警备部)。此处也点明1949年1月里运的军费黄金银元是由海军军舰运的。如是空运,何必去联系海军的港口司令部?此与詹特芳回忆用军舰运厦门相符。此外,如是2月里运(第三批),还有一个月就不必急着当天就跑四个部门,这批军费金银一定要赶在蒋介石下野前运出上海。由于是军事机密,即使是在军舰上的人员都不知所运是何物。

12日先父日记:

晨抵(南)京……至总司令公馆,详细报告出差经过,并请示是否需赴台一行,结论,考虑后再说。下午约陈(康华)、程(邦藻)、汪(子柔)三君来寓,告以出差经过,并嘱办手续。……

这里问“是否需赴台一行”是考虑运储金银地点,当时还不知道是运厦门,也显示是蒋总裁在作最后决策,先父与郭忏总司令都只是执行者。“嘱办手续”是中央银行转“预支军费”账到财务署。这里的“约陈(康华)、程(邦藻)、汪(子柔)三君来寓”,此三位中,前两位是副署长,后来都到了台湾,笔者很熟知,都已过世;后一位是湖北籍的汪秘书,在重庆时离开财务署。这里面没提詹特芳,可见“草约”詹或不知,故他以为军费转移是蒋介石“亲笔下了一个条子”给先父(见下文)。一个立宪政府,事情哪能这么简单?

13日先父日记:

上午总部会报,下午署会如常。增加一个月薪,(行政)院已决定,但尚未下令,尚需候前线士兵发之二元之人数之确定,不知需候



之何时？向总司令报告下列各事：1. 美金公债案；2. 台币案；3. 银元案……（按：此处的“美金公债案”，可能与“预支”军费里的7000万美金外汇有关。）

预支军费的草约及手续确定以后，蒋介石还是继续跟踪上海央行剩余的金银外汇。1月15日蒋介石日记：

……约见鸿钧、席德懋指示中央中国两银行外汇处理要旨，总勿使两行外汇为后来者消耗于无形，略为国家与人民保留一线生机耳。

1月16日蒋经国日记：

父亲（蒋介石）约见俞鸿钧、席德懋二先生，指示中央中国两银行外汇处理要旨，盖欲为国家保留一线生机也。

没明说，是准备“藏”起7000万美元的外汇。显见，准备下野的蒋总统对央行金银外汇极为关注。而蒋经国所记的，与其父日记连用字都雷同，似乎是事后参考蒋介石日记补记的，本书以下将略去蒋经国重复的记载。

16日先父日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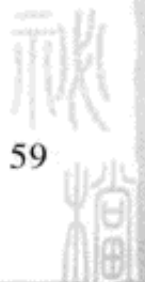
晚车赴沪……处理以前各案（即央行预支军费、美金等案）……

此趟去上海，极可能是安排军舰装载启运时刻，总之，一定要在蒋总统下野前完成。现在财务署掌握了一大笔金银“现金”，可以放手向台湾购买米糖及台币来稳定台湾基地的经济金融，这一定是蒋介石与陈诚早已商量好的方针，先父需要跑趟台湾来落实。

1月18日先父日记：

……十时抵台……下午四时至省府谒陈（诚）主席，谈购台币事。

此即是以银元和外汇购买台币，为国民党军队发饷和买台湾的米糖等之开始，黄金到6月才开始动用（见大溪档案电子档“厦门分行代付拨交联勤总部吴署长嵩庆黄金数量”），国民党政府不愿在台滥发钞票（如在大陆各地）来使台币贬值如金圆券。这是蒋介石苦心经营台湾的积极步骤。



1月18日蒋介石日记：

正午召见刘攻芸处理中央银行外汇及现货之办法，又见孙立人高谈新生兵力之计划……

此日离他下野只有三天，淮海战役已近尾声，杜聿明的部队被歼，他的注意力在央行的金银外汇及台湾的新军。

这里或有蒋介石的手条（见下文如詹特芳所言），或有先父签字的“草约”，如有，为什么中央银行档案里从没提过？也许涉及军事机密，连投共



图 5.7 1949 年 1 月起担任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总裁的刘攻芸，他对运金银去台湾、厦门很犹豫，但最后还是屈服于蒋介石的压力，把前任俞鸿钧移交的 100 余万两黄金及近亿两白银南运

的李立侠（央行副总裁）在大陆的许多回忆录里都未提及，也许“草约”签字者刘攻芸总裁几个月后就带了文件去台湾转香港，流亡海外（新加坡）了。刘为蒋介石不喜欢的人，是不敢谈也不敢藏此文件的，可能被他销毁了。这一合法性有问题的“草约”，的确是民国史上的一个模糊点。但如无此“草约”，厦门中央银行为什么把近百万两的黄金直接拨付给吴署长嵩庆（见大溪档案电子档“厦门分行代付拨交联勤总部吴署长嵩庆黄金数量”）？这“草约”是当时转账的唯一“法律”根据。

当然，下野的蒋介石担忧李宗仁代总统会抢走另外一半黄金，于是在 1949 年 2 月初从溪口不断施压（见第 6 章）。

财务署机要秘书詹特芳的回忆

依照董德成在 2007 年告诉笔者，他在父亲身边，尤其是在上海、广州、重庆时，比较熟知的一位秘书名叫汪子柔，也是湖北人（从湖北省财政厅跟到南京的），而对詹特芳这个人没什么印象，但在 2008 年初，才想起的确另有一位湖北人，沉默寡言，矮矮小小的身材，是与先父同一办公室的。查先父日记，多处记载了詹特芳。最初提到詹秘书，是先父于 1948



年5月4日调他进入办公室,参与机要(见第18章)。印证詹自己的叙述,他是中校职级,在财务署长办公室的具体任务是:

(一) 守电话,整天不离开办公室,不参加任何会议。

(二) 代拆吴(署长)亲启函件,拟覆他个人的私函。

(三) 保管吴个人的机要文件。自吴接管这批黄金、银元后,(我)便理所当然地成了他(吴)的忠实助手。至于具体任务,主要是缮写(不是拟稿,稿由吴亲拟)呈蒋(介石)的报告。对蒋的报告,跟一般报告不同,必须是正楷大字,不能简写横写,更不能使用1,2,3等阿拉伯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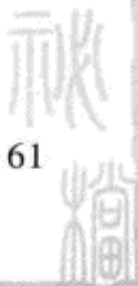
(四) 经管吴与蒋侍从室的一本专用密电码本,来往电报,不经译电室,由我直接翻译,由于这些工作关系,使我逐步了解一点蒋介石核心层的内幕及黄金、银元的盗用情况……(詹特芳,《蒋介石盗取黄金银元及外币的经过》,载《文史资料选辑》第93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58年版)

由于詹特芳整天不离开办公室,不参加任何会议,让董德成这位替他在挨先父责骂时缓过颊、一起议过事、吃过饭的同事都印象不深。足见詹有极好的修养与内敛功夫,是一位上选的机要人才。笔者在下文里会再谈到他。汪子柔与詹特芳这两位从湖北财政厅加入到南京财务署的人,都没有随国民党政府撤退到成都及台北。

詹特芳回忆道(转引自李敖编著《蒋介石研究》第一集,台湾:天元图书公司1985年版):

是蒋总统在……我们撤退到上海后,有一天将吴嵩庆叫去,亲笔下了一个条子,叫他到中央银行总库将全部黄金、银元及外币提走。

蒋介石交代先父的这项重大任务,并非如上述“亲笔下了一个条子”这般简单,其次也绝对不是一次就把“全部黄金、银元及外币”提走。更严重的是,詹秘书把时间也搞错了,时间当然应该是蒋总统下野前,而不是“撤退到上海后”,那已是1949年2月,蒋已是下野之身,根本无权公然下命令了。混淆时间,詹有误导近代史家之嫌疑。有的近代史工作者如李敖,就



攻击蒋介石下野“总统”“下手令”的合法性。

下野前夕，蒋又安排石祖德（1900—1972，时任蒋的侍卫长，见图 11.8）出任厦门警备司令，侍卫团的军需官王逸芬调任台北收支处主任。王逸芬（又名王永涛、王翊群，后曾资助王惕吾，有人说他是“联合报系”奠基起步的“大恩人”）是财务署在台北的负责人。王是湖北咸宁人，但他是浙江奉化人的女婿。包括先父、石祖德、王逸芬都是与官邸有相当渊源的人。但先父有别于石、王两位，是蒋信得过的人，不像这两位及其他“内廷”诸公是蒋介石的“亲信”。其实主要重点在于“亲”字，有些人可以要他们去争权夺利，甚至去做“打手”，但也许不能完全信任，能把金银美钞交在他们手里。先父的角色主要是监督，使这些在蒋周围一起打江山的三山五岳的“好汉”、“亲信”，不会见财起意，但最后他们免不了还是动了黄金的脑筋办了报纸（见第 16 章），化公为私。当然，一位打拼江山的大人物的周围有这些不同类型的助手也不足为奇，近代史上多有先例，包括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内（水门事件）。只是民主法治彻底实行之后，应该能降低其发生率，但是在 2000 至 2008 年台湾政党轮替之间有大幅度的上升，让人不解，但至少已可寻法律途径来找出真相。

据詹特芳回忆军费细账是：



图 5.8 父亲（中右）与母亲。父旁为陈良（白眉），后左一是王逸芬，左四是董德成（在南字底下）



……黄金是九十万两，美钞是八千万及银元三千万。以上这些人民血汗钱，经由吴嵩庆以军费名义全部提走后，其中黄金及银元用了一艘海军兵舰，由上海运到厦门，在厦门存放了一个时期，又移至台湾。当时具体负责这件工作的人，有财务署收支司副司长董德成、总务科长李光烈等，但他们都是临时抽调的，有的人可能还不知道其中内幕。……

“移至台湾”就是送进“财务署”在信义路边上的保管库里，这保管库就是需要三把钥匙才能打开的金库。2009年，95岁的董德成应笔者要求，把当年的金库位置画出来(图5.9右图)，他在图上是这样形容保管库的：“除保管库乃日本留下唯一一栋红砖平房，非常牢固，所余均应临时需要，简便克难建造”。笔者高中二年级时(1956)，曾在半年里每周两三次下午来此学习81式杨家太极拳，老师是杨露蝉的嫡传弟子李寿箴，在太极拳界辈分颇高，是郑曼青的师兄。当时完全不知还有金库在左近，可惜现在都已被拆掉，原地建了台北地标之一：中正纪念堂。

此处提及用军舰由上海运到厦门，应是正确的(见下述)。很幸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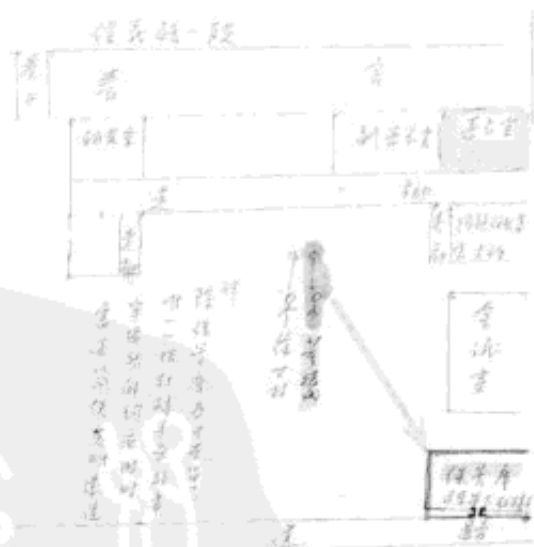


图5.9 (左图)董德成是右边较高者，站在台北“财务署署长”室(先父办公处)前，其斜对面即地下金库(右图)2009年董德成手画“财务署”保管金库图，即两人所立处的右下角(都在今日台北中正纪念堂的园内地内)

是,詹特芳这里提到的董德成、李光烈,在父亲过世多年后,我都访问过。詹的数据被许多人引用,但是他的记忆有些错误:美钞 8 000 万,是 7 000 万之误,另外 1 000 万美元,据李宗仁的回忆,是蒋介石下令由中国银行提出,直接汇给美国的毛邦初(1904—1985,空军副总司令,图 5.10)购买空军军用品,没有经过先父,可能受空军的监督,但最后出了纰漏,成为国民党政府的丑闻。

詹特芳又说:

外币部分,是听吴嵩庆口头谈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因外币提出后,马上就交给台湾银行了。

依于宗先的资料:“从 49 年 6 月 15 日至 50 年底的一年半内计抛售……美金 6 600 万元,以建立台湾人民对新台币的信心”(于宗先总主编,《台湾货币与金融论文集》,台湾:联经出版社 1975 年版,亦参见第 16 章)。如此看来,在台卖出的美金,绝大部分应是先父经手的“草约”军费,也就是蒋介石 6 月 1 日日记所称“更无七千万美金之逃避”(详见下文)。蒋也没说“谎”,这笔外汇“公然”存在台湾银行里的财务署的账上,预支为军费,不在中央银行的账上,推想大部是金圆券兑来的。这类似于厦门藏金,中行兑的美金的账也失踪了。新台币准备金中的 1 000 万美金,也是财务署“借贷”给台行的,其他 6 000 万后来也陆续拨给台湾银行,算台湾区军费及购买台湾米糖的费用,部分“台独”人士只在黄金里转圈圈,不知这笔美金就接近 150 万两黄金的价值,蒋介石替台湾设想得真周到,“用心良苦”。



图 5.10 (左图)毛邦初 1952 年在墨西哥法庭受审(右图)毛邦初 1955 年出狱后回美国,1985 年去世,葬于洛杉矶



银元3 000万,应该是不错,但忘了另外价值六七千万美元的纯银,约是银元的四倍量。

这第二批(当时属最高军事机密)由先父、蒋经国、俞鸿钧经手的黄金,在1949年1月20日左右运往厦门,这就是前文所提的海关里的中共地下党不愿再让“海星”号替国民党政府运黄金到台湾与厦门了。海军的“昆仑”号、“峨嵋”号等运输舰都曾参与装运黄金、银元及纯银。

蒋介石密藏厦门军费的用途

蒋介石的密藏军费就是詹特芳所说:“黄金是九十(实数是99)万两,美钞是八千万及银元三千万”,这是蒋在1949年1月下野前所安排的对抗中共的密藏军费。为什么要秘密藏起来?笔者以为至少有三个原因:

其一,下野已成定局,不能再拖,“代总统”李宗仁(十天以后)就要上任,到时候他就无权使用国库金银外汇了。

其二,藏起金银外汇就毋须受立法院监督,要知道国民党政府当时还是立宪的政府,质询时,内阁财政部长还是要答复立法委员的,虽然他可以不理睬,但还是会很尴尬。蒋是独断专行惯了的人,又已下野,怎禁得起民主议会的折腾?

其三,经由央行的厦门分行及财务署先父那儿藏起的军费,用起来不但方便而且有“效率”。前线有重要军事行动时,金银就及时运到那儿,对维系作战部队的士气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无须费事费时地经过行政院,申请财政部拨款,更不必受主计系统的监督和预算的限制。但负责经管的人,必须忠诚、廉洁、可靠。更何况,作战要粮饷,“金圆券”已没人要了,要国民党军队将士继续作战,至少需要粮食、制服、汽油、子弹炮弹、枪械零件等等,无一不需现金外汇购买。

由于是秘密军费,所以两岸“中央银行”正式公文档案都没记录(表1.1),但在当时央行总裁和财政部长的报告、蒋总裁的秘书周宏涛之记录、宋子文及俞鸿钧的密电、詹特芳和先父的记录及蒋介石的日记里,都得到可互相交叉印证的史实、数据。尤其明显的是,如果不计入这笔黄金



银元,央行的账就会出现大的空缺,也就是用掉的金量比公布的收入要多出许多。此外,近来慢慢浮现的档案史料(如笔者最近得见的大溪档案电子档中中央银行“厦门分行代付拨交联勤总部吴署长嵩庆黄金数量”及“吴嵩庆呈蒋中正保管之奖恤金黄金支拨情形”),也完全证实了秘密黄金的存在与数目(见第16章表16.4及其他各章)。至于外汇,所公诸于世的资料有限。

我们不能忘记,蒋介石是军人,作战要步步为营,无论攻守都要有第一线及第二线部队,还要有总预备队。如以黄金为例,蒋的第一线就是先父经手的99万两蓄存厦门的(第二批)军费黄金。第二线秘密军费就是存台北财务署的第三、四批上海空运及海运的黄金(当然还有美国运回的,见表1.1)。那么,总预备队呢?就是那第一批央行的260万两黄金及隐藏的7000万美金了。蒋介石在内战中军事上是惨败,但在军费上还是考虑得蛮周到的,能重用俞鸿钧与先父,是知人的。可叹(或可惜或可幸)的是,解放军进展太快了一点,没等第一、二线的黄金消耗用罄,国民党军队就被完全逐出大陆了。战略上,蒋介石也成功地把部队从海南岛、舟山及大陈岛撤回台湾,使用剩余的350万两之多的黄金及约7000万美元外汇来稳定新台币及台澎金马的局势,直到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的爆发。蒋“缩小范围”、“另起炉灶”的蓝图(1948年11月24日的日记),在解放军的“协助”下,至此似乎完全达成。但逐鹿中原再也无望,只能冀望于美苏直接冲突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或抽象地“政治反攻大陆”,他也深知,这希望是极为渺茫的。

这秘密军费的藏金,是当时李代总统紧紧追寻的,立法委员们也咬着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不放。面对广州6月1日立法院的质询时,财政部长徐堪就只承认有相当于2.7亿美元的现金(值1.5亿美元的黄金300万两、外汇7000万及5000万纯银)。6月1日蒋介石日记:

……幸有前财长徐堪与央行总裁明白宣布,央行所有各种现款,只有(值)二亿七千万美金,并未如李白所报有四亿之多,更无七千万美金之逃避……

而秘密军费,包括那逃避的7000万美元,是2亿多美元(第12章),李白



所报与外界所知应是大部属实,蒋的这段日记也间接承认了。

但最明白暴露的,还是先父的日记所记(1950年2月2日在台北):

……上午在立法院开军费会议,到一时结论:财部本年拨专款790万(银)圆,海空军旧欠56万,与(仍)旧在保管款开支之款,均请示(蒋总裁)是否拨还,或拨半数,或全开支。此事余最狼狈(尴尬),盖保管款本属机密事,现成公开。(按:此处有些用宁波的乡音,如“与旧”乃“仍旧、依旧”,“狼狈”乃“尴尬”之意。)

此“保管款”就是本章先父记录的“军费草约”里决定的“预支军费”,国库转给财务署保管的现金。台湾当年也跟大陆一样,外界隐约知道些,但此时居然在会议上公开讨论,并列入记录。可见,到1950年2月之前,依旧是军事机密,没有公开记录,只有先父给蒋介石个人的密电或亲呈报告(见1949年12月5日先父在成都呈蒋介石的报告,第15章),蒋不一定会完全把这些“非常敏感”的机密报告归档,周宏涛管蒋介石的机要,就无此记录(《蒋公与我》)。先父一生都是遵照蒋介石的嘱咐,保密了一世,直到他90岁时无疾而终。又五年后的1996年,笔者草《家父吴嵩庆将军逝世五周年纪念》一文时,才去检阅他内战时的记录。至今公布的大溪档案(“厦门分行代付拨交联勤总部吴署长嵩庆黄金数量”)总数是786540两(图12.3),与笔者2007年估计的秘密军费支出是80万两一致(《黄金档案》,2007年)。

第二批军费黄金运出时间与交通工具

但是,究竟这些作军费的大部金银是1月10日以后的哪一天开始运出上海的呢?财务署接到命令,一定立刻与央行接洽,但登记、称重、打包、装箱等等都需要时间。需要多少时间?合理地估计,应该最快是四五天。最晚呢?那就是蒋下野之前了,1月21日。

尔湾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原负责人汪燮,2007年为笔者借来了1948至1949年的英文上海《字林西报》的缩微胶片(Microfilm),该报主要读者是上海外侨,请看此报1948年底到次年年初的上海新闻(2008年笔者赴上



海图书馆查当年上海《大公报》、《申报》，也有相近的采访报道）：

1948年12月24日（圣诞节前夕）：“……央行停止出售黄金……挤兑7死41伤……”（见图3.13,3.14）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黄金挤兑（见第3章），是从12月初就开始的，大概是百姓知道上海黄金已经开始运走，为安定民心，国民党政府就宣传可以随时以金圆券向中国银行兑换金子，金圆券1000元可兑1两（如前述，每日牌价上调），从此中国银行及其他国家银行（如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就完全被老百姓包围了，每家一天限制兑出1000两，其实是国民党政府安抚民心的虚招，10万两黄金就可应付相当时间。但这兑换显然有利可图，里面当然是大有文章的，银行职员、警察及政府有力人士都可私下幕后买一点，占了辛苦排队的人的限额，又是增添民怨！国民党政府监察委员也“发现兑金循利……未经排队，购逾2000两”（上海《申报》1948年12月15日）。

《字林西报》继续报道：

12月31日：“将从1月5号起售金……”

1949年1月7日：“从1月1日至今上海街头共收尸800……”（按：这些多数是因饥寒而亡的难民。另据上海《大公报》与《申报》记载，该日前一晚外滩气温为摄氏零下五度，露宿冻死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童尸。）

1月12日：“两只美国军火船转航台湾……”

18日：“停止央行售黄金，人潮依旧……”

19日：“从1月1日至今上海街头共收尸2300……宵禁开始……”

20日：“国民党政府此日起移广州……”

22日：头条新闻是“昨日国民党政府蒋总统宣布下野……”但是令人瞩目的却是市闻版有个小标题：“中国银行否认箱子属于它们的……”里面提道：“中国银行声称前晚银行门前的许多箱子不是属于它们的，此外，它们的人员也未参与搬运这些箱子上船，中国银行内属于顾客的库存物件，仍在保险库内绝未曾动过。”



这条消息,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主要是在安抚上海人心:储放在中国银行(图3.2,3.3)保险库的私人贵重物品绝未移走,不必担心。同一天美国“合众社”也有一条类似新闻(上海21日电):

国民党政府昨晚深夜在外滩戒严……当时中央银行运出许多箱秘密物件,大概是贵重的物质。据推测,这批箱子装的是金条等固体担保物。该行正将这批担保品运往华南某城市或台湾安全地方,据信国民政府正将财宝南运,以免落入解放军手中,该行将继续营业至最后一分钟为止。

这位美国记者就不含糊地说是金条。

宵禁是从18日开始的,人潮总要到次日才清光,包括许多露宿的人群。21日蒋介石就要下野,于是20日(那就是新闻里的“昨晚”)应该是一个运出国库黄金的妥当时间,于是军方就准备好了戒严及运输舰。午夜之后中国银行门前就出现了许多箱子,箱子当然是中央银行国库的,里面装的金子共约90多万两,也仅仅是32吨左右(约300箱)。为什么说这晚箱子里面装的是金子,而不是银元、银砖?因为银元有3000万个,也就是850吨,100多公斤一箱,就要7000多箱;而银砖更多,有3000多吨(1亿市两),3万多箱。在李宗仁代总统上台前夕,当然应该抢先运金,银子可以慢慢运,即使是全部市价达100多万两的金子,一直到2月10日也未必运完,1月27日沉没的“太平”轮上应有一些。据前述《纽约时报》在4月的报道,已运出价值5000万美元的纯银,那就近1亿两了。但直到5月底中共快进上海时,汤恩伯还在抢运第四批黄金银元及剩下的纯银砖,每只撤退的船舰都被要求塞上许多箱,有些人就以为塞的都是金砖。

厦门是金银转运重镇

笔者以上所述都是以常识判断,但是依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季刊《民国档案》,则说1月20日夜主要是运银元,那么黄金极可能在先父1月16日、17日来上海时已用军舰运走(见1月16日先父日记)。有关运银元,中央银行内部是如下记录的。

1949年1月11日(《民国档案》1989年第1期,第54页):

顷奉面谕:关于准备金项下之白银,应即日再设法运厦叁千万元。等因,遵即向招商局洽轮。据称:所有轮只,大半征作军用。经竭力设法,允有两轮可能为本行派遣,1.“万福”登陆艇,载重一千五百吨,约十五、六日可用。惟事前亦为空军包去,现已长途电话询南京总部可否,须明日确定。2.“海康轮”,载重二千二百吨,十八日可用,当无问题。惟此次装运均属银元,箱数有六千箱之多,照以往装运经验,倘利用戒严时间(晚十一时至晨五时共六小时),每晚只能装二千箱左右。如日夜继续不辍,需一日夜犹未能装竣,且日间耳目众多,风险堪虞。故拟利用戒严时间,分两晚装运。第一晚装至天明即停止工作,将轮驶近口外抛锚,候次晚驶返,再装至天明,即行驶厦。尽量利用两晚戒严时间,箱数不计,如此仅能避免日间耳目,对于在场工作人员(包括夫役、船上人员、警卫等)能否不予泄漏机密一节,仍有可虑。是否照以上办法办理,抑应如何之处,理合签请迅赐批示示遵。谨呈

总 裁

副总裁

奉总裁批:“尽量先运一批,下次再另洽运。”

鸿 一、十二

此处“鸿”是总裁俞鸿钧。这里也活生生地描绘出一个面临大失败的政权的风声鹤唳,主要是经济崩溃,民怨太深,尤其是要搬走属于老百姓的金银财产、性命家当。

1949年1月21日(《民国档案》1989年第1期,第54至55页):

前奉面谕:关于准备金项下之白银,应即日再设法运厦叁千万元。等因。遵即将洽船等情,于一月十一日以发总字第四、四密签承奉钧总座批:“尽量先运一批,下次再另洽运。”等因,自当遵办。兹已与招商局洽妥“海平”轮及海军司令部“美朋”两轮同时装运,计“海平”轮装叁千箱,“美朋”轮装贰千箱,共伍千箱,计值贰千万元,限于今晚戒严时间,如数装竣,明晨六时,即行启碇驶厦,并派出纳科



副主任杨兼生、办事员安震宇、埔修、张志民四员，率领行警六名，随轮押运。理合将接洽情形及拟装数目陈请钧察，可否照此办理之处，敬祈迅赐批示祇遵。谨呈

总 裁

副总裁

奉批：“可”。鸿。

芸 一、廿

此处“芸”是副总裁刘攻芸。

1949年1月21日(《民国档案》1989年第1期,第55页):

谨查职局此次奉密谕装运银币赴厦事宜，遵经于一月二十日晚在戒严时间内办事竣事，该“海平”、“美朋”两轮舰同时于今晨六时起碇驶厦，一切均称顺利。惟原定装运五千箱计值贰千万元，嗣以上项银币散存各库，装卸费时，故时间不及，临时减少伍百箱，计装“海平”轮贰千伍百箱，“美朋”舰贰千箱，共肆千伍百箱，计值壹千捌佰万元。除密电厦行吴经理(本景)密洽妥提外，拟于各该轮舰抵厦后，即由厦行代表总行犒赏各该轮舰各金圆肆拾万元。所有本埠警备部最近两次服勤，加派警卫人员，工作异常努力周妥，拟再犒赏金圆肆拾万元，以示谢意。又海关港口警察署及公用局码头管理部，协助照料保护码头等工作，亦均出力，拟各犒赏金圆贰万元。是否妥当，理合将办理经过并拟具犒赏办法密陈钧核示遵。谨呈

总 裁

副总裁

奉批：“可。”

2006年1月1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则总结上两则中行签呈如下：

刚接任中央银行总裁的刘攻芸，又奉命指派发行局“将准备金项下之白银，应即日再设法运厦叁千万元”。因一时找不到轮船承运，延至1月20日，才与招商局洽妥租“海平号”并派海军“美朋号”同时

装运。原计划“海平号”装3000箱，“美朋号”装2000箱，利用当晚十一时翌晨五时的戒严时间，赶装完启运，但由于“银币散存各库，装卸费时”，在戒严时间没能赶装完毕，临时减少500箱，计值1800万元。第二天清晨六时，两轮起碇驶厦，由发行局指派出纳科副主任杨兼生、办事员安震宇、浦修、张志民率领行警六名，随轮押运。一月二十三日，中央银行厦门分行电沪发行局：“船已安抵厦门”，嗣又以中央银行厦门分行经理吴本景名义电告发行局：“已卸毕入库”。

按说，原来计划是2000万元银元共5000箱，“临时减少伍百箱”，就是只运走了1800万。4000块银元一箱，110公斤。厦门当地的报纸把全部先后两次的总数（共2200万）泄露了（图5.11），另外还提到了50万两黄金。如果厦门仅有银元，宋子文会在4月15日跑去鼓浪屿视察吗？但在大溪档案里，4月的厦门是没有黄金的（表1.1），宋去看的黄金应该是极端保密的军费黄金，数量远过于厦门报界所知，他们不知道1月运到的50万两黄金早已空运去了台湾（图1.4）。

这1800万就是詹特芳提到的转财务署的军费银元3000万的一部分，那几百箱黄金（如每箱重量与第一批相同，80公斤，就是400箱）也可能是一起运走的，取代了“临时减少500箱”后“海平”号上的船位。另一可能是，中国银行以外的库存黄金在这之前已先运厦门了。此外还有另两种不同的记载：



图 5.11 1949 年 4 月 18 日的厦门报纸（由厦门大学提供）

其一是，“1949年2月18日黄昏装船，19日晨4点桂永清（海军总司令）启运，2月20日中午，上海金条运抵基隆，陈诚接金……”这是网站上流传的说法（这艘停基隆的船，香港一家电视台也曾制作成节目），除了海军运送与詹特芳记载相符，其他疑点甚多：首先这批90多万两（数目下详）的军费黄金，是送



到厦门而非基隆的；其次，军舰一般停卸在南部军港左营，保密性较高。此外，台湾行政最高负责人陈诚需要亲自来基隆码头吗？此则网贴缺乏常识。据其他资料显示，这一天，这艘军舰除撤退的人员及家属外，还有少量银元、银砖，应该没有黄金。

其二是，有无可能用军机在1月中旬由上海运出大部秘密军费黄金？94岁的张光明将军当年担任国民党政府空军作战处长，于2007年在美国回忆：

突于49年1月中旬中奉命调派C-46空运机12架(图5.13)，立即赴上海，执行至台湾的一项机密任务，要于两日内完成24架次，运载量为96吨，当时此一任务的飞机派遣者，空勤执行者及场站人员，均不知空运何物，而在各地的运送装载均有专人处理，对外保密到家。然而由上海台湾装卸运物品的体积、重量、包装及神秘性，其执行者均为中央银行观之，应可确定所运物品均为国库整箱黄金。(台北《中外杂志》第81卷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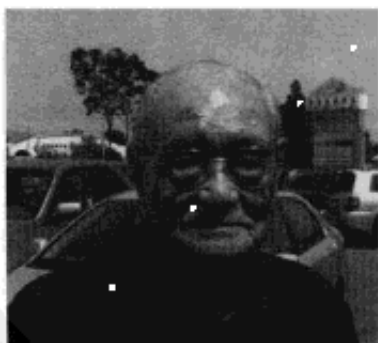


图5.12 (左图)张光明1935年毕业于杭州国民党军队中央航空学校
(右图)2007年于美国洛杉矶(台北《中外杂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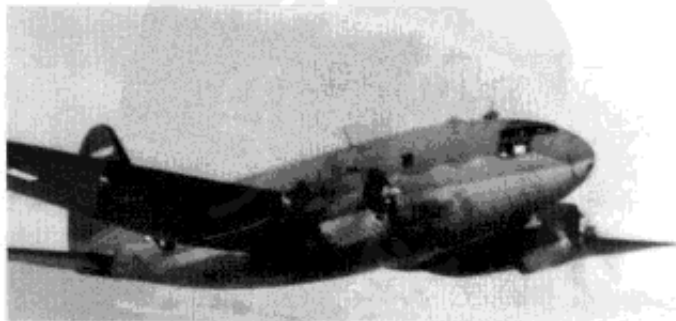


图5.13 C-46空运机

此处所说的“各地的运送装载均有专人处理”，似乎不只指上海、台湾两地，后来笔者访问他时得知还有一地是新竹，而非运到厦门。此段回忆颇神秘，可惜的是没人确切知道空运究竟为何物，无（黄金的）目击者。此处最让人存疑的是它的重量，96吨，不论公制、英制抑或美制（见附录1），如果都是黄金就超过300万市两。就所有数据显示，1949年1月上海央行国库全部剩余黄金不到200万两（表6.1），如本章所述，其中近100万两（只有30多吨）于1月20日夜或之前运去厦门，并非是运去台北。除非张将军记错了，是运飞厦门，而非台湾，那就极有可能这96吨里就包括那30多吨的军费黄金，在时间上倒是很契合的。

张光明在2007年7月至2008年9月间在洛杉矶数次接受笔者电话访问。他中气十足、条理清晰地说，执行那次“机密任务”时，他本人不在上海，但在南京的空军总部里记得曾查看运输记录，这24架次是飞台北松山机场及新竹，应该没有从上海运送厦门。如果张光明记得对，是空运到台湾而没去厦门的话，那么笔者推想这些飞机运的大部分应是银元（约350万块银元）。为什么用军机紧急运输？是否为急输前线国民党军队，尤其是徐州？先送台的原因或是因为台湾比较稳定，也避人耳目，可以慢慢分装（如适于空投）。但不料淮海战役结束得太快，杜聿明在1月10日就被俘了。但张认为：“装载银元的可能性不高，因为北平需要空运孔急，不会用廿几架次飞机来运银子，运金几乎是唯一的可能性。”解放军是1月23日进入北平（北京）的，在1月中旬国民党政府空军确实急须派机赴北平（军机以后也参与运黄金，2月由上海运第三批到台北，以及由厦门机场转运鼓浪屿和鹭岛的存金到台湾）。

1月15日蒋介石日记：

朝课后……召见（毛）人凤与（王）叔铭授予北平军政处置要者……

16日蒋介石日记：

……北平部队之空运……

北平空运是他下野前五日等待办理的要事，王叔铭（副总司令）是蒋比较

命转飞杭州,和从南京飞来的刚下野的总统在杭州笕桥机场见了面。他记下:“五时半,专机到,老先生甚安祥……”蒋当时最关心的应该是台湾的情况和今后打仗的钱。

倒是香港《华商报》在1949年2月18日有篇“本报特讯(南京17日电)”：“……又黄金一批价值7500万美元已运抵厦门”。此为近150万英两黄金(以国际市场价50美元一英两计算),这是第一批的第二船次,“海星”轮运的57.3万两,与拨作军费的第二批90余万两的合计数,应在2月17日前已运到厦门了。

但如前述,第一批里的57万两在2月7日之前已进入大溪档案的记载(记者或不知早已运去台湾了)。另一可能性是,国民党政府把2月7日前(上海或厦门)空运的55.4万两,当作是第一批第二船次的57.3万两,这里空运的55.4万两确是来自上海(图1.4),则57.3万两黄金在2月底以后仍留在厦门的机会大增,加上广州运来的33万两(第11章),也就接近90余万两密藏鼓浪屿上的军费黄金数了。这与《尹仲容与台湾经济的重建(1949—1953)》中厦门的军费黄金(拨给先父的部分,见大溪档案电子档“厦门分行代付拨交联勤总部吴署长嵩庆黄金数量”)是来自上海与广州之说相合。目前,广州央行的账目付缺。

这笔钱到了厦门的鼓浪屿之后,它的流向留在下文里专章详论。





第6章 1949年2月第三批国库黄金空运台北

先父经管第二至第四批金银运台厦为“预支”军费，前章已提到第二批，是发生在1949年头一个月里（海运厦门）；与第三批（空运台北）的划分在1月底，进入2月就是第三批（表1.1,6.1）；到5月是第四批。

本章展示了从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起至4月底先父日记里有关军费的记录，也参照蒋介石及蒋经国日记里的有关实录。主要是提供近代史资料，也按日记下一些国民党政府的军经大事及运金时的时事背景，让有心追踪史实的读者自得结论，有些叙述不免会前后重叠，显得啰嗦，宁“复”无缺之处，亦请读者谅解。

在蒋介石下野前夕，先父在台北与陈诚商谈如何以财务署新得到的军费金银外汇以购买台币的方式来向台采购米粮[按：台湾在日本占领期间，侵华战争之前，米运日本已占年产一半，以后更多，台人多以甘薯补充日用粮食（徐中约，《中国近代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以下就是商量出的办法：“分期结汇”。1月19日先父日记（图6.1）：

留台北。……下午偕严（家淦）厅长再谒陈（诚）主席，决定分期结汇，决派王（逸芬）主任赴沪办理此事，余则仍照原定计划，赴高雄视察，并请供应局何科长同行。

蒋介石决定引退

蒋经国日记提及此日（19日）蒋总统决定引退：“杜聿明的部队自本



月10日徐蚌会战败退后,只余三万人,自陈官庄西南方面突围,亦被匪军歼灭。自此黄河以南地区,匪我兵力悬殊,势难挽回。父亲对于杜部待援,已尽最大心力,自信问心无愧,认为于此时‘引退’,可无遗憾。于是下最后决心。”

1月20日先父日记(图6.1):

在高雄,晨八时抵站,业务处张处长等来接,在站早点后,即赴201D(师)、206D及(凤山孙立人的新兵)训练司令部视察(按:201师的两个团在该年10月24日至27日参加金门古宁头之役,战力受肯定),至下午二时毕,在司令部开座谈会,为解决若干问题,三时半赴凯歌归(主聚)餐,餐毕赴高雄要塞及左营海军司令部参观。整理决议文案、开支案36亿,交何科长带交收支处执行。……傍晚原来想去台中看望陈果夫(图6.2),因得电话催归,作罢。

1月21日蒋介石日记:

本日为余第三次告退下野之日,只觉心安理得,感谢上帝恩德,使余得有如此顺利引退,实为至幸,离京起飞抵杭游憩,如息重负也。……密告孙(科)吴(忠信)金融与外汇之处置与实数。对(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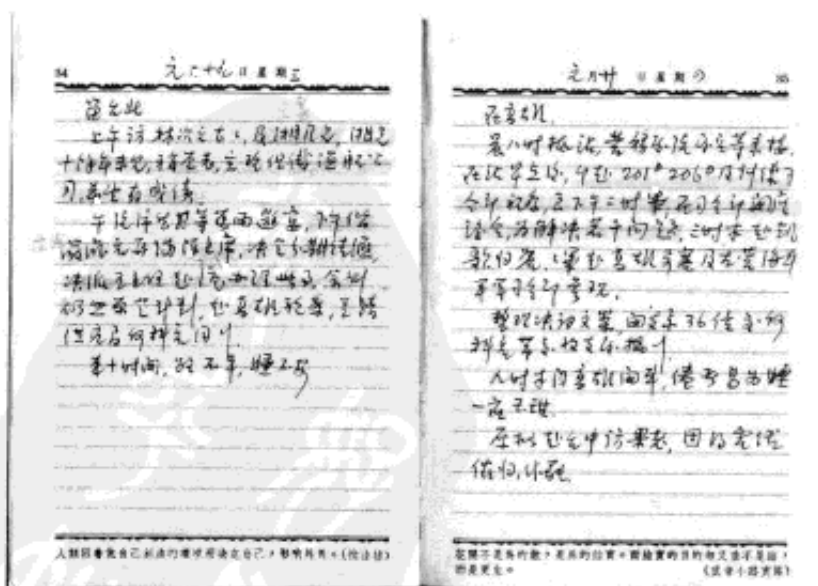


图6.1 先父1949年1月19至20日的日记



图 6.2 (左图)年轻时的陈果夫(左,1891—1951)与陈立夫(1899—2001)
(右图)陈果夫晚年在台湾

德邻实告其政治、军事及人事之部署。

此处明显指出：蒋没对李宗仁交代金融与外汇之处置与实数。另外，蒋把国库资金都已“安排妥当”，大部已（或准备）运交财务署为“预支”军费。

1月21日先父日记(图6.3)：

……晨抵台北，知陈(诚)主席专机一时起飞……十二时四十分抵(松山机场)站，一时起飞，至富阳上空，得令改飞杭州，三时二十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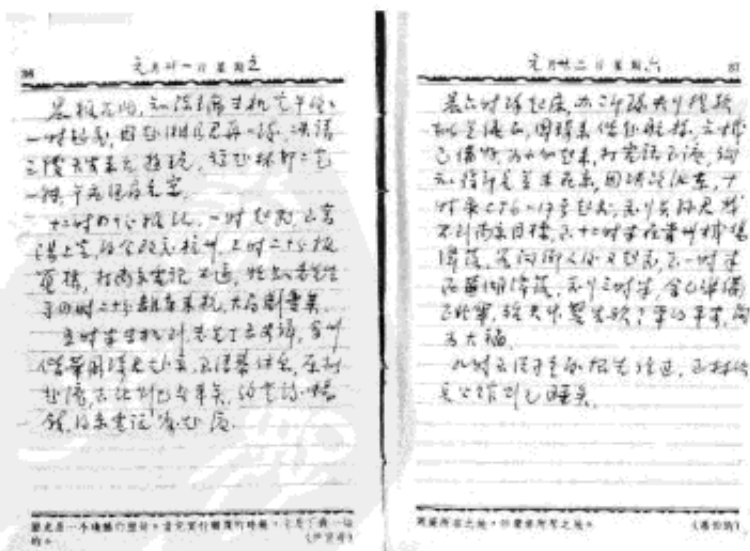


图 6.3 先父 1949 年 1 月 21 至 22 日的日记，记蒋介石下野抵杭州

抵笕桥，打南京电话不通，始知（蒋）老先生于四时二十分离京来杭，大局剧变矣。五时半，专机到，老先生甚安祥。余则（准备）偕华国琦君赴京，至清泰休息，原拟赴沪，至站则已无车矣。……得京电话，嘱赴沪。

明显地，刚下野的蒋总统在笕桥机场已给了先父指示次日去南京公干。

1月22日下野的蒋介石总裁日记：

昨正午特赴基督凯歌堂默祷告辞，下午四时十分由京起飞，以天晚即在杭城下机，宿于空军学校天健北楼。……（晨）九时见辞修，商谈今后台湾军政及经济及对反动（共党）方针。及十时起飞，安抵故里……

1月22日先父日记（在杭州）：

晨六时余起床，办（总）部致央行提款、拟签缮正，国琦来偕赴航校，知机已备好，为小心起来（见），打电话至沪，询知徐部长并未在京（沪），因决改派（机赴）京。十时乘CT6-17号起飞，飞行员孙君找不到南京目标，至12时半在常州机场降落，略问乡人后，又起飞，至一时半在芜湖降落，（又）飞行三时半，余已准备跳伞，殆天作警告欤？幸得平安，洵为大福。九时至（南京郭）总司令处报告经过……

他此日笔误较多，是他日记里少见的，显然情绪受蒋下野及飞行中的奇异遭遇所影响。机师要问乡人后才知方向，真可列入近代版《拍案惊奇》。

1月23日先父日记（在南京）：

……（上午）访（陈）辞公及严（家淦）厅长，访徐（堪，财政）部长交涉余款……十时余至署，交办各案，人员大都已疏散，仅余五十……十一时至凯歌堂礼拜，人去堂空，心为黯然。……四时至机场，沪天气恶劣封机，只得改明日成行……

交涉的“余款”即下文蒋介石日记里的“现货”，凯歌堂是在南京东郊小红山，为蒋介石夫妇做礼拜处，笔者八九岁时也随侍先父去过。

1月27日蒋介石日记：



……约见林崇墉谈中央银行现货运厦门，闻刘公芸有难色，殊为疑虑，世人皆利临（令）智昏，真能明理识义者，究有几人？……

此处现货指依军费“草约”提出以后剩余的一半黄金纯银，见下面俞鸿钧（1月28日）、宋子文（2月8日）的密电。如前述，蒋对刘攻芸极不满。

1月28日蒋介石日记：

……令（郭忏）悔吾来见，处理上海中央银行现款运出之指示并决定固守江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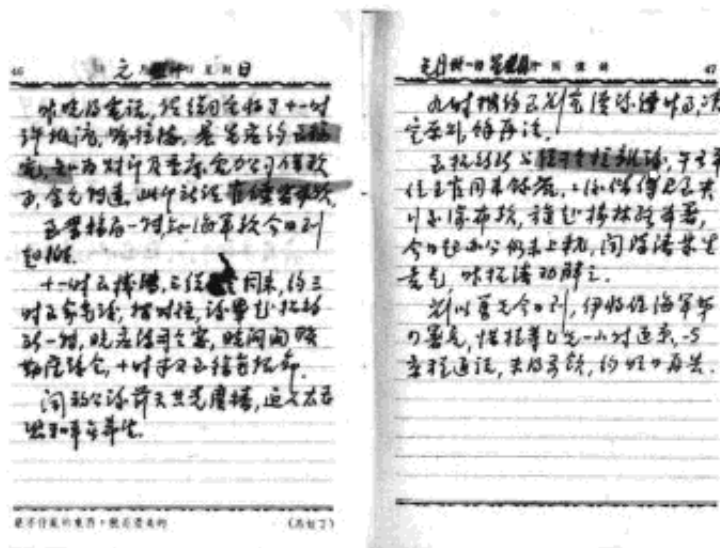


图 6.4 先父 1949 年 1 月 30 至 31 日的日记

宋子文、俞鸿钧密电与第三批黄金空运台北

28日俞鸿钧从上海给蒋介石一份密电：

奉化总统蒋钧鉴：3906 密（一）沪国行存金尚有 82 万余两，银元 2 600 万元，以前因存兑金银，故不得不酌予留存，现在政策变更，无此需要，亟宜早日运出，免滋延误，除密洽刘总裁迅办外，拟请由经国兄电话催办。（二）……谨闻。职鸿钧叩感印。

俞担心代理中央银行总裁的刘攻芸延误把资金运出上海，要蒋经国去电

话催。俞也提供了央行内部的“黄金暗账”，比后来刘告诉蒋的秘书的黄金量要多14万两，这中间就有一批12万两的黄金运去了台北（见2月5至7日的资料）。紧锣密鼓地，目标都指向刘攻芸，是因为李宗仁的桂系也在争取这笔黄金银元，都在向刘施压，他正在伤脑筋到底该听谁？

1月30日先父日记（图6.5）：

昨晚得电话，谓（郭）总司令（按：28日郭忏已在溪口得蒋有关央行金银外汇指示）将予十一时许抵沪，嘱往接，晨先应约至徐宅，知为财部及重庆电力公司借款事，余允转达，此即所谓官僚资本款？（按：川人财政部长徐堪还在营假公济私的借款。）至（中央银行）业务局一转，知海军款今日到，起搬。十一时至机场，三总司令同来，约三时至俞（鸿钧）宅谈，按时往，谈毕后赴招待所一转，晚应陈（大庆）司令宴，晚间开联勤座谈会，十时半又至徐宅报命。闻初公（陈良）谈，前天共党广播，迫人太甚，恐和平无希望。

此是蒋下野前的安排及在溪口有关央行金银外汇的新指示。三位总司令是空军周至柔、海军桂永清及代表陆军与联勤的郭忏，他们同去见俞（鸿钧）、刘（攻芸）及徐（堪），就是将央行剩余的金银外汇也拨为军费（其中包括蒋总统下野前夕命令拨给三军的“抚恤金”两三千万银元，数字近于央行余留的银元2600万元），三位总司令及先父同去，以表慎重，也有示威加压、“赶快拨下来”的微意在。急着要钱，主要是怕代总统李宗仁截留现金，都是蒋介石在幕后催促（见下面蒋2月8日的日记）。

1月31日先父日记：

（晨）九时按约至刘（攻芸）宅续谈昨事，决定原则，余再洽。（按：先父也是来催取军费的。）

2月1日先父日记：

……（晨）赴徐（堪）宅，谈借款事，嘱暂候。……

2月3日先父日记：

……晨赴徐府，借款事，先支5000万（美）元（外汇）。谈到副食



费事,汉口(白崇禧)方面改发现洋,为此可公(徐堪)甚感焦急,时庞(主计长)泰二公偕张局长至,因决定先照商定32亿(金圆券)拨,又运输费先拨3亿,海军先拨3亿(闻孙院长核定8亿,国库署已拨……)

俞鸿钧于2月3日由沪发给蒋经国一通密电(由俞济时2月4日转呈蒋总裁),电文称:

溪口蒋教育长经国兄勋鉴:3906密 沪存金银已洽刘总裁速运,此间事务,大体就绪,拟于微(5)日赴穗返里一行。赐示请飭寄穗央行收转,并乞转陈为禱。弟俞鸿钧叩江印。

俞鸿钧已离开央行总裁职,刘攻芸继任。

此密电表示刘攻芸已同意将上海剩余存金运出。2月4至14日,先父的日记都是空白,但都记了日期,表示在办极重要的机密任务,没有时间记录,也没带日记本在身边。由下文宋子文2月8日密电可推知7至10日是空运黄金至台湾。他可能参与运送到台北,因是军费黄金,由财务署保管,还要入库核对数量等。直到15日记下:“晨回沪倦甚,休息半日”,完全没提从哪里回来,出差任务为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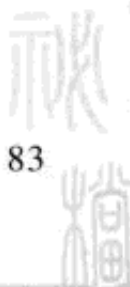
这中间,蒋介石记了些有关运金的事。2月4日的“一周择要”:

一、青岛我军应如期撤退;二、上海现金运完否?……下午:徐可亭(堪),毛人凤分别谈话后……

重要的一句是“现金运完否”,就是把央行在军费“密约”之后剩余金银外汇的另一半提光,这里也含交代给先父的任务。

兵分两路,央行的林崇墉于1月27日在大溪觐见蒋总裁后得指示,回上海从内部施压。2月5日中央银行业务局致发行局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党政府撤离大陆前向台北厦门密运现金一组资料》,载《民国档案》1989年第2期,第69页):

奉(刘)总裁2月5日手谕,“由发库在准备金项下拨出黄金12万两交业务局,另由业局以同值外汇抵充准金,仰即办为要。”等因。



查上项黄金 12 万两,折合美金 500 万元,兹以本行美金外汇短絀,拟改拨 600 万美金同值之港币 3 200 万,俾资抵充准(备)金。除已电知香港中国银行迅就本局港币户划拨,另请关立贵局户外,相应函请密洽为荷。此致

发行局

业务局局长林崇墉

附:总裁手谕一纸

由发库在准备金项下拨出黄金 12 万两交业务局,另由业局以同值外汇抵充准金,仰即办为要。业务局、发行局。

芸 二.五

这显然是业务局局长林崇墉向刘攻芸直接施压的结果,看来俞鸿钧在 2 月 3 日以为刘攻芸已屈服,其实不然,刘还在用“拖延战术”。蒋介石在央行的忠实干部林崇墉就要刘下手条,从“承兑支用”的 82 万两黄金里拿出 12 万两来交业务局。之后,这笔黄金去了哪里?请看两天后 2 月 7 日香港《华商报》的消息:

央行又有黄金由中(国)航(空公司)专机飞台北,央行派出纳科郝树铭押运至台北。

这条新闻可能是刘攻芸故意让人泄漏的,他实在气不过被蒋介石、俞鸿钧、林崇墉等逼得做“违背李代总统”的事,连押运员的名字都曝光了。新闻里并没有说运出多少,但 12 万两正好是一架中航 C-46 运输机的载重,而且到 8 日央行黄金量就从 82 万两剩余到 68 万两了。刘攻芸或以为这笔 12 万两的黄金可以暂时让蒋总裁安静一下,但不然,蒋知道刘在拖,就在这 12 万两到台北的次日,派贴身秘书周宏涛来央行,再加重施压。

2 月 8 日宋子文从香港发给蒋介石的密电:

溪口总统蒋钧鉴:0111 密 俞鸿钧昨(7 日)来港,拟谓攻芸因环境关系……该员犹豫延迟甚久,鸿钧临走日(按:是 2 月 5 日),彼始决定以翌日起黄金逐渐空运,至白银如何,似未肯定,现在情形究竟如何,请注意。职宋子文八日。



这里宋倒是提及了少人注意的白银,2月里还有近亿两银锭存在国库,到4月里已大部分运出(见1949年4月16日的《纽约时报》)。以上宋子文的密电是唯一有关第三批空运黄金的记录,显示在2月8日至10日间,飞机参与由上海运出黄金直接到台湾。

看看8日蒋介石的日记:

派宏涛赴沪,指示中央银行处理要务,以李急于夺取该行也……

到10日周宏涛回来报告(参见第11章):

目前全国黄金存量,运到台北260万两、厦门90万两(按:实数99万两),放在美国38万两,上海仅存28万两、承兑支用40万两……此外还有数千万银元。(按:上述俞鸿钧1月28日密电称:“沪国行存金尚有82万余两,银元2600万元”。)

刘攻芸在2月7日才开始运一小部分(12万两),而且把消息外泄,或想借舆论来抵挡蒋排山倒海的巨压,希望能留住六七十万两黄金及两三千万银元在上海。刘当然想留金以自重,作为央行总裁,守着一个空国库是任谁都无法接受的,但从他一个月后就升任财政部长看,这里面或另有暗盘钱权交易。

10日蒋介石日记:

……宏涛自沪回来,中央银行存金已大部如期运厦台,存沪者仅廿万两而已,此心甚慰,以人民脂膏不能不负责设法保存,以免为若辈浪费耳。

这余下的68万两黄金中的48万两是2月8至9日由上海直接空运台湾的(表6.1)。据蒋介石的专机驾驶员衣复恩(图6.5)回忆,他在1949年内曾率“七、八架飞机奉空军周至柔总司令命令运一批东西从上海到台湾,后来他(周)有当面对他们说这是黄金”。使用军机有保密的好处,这42万两也恰巧是七八架C-46,C-47的运载量,与衣复恩的回忆相符合。而且,运此第三批黄金是蒋介石最关心的,因而派自己的座机驾驶员去完成此项任务。其次,2月7日使用民航机运黄金,消息泄漏,让下野的蒋担



心李宗仁代总统会出面尽力阻挡,只好出动军机在两天内完成紧急运输台北的任务。

但衣复恩为什么不说是蒋派他去的?这里面或许掺杂点与蒋家的私人恩怨,衣在台湾被蒋经国关押过(据说纯因私事),此事与本书主旨无涉。就事论事,在1949年蒋父子是很信任“衣驾驶”的。



图 6.5 蒋介石的专机驾驶员衣复恩在蒋介石的侍从室(1946年)

为什么说是2月8至9日运台湾?旁证就是:2月8日还有68万两在央行(刘攻芸告周宏涛),到10日就只剩20万两(见蒋父子日记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编《中国国民党大事典》)。去哪儿了?去了台北财务署金库(这7至9日空运的第三批60万两,没进大溪档案的账,见表1.1)。笔者在2007年的《黄金档案》一书里提及,赵志华说在1950年有约100万两以上,但詹特芳说在1949年11月财务署只有22万两,缺了近80万两,这里空运的“第三批”就补进了60万两,其余就是蒋经

国在上海沦陷前多拿了20万两,数字就对上了(见第16章)。

另有一说,大溪档案2月7日(表1.1)的55万余两黄金就是这一批(从现今上海光复路的四行仓库运出的),笔者认为此说与其他资料不符,主要是基于央行总裁刘攻芸在2月8日说“运到台北260万两”。如果这55万余两是第三批,那么第一批里的57万两是什么时候从厦门运台湾的?大溪档案里所提的55万两应该是厦门运台湾的第一批里的余数;其次,刘2月8日告诉周宏涛,央行还有68万两,这明示了第三批的大部8日还在上海,不可能在7日已进国民党政府的档案记录。

从四行仓库运出第三批黄金倒是极有可能的,因为当年担任央行发行局调拨科副科长的魏曾荫(第9章)就曾说过,国库黄金除了在中国银行外,还存汇丰及四行仓库。其次,从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去江湾军用机场,或是龙华、虹桥民用机场,也不太引人注目。

2月10日蒋经国记同样事:



中央银行金银之转运于安全地带,是一个重要的工作。但以少数金融财政主管当局,最初对此不甚了解,故经过种种的接洽,说明与布置,直至今日,始能将大部分金银运存台湾和厦门,上海只留20万两黄金。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编的《中国国民党大事典》(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年版)也在这一天记下此20万两的数目(附录2)。

这里蒋经国提及,“少数金融财政主管当局,最初对此不甚了解,故经过种种的接洽,说明与布置”。先父日记中所记的财经当局“对此不甚了解”的,就包括徐堪、刘攻芸,他们都是接洽及说明的对象,布置方面就有海空军及民航商船运输费的安排。在中共及李(宗仁)白(崇禧)的多方进逼下,先父是配合蒋总裁的,把大部分中央银行的国库资金“借”出作为军费;还有三位总司令(海、空、勤)在1月30日陪同先父见俞鸿钧,也是去“说明”主要是“三军的抚恤金”(不是第二批黄金),但这军费一“借”就是60年,连1月11日先父日记里的“草约”也无影无踪了。



中央银行上海黄金存量

(1948年11月—1949年5月)

表6.1 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上海黄金存量(1948年11月—1949年5月)

时间 (月/日/年)	运出量(剩余 量)万市两	交通工具 (批数/次)	运去地点 (用途)	主要参考资料	本书涉及章节 (主要)
11/1/48	(450) ^①			刘攻芸总裁 告蒋介石秘书	第1章, 第11章
12/1/48	200(250)	海关船 (第一批/1)	基隆 (准备金)	中央银行档案	第3章
1/1/49	60(190)	海关船 (第一批/2)	厦门 (准备金)	中央银行档案	第3章
1/18/49	20(170)	国家银行 兑出给市民	上海	略估	第3章

(续表)

时间 (月/日/年)	运出量(剩余 量)万市两	交通工具 (批数/次)	运去地点 (用途)	主要参考资料	本书涉及章节 (主要)
1/20/49	90(80) ^②	军舰 (第二批)	厦门 (军费)	刘攻芸总裁告 蒋介石秘书及 “黄金军费秘档” (吴嵩庆/詹特芳)	第5章 (实运厦门为 99万两)
2/7/49	12(68)	中国航空 (第三批/1)	台北 (军费)	中央银行档案	第6章
2/9/49	48(20)	军机 (第三批/2)	台北 (军费)	刘攻芸总裁告 蒋介石秘书 与宋子文、 俞鸿钧密电	第6章
5/18/49	19.5(0.5)	军舰 (第四批)	台湾 (军费)	中央银行档案	第7章

注 ① 此数量为低估,是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的“明账”,实数可能远过于此(最高数量是上海《申报》1948年12月11日所登载的:财政部“权威人士”称央行黄金为550万两,见第11章)。

② 如第5章所述,也有可能部分(10吨)黄金由广州以海关“福星”舰(附录1)运厦门。

2月13日蒋介石日记:

(戴季陶步陈布雷之后自杀)……平生对余最忠实之两同志,皆服毒自杀,是余不德无能,以致党国危殆……

2月15日,先父应该是从台北回上海,已安顿好第三批黄金在财务署入库,又开始记日记,开始关注山西太原的运补:

晨回沪倦甚,休息半日。得南京电话,知阁主任伯川(锡山)抵沪商(山西)粮运,囑约徐部长商后,因商定原则,前往报告,发核定先付运费47250万,以后每天付费,在徐宅遇庞主计长,伊以空运多浪费,必须降落(价)方免流弊,又总吨位数、本定为6000吨,兹改为2000吨,定明日商订约。(按:太原是4月25日解放的。)

2月16日先父日记:

晨约中国、中央、民航队三家与运输署代表在署商定合约至午。

2月21日蒋介石日记：

美合众社侮辱余谋再起，并以余仍暗中主持军事与中央银行运移金银……此一消息当为桂系有意宣传。

2月25日蒋介石日记(在溪口)：

(一) 宁波、福州、厦门各警备司令人选；……(六) 召见财(政)厅长……

3月21日蒋介石日记(在溪口)：

……拟电稿致(吴忠信)礼卿转何(应钦)，顾(祝同)，以李白运动立委，拟将台厦现金运回，支付政事，期以半年，用光了事，此种卑劣阴谋，不惜断送国脉民命，贡献于共匪，以为快也。

3月24日蒋介石日记(在溪口)：

……正午(陈)辞修与逸民来庵，访谈畅叙三小时，以商谈台湾财政与闽厦构筑工事……经国飞沪参加新组织会议。

3月25日蒋介石日记(在溪口)，蒋之上周反省录：

……4. 广州、台湾金融整顿与新政策……8. 中央银行与信托局之注意；9. 中央银行存美现金之监视。

3月28日蒋介石日记(在溪口)：

朝课后与(宋)子文谈经济、外交之计划……(按：宋子文于4月15日游台湾后，曾访厦门鼓浪屿的藏金银处，这是宋最后一次在中国大陆旅行。如照表1.1的大溪档案中厦门是没有黄金的，难道宋子文来鹭岛是“纯”为观赏景色吗?)

3月31日蒋介石日记(在溪口)：

昨下午二时半，约见郭忏，黄仁霖等复谈陆海空抚恤基金，现银仍需集中保管，不得由各军擅自动用事……

此款空军约 500 万银元,海军约 300 万银元,陆军银元数不知,以人数计,在两三千万银元。

4 月 21 日蒋介石日记(在溪口):

下午静默晚课毕,召见吴崧(嵩)庆,谈军费动用,厦门现洋事。……

吴崧(嵩)庆即先父,4 月厦门的“现洋”是军费用的金银,50 年来都是秘密档案,近在大溪档案电子档“厦门分行代付拨交联勤总部吴署长嵩庆黄金数量”中现踪迹,如没有台厦的第二、三两批军费密藏的黄金 160 万两,那么支出与收入的账就兜不起了(见图 13.7 及表 16.1,16.4)。

4 月 23 日蒋介石日记:

只有严嘱汤恩伯固守上海,以期能如预定方案,转移堕势也。

“预定方案”就是要固守到把金银和其他重要物质及时运出上海。

4 月 24 日蒋介石日记:

……刘攻芸来访商谈金融方针,对军饷发现洋,余极反对,但本月底不能不发也……

再不发银元,士气就无法维持了。

4 月 25 日蒋介石日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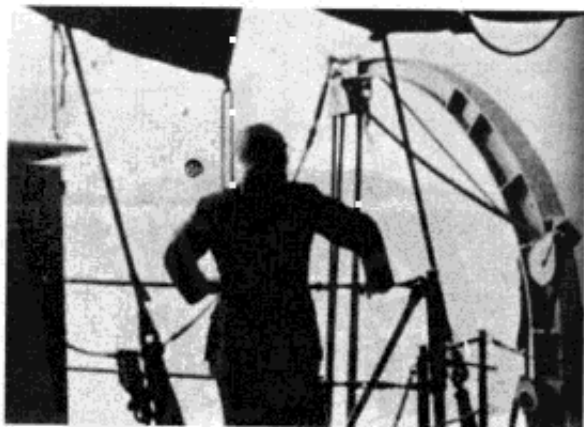


图 6.6 蒋介石 1949 年 4 月 25 日在“太康”舰上由溪口经象山去上海复兴岛途中

……刘攻芸来谈,余切嘱其速发兑现(洋)币券,以延长军饷发现(洋)之有效时期也……

此即是以发银圆券来减少银元黄金的支出,蒋深知,金银散尽时,军心也会垮。此日他永离溪口:

上午二谒母墓告别,依依不忍舍,似有母灵慰留之象……再



搭小汽艇到太康舰(图6.6)已五时矣,六时启碇……

次日即抵上海复兴岛,为上海保卫战作最后努力,主要是想要确定把沪上的金银物质运出到台湾。

4月27日蒋介石日记:

……军饷发给现洋,又成金融枯竭的焦点,若不彻底解决,则军事、政治与社会生机皆成不可挽救之死症,应亟谋解决之道……继会徐(永昌)、顾(祝同)、林(蔚文)、郭(忭)等,商定下月副食军费之办法……鸿钧由香港来沪,特嘱其研究金融救急办法……

金圆券已巨贬,至少军粮总需现洋买。

27日,远在美国的宋美龄来了一封急电,要蒋介石将中国银行总行即时撤离上海:

介兄亲鉴:顷闻纽约财政监理官通知纽约中国银行,因上海时局紧张,中行总行仍在上海,恐发生不幸事故,累及纽行,故有取消营业执照冻结款项之意,此事关系重要,祈即令总行迁移,宋董事长离沪,免为敌方操纵利用。并令总行通知纽行,以便转机为要。妹美。

中国银行曾在1月转拨1000万美元给毛邦初供空军在美采购,后毛与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发生矛盾,卷款而逃,成为国民党政府在美丑闻,先父曾奉蒋介石密命调查此案。此外,宋子文早已离沪,在1月24日已辞广东省主席职,移居香港。

4月29日蒋介石日记:

……召见中央银行与中央信托局各重要人员,慰勉之,使其安心供职……今日银元价已涨至金圆券200万以上矣。……

4月30日,本周预定工作科目:

……2. 台厦存储金银之处置……

1949年的前四个月里,蒋介石的注意力除在军事外,对台厦存储的金银是时刻关注的,他心里清楚得很,这是未来立足于台湾的本钱(表6.1)。



第7章 1949年5月第四批国库黄金运台

现在来看上海解放前夕央行是如何运出第四批近20万两黄金的,此事件也是笔者生命里的一个关键转折点。

解放军在2月以后已逼近南京浦口,中共在央行内的民盟党员、担任“稽核专员”职务的黄竞武(黄炎培的公子),正在加紧收集央行的档案及账册,此时知道刘攻芸总裁已得蒋介石及俞鸿钧的通知,要把最后这库存的20万两黄金及100多万块银元运出上海。他原来是准备阻挡的,但于5月12日在中央银行(黄浦滩路24号)四楼办公时,被国民党政府保密局特务捕获,旋即遭血腥杀害,此事令央行副总裁李立侠感到十分震惊、疑惧,而开始接受中共地下党的指挥,反对将央行档案移往广州,那是当时国民党政府所在地。

在此之前(1月27日),在上海、台湾间航行的“太平”轮与较小的“建元”轮相撞沉没于舟山群岛附近,“太平”轮装有的央行部分档案(如前述是1948年6月之前的档案,没有金圆券发行前后的重要部分)全部丧失,随船的六名押运人员中五人死亡。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央行在1948—1949年的黄金总量、各地金圆券发行兑入黄金数的清单及运台的经过,虽有本书所引部分大溪档案的记录,但还是缺少整套档案记录的原因,反而大部卷宗滞留大陆,部分遗失于大海中。此外,主持运金的央行总裁俞鸿钧及笔者父亲生前均一字不提,因为蒋介石曾经叮嘱保密,尤其是军费部分。笔者从先父遗物中找到部分记录,算是第一手数据。而在台的“中央银行”,早期无一套完整的记录发表,向近代史作一交待,也向海峡两岸亿万



百姓,尤其是许多受金圆券及旧台币贬值而丧失黄金银元及美元外币的人民,作一正式的说明。

可喜的是,近年台湾已逐渐公布大溪档案中的“中央银行”档案,秘密军费支出部分仍是大纲(大溪档案电子档“厦门分行拨交联勤总部吴署长嵩庆黄金数量”,图12.3),尤其是1949年5至8月(见表1.1,16.1,16.4和图13.7)。如6月14日给先父一笔35.6万余两的黄金,大概是6至7月的军饷及副食费,先父日记中也很简略。我们这些经历内战沧桑的人,当年仅是稚童,时不我与,应有责任尽力在余生作一客观完整的追踪,看看这些黄金究竟去了哪里(见第16章)?

南京于1949年4月23日解放后,先父的工作主要就在上海、厦门、福州、广州、重庆及台湾等地。

1949年5月5日先父日记(在广州):

……闻徐部长(堪,财政部)三次来电话,后知为银元预算案,定明日开会讨论,晚先至(参谋)总长寓交换意见,决定人数为350万,经费恐在3500万(银元)以上。

上海保卫战前夕,国民党军队人数如此之多,“吃空缺”总在三分之一,军费惊人,是以每人10元计。

5月6日先父日记:

……11时至徐部长处集会,讨论改币制后之预算,争执在3000万—3400万之间。

这是预期以银圆券取代无人要的金圆券,如以搭配一半的现银计,每月就要一千六七百万银元或20万两黄金(1:80计算)。进入6月,为了维系军心,国民党军队就只好全以现银(金)发饷、购粮、制冬季服等。

5月初,笔者家还在上海(图7.1),解放军开始合围,炮声已清晰可闻。14日(图7.2)先父从广州飞上海,即赴央行商拨军费(应是奉蒋总裁命把剩余金银移作军费,他是国民党政府管理军费的官方负责人)。他记下:“多伦路已列入警戒线,出入不太方便。”



图 7.1 1949 年初的外滩，军车运送繁忙。此外也可见到美式新型“黑头”轿车，孔宋的孚中及扬子公司进口数量甚多，并有其他套汇走私大发国难之财。蒋介石于 1948 年 11 月 4 日的日记中提到：“孔令侃囤积居奇，见其货单，痛愤之至。”货单之中就有多辆此种小轿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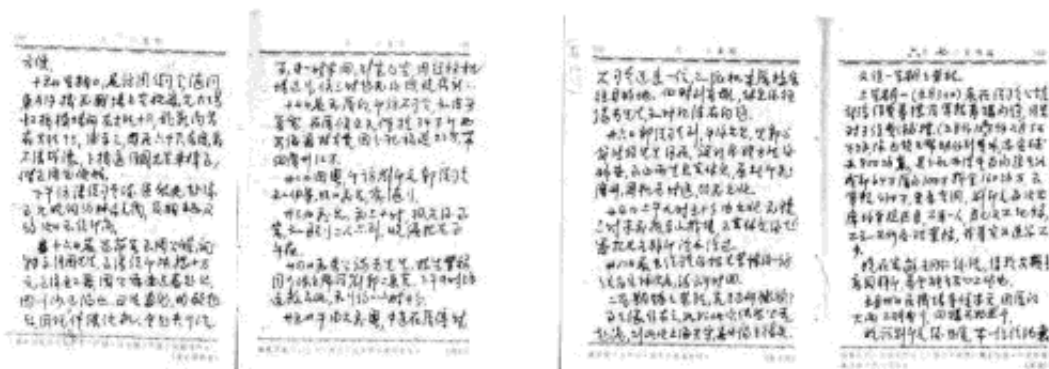


图 7.2 先父 1949 年 5 月 15 至 30 日的日记(6 月 7 日补记)



图 7.3 1949 年空军总司令周至柔

15 日晨，他还同周至柔(1899—1986，保定军校 8 期，时任空军总司令，野心很大，是一位让蒋介石伤脑筋的人，图 7.3)飞到大场、龙华、浦东上空去视察前线，只见到到处都是火头，表示解放军已经在东面、北面、西面合围上海了(图 7.2 日记)。下了飞机，蒋经国也刚由台北飞到，正好与先父及周至柔在机场相见，蒋经国也是奉其父蒋介石命，要央行总裁刘攻芸(当时人在广州)将上海最后的存金存银转作军费运往台湾。此日，解放军攻打浦东，上海南面的川沙与南汇已被攻陷，上海陷于解放军



的包围圈中,情势实在是十分危急。只要有一团一营的国民党军队起义(按:国共内战中,国民党军队起义投共屡见不鲜),造成一个小防卫缺口,解放军就可在几十分钟内进抵黄浦江边。如果当年蒋经国为中共所俘,今天台湾的历史就要重写。

当天,蒋经国与先父同在周至柔家中便餐(图7.2日记)。此日,蒋经国应与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1900—1954,早年得陈仪推荐,进入日本士官学校,因他的出卖,陈仪于1949年2月被蒋介石逮捕,后在台被枪决)有过面谈。见过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及军费管理的官方负责人后,在先父到沪的次日即15日,汤恩伯就正式行文到中央银行:

为适应军事,贵行现有黄金银元,除暂留黄金5000两、银元30万元外,其余即存于本部指定之安全地点,需要时继续提用。此致中央银行

汤恩伯亲笔(5月15日)

16日央行召开临时行务会议,记录如下(见《民国档案》1989年第2期):

附件:行务委员会第14次会议记录

日期:(民国)38年5月16日上午下午临时会议。

出席:林局长(崇塘、业务局)、陈处长(延祚、秘书处)、李处长(立侠,稽查处)、张处长、夏局长(晋雄、国库局)、金处长、高局长。

主席:林局长。

讨论事项:

(一)奉汤总司令电话,即刻查报本行各局库存黄金银元数字。

决议:由业、发、国三局即刻列表送陈。

(二)奉汤总司令亲笔手令:为适应军事,贵行现有黄金银元,除暂留黄金5000两、银元30万元外,其余即移存于本部指定之安全地点,需要时陆续提用。等因。请商讨。

决议:电总裁请示。

(三)业务局提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副处长吴本一根据汤总司

令5月15日亲笔手令,并持该部正式收据来局,声称须于即晚提取本局黄金19万8千两,银元120万元(内半元32万元),如何办理,提请公决。

决议:并由本会长途电话请示总裁,奉电谕交业局遵办。

16日中央银行致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代电稿:

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汤总司令勋鉴:本行库存黄金银元晨间奉电话应即列表密报备核。等因。兹将本行业务、发行、国库三局库存黄金银元分别列表随电附奉,至祈密察为禱。

中央银行副总裁

《民国档案》(1989年第2期)并没有将央行业务、发行、国库三局库存的黄金银元列表附录,但总量见上文5月16日会议记录和下文18日电及20日签呈。但首先总裁刘攻芸不在上海,央行行务委员会还要致电广州。

中央银行行务委员会致刘攻芸电(1949年5月17日):

广州总裁钧鉴:0517、315电奉悉。正遵办间,复准汤总司令0517平字1001号代电开:“一、兹为适应军事,贵行所报现存黄金银元除业务局必需准暂留黄金5000两、银元30万元外,其余黄金19万8千两,银元及半圆120万元,希即刻移送安全地点。二、除派员前来协运外,即希查照”。等由。经将业务局库存纯金17570点377市两,发行局库存黄金120750点531两,发局代部保管新疆省银行缴存发行准备金项下黄金50289点304两,发局代业局保管发还苏上达案黄金93点118市两,国库局库存纯金3317点413市两,合计黄金192029点743市两(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又业局库存银元88万元,半元银币合银元32万元,发行局库存银元26万9000元,合计银元146万9000元,于5月17日照数拨交警备总司令提运,取有领据,并派行员李光朝、徐厚善、高光汉、杨炳熙、田家丰等五员随船协同照料。谨电呈钧鉴,并祈就近呈报院部核备为禱。行务委员会谨呈。(皓)

(17日电复勉准照办)



中央银行发行局出纳科、接管科签呈(1949年5月18日):

谨密呈者:职等奉钧座面谕本局库存黄金……(数与17日同,略)……扫数点交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接收。等因,自当遵办。谨于本月17日晚留局候命,至十时半后,该部派财务赴吴副处长本一率领官兵数十人随带卡车六辆奉命来局提取黄金银元,职等在钧座引导之下,先将黄金银元数量总清单及详细箱号、重量、数目清单全份检呈,施由吴副处长洽收,当时取得该开具列明“黄金33箱又33桶(据称17万1141两9钱5分3厘),银元62箱(据称26万9000元),附清单10纸”,盖有京沪警备总司令部防之平字第0351号领款收据一纸,并将本局存底之黄金银元数量总清单与该部所开收据拼合在骑缝处由吴副处长加盖私章后,即分别在本局15号6库及本行24号库房内依照清单逐一点交吴副处长接收,由其同来之官兵自行扛出库房运去。至18日晨2时许竣事。理合检将部所出平字第0351号收据一纸、盖有骑缝章之黄金银元总清单一纸及详细箱号重量数目清单全份一并附呈,敬乞钧核。关于是项金银之交出应如何做帐之处,并祈核示祇遵为禱。谨呈

局长

副局长

出纳科职 李友仁

接管科职 孙晓初

(民国)卅八年五月十八晨四时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黄金有桶装与箱装两种方式(图11.4,11.5),桶装应是以由金圆券兑来的民间金子为主,成色较差;箱装以美国金砖为主,约400市两一块,上铸有999(三九)成色。此外,18日警备总部的领据单,与17日致刘攻芸电文中的金银量不符,黄金相差约2万两,银元120万块。但大溪档案中6月5日由沪运台的192029两与17日致刘攻芸电文中的数量完全吻合(见表1.1与图1.4)。

中央银行发行局签呈稿(1949年5月20日):



奉行务委员会交下迭次行务会议记录及有关文件,略以关于奉汤总司令亲草手令,本行现有黄金银元除暂留黄金5000两、银元30万元外,其余即移存该部指定之安全地点一案,经呈奉钧座本月17日电复勉准照办。等因,提经第15次行务委员会,决议分送业、发、国三局遵办具报。等因,奉此,自当遵办。查本局在沪库存准金共计130701.542纯市两,除于本月17日准业务局先后函请拨付共9951.011纯市两,已在调拨中准金户转帐外,其余计有黄金120750.531市两……(与上稿重复处,略),乃于本月17日晚十时半汤总司令派该部财务处吴副处长本一率领官兵数十人随带上车六辆来局来提取,当经职会同本局李副局长振五转嘱原经管人出纳科主任李友仁,接管科主任孙晓初先将黄金银元数量总清单及详细箱号重量数目清单全份移交吴副处长洽收……(与上稿重复处,略)再,上次交出金银究应如何分别转帐及报财部查核以清帐务而符事实之处,并祈核示祇遵。谨呈

总裁

“需要时继续提用”及下面回文里的“为适应军事”一句,就是提出来让财务署管理,作为军费。据2006年1月1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载摘自《馆藏民国台湾档案汇编》(2007年)的电文:

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汤总司令勋鉴:奉本月17日平字地1001号代电,为适应军事,本行所报现存黄金银元除业务局必需,准暂留黄金5000两、银元30万元外,其余黄金19万8千两,银元及半圆120万元即刻移送安全地点。又,奉本月16日手令,因近日无飞机,暂移存船上,并随船派人照料。各等因,自应遵办。……特函奉复,敬希察照为荷。

中央银行(5月18日印)

这里的数字与上面18日的签呈又有相差,但又点明,是运上了军舰,还有人随船押运。当接到汤恩伯的手令之后,上海央行内部的反应又如何呢?《国民党秘密抢运内情》(巴图著,群众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中是这样描



写的：

……国库局局长夏晋雄接到秘书处处长陈延祚的通知，说汤恩伯已有正式公文，将于当日夜间派人来中央银行，将业务、发行、国库三局的全部库存金银，用专轮运往“安全地带”保管，并告诉夏晋雄一定要严守秘密。……接到汤恩伯关于提取黄金的指令，李立侠在电话中说：“这件事需经过行务委员会开会决定。”……但此时，在险恶的环境中，李立侠等人也无可奈何。他们在行务委员会讨论后，三人就打电话给广州，刘攻芸复电回答的很明确，就是“照复”（按：“17日电复勉准照办”）。这就使他们没有什么回旋的可能。18日夜（按：应为17日夜）里8时，南京路外滩提前戒严，汤恩伯派出的军官分别进入业务、发行、国库，将国库局的黄金提走，存在业务局的最后19点8万余两黄金、120万元银元共50箱上船。在夜色中，军舰悄悄向吴淞出海口方向驶去。……这就是蒋介石于2月10日后留给汤恩伯用于市面流通的最后廿万两黄金，至此，“中央银行”的黄金、白银被完全卷运走了。……

这里还有俞鸿钧的一段插曲（可能是把时间移后了三个月，见《俞鸿钧传》），颇为一些不究真假的网上人士所引用：

……俞在（1949年）5月16日在中共集结40万大军，大举围攻上海声中，只身一人，飞抵虹桥机场。一下飞机，便被卫兵扣留，把他押到候机楼，不许擅离一步。俞鸿钧一再表明身份，自我介绍。卫兵们的回答，说来说去就只一句：“你拿出证件来看呀！”当年在大陆没有身份证，俞鸿钧是党国要人，报章杂志经常都有他的大名和尊容出现，他拿不出任何证件，更不相信这些卫兵竟然不认识他。更摸不清楚他们是何用意，究有何种企图，他只有耐心的等候下文，暂时失去自由。不过他很机警，趁那些卫兵们一个不注意，移近电话机旁，拨了一个电话给淞沪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汤总司令一听到俞鸿钧抵达上海，在机场被扣留，立刻派车来接。当时，俞鸿钧便把握时机，驱车直驶上海中央银行，访晤央行总裁刘攻芸，请他立即召开一次紧急会议，秘密会商续运余存黄金事宜。



这段插曲,当然把俞鸿钧写得胆识过人,智勇兼备,但这是小说家(王绍斋、章君谷)言。在危城之中,“党国要人”还很多,包括蒋经国(16日上午9点50分才飞去定海)、周至柔等位,名不见经传的家父及他的一家子人也在围城之中,父亲是次日(17日)才飞离上海去厦门的。此外刘攻芸总裁当时也不在上海中央银行内(见上文),据许多方面资料显示,是打电话到广州的。另外还有个疑点,不止先父16和17日的日记里没提到俞到上海,两蒋的日记也没记此事。俞是2月5日离开上海经广州回到他在香港的家的(见第6章中他给蒋经国的密电),即使在机场被扣留,也是2月的事,上海那时还没被包围,刘攻芸总裁也的确在上海,“秘密会商续运余存黄金事宜”是第三批的60万两(在2月7至9日空运台北),但《俞鸿钧传》的作者为凸显俞的“勇敢”,不惜把发生时间压后三个月,反而露出“马脚”。近代史实未远,就已经有人在“制造”历史,尤其是一些有财势的家族,除了请专业人写书,如同古时写阿谀先人的墓志铭,近来也有人经由网上资讯作宣传(见第18章),此风不可长。求历史真相,的确不是易事,需要交叉求证,更不能请小说家来兴笔发挥。另一方面,《俞鸿钧传》的作者手头可能没有可靠史料,换言之,俞鸿钧大概没有内战时的日记留下来,以提供正确时间。

即使俞鸿钧在5月16日那天来到围城,也许此行也是多此一举(不过,比起许多国民党要人早已开溜到香港与海外,蒋经国、周至柔、先父等人能来这围城,算是有勇气的)。中共再厉害,那时还没有进上海,央行也不敢违抗警备总司令的命令,汤总司令有足够时间把国库的金银全搬空,上海是5月27日才弃守的!连5000两黄金及30万银元都不留给中共,此外连中信局的敌伪手饰(见第11章中1949年2月8日央行总裁刘攻芸报蒋介石)也许也可拿走。蒋经国15日来上海,除了要汤恩伯把金银搬去台湾外,还想要把这些手饰拿走。

蒋经国所著《我的父亲》是赠阅的,送了以后,听说又都回收,少数“漏网”,包括笔者手头一本,是蒋经国亲笔赠送给我父亲的(图7.4),提到了上面上海失守前夕的事:

……父亲(指蒋介石)正当此风雨飘摇的形势下,准备力挽危局



的时候,李宗仁突然从桂林来了一封信;那时,他不但滞留桂林,不到广州处理公务,而且还要写这封信来,向父亲“谈条件”。他要索取已经运到台湾的库存的黄金,并且要父亲不要再问国事,建议最好“早日出国”。……

关于李宗仁来信所提到的库存黄金的搬运经过,我应该附带在这里说一说。当上海快要撤退的时候,父亲就派我们几个人到上海去,劝中央银行把库存的黄金全部搬运到台湾来。临行的时候,父亲又再三嘱咐我们:“千万要守秘密!”因为早已预料,李宗仁一定要以库存黄金作为“和谈”的条件之一。后来这一批黄金,是很顺利地运到了台湾了。政府在拨迁来台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和经济情形,早已不堪设想了;哪里还有今天这样稳定的局面?(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古语说:“无粮不聚兵”,如果当时饷糈缺乏,军队给养成了问题,那该是何等严重?库存黄金到达台湾之后,父亲又记起还有一箱国家的珠宝,存放在中央信托局;命令我们再赶到上海去,劝信托局把这一箱珠宝也运到台湾来,交给国库保存。这一箱珠宝,多半是抗战时期一班汉奸非法搜括的财物,胜利后被政府依法没收,交付中央信托局代为保管的。因为我曾经担任过管制上海经济的工作,知道这箱珠宝存放的地点;所以,父亲就命令我去负责执行这一项任务。当我到达上海以后,李宗仁已经知道了这回事,立刻下令,不准移动这箱珠宝。后来竟吩咐那个保管保险箱的人,飞到香港去,使我无法取出。我因向父亲建议:“据所知道的情形,这一



图 7.4 蒋经国所著《我的父亲》是 1956 年为庆祝其父蒋介石 70 华诞而写的,据说大部都被收回(铺为笔者,吾父吴嵩庆于 1986 年转赠此书于我)

箱珠宝已经用了不少,剩余的东西,仅值二三十万两黄金,我们何必为此区区之物,同人家伤和气。”父亲却指责我说:“到了台湾,当军队粮饷发不出来的时候,就是一块美金也是好的!”我听了无言可答,只好依从父亲的意思去进行;但结果还是没有法子把这批珠宝搬出来。……

这一千多条珠宝没能拿到台湾,是蒋经国一生的憾事,为怕跟李代总统闹翻,“任务”失败了。而汤恩伯就没有那样的顾虑,十天之后,中共就进上海,汤如果在上海撤退时把剩下的金银珠宝全拿走,对蒋父子及国民党政府来说,不会是“有过”的!

大陆方面说: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国民党党报为蒋经国从“行政院长”一职升任“总统”大造舆论时,也是将运黄金作为蒋经国的重要“政绩”大肆渲染。1975年4月29日台湾《中央日报》写道:“民国38年(1949)是我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段时期。那时上海都快撤退了,环境很恶劣。蒋院长奉总统之命,不顾危险,深入危城,把中央银行库存的40万两黄金,全部搬运到台湾来”(着重号为引者所加)。这里写的是40万两黄金,《中央日报》公布的数字是蒋经国的日记记述的一倍,哪一家正确,还是个谜……

为什么一般人只说20万两(当然最主要是根据中央银行给汤恩伯的公文上写的),的确是个值得探讨的谜!

这第四批在解放军的包围下强运出来的金银应该是分几晚运的,可能不止20万两。18日清晨是运17万余两黄金(6吨重)加26.9万块银元(约7吨),正需六辆十轮军用卡车才可装载完毕。但还剩余黄金2万两(即使



图7.5 美式载重两吨半的军用十轮卡车

没有其他黄金)和120万块银元(共30多吨),就另需多辆卡车(图7.5)隔晚再运。

如上所述,在兵荒马乱中,汤恩伯可能就叫士兵去各国家银行(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中央、中国、交、农四大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如上文《纽约时报》提到的“中央银



行所公布的金银及外汇并未包括中国其它的公私银行及金融机构”)的仓库里搬黄金,如许多证人(见第9章)回忆的,尤其是军舰上的,都是五吨十吨的装,不须点交。当然其中大部是银砖,但也无法确定。所以,后来汤恩伯很有钱,去日本买豪宅,而且想逃到日本去(见下文)。当然,蒋经国有情报,有政工,慢慢都查出来了。或许汤恩伯心中不安才要出亡。第四批黄金量也由20万两升到40万两(可能还不止),因为是“军费”,就交到财务署,由我父亲暂时保管。并且,蒋派官邸的赵志华来,因此财务署后来从第二批剩余的十几、二十几万两,到1950年在台北兑换黄金时,发饷达100多万两(见第16章),当然这里有2月初的第三批空运黄金60万两。

如果各国家银行的金银被国民党军队拿走,那为什么上海解放后没有人报告?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这些国家银行的负责人已带着账本离职逃走了,另一方面要考虑报告以后的后果如何,是否有监守自盗(或许也真会趁乱拿一点)的嫌疑?对报告人,共产党是会追查到底的。

参见1949年5月8日以后蒋介石的日记:

11日:

昨下午启碇向普渡进发……共匪虽狡,无法渡海来侵也……

12日,本周预定课目:

……4. 移驻马公岛;5. 台湾金融改革之督导;……7. 厦门现金之疏散;……

15日:

朝课后,派经儿飞沪参加党务联络会议及转达意旨于汤(恩伯)、周(至柔)各将领。记事,及接沪电始知13日夜,共匪已向上海杨行等处正攻矣……

16日:

朝课后,经儿自上海回来报告沪情战况,尚佳,但南汇、川沙二县城已失,函汤(恩伯)、周(至柔)、桂(永清)三总司令,激勉之……并指示其运输物资……下午阅报及厦门存金分配各省办法……(明日



赴马公岛)……(按:完全没提俞鸿钧到上海的事,按常理来说,俞如是这样忠心耿耿地赶到已被包围的上海,帮忙把央行最后的存金提出作军费,两蒋及先父日记都应该记他一笔。此外,据凤凰网2009年12月3日资讯,近日有五封蒋介石亲笔信在台湾“清华大学”展出,写在5月上海解放前夕,要中央银行“留二万两黄金给中共”,仅留5000两或是汤恩伯的决定。)

先父在上海黄金运出的差事办好的同时,也“顺便”把先母、笔者等送到台湾,因为11天以后上海就解放了。5月17日先父日记:

晨(由上海)飞厦门,即访石司令(祖德),知尚无覆电,在厦候5天,仅提34万(银元),即西安绥署特支费,因分配福建22万,带回广州12万。

由此处可见,厦门防卫司令更是蒋介石的亲信,先父在厦空候数日,背后却隐藏着国民党政府内部的暗斗,也只有先父不顾及派系,为华中白崇禧的部队领饷。据周宏涛的《蒋公与我》记载,李宗仁5月23日在广州召开中常会,白崇禧在会中报告:“联勤总部吴(嵩庆)署长,日前派员赴厦门领取银元,却被当地警备部队(即石司令的手下)阻止而未得。”派他去厦门运取银元作为军政用费,这应是完全合法的。但是,那一个月白崇禧的“华中剿匪总部仅自广州央行借得银元30万圆,每个士兵仅三角”(周宏涛的《蒋公与我》一书中只提联勤总部的吴署长派人去厦,从上面的日记就知是先父吴嵩庆本人被挡驾了)。换个人,讨好上级都来不及,还敢去顶撞大权在握的蒋总裁?在厦门坚持五天,替一位非嫡系的已败退湖南的“华中剿总白长官”的部队去领薪,对他自己而言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但5月17至22日的那五天,却是“华中剿总”20余万国民党军队士兵的生死关头:18日,解放军攻进汉口;19日,白飞广州向李代总统求饷,并把“剿总”撤到长沙;21日,南昌解放,解放军南下闽粤,渐形成对白集团军的大包围。对派系斗争、争权夺利,先父本来就毫无兴趣而且厌恶透顶。凭着一个读书人的良知,他当时能为华中国民党军队士兵做的,仅仅只有这一点点点了(还是领了12万银元给广州)。后来在8月,先父又违背蒋的意愿,运黄金7万两到广州,第二次“违旨”。蒋也原谅他,还是信任不衰,只是升官就无望了。



5月18日蒋介石日记(于澎湖马公岛):

……鸿钧由台北与经儿来访研究台湾币制改革之报告甚详……

此则日记与一周前(11日)陈诚给蒋的电报有关联:“以台湾言,目前已感人口激增负担奇重,财政经济濒于最后关头,职虽竭尽能事,仍穷于应付”(大溪档案,第29册,第374页)。

5月21日蒋介石日记:

……于蔚文,辞修囑其不可拒绝政府运金出台,但有三原则[按:见两天后日记,此即曹(圣芬)秘书三原则](图7.6):

甲、此金必须用于剿共之军费;

乙、此金应仍为改革币制之基金,不宜过于分散;

丙、运金地点必须比台湾更为安全,切勿为匪所劫夺。



图7.6 (左图)曹圣芬,1949年在蒋总裁办公室任机要秘书,即曹(圣芬)秘书三原则之献策者(参见图11.8),此为其晚年时(2001年)中风前8个月与笔者(右图)曹圣芬书写手迹(兴镛即笔者)

5月21日蒋介石日记,本周反省课目:

……四、行政院……粮食会议,陈辞修不问利害与结果,如何贸然前往(广州)参加?如果桂系李白向其要求运出台湾存金,而彼应因不宜,甚可为其所害,白崇禧之卑劣毒谋无所不为之往事……

五、督导青岛之撤退与厦门存金之移动……

国民党政府内部真是尔虞我诈、斗争激烈,如何能不败?

5月22日蒋介石日记:

秋



……辞修与铭三忽由穗飞来相晤甚慰，数日来所焦虑者，至此释然。

5月23日蒋介石日记：

……于运用存金示以曹秘书三原则，决予以支持。

5月24日先父日记：

24日飞马公谒老先生，报告业务，同行陈主席（诚）及刘（峙）郭（忭）二长官，下午四时余返抵台北，飞行约一小时十分。

5月24日蒋介石日记：

晚课……接（何）敬之致石祖德，欲调运存厦现金，突如其来，令人不知所解，甚叹。回馆，刘攻芸、郭忭、陈辞修等已到，仍与谈下月军费之提用及今后金融币制之改革办法，何（应钦）刘等终想厦门仅有之现金完全运出作无益之消费为快……

由此处可见何应钦也在动厦金的念头，让蒋生气。

5月25日先父日记：

午由台飞粤，中途在厦停时，石司令送来一信，知派机来厦接余往目的地，四时到高雄，休息后往谒老先生，知对记录有问题。

同日蒋介石日记：

昨下午甚受文武干部之骄横，其对余之态度，渐不如前，郭（忭）陈（诚）皆如此也。……冈山下机……叔铭来接，直上高雄要塞……至下午见……吴司长嵩卿（庆）研讨……下月军费收支要领，忽见经国来报，称在机上得信，上海机场已不能降落。……

此日上海江湾机场已在解放军炮击射程内，空中交通已断。蒋记得先父曾于1943至1945年任国民党军队粮秣司司长，故以旧职司长相称，把名字也写错了。蒋介石在此误笔，也反映出他的心理状况，他到台湾只敢上高雄要塞，是因为对陈诚有疑惧（见下文）。除此，上海战况恶劣，更增加其心理担负。蒋介石感叹：“甚受文武干部之骄横，其对余之态度，渐不如前，郭（忭）陈（诚）皆如此也”。先父与郭陈同时晋见，应都看在眼里。



5月26日先父日记：

郭(忬)总司令到,午后公见,见郭与俞鸿钧先生同在,说明处理方法后辞出……

谈的事一定与国库军费有关,自从17至22日在厦门替白崇禧提银元后,蒋老先生一再召见,并且还找来了郭俞二人,似含告诫微义在其中。

同日蒋介石日记：

正午鸿钧与郭忬来见,嘱其赴穗(广州)办理军费与金融等事。(按:要俞去广州办事是与银圆券发行有关。)

5月28日先父日记：

二星期余之劳顿,究于事何补欤?事之缘信有之,如非此次偶然公差赴沪,则此次上海失守,眷必陷于彼矣。(图7.2)

家眷中包括在上海念小学的笔者,先父对官场的这一套有些不适应。

同日蒋介石日记：

……至柔与陈(诚)尚争气,悲痛之至。本周反省课目:……7.台湾广州重庆三区金融之督导……

5月30日蒋介石日记：

……桂系也准何(应钦)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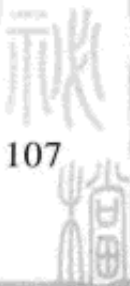
又记本月大事预定：

……台湾大广播电台之建设;5. 改革币制。

5月31日蒋介石日记：

……周至柔与陈诚私见甚深,忽由沪赴粤而不敢来台,因其覬覦省主席而不得,其渐走极端……令人悲观,天父果要试练。

纵观1949年5月,大概是蒋介石一生中最背的一个月,不止把他赖以起家的上海丢了,内部也是纷争不已,但最重要的财权他仍牢牢紧握着,先父只是他帐下一位中高级部属,纯书生来管军费,此时似也颇倚重,其命也乎?



第8章 吴嵩庆——1949年“预支”军费的负责人

蒋介石对先父吴嵩庆为什么这样倚信？先父担任国民党军队财务军需署长达15年（1947—1962）之久，职位并不高，但是这段期间所管理的军费数目在国民党政府总预算中最高曾占三分之二以上。此外，在国民党政府最艰困的时期（1948—1949），中国国库大半资金也暂时由他与中央银行共同监管。前面已提过，蒋信任他，但他并非“内廷的亲信”，因为他做人有原则，不是一位可以颐指气使的下属，由于这点原则，曾“顶撞”过蒋[替蒋的政敌白崇禧的部队领过银元（见第7章），又“违旨运黄金”到广州（见第14章）]，但蒋还是对他信任有加，只是蒋心知肚明先父不是一个会玩政治的人，从此摒他于高层权力圈外。肩上的两颗星，一直到退休，20年都没变过，眼见同僚（如严家淦，曾任蒋的副手）、下属越他而上，飞黄腾达，而他数十年如一日，只是本分地做他岗位上的事情，在日记里从未见任何怨言，只是自我鞭策把每天应做的工作做好。以下简单地介绍他的一生，让读者来判定，蒋介石是否知人善任。读者或可从他一生的经历，为个人安身立命作参考。如果因此而改变为积极奉公的人生观，也是笔者所乐见的。

笔者祖父是读书人，教子极其严厉，使先父备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有四维八德的身教及天下为己任的宏观。祖父以兴义学、排危解难为乡人称道，要求其子正道为“公”，从大处远处着眼，不斤斤计



较眼前得失。^① 父亲一生也以此自励，奉行不辍，笔者不是想过分“捧”自己的亲人，只能从这个角度去分析他一生为公、冒险犯难的行谊及所做的许多“傻事”，如1936年在反共高潮时，他竭力为亲共左倾的许多位入狱乡亲作保人，当年不但轰动镇海县城，也传到了沪上，至今还为乡人所乐道（小港信息网，宁波北仑教科网），这些事从未听他提及，直到近日笔者才在网上知悉，这说明他只论事情的是非曲直，而不顾自己的得失损益。他进教会学校之后，更增添宗教里爱人如己和每日自省的功夫。

先父一生奉行一个字，就是祖父教的“公”字。不是为了“公”事，我一位早夭的妹妹也许今天还活在世上。除了“公”以外，据我看，先父还奉行的一个字就是“忠”（但非“愚忠”），因为他早年追随了蒋介石夫妇，一生也就忠心耿耿地追随到底，即使在蒋最失意的时候，即1949年1月到次年3月，蒋只剩下一个失败党（国民党）的总裁名义，也就是这段时间，蒋把一件极重要的任务交给他，即是前文所说的“第二至四批黄金运离上海”（见第1章，表1.1）及央行的部分外汇及大部纯银银元，也就是当年中国央行“现金”的半数以上，以“预支军费”名义转移到他手中，尤其是厦门的军费黄金，是以先父个人名义转入账中（大溪档案电子档“厦门分行代付拨交联勤总部吴署长嵩庆黄金数量”）。

^① 笔者于2009年8月在本书校稿之际，查到宁波市中共北仑区委宣传部、宁波市北仑区文联在2008年9月12日组织为戚家山名人投票，祖父吴吉三被乡人推荐为001号，并介绍他生平如下，可作上文注解：

吴吉三（1874—1936），名企唐，号梅香，戚家山青峙人。清光绪十八年（1892）因府试未中，又目睹清廷丧权辱国，受维新文化思想影响，遂绝意仕途，专心于家乡教育及公益事业。以自家西轩为教室，招集族中及近邻子弟读书。三十二年（1906），以自家积泉庵之产业为经费，呈请镇海县署批准办学，定名青峙学堂。次年，青峙学堂开课，自任校长。三十四年（1908），得族叔吴正国等人资助，在村东石子滩新建校舍，取名七星延陵学校。后为解决办学经费，将祖产丰泰帆船出让，所得六千金作为学校经费。1940年，日军侵犯镇海时，学校毁于战火。抗战胜利后，校舍由其子嵩庆（即先父）重建，改为青峙学校。1989年5月仍复原名。办学期间，耗尽家财，但矢志不渝，临终仍嘱咐家人办学救国。吴嵩庆继承父志，接任延陵学校董事长，继续办学。



2008年秋,笔者从刚公布的蒋介石内战日记得知,蒋在1947年底调先父入(南)京时,已对国民党军队“陈旧”的军需系统完全失望。先父甫上任,得到的指示就是如何“落实”发饷人数,也就是把民国以来军中最令人垢病的“吃空缺”的恶习纠正过来,但谈何容易。直到去台湾,先父与他的财务同仁才能点名(核对照片)发饷到每位士兵,在50年代完成蒋交办的任务。

俞鸿钧把260万(市)两黄金移到台湾,其价值当时约为1.4亿美金的话(当时1英两市场价为50美元,1市两则为55美元),那先父经手的“军费”就在2亿美元以上,也就是说比俞鸿钧所运黄金价值还要多些。他的清廉,在台湾是有目共睹的,作为他儿子的笔者曾经见证了三件事,可与读者分享:

第一是,1957年笔者在台湾的大专联考中分数颇高,可进当时最热门的台湾大学的所有学系,但差一分进我的第一志愿台大医科(全台最高录取分),那时高雄医学院医科已开办,如我填的话,可能是前几名,但这所私立医学院学费是新台币5000元,美金125元左右,是台大的20倍,但我家无法负担,这就开始了我一生中最暗淡、最失意、最感挫折的12年。直到1969年,我以自己的“成绩”进了美国排名前列的医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自己借债去完成学医的志向。

第二是,1964年笔者出国留学,先父向蒋经国借了1500美金做旅费及生活费,不到一年母亲来信,说被催还此款,幸而当时我在圣路易市的华盛顿大学有奖学金(每月200美元),省吃俭用,刚好够还此款。

第三是,1991年9月,笔者赶回台北料理父亲丧事,亲自经手他一生的积蓄款项,包括他30年的军职,12年担任唐荣钢铁公司的董事长,及最后15年在一家私营机构(万邦公司)任董事长的收入,他全部财产是现金300万元新台币(加上约90万元的人寿险及奠仪)。我母亲手中也有约同数的积蓄。这就是他俩一生的积蓄,这不到800万新台币就是我母亲赖以维持余生的钱(还须维持一位来台依亲及照顾她晚年的儿子一家人的生活),直到她九年以后以百岁高龄去世。2000年11月办完母亲丧事



后,剩余的就让留在大陆的三个儿子分了。至于宿舍房子,是台北收支处长王逸芬在1949年替我们安排的,当年巷口还有猪舍,现在则是近建国花市,台北的黄金地段,光是土地就价值近亿元新台币,但先父在世时拒绝友人建议以新台币20万即可自己买下当时时价超过千万元的寓所,他对好意相劝的友人说:“我一生为公,不愿到暮年来占公家便宜。”他当然希望在两老过世之后,此项公屋就干干净净地交还公家,更不要没替公家出过力的子女“来占公家便宜”。

先父的教育

父亲生于1901年阴历正月初九,该日是地藏王菩萨(这是位发愿“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菩萨)生日,所以在台北每年他生日的清晨总是被鞭炮声吵醒,像是为他祝寿似的。

他5岁到15岁上的是家乡浙江镇海附近的小学,先是念沙头的青峙学堂,6岁改念较近的七星延陵学堂,此校当年是先祖父吉三先生与一位叔祖合资新创的。

到16岁先父就进了宁波北岸的斐迪学校,是英人所办教会学校,前四年是中学,后两年是大学预科,他念了三年之后,就转入上海沪江大学的高中部,毕业后进入大学部,民国十四年(1925)从商科毕业,已内定他到宁波四明中学任商科主任(两校均为美浸信会所办)。1926年冬我叔嵩寿以伤寒在校去世,父亲就离开此伤心之地。据笔者所知,他在四明中学教书的时候,教过一位后来台湾医学界的名人,那就是“农复会”的卫生组长许世巨。许是最初推动台湾家庭计划的发起人,是人口计划的执行人(会同周联彬教授),后来曾获得闻名于亚洲的菲律宾麦格塞塞奖。1972年我从霍普金斯医学院毕业,在台北的校友聚会上许老告诉大家,先父曾在四明中学教过他英文。

先父在宁波、上海念书的时候有两位要好的同学。一位是叶良光(图8.1),在抗战胜利后先父担任财务署长后,一直追随父亲身边,“财务署”台北的地下金库有三把锁,其中一把钥匙就在叶的手里。另外一位是陈





图 8.1 叶良光(右,保管“财务署”金库三把钥匙之一)、陈舜畊(中)与笔者(约 1972 年)

舜畊(图8.1),在中国铁路界是有点小名气的,抗战胜利后曾任津浦铁路局局长,到台湾后曾任台湾省铁路局局长。他影响我父亲甚多,他与蒋家关系甚深,就像俞鸿钧与蒋家的关系建立之渊源有周雍能,我父亲与蒋家的关系有一部分是由于有双方都

熟悉的陈舜畊。舜老的姊姊陈志坚是蒋经国母亲毛福梅的结拜姊妹,蒋经国在上海念初中时,就是由陈果夫与陈舜畊照顾的。笔者曾为他在《传记文学》写过一个传(如对他的生平要知道更多的话,请看第 18 章)。陈先我父亲去欧州留学,当然也影响到我父亲,他后来也去法国留学。

1927 年,北伐军一路破竹到上海,我父亲承陈舜畊的介绍进入上海龙华卫戍司令部任少校秘书,司令官是白崇禧(图 8.2),而陈自己则到蒋介石身边任机要秘书。有些奇怪的是,陈在上海这么久,还去黄埔军校教过书,应该知道追随蒋和追随白有多大区别,完全是不同系统的嘛。(幸亏后来父亲离开白,去了法国念书,回来后才被留法同学汪日章介绍到蒋的身边。)次年 6 月入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部,还是少校秘书,而此时陈舜畊已离蒋去欧洲留学去了。行军到保定时,指挥



图 8.2 白崇禧(左)曾帮助父亲(着中山装)于 1928 年去法国留学,两人在台北欢谈(约 1955 年)。来台初,白崇禧是被蒋介石当众点名羞辱过的失势桂系军人,但先父还是尊敬他为“老长官”在大庭广众中欢谈,有时白将军傍晚散步也会散到笔者家



部取消,就失业了,其时北伐军已入北平,统一在望,先父或因陈舜畊在欧洲之故,也决心出国留学。承白崇禧之助,在1928年替他写了一封介绍信给大学院(今之教育部)院长蔡元培(元培,1868—1940,浙江绍兴人);蔡元培给他一个特约编译员的名义,月支薪100元作学费,自出国之日起支,使他有去法国留学的机会(图8.3)。那年10月,先父由上海乘轮赴法,因为在北伐行军时“看到各地鄙陋情形,深感市政建设当为建国之重要一环”,就选择进入巴黎大学法科附属市政学院,两年半后毕业,获硕士学位返国。



图8.3 (左图)蔡元培颁发给先父的留学证书 (右图)蔡元培

服务国民党政府及与蒋介石夫妇的渊源

父亲嵩庆公在1931年夏天由法国回国,“经过几个月的失业,饥不择食,经友人介绍铁道部任文书科员一年余”。据他告诉家人,每天无公事可办,就到图书室去念书。但是笔者在2009年无意之间在网上发现,先父那一年不仅仅在图书室读书而已,也晋升了一级。

1932年11月,商务印书馆胡愈之主编的《东方杂志》发起“新年的梦想”征文,向全国发出400余封征文信,寻求答案:“先生梦想的未来中国是怎样?”回复的142人中,有老舍、巴金、朱自清、梁漱溟、郑振铎、柳亚子、谢冰莹、林语堂、张申府等近代史上的知名人士,先父以一铁道部的低阶职员,不知何故在此《东方杂志》里也留下了雪泥鸿爪,这或许是他平日

在此杂志投过稿而列入征文之列,但在他自传里丝毫未提及。《东方杂志》1933年1月第30卷第1期(图8.4)记下:“铁道部一科长吴嵩庆所梦的是:‘废除军备、国界、种族而臻于大同’。”这种理想,当然来自传统儒学与在巴黎留学时亲身体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息战思潮。1931年,中国正经历“9·18”事变,惨受日本及列强的侵略,祖国能无军备吗?多年后,先父又奉命出掌国民党军队财务与军需署,所管正与军备有密切关联,与他刚回国的理想相去甚远,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在动乱的大时代中,有几人还能紧抱自己最初的梦想,而不为时势所推移?(刘瑞林编,《温故之五: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上)》,广西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刘仰东,《梦想的中国:30年代知识界对未来的展望》,西苑出版社1998年版。)

1933年夏他的留法同学汪日章(1906—1992,图8.5)来信,那时汪任军事委员会机要室秘书[主任是毛庆祥(1898—1998)],谓该室有一中校秘书缺,问他“愿否屈就”,先父认为这是一大好机会,随之向铁道部请假



图8.4 《东方杂志》1933年1月第30卷第1期刊载先父吴嵩庆对中国未来的梦想的征文

赴庐山,与毛庆祥及汪日章同见蒋。蒋看他履历书,知道他为沪江大学毕业(蒋曾资助陈舜畊念沪江大学),又留学法国,即说:“好,好,好好工作。”(按:这就是蒋最早期的“侍从室”,是从1932年在南昌围剿红军时开始的。到抗战时,才扩大编制,正式称为“侍从室”,只是蒋比较低调,其实这里面人才济济,尤以抗战时为然,是蒋培育及观察人才之所在。)

先父晚年在台湾曾提及该次去庐山一逸事。一日,与汪等出游,帽为风吹落山去,汪日章即大声向先父笑道:“你出头了!”此次庐山之行,确是先父一生关键的转折点。汪别名获良,亦一奇人,在蒋事业之巅峰时,即1938年抗战初,离开蒋侍

从室少将第四组长的职位,去从事他的油画生涯。他留法时原是学艺术的,1947至1949年担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先父周围,就有多位类此视富贵如浮云、有胸襟的道义之交(可参见敝著《黄金档案》人物篇)。

不久,侍从官交来父亲的履历书,上面有蒋的批示:“准派为机要科长”。换一个人,一定非常高兴,留学巴黎大学,拿了硕士回国做个科长也不算过分,但我父亲看了:“大吃一惊,我对庆祥兄说:这绝对不可能,必是委座笔误。庆祥兄认为不会错,委座对你印象一定特别好。”但先父坚持要毛庆祥再请示蒋。次日清晨6时,汪日章打电话给父亲,“委座嘱即往见,至则见委座正在庭前静坐,胸腰挺直,而手置膝上,移时坐毕入书室,嘱我进见,微笑对我说:你还是先做少校秘书,好好从小做起。”先父就是这样极本分的一个人,不躐等躁进,从基层切切实实干起,由此开始,蒋介石对先父的信任,渐渐超过了与他渊源更深、曾资助念大学的陈舜畊。在服务半年后先父就晋升中校密电股长,掌理蒋与全国政要将领间密电本的编制与配发,并协助“黑室作业”,即蒋的侍从室著名于世的密电室。



图 8.5 先父留法同学
汪日章(前)与戴笠



图 8.6 1933年父亲进入蒋机要室的任命状

先父曾提到一件事,印象特别深。

1933年9月底,福建的陈铭枢(图8.7)早有叛变迹象,10月初即陆续有各方面情报,我们截译密电工作也特别紧张,有一天,我适在

黄季弼兄(主持黑室工作)办公室,得知正截获了一通无线密电,已译出了几个字,后经再三推敲,竟将全文译出,暴露了全面叛变计划,立刻送上委座核阅。此乃敌人自己供给的资料,比任何情报可靠。这也说明为什么,委座特别看重这一项黑室工作。

此即近代史之“闽变”,也间接证实了先父从一开始就受到蒋的信任,进入了最机密的中心。



图 8.7 (右起)李济深、陈铭枢、陈济棠

1934年7月,航空委员会改组,蒋兼任委员长,不久意大利墨索里尼征得中国同意,派了一空军顾问团来华,团长为意大利阿比西尼亚民族英雄劳第将军(Genl. Rodi),他想找一位秘书,其条件是必须为蒋委员长所熟知的人。先父就在那年11月至航委会到差(据汪日章回忆是他推荐的,参见汪日章等著《在蒋介石宋美龄身边的日子》,团结

出版社2005年版),开始了他在国民党政府空军整整十年的生涯,由航委会秘书,而笕桥航校秘书,而航委会主任秘书、经理处副处长,最后一职为空军上校经理处长。值得注意的是,1936年西安事变,蒋夫人宋美龄应变出任航委会秘书长,晋升先父为主任秘书(刘凤翰,《国民党军事制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

据2009年宁波北仑小港信息网登载,在1936年抗战爆发前夕,先父做了件“傻事”:

(宁波)蔚斗小学师生鉴于国内形势十分紧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达到了高潮。三月,蔚斗、新民、良才三校决定出一份以“反对内战、团结抗日”为宗旨的半公开油印刊物。编写工作由周鸣宇等实际负责。……为县政府所注意……不久,蔚斗的多位爱国教师被捕(而



地下党周鸣宇逃逸)……

上海进步刊物《读书生活》、《妇女生活》曾以《镇海国民党当局逮捕爱国教师》为题,撰文揭露反动政府迫害爱国教师的罪行。蔚斗校董唐爱陆,校长乐嗣钟以及在上海的吴沛宁同志积极奔走营救,终于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经吴沛宁之叔父(青峙七星延陵学校校董)、笕桥航空学校教育长(按:先父只是秘书,并非教育长)吴嵩庆先生力保,迫使反动派不得不将被捕教师全部释放。爱国教师在狱中同敌人进行了两个月的斗争,终于获得胜利。

这里又显示出先父的政治认识在国民党政府反共高潮中是太“天真”了。他只知是非,而对党争毫无了解与兴趣。

在与蒋夫人共事期间,有一次他与飞虎将军陈纳德(图8.8)因事相争,蒋夫人对他说:“你得罪了顾问,应向他道歉!”我父亲说:“此事我有理,我决不能道歉,而且他用手拍桌,是他侮辱了我,应向我道歉。”蒋夫人听了遂向陈纳德说:“我们中国人认为拍桌子是一件极不礼貌的事情,好罢,你们两人握手言和罢!”于是,在夫人面前,我父与陈纳德两人热烈握手,言归于好。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洋顾问面前一向不卑不亢。

抗战期间,1942年先父已晋升为空军经理处长,四川梁山要筑一大型机场,以接应盟国空军,需要一笔巨大经费。父亲请夫人帮忙,夫人告诉他:“我们一同去孔公馆”。到时,孔祥熙(1880—1967,时任行政院长)远远看到他们下车就用英语说:“我知道你又来讨钱了,因为你带了会计来。”随着拿笔批“照发”二字。父亲认为,此案如果用正式公文手续,不知几个月才能办通。又一次,父亲经办某案,就用便条写着需费多少,面呈夫人。过了一小时,父亲收到侍从室送来的委员长亲写“吴秘书亲启”函。拆阅之下,原来是方才呈送夫人的便



图8.8 蒋介石、蒋夫人与飞虎将军陈纳德(右)

条委座没有批,只在后面写:“此致孔院长,中正手启某年月日”。蒋的字比他还要工整,让我父亲感到惭愧,也让他感激。先父与蒋夫妇的关系,较从属与长官的关系要深一层。

他认为,在离开空军二三十年后,夫人仍对他照顾有加。1968年,他在唐荣钢铁公司任董事长,在高雄新建好一座中兴钢铁厂,正巧蒋夫妇也寓于澄清湖官邸,父亲极盼正在欢度82岁寿辰的蒋也能来厂视察,特写信给夫人。第二天,蒋夫妇即亲临此厂,夫人对他说:“我给你请到了!”让先父感到温馨(图8.10)。



图8.9 1979年先父赠书给年已82岁的蒋夫人于台北



图8.10 1968年蒋夫人与82岁的蒋“老先生”来访问台湾高雄中兴钢铁厂,与先父(右)在一起

1971年3月,先父遭遇重大车祸,座车与一被警察追逐的盗车在纵贯公路上相撞。第二天清醒后,在左营海军医院得知士林官邸打来电话,当晚空军派专机由外科教授杜圣楷(杜是我们家的好友,也是蒋的侍医之一,图8.11)护送至台北三军总医院治疗。次晨,外科主任卢光舜大夫(医界前辈,曾主持筹备兴建台北的阳明医学院)带了一束花来到病房,面传夫人关切之意,并谓这束花是夫人亲自在花园中采来的。卢大夫并告诉父亲:“我们医护人员看得多了,对某人,蒋老先生关切。对另一人,则夫人关切。很少有蒋老先生与夫人同时深切关怀如对你的。”方知昨日电话与专机,都是夫人从中促成的……

与蒋夫妇能同时建立良好关系,可能是家父的教育背景、宗教信仰以



及个性使然。如前述,他为人本分,从不作非分之想,也不做攒营晋身之事,先祖父教育他一切为“公”,所以一生很少为自己,甚至自己家庭着想(有时就有些过分,变得“不顾家”了)。因为是基督徒,与蒋夫妇在信仰上没有隔阂,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又是奉化的邻乡



图 8.11 笔者老友杜圣楷教授(左)是蒋介石的侍医(直肠外科),也曾治疗先父 1971 年车祸的重伤(杜圣楷夫人摄)

人(同属浙江鄞县),在外语上也是得心应手,英、法文都很流利,做事方面也是侍从室“中正学校”严格训练出来的。日后中原板荡之时,央行的“军费”大任就降到他头上了。这也是蒋夫妇知人善任的一面:先父虽然古板木讷,却是一位忠实可靠的人。但在这之前,还须接受其他历练。

1943 年 7 月,他奉命去国民党的党政高级班受训,得当时任军需署署长的陈良(字初如,见图 5.8,9.12)的赏识,于结业后调任少将粮秣司长,从此被纳入军需财务系统,由于此而经历了黄金运台等惊天动地的历史



图 8.12 蒋介石在重庆黄山的办公处:云岫楼

巨变。1943 年 8 月刚上任时,他就遇到一个惊险经历:蒋介石在重庆黄山(图 8.12)召集最高军事会议,带了一位高炮士兵,报告说,每日吃的主食,军米仅 20 两(照规定为 25 两)。委员长遥指着坐最后一排的粮秣司长作答。先父哪见过这样大的阵仗,刚上任,不知怎样作答。幸亏何应钦(军政部长)、陈良、俞飞鹏(后方勤务部长)说碾制、运输、储藏、洗濯都有损耗,替

他解围,但蒋要他在山上多待几天。当时王惕吾(后为台湾《联合报》创办人)任蒋卫队团第二营营长,王逸芬(后任财务署台北收支处处长)任团军需主任,父亲就与他们住在一起,并请他们协助调查。

这种“粮耗”,是历史上最伤脑筋的事,他甫任斯职就须为此“耗损”说明清楚,实在是个难题。但他精力过人,脚踏实地,到部队去调查,由各种数据说明军粮之领发、碾制、运储等损耗难免,绝不能达到25两全数。这种用科学数据的统计方法,与我每日在实验室中作动物或人体研究论文,其复杂度不遑多让。他的结论是,需要管理一元化,建立全国仓库网,集中管理,以减少损耗。

通过了这次测验,他于一年后晋升为军需署副署长,1944年11月又奉命兼任兵役部经理处长,身兼两职,当然是位“能吏”。另一方面,作为前西北军“军阀”的鹿钟麟是兵役部部长,而兵役是抗战时期中国最大的弊端所在,蒋介石曾枪毙了负责兵役的署长(原属军政部),才设立兵役部,找了一个“党外”的西北军将领来做部长,自有平息众怒的目的。鹿部长也非傻瓜,特别找了位与蒋关系甚深又有清誉能吏的人来兼任经理处长,可以有如昔日的“钦差大臣”,来纠正风气。

父亲的一项任务就是调查新兵及师管区医务实况。他披露贵州各师管区的医院直如“催死所”,途中二连新兵直如乞丐群,旅舍不许入内,夜卧檐下石板上,以致一夜即添病兵23人。碰到先父这样有血性的“钦差”:

……立即将病兵送入医院,嗣经交涉,始得入室居住。夜闻咳嗽声呼应不绝,声声刺耳,不能入眠,因起而秉烛草此报告。钧长读之,当亦可闻新兵在寒夜所发呻吟咳嗽声,而共掬同情之泪也。谁无父母,孰无子弟,使其流连颠沛至于此极,未握枪受训杀敌前,已成饿者、病者、死亡者,害民而不能福国,尚有逾于此?……

钧长当指兵役部长鹿钟麟。此外他也调查了新兵的伙食:

……在贵阳则常领不到米。……在此军粮困难中,又有干部克扣之事。据兵站运输大队所接新兵面告,由安顺来筑(按:即贵阳)途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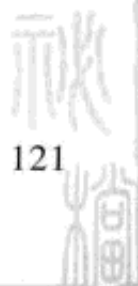
连长曾售去米一斗；是否仅此数，尚不得而知。每日仅吃稀饭二餐，每人饿得目不能视云云。……至副食更谈不到，规定固少，而一般干部尚多克扣。调查兵站运输大队新兵，据云，每天仅吃稀饭，并无副食，并须为连长每人挑菜若干来筑囤利。在晴隆查安兴师区四团六连及十连时，据云，副食每兵每天以十元计算，余作灯油等费。见其所吃之菜，亦不过菜汤一钵，每人分食少许而已。已嘱应照规定发十三元，此等事不一而足，实不胜追究，惟谆戒要爱新兵而已。……

这些就是他替兵役部实地调查的冰山一角，抗战那时已近尾声，不到一年日本就无条件投降了。他揭露了兵役的虐政，国民党的腐败，但是日寇的侵略这笔账也不能不算！先父就是如此秉持自己一点读书人的良知，在官场这个大染缸里特立独行。

兵役的虐政，到抗战胜利后，显然并没有改善。1945年8月盟军中国战区的参谋长魏德迈（Albert C. Wedmeyer, 1897—1989）向蒋委员长呈上一份措辞强硬的报告称：

……中国的征兵方式是如厉疾……新兵都骨瘦如柴，身体软弱无力；军医院都成病兵的葬身之地……[Jonathan D. Spence（史景迁），*To Change China*（《改变中国》），UK: Wylie Agency, 1969]

其实，在日寇侵略下的民族抗战洪流中，人命如草芥，牺牲的岂止平民、新兵？几乎每个家庭的亲族里都有病死之人，笔者家也不例外。先父这样一心为公办事，不是没有代价的，家人子女就为他付出了健康甚至生命的代价。由于营养不良，在成都我那不到3岁的妹妹兴静一天早上起来腹泻发烧，晚上请来医生诊断为痢疾，次日帮工抱去医院的途中就死了。据年长的亲友说，妹妹得病前一日，笔者先拉痢，但挺过来了，才能活到今日。父亲当时担任航空委员会的经理处长，相当于中将级主管，如果借部车，当晚送医院，一定还有的救的。笔者5岁时，住在重庆，全家六口挤在一间房内，卫生、营养都很差。每餐都吃发霉、含稗石的配给米，能够有一两块甜饼干下饭，已算是不错了。笔者生疥疮，身上溃烂得很厉害，记忆里似乎没有去医院请医生治疗过，都是母亲与姊姊在屋外烂泥地



上,替我用硫磺水洗疮。能活下来,看看自己身上的疮疤,现在年已古稀,也算幸运了。当时先父担任军政部粮秣司司长,主管全国军粮(家里配粮也是霉的),忙得很,很少见得着他,全家衣食住行,都是先母一手打理的。

1945年他被陈诚系的王东原(湖北省主席,图8.13)请去当财政厅长,先父对在湖北任职的两件事常悬念在心头不敢忘。

第一,我去湖北服务是由王主席东公推荐。当东公携着名单向蒋先生报告时,委员长指着我的名字说:“他是办军需的,不能去!”东公说:“他本人已同意。”委座才予核准。其实,王东公曾请我们高级班同学刘公武兄事先征求我意见,我说:“现在我们工作没有个人自由,如果委员长一定要派我去,我自乐意去追随东公。”我知道委员长选拔干部,有他一贯的方针,违反他意志的事情,实非我所愿,每念及此,心中仍是悒悒(按:王有些自作主张,像是先父在撻营,使他不快)。第二,当王东公调任湖南主席,万武樵(耀煌)先生接任湖北,我提出辞呈,并面报武公表示坚决。武公向委员长报告时,委座说:“此人我知道很好,可留任,其余各行处可随便更换。”当武公归来告诉我经过时,使我对委座成全支持的德意,又增一层不可磨灭的感戴!



图8.13 王东原将军(右,时年96岁)与笔者(1994年在洛杉矶)

他除当财政厅长外,也兼任省银行董事与总经理。他与湖北人相处得很好,在近三年的任职中,“与议会也相处得不错。第一月初到差时,曾遭若干位围攻炮轰,以后他们知道了我的工作与生活情形,从不曾再对我



有不礼貌言词,有时且替我辩护”。[按:先父由重庆去湖北任职时,途中被匪抢掠,可能是民国史上被土匪打劫的最高现任官员,在“土匪史”上亦留有记录:“湖北省新任财政厅长吴嵩庆等的专车行至川东武隆白马山,被贵州道真王怀瑾匪伙拦劫,并绑走数人为质,吆吓官方……”(冉光海,《中国土匪》,重庆出版集团2008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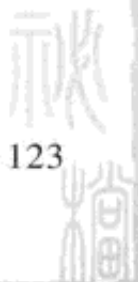
先父当了近三年的湖北财政厅长,笔者曾记下:

他依然是两袖清风,家庭经济上并没有什么改善,武昌的大雪天里,我们这些小孩还是穿着母亲亲手纳底的棉鞋,雪地里一走,都湿透了,一个冬天,双脚一定生冻疮。

念小学三年级时我与当时一位主席的公子同校,记得那时他是学校的明星,周围都围着捧月的众星。有一个镜头印在我脑海中,至今如在眼前,就是他小手腕上那只圆形的大表!到笔者有一只表时,已是十余年以后了。多年后读到一则新闻,说是某夫人因为儿子在美国并不是太得意,只好一人返回台湾养老,大叹美国居不易。不知她的那位公子是否就是在武昌校园里曾见到过的少年同学,真是人生如梦呀!

出任财务署长管内战军费(信任而不“亲”)

到1947年底,父亲又被召回军中,担任国民党军队财务署长,这是美国顾问建议的,将国防部改组,实施新编制,将联勤总部的财务署划归主计系统。那时的行政院主计长徐堪(字可亭,属张群的政学系,1949年1月出任财政部长,见第18章)向国防部长白崇禧推荐先父出任。白说:“他是我北伐时的老部下,当然欢迎。”先父是蒋和桂系都能接受的人。是福是祸尤未可知,就赶上国共内战,将蒋托付央行的大部分资金带到台湾。从此工作更忙,他的家庭生活更少,尤其是1949年得到蒋总统的“托金”重任之后,更是忙得全国到处飞。曾计算过,在这年5月里,不到四个星期,他就乘坐了14次飞机。要知道,这些飞机都是“二战”的剩余物资,战乱中飞机保养更是不足,为了赶时间,只要加满了油就飞。在这之前两年,1946年12月24日一天就在上海摔下来三架民航机,不到一个月后在



上海与重庆又掉下来三架,多半是天气与保养的问题。那时节飞机出意外的机率真是不低,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上了飞机就可呼呼大睡的,为了“公”就顾不了自己的安全了。

5月15日,他奉命飞上海,安排第四批黄金运台(表1.1),次日碰到老上司周至柔(空军总司令,图8.14)与蒋经国,在办这件公事时:

周嘱速送眷赴台,因川沙(在上海市南面15里海边)已陷也,回告妻儿(作者是幼子,也在里面),均愿赴台,因托仲谋洽机,余赴央行洽事,一时半回,则室已空。因赶往机场送行,俟三时起飞后回。

显然先父这次来沪跟提出央行最后这第四批金银作军费有关,也因为这一偶然的时机碰到了周总司令,使包括当时在上海念小学的笔者在内的部分家属才得以“脱离虎口”。先父“公尔忘私,国尔忘家”(王东原将军评父亲的话)也未免太过分了。以他当时总管军费、掌握实权的“通天”人物,安排家属“早离危地”,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然而他竟然要周至柔去

提醒,去催促他送家眷赴台,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上海是5月27日解放的。

事后,父亲也觉得,“事之缘,信有之,如非此次偶然公差赴沪,则此次上海失守,眷必陷于彼矣!”(这是他5月28日于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广州记下的,同时也提到两周来他体重掉了11磅,并于前一日昏倒过。)

1949年12月7日是先父在国共内战期间在大陆的最后一日,以后他工作的重点就只在金马台澎了。



图8.14 周至柔(左)与王云五在台湾

在台湾的工作

1949年底,先父乘载台北运成都5万两黄金的回程机,带领几位共危难的同事,包括董德成、叶良光等,飞到台湾。这些人,从另一立场看,都



是国民党最反动的顽固派了。事实上,他们都是奉公守法、勤勤恳恳的公务员。到了台湾,在两蒋的领导下,与台湾百姓齐心把台湾建设成令人称羨的“亚洲四小龙”之首。

1950年1月8日蒋介石日记:

朝课毕,见吴嵩庆研讨对军费总预算数目及筹备……

蒋总结大陆的失败,军人数目不核实、军需腐败是重要因素,改革军中财务的任务就落在先父肩上。

1月21日先父日记:

上午随关部长(吉玉)、徐(董事长)柏园、严厅长(家淦)、任厅长(显群)及陈次长(良)于11时进谒总裁:1. 一月份军费照给;2. 军额减为80万人;3. 军饷应直接发到官兵身上。

蒋又提核实部队人数,撤退来台湾的军人应在百万以上。

从1949年直到1962年,来台湾最初的13年,他还一直是担任“财务署长”。中间(1950年4月)出任“军需署署长”兼管“经理署”,总的还是管军费。蒋介石实在换不出别的可靠的人,而且知道他忠于职守,即使不升官也无怨言。笔者出国的那年(1964年),他届龄从军中退休,去当年台湾最大的钢铁公司之一(唐荣)担任董事长。

刚到台湾,“财务署”实行补给到团,即点名发饷,立刻把大陆吃空缺的陋习从军中扫空。但先父同时发现:

各部队自大陆撤退以来,多多少少总有些亏空(垫付款),过去可寅吃卯粮;现在军费不再经过军师部,对过去亏空无法交代。我已向各部队查明,是项亏空共有104万元(新台币)。当时任君立刻起来报告:“吴署长所说的必是实情,为使部队长安心工作,此事必须予以解决,我负责筹款。”蒋“总统”(介石)即席指示照办。各部队长觉得这样痛快解决问题,非过去所能想象得到,大家欢声雷动,无不竭力拥护补给到团的核实政策,使国民党军队整顿收到预期的效果。

这位任君就是任显群,是位有担当的台湾省财政厅长,后来为追求京戏名



且顾正秋得罪了蒋经国,吃了不白的官司。1950年6月19日先父记下颇有意思的有关两颗台湾政坛新星的评语:“晨访任(显群)严(家淦)二君,任锋露、严稳狡,各有千秋”。看来先父还是比较欣赏锋芒毕露的任显群,能做实事,解决问题;而严则会玩政治。此当年台湾省先后财政厅长的命运却截然不同:任后锒铛入狱;而严则一帆风顺,“贵”至台湾当局领导人,继蒋介石。人之一生命运为其性格所铸成,在此再得佐证。先父则觉,在人事应付间,自愧才不如二君。得蒋老先生赏识信任,一生唯以“廉洁”二字相报。

50年代先父又建立了给各部队发特支费的制度。那时他每月在外面跑的时间多,分访各部队长征询意见。

有一次到嘉义75军,晚间与叶军长、罗师长闲聊,叶说:“现在军长无法干了!”问何故?他说:“军长现在每月特支费为180元,可做什么用?从大陆撤退来的旧部,我们每人都很多,经常每月总有几个来找你;现在编制确定了,人事稳定了,不能随便补人。有人来找你,总要请吃一顿饭,送一些旅费。送少了不要,送多了又送不起,人家何从知道你做军长的苦处。昨天还有一个人来看我,我送他30元,他往地下一掷跑走了;你看气不气人?”

他次日回到台北,适逢财经会谈,就把这故事简单地报告了。当时任厅长立刻起来又支持他说:“吴署长说的对,部队长需要有一些特支费才能办事,我负责每月筹100万元,请他去分配。”蒋介石指示照办。当日,他即通告预算局将此特支费妥为分配,呈请核定后拨发,军长每月可分配3000元,又解决了军中一个难题。所以,当年在部队中,先父有“财神爷”之称。因为他经常去访问部队,解决其随时发生的困难。所以,补给到团能够彻底执行。不久,又补给到连,进而补给到个人。他回忆往事,在执行配合方面不能不怀念他老友任显群之贡献,任的功劳应是不可磨灭的。

他同时要与美国顾问打交道。“军需署”共七位顾问,许廉夫中校(Lt. Col. C. Shreeve)为首席,是他对手,时常偕同出去访问部队。

……许认为要提高部队士气,必须先使士兵吃得饱穿得暖。他



提议士兵副食须增加每天黄豆二两、每月鱼肉各一斤，连同原有的油盐配给，方能足够营养；至于军服，第一年冬夏各发人字布服装各两套，以资替换，并发棉背心加活动袖子一件，以后每年发冬夏服各一套。

先父曾请示蒋老先生，蒋老先生说：“国军军械要请美国人支持，至于吃穿应由我们自己想办法。”所以对许顾问所提的办法，原不想再予进行，但是许坚持非这样办不可，那时已做成计划，只等待先父签字，最后得到中美双方核定。他犹忆这一方案的经费，“占了那一年经援的大部分，但对当年国民党军队士气的提高，实有极大贡献。那时，要增加每月军肉鱼各一斤，供应七十万大军，实在不是一件易办的事”。（按：初抵台湾，经整编后的国民党军队人数，先父记下1950年3月31日军事会议上曾提到的，空军82000人，海军43000人，陆军575000人，合计70万。而1月21日日记则为80万，两个月缩编了10万人。）

蒋介石不想要美国人涉入国民党军队补给太深有他的原因，美国人就是喜欢利用顾问补给，进而控制盟国的军队，然后以容易受它控制的军人发动政变，设立它心目中的“民主”政权。美国在南朝鲜、“南越”都以给官兵发饷为饵，控制军队后，发动政变。50年代，美国早已想在台湾如法炮制，给国民党军队发饷，为蒋所拒。美国中情局中有些人素质不是很高，似乎像日本的浪人，更像是《丑陋的美国人》（*The Ugly American*）一书中所描述的那些人，怎么是蒋介石的对手？何况当时他身边还有精明能干、饱经忧患的蒋经国。

这里又想起半世纪前的“5·24事件”。1957年刘自然少校被美军雷诺上士于近距离枪杀，两个月后美军判雷诺无罪。台北爆发群众暴动，美国“大使馆”及新闻处被侵入，据说是蒋经国指使，目的是搜取美国在台的情报活动，翻箱倒柜的过程中被监视器拍摄到。而所搜到的情资里，就有美国扶植“台独”等证据。可以想见，美国对国民党台湾当局一向是有二心的。此事件就是蒋经国要显点颜色给美看。后来倒霉的是台北卫戍司令黄珍吾，他那时被内定为联勤总司令，已经开始做接任新职的准备。先父是联勤里最资深的，我们父子曾被邀请去他家，在台北宾馆斜对面，蛮



宽敞的房子,陪着打羽毛球。结果,他当然是空欢喜一场,被撤职,连卫戍司令也当不成了。

在 50 年代的台湾,军需补给、军饷等对军民心的安定颇为重要。此外,先父又筹设军中储蓄业务。此办法初拟设立“军友银行”,有很多人不同意,拖了一年多,但由于蒋介石的坚定指示,方在 1959 年 2 月定案,成立“同袍储蓄会”,对于安定军心、提高士气起了很大作用,军中每人都受其惠。当时对“军友银行”的设立,反对最力的就是财经界的人,包括陈诚在内。部分原因是:先父与蒋经国是患难之交,不受陈诚支持,在意料之中。他的耿介廉洁,也是财经界人士所担心的。

1964 年 8 月他从军中退役,当时蒋经国有三个工作让他选择:第一是农民银行总经理,其次是辅导会副主任委员,第三是亏负累累的唐荣钢铁公司。第一个工作应是最好,薪水最高,如为晚年家庭及个人健康(他有



图 8.15 农民银行董事长竺枝珊老先生是蒋介石的妹夫。其子竺培风是蒋最喜爱的外甥,是国民党空军军官,死于空难,蒋日记里曾记:“昨晚梦见甥培风二次,醒后清晰非常……”(1949 年 10 月 30 日,次日是蒋生日)

糖尿病)着想,退役下来,应该轻松点。董事长竺枝珊老先生(图 8.15)是蒋介石的妹夫,竺已告诉父亲,再过两年他就退休,让出这农民银行董事长的位置给父亲,这本来是最好的抉择。我那时正准备出国,除了每月 200 美元的奖学金,自己身无分文,如前文所述,机票钱还是从先父向蒋经国借的 1 500 元美金里支出的。但他那“傻劲”又犯了,选了最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到那“恶名昭彰”的唐荣。他曾回忆道:“但调职前消息早已传播,亲友闻讯都来规劝,绝对不可以去管这一烂摊子。后来竟成为事实,心中未免有无限感慨,特呈请正式自军中退役,以示破釜沉舟义无反顾之意。”(按:同时他也拿“断”军中的退休金,全部一次领了新台币 10 万元,



当时值美金2500元,就与国民党政府的一切退休金绝缘了。)

笔者当时也参加了这“规劝行列”,在忙着办出国手续之际,特别搭乘公交车远道从台北市东门町到石牌荣总去看他的糖尿病医生田可高大夫,希望他也帮忙劝阻。当然,这些功夫都是白费!从1964年他跳入了这“火坑”,到1976年再次以75岁高龄退休,他对得起高雄人,对得起台湾老百姓,也对得起唐传宗(创始人唐荣的公子,据说还了他8000万),但对自己家毫无裨益。他在这12年中,最初几年没拿薪金,去世后,才知道唐荣公司连个人寿险都没有替他买,也没有退休金。

唐荣耕耘12年

他接手时,唐荣全部资产6.5亿新台币,而负债总额超过资产2000万(6.7亿余元),利息负担沉重,每月借款利息300万元以上,每月亏损高达500万。他一面增资,一面处理闲置资产,接掌后不到半年就转亏为盈,增强了员工的工作信心。同时,他筹建新厂,第一就是建中兴钢铁厂,主要以发展当时仰赖大宗进口的高级钢材为要务。

……厂的经费,系自日贷中拨300万美金,这要感谢当年经合会李国鼎先生(图8.16)的支援。至于台币配合款,是省政府周转金内流用,也要谢谢周厅长宏涛(省财政厅)先生的接济。第二为中兴合金钢厂,是奉令办理的,是1968年10月开始筹划,至1972年5月21



图8.16 1997年笔者访问李国鼎先生(右)于台北科技大楼

日落成。所需美金 360 万系由日贷内配拨，台币款一亿六千余万由“国防部”项目指拨。此厂为“国防部”所有，由唐荣代建代管代营，现已拨并于台湾机械公司。

此合金钢厂，主要是制造炮管用的无缝钢管，是与日本三菱合作，据说当时曾有炮管外销到中东的盟国约旦。

同时，他也发起筹设“中国钢铁研究所”，并扩建台北的唐荣机械厂与铸机厂。与 1964 年比较，唐荣钢铁公司在他手中回生，由负债 2 000 余万，到 1975 年底反而累积资金 3.2 亿。钢锭产量由月产 7 000 吨，提高到 1.5 万吨。此外，炼钢电炉和轧钢机也是除旧换新外，更大幅增加。1976 年 3 月是他告别唐荣的时候，在海外看到新闻，他的继任人不到一两年已卷入某项弊案。国民党里的一些人还是没有从大陆的失败中学到教训，但至少贪污嫌疑者被抓出来了。

一次小小的中共统战

在唐荣前后的二三十年中，先父除了钢铁工作以外，还热心于教会工作，曾任“基甸会”会长，负责“军官团契”；以及老人福利事业，曾任“世界资深公民协会”副主席（在副主席的竞选中击败美国的代表）。除了唐荣的公差以外，他常常代表台湾到海外访问，都是他分内的且与政治没什么相关的活动。

在海峡两岸尚未开放之前，大概是 1973 和 1974 年，笔者回台北探亲，有一天我俩在外散步，先父有些神秘地从口袋里拿出一封信来，原来是留在大陆 20 多年无音讯的大哥的亲笔信，在那时候政府官员与大陆亲友私下通讯是犯台湾当局大忌的。他告诉我，前些时在东南亚旅行时香港一位沪江大学的老同学跟他联络，说是周恩来总理“向他致意，并希望他为两岸和平统一尽份力”。其实，周在 1924 年 8 月已由法返中国，父亲是 1928 年以后才去的，只可算是他的留法前期同学，两人并未在法国相遇或认识过。父亲告诉这位老同学，如果周真有诚意，可否让他大陆的三个儿子来香港见见面，就知道他们都还很好地活着。同时，他把一次泰国的行



程临时缩短,提前赶到香港。见到了老朋友时,才知道孩子们来不及办手续,无法赶得上来港会面,但带来了长子的亲笔信。信中说大陆生活很好,两位弟弟也很不错,总之,都平安无事。当然,二三十年的隔绝,能见到信也很好,但是总不及实地见面更好。

父亲并告诉我他已向(当时任“行政院长”的)经国先生报告过了,蒋没讲什么话,只是摇头说:“共产党真是无孔不入!”以后十多年,先父还是经常出入台湾,参加国际钢铁、老人福利及宗教等各项活动与会议(图8.17)。蒋父子对他还是信任有加。我把大哥的信带返美国,从那时就开始不断通讯,知道大陆兄弟的情况,让父母亲安心不少,这要感谢中共这次小小的统战。



图8.17 先父喜欢旅行,1987年来洛杉矶开会,与笔者全家欢聚,右起分别为吴于艳秋、先父抱吴士华和士皎与笔者

这里又想起另一次中共统战(或宣传),那就是刚到台湾的时候,有一天,一位亲戚来告诉母亲,说是听到上海一个无线电台的广播,是我祖母在呼唤,要父亲“反正”回归。在父亲的记录里,1948年4月他曾帮助一位同乡长辈“筱香叔”在上海取得电台执照,他感觉“很后悔,不应徇私”。大概就是从电台来的广播。1949年初在上海,母亲和我还应邀去电台吃过茶点。记得是在一个大厅里,有歌唱表演,台上就是播音室。



从唐荣钢铁公司退休之后

1976年,父亲已是75岁高龄,他坚持退休。原先创立的“中国钢铁贸易股份有限公司”是1966年成立的,负责执行同业间外销合作公约,当时越战正是火苗旺盛,需要钢材甚多,为避免同业恶性竞争外销,才制定合作公约。父亲由于大家拥戴担任董事长已11年,原是尽义务的,此时他退出唐荣,“中钢公司”决定给他一笔车马费,“以维持生活”。(按:很奇怪,先父在唐荣任董事长11年多,居然没有一点点退休金。“中钢公司”后来倒闭,连以母亲名义投资在里面的钱也失去了,但得蒋经国的帮忙,其他股东的钱都还清了。)

从退休到1991年过世,他在最后15年担任一家焦姓老板的私营公司的董事长。此外,他于1979年创办大同老人福利基金会,这原是一位已故教友韩时俊长老的一项遗愿,为年老传道人建一退休之所,其哲嗣韩伟(首任台北阳明医学院院长)秉承遗志,将治丧余款12万余捐赠以作倡导。父亲自己尽力捐助,到1981年捐得新台币1000万。但此戈戈之数,实难以觅地建屋照顾老人生活,经在台北市基隆路一段55号三楼设立“松柏之家”,以作老人康乐教育休闲为主。另设立松柏学苑,邀集学有专长者教授老人语言、法律等方面的知识,笔者也曾应邀讲授医学新知。这个“松柏之家”是法人机构,由董事会管理。

在此之前,他也创办了台北近郊景美的沪江中学,那是1958年邀集沪江大学同学会在台湾校友共同努力的结果,他担任了前三届八年的董事长。当年为购地建教室真是焦头烂额,到处做不受欢迎的劝募者(后来我替他设立一个基金,才知道要人捐钱的困难,参见敝著《黄金档案》),最后占地一万坪的沪中在景美出现。他在1966年把建校所有债款筹措清还后就“功成身退”,辞去董事长职。由于台湾工业起飞,地价大涨,千禧年去访问时,学校基金充足,当时任董事长的不但有美轮美奂的宽大办公室,还有学校供给的轿车与司机,但这些他在世时都没有享受到,只有一栋以他名字命名的教学大楼“嵩庆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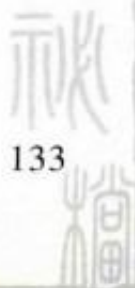


巍然矗立于校园中(图8.18)。笔者曾带妻女去参观“松柏之家”与沪江中学,希望在美国生长的下一代知道她们的祖父,为中华大地、退休老人及下一代无私地献出了他一生。



图8.18 千禧年笔者与徐立校长(右)在台北景美沪江中学的“嵩庆楼”(红字)前

他的晚年生活并不宽裕,去世后他身边全部的存款,已于前述,约300万新台币(加上90万的奠仪与人寿险)。1991年台湾已工业化,生活程度普遍提高,这不到8万美元的积蓄,实在让他没有安全感。30年的(军)公务员生涯,去唐荣时,如前述,为表示与全体员工共患难,一次拿出退休金10万新台币,就与军人退休金绝缘了。到1990年左右,如分月拿退休金的话,以退休国民党军队中将,一个月就差不多有10万元了。也许他太信任国民党当局,没有想到1988年1月蒋经国突然辞世,经国是比他还年轻近九岁的,当年的老战友都先他而去,如周作人所说:“人以寿辱”,他的确活得够长了。虽然李登辉那时真面目还没有完全暴露,但他心里很清楚,这个政府已不会记得他,只有自求多福了。他去世后,我在书房锁着的铁柜中找出一个空信封,是我寄给他最后一个生日的挂号信,除祝他生日快乐外,还附有美金1000元,这现金显然使他感到温馨,也说明,老年人到这年龄是需要经济上的安全感的。可惜我这拿薪水的医学院教授,有家有小(幼稚园年龄),能力也仅限于此了。这就是当年经手全中国中央银行国库大半金、银、美金外汇的老人。



他是在1991年9月25日由大陆经香港，回台北当晚就过世了，当时要营点像样的墓地至少要百万了，幸而有蒋纬国做联勤总司令时在台北东北面五指山上建了国民党军队公墓，要得过两个勋章以上、有功的将校和尉士官才能入葬的，我就赶着去办，得以顺利地只花了少数费用就入葬了，当时的台湾当局还颁了褒扬状：

除役陆军中将吴嵩庆，志虑忠纯，清廉耿介，壮游巴黎，学有专精，迭膺军政要职，夙昭令绩，于湖北省政府财政厅长，联勤财务，军需署长及副总司令任内，建立制度，支应军需，协助建军备战，厥功至伟。大陆易色，抢运库存军实，稳定基地金融，应变有方，勳道益懋，嗣后主持唐荣公司，创办沪江中学，致力国民外交，推展老人福利，亮节高风，允足矜式。兹闻溘逝，轸悼良深，应予明令褒扬，以彰忠荃。（图8.19）



图8.19 先父之褒扬状

这里所述，言简意赅，倒是实情，尤其是“大陆易色，抢运库存军实，稳定基地金融”，就是指把国库金银作军费和新台币准备金的一部，以“稳定基地金融”，除了黄金白银外汇，还有什么可以稳定金融呢？这比蒋老先生给俞鸿钧的褒扬状要写得清楚多了。俞的是：“……排除阻碍，为国家保存元气，以奠财经再造之基……”当然，虽没有提什么库存金银，但为国家保存了什么“元气”，可以奠财经再造之基呢？当然这也是隐约地指黄金，只



是更含糊一点。

父亲的这张褒扬状是前北大教育系主任、毛泽东的“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同志、先父留法老同学吴俊升老先生写的，吴老告诉我是他与王东原将军(图8.20中坐右一是吴俊老，右三是王东原)及查良鉴三位“特任级”官员联名上书申请褒扬状的。父亲在这里也清清楚楚地留下了在中华民国历史上参与国库黄金银元及外汇运台的铁证，李登辉后来想否认，看到这个褒扬状也不再申辩了，他总不能自己打自己的嘴吧！那是2004年，我曾在电视上公布了这张褒扬状，他虽然汉文基础不是很好，总应该看得懂自己签发的文件吧！



图8.20 洛杉矶资深公民社团“中华益壮会”成员：(坐右起)吴俊升、浦薛凤、王东原与笔者(右立)



第9章 四批上海国库金银运台的运输及见证人

最重要的证人应该是蒋介石！

从最近公布的蒋介石 1948—1949 年的日记看，他应该是第一证人，归根结底，因为他当时是最高领导人，俞鸿钧、蒋经国及先父吴嵩庆，会同国民党政府其他军公人员都直接和间接听他指挥行事，上海央行国库运台湾厦门的资金，只有蒋才能动员海关及海陆空军协助搬运，只有他拥有动用及最后支配权。蒋的日记与先父的手记都印证了此点。

即使 1949 年初他已下野，不再担任总统，但他仍然是国民党总裁，革命政党是以党领政领军的，虽然当时已行宪政。1949 年 1 月 21 日他下野回溪口镇（图 9.1），以无线电台的电讯及密码遥控军政，幕后掌控国库“现金”运台及运用，坚持发行新台币，把国民党政府重心向台湾转移，作“有计划的放弃大陆”，来争取时间，除国库资金外，还尽快把工厂设备、机械原料、文件档案及故宫宝藏运往台湾；更重要的是人才，譬如以有限的机位，由解放军包围的北平抢先接出包括胡适在内的教授群，“未来英才”里也涵盖来自大江南北的众多“流亡学生”以及在抗战末期请缨入伍、知识程度高的“青年军”，这些精英在六七十年代会同勤劳的台湾民众，开创出“台湾经济奇迹”（见附录 4）。

先父奉蒋总统下野前之命令，接管黄金、银元、外汇作为“预支”军费。



本书所引述的蒋与先父的日记中的有关记载,原都是绝密档案(有关蒋介石“隐藏”的军费),也是第一手资料与运金证据及历史证人,现在都解密呈现给了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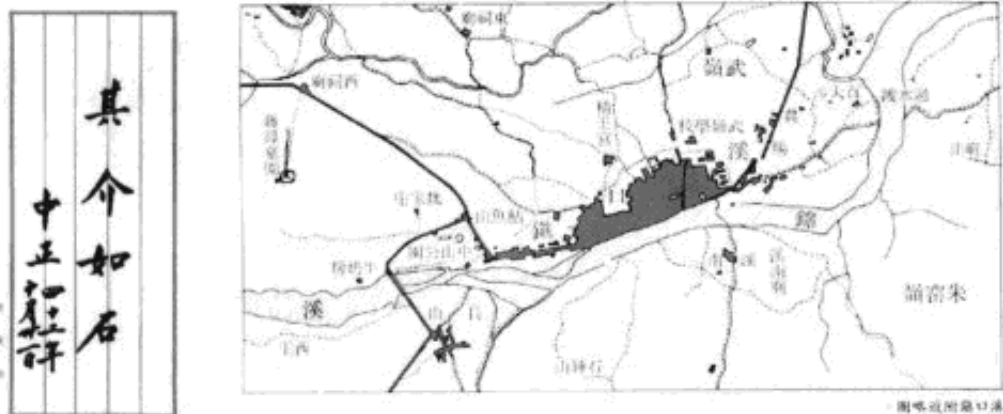


图9.1 蒋介石从浙江溪口(右图)幕后主持国库“现金”运台及运用。蒋在1953年的题字(左图)就如同他终身的日记,也是毛笔字

沪台海关见证人

关于第一批(第一船次)运输黄金银元赴台的船只,《俞鸿钧传》里说1948年12月的这一批黄金是由军舰运的,但是其他的证据包括1943至1950年任海关总税务司的李度说是由海关船运的,当然2006年《人民日报》(海外版)公布的“发行局签呈”(1948年11月29日)最为可信:

……洽妥海关海星巡舰装载,海军总部美朋舰(按:后由“美盛”号)随行护航……(由发行局密呈)

据当时任央行秘书处秘书兼机要科主任、专办俞鸿钧交办公文的何善恒,在1985年4月18日写给刘绍唐社长(台北《传记文学》社)的信中提到,发行局负责签呈的是副局长陈延祚,后来负责押运的是发行局襄理何骧及专员刘光禄。陈也负责安排戒严、防卫及运输(见第3章的央行档案)。

这艘运黄金的“海星”号,是上海江海关海务部门里四艘较大型的缉私艇之一,属 AN 型舰艇,系美国“二战”后退役的防潜艇(Fleet Auxiliary Netlayer),其他三艘是“春星”、“流星”及“联星”号。据美国海军记录,此数十艘 AN 型舰是 1941 年 3 至 7 月由美国七个不同的造船公司生产的,它的总长度是 163 呎,宽度约 30.5 呎,空重是 500 吨,满载是 700 吨。“二战”期间在海军服役时有 3 吋的防空机关炮及机关枪等武器,装有柴油引擎约 800 马力,航速可达每小时 12 海里。盟国海军曾有将之用作军舰(图附.1 中下图)的。

为什么用海关的船只运送?除了在热闹的外滩江边不引人注目外,是否还因为蒋、俞认为国民党政府海军已不太可靠?此一推想应该是正确的。

因为当时海军派系林立,早已有中共地下党渗透,“重庆”号是最大的 5 300 吨巡洋舰(图 2.11),次年(1949 年)2 月 25 日就起义了。以后投共起义事件更是层出不穷,到 4 月,“惠安”号(中共改名“瑞金”号)、“吉安”号、“安东”号、“江西”号、“太原”号、“联光”号(中共改名“古田”号)、“美盛”号(中共改名“黄河”号)、“楚同”号及“永绥”号共九条军舰同时起义。其中“美盛”号在几个月前才护航“海星”号运黄金去台湾(如果那时台湾发生金融风暴而政局不稳的话,这些军舰几个月后都可能用来攻台)。就像“昆仑”号曾于 1949 年 4 月底由上海运金银经福建马尾去台,途中就曾发生舰长起义事件,5 月 19 日第四批上海黄金由 105 号登陆艇运送,出了吴淞口后也发生起义事件,结果两天航程走了两周。总之,从 1949 年 2 月至 12 月不到一年中,国民党政府海军共有 90 余条军舰起义。

因此,最初避免用军舰运,这种考虑是非常必要的。“美盛”号的姐妹舰“美朋”号在几个月前才护航过“海星”号运黄金去厦门,5 月 26 日傍晚曾于长江口和解放军炮兵交火后安全抵达上海,加入最后的撤退行列。九年后,“美朋”号因参与“823”金门海战受创而被抢修。

海关是“洋机关”,待遇较好,或属于“小资产阶级”,中共渗透比较少,但也绝非没有。蒋、俞在 1948 年底使用海关船只运送黄金、银元两次,的确让中共地下党“没防到这一招”。但到次年 1 月底以后,中共地下



党在上海江海关已十分活跃,第二批国库黄金就只有“冒险”以海军军舰运送了。

“海星”号船员范元健(图9.2)1991年8月在台湾回忆道(《传记文学》59卷第2期):



图9.2 任职于上海江海关“海星”号上的船员范元健

……船长是钟福林(安徽人),五位关员及卅几名水手都是中国人。平常,“海星号”停泊在黄浦江中央的浮筒上,和江边的江海关(见插页外滩长图及图3.10,黄浦滩路13号就是海关的江海关大楼)遥遥相望,除非出海缉私,否则船始终停泊江面,船员上下班或休假要“下地”(即登岸之意),都得搭海关渡船或自己雇乘民用舢舨。那天应该是民国37年(1948)11月底或12月初的某日(按:第一批运离上海的国库黄金,应该是在1948年12月1日午夜启运),大概是下午二点光景,舰长突然神色凝重地进入船舱,告诉大副:“我们今天要出航,任何人不准下地!”这项命令布达之后,船上人员便做好出海准备,静待出航的最后命令。谁知道,等到当天晚上十一二点,都没有接到开船指示,大家都觉得事有蹊跷,谁都不敢乱跑,到深夜一点左右,船忽然开动了,但是,让我们吃惊的,“海星号”竟然是偏向左弯,随船人员莫名其妙,因为向左转就是外白渡桥,也就是上海外滩岸边,根本不是出海缉私,大伙儿都想不通船何以要靠岸。

“海星号”停泊的地方,正是中国银行的专用码头,这附近高楼林立,算是全上海最繁华热闹的地方,行人如织;然而,这晚却是一片死

寂，没有一幢房子亮着灯，码头邻近的街道上没有一个行人，显然已经实施局部戒严。几分钟后，中国银行旁边的街道内（按：即滇池路）出现了十几个挑夫模样的老百姓，二人一组，用扁担挑着两箱大约一尺半×二尺半×半尺见方的木制箱子，吃力地朝“海星号”鱼贯而来。木箱子怎么看起来特别沉甸的样子？船上同事不禁好奇地打量着，东西似乎是从银行仓库搬运出来的，难道是金砖不成？同仁们好奇地彼此窃窃私语，舰长钟福林这时告诫大家：“不要管里头装着什么？反正只管完成任务就是了！”船员们虽不敢问，私底下都猜出那是国库黄金。

约莫一个小时之后，上来一位着便服的男人，很客气地和我们打招呼，原来，他就是中央银行派来押运黄金的人，钟福林还派人在大厅为他准备了一具行军床（按：应该就是央行职员刘光禄）。等黄金全部送上船，“海星号”即在夜色掩护下，驶向长江口，茫茫江洋，没有人晓得船要驶向何方。

等船开到舟山群岛附近江面，钟福林才透露：“我们这趟去台湾！”显然，这是一项极度机密的运金行动，没有任何军舰护航。若干数据记载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派了兵舰护航……

“海星号”在海上航行了一天一夜（按：上海、基隆之间航距是419海里，而船速约每小时12海里，与范的回忆航行时间契合），终于平安抵达基隆港二号码头。看起来，基隆没有什么警备，但，行动还是隐密的，几部大卡车早已静候多时，一个小时左右，卸运完毕，大卡车便在央银人员押送之下，朝台北绝尘而去。

在基隆待了两天，“海星号”便又折返上海。可惜“海星号”在京、沪相继失守后，并未随政府到台湾来，这艘老旧巡防舰已经在那次偶然的任务中，写了中华民国金融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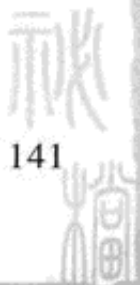
范元健的这段回忆是可贵的资料，他是唯一的一位目睹者，记录下这历史的一幕。读者可以对照本书插页中的上海外滩长图，就如身临其境。但有少许疑问，就是只有十几位挑夫来挑（700多箱）黄金，似有记忆的错



误。如第3章所述(包括一项1948年11月29日中央银行的发行局签呈)共约200万两,平均是2500市两一箱,是81公斤。就算20位挑夫(两位挑一箱)跑20个来回,也不过200箱。会不会分批运出?不会的。一方面,上海外滩戒严不是轻易的事,12月1日夜晚的黄金外运已是举世皆知的新闻,不可能为节省几位工人,就一两天内再重演一次外滩戒严[近两个月内(1949年元旦及1月20日)外滩才各戒严一次]。另一方面,其他可靠的史料都没有分批运的记录,包括第3章的《民国档案》中“国民党政府撤离大陆前向台北厦门密运现金一组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也许范在“海星”号上是比较基层的船员,工作主要在甲板下,短暂观察到的只是海边的一角,不够全面。同样,以偏概全,船抵台湾后,在基隆也应不止几部大卡车,200万两是62吨,即使是当时最新型的美式军用十轮大卡车,载重量是两吨半,包括人员在内,至少应需二三十部大卡车。近代史上,许多史料都须交叉求证,更须用些常识,不能偏信孤证或闭门造车。

“海星”号到了基隆,当局也安排了台湾央行的驻台代表沈祖同,沈原任中央信托局副局长,此时奉俞鸿钧命,负责点交给台湾银行金库存储保管。此中应牵涉到驻台湾的海关,据基隆海关(即当时台北海关)秘书课主任王树德[江苏太仓人,后任“总税务司”(1971—1978)]于1975年12月回忆(《海关临危受命的一项紧急机密任务》,《传记文学》59卷第1期):

……民国三十八年春,当解放军渡江南侵日亟之际,在一个深夜零时许,原台北海关(即现在的基隆关)三沙湾电台收到由上海海关总署发来的一封紧急密电,该电台同仁即刻将电报送到我的宿舍,当时我担任该关秘书课主任职务,我因平日使用密码较多,重要密码,几均能背出,故在一面披衣一面阅读电文时,发现此事非比寻常,乃立即驾车到办公室,打开保险柜找出海关专用密码翻译,电文内容略为:“政府已将中央银行库存黄金及白银××吨交由海关‘海星舰’运台,该舰将于明晨抵基隆港,希即协调有关单位做必要之安排,并即交由中央银行在台代表×××接收”。我当时以事极机密紧急,乃即



刻向税务司(按:税务司为张申福,后曾任“总税务司”,已故)报告,并依照税务司的指示漏夜部署各项因应措施,当一切办理就绪时,载运黄金白银的“海星号”已在破晓时分驶抵基隆外港,由于当时已有万全的安排,所以那些黄金白银都很顺利和安全地移交给中央银行在台代表接收,该舰亦于完成任务后驶离基隆,恢复其原来工作。……

……上面这一段 26 年前的旧事,因保密的关系,海关同仁中即使为资深海关恐怕知道的人很少,一般官员当然更不知道。这一真实的故事,说明了海关是如何地被政府所信任及倚重……

王树德此项回忆是在 1975 年,距离 1948 年正好 27 年,年底与次年(1949 年)4 月江阴要塞投诚、解放军渡江相差近半年,应该不会记错,但他又提到“海星”号海关缉私舰,这就表明他指的是 1948 年 12 月 1 日这一次金银运输,因为中共地下党在 1949 年 1 月 28 日春节前一天晚上,已经动员船员拒绝再为国民党政府运黄金,他们是这样记载的:

……“海星号”在 1948 年下半年突然接到总税务司署的命令,先后两次为国民党政府财政部运送黄金往厦门和台湾(按:第一次是 1948 年 12 月 1 日,第二次是次年 1 月 1 日元旦)。开始船员不知道是运黄金,在起吊时不慎将木箱跌碎,才发现是黄金(按:据《民国档案》1989 年第 1 期记载,此事发生在 1949 年 1 月 3 日清晨,厦门的太古码头,即今和平码头)。党组织得知国民党当局还要继续用海关船运黄金,在 1949 年春节前一天晚上,在同益里海关同仁进修会底层大厅召开各船积极分子会议,动员船员拒绝再为国民党运黄金。……

使用海关船只运送黄金去台也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反应。2 月 16 日,上海各大报又刊载了合众社香港 15 日电(图 11.10):

……15 日探悉,属于中国政府的 160 吨以上金条银条,自广州运抵厦门。据称或有更多数量的金银由上海运抵厦门,取道运往台



湾。……中国海关巡逻舰载 10 吨……海关巡逻艇所载均系金条,其价值得 1 200 万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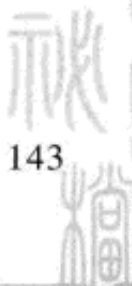
广州运抵厦门的或是广州金圆券兑换来的黄金。

《关声杂志》即发表短评提出:

黄金他运,小老百姓原是没有置喙的份的。虽然蒋总统好像有过黄金外钞“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说法,而上海市在黄金外钞收为国有的时候,缴献的数量特别多,要有所主张也不是完全没有依据的……海关的职务是收税、缉私以及管理航行标志,它的船只都有指定的任务……海关有什么权力可以拿国家托付以为缉私之用的巡逻艇替别的机关搬运黄金?假使这些船只只是属于别的机关,请问这样未经最高当局核准,又不经过报关手续搬运黄金,是不是变相走私?……海关是替国家人民服务的机关,它的任务是庄严的。在目前时局动荡的当口,我们应该怎样坚守岗位,保持独立的地位,固有的作风,庶几可以度过这暴风雨的世纪。在海关员工的公开反对与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没敢再用海关船舰外运黄金。这次行动,为以后船员公开抗拒上级命令,不把船舶驶台打下了基础。……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中共当时对海关的渗透似乎只限制于较低层次,到“木箱跌碎,才发现是黄金”,表示 1948 年底第一批上海国库黄金运台及运厦门,保密还是很周到的,让中共没有料到。也许中共还没有料到蒋刚被选上总统(1948 年 5 月),年底前就已经开始做逃亡台湾的准备(同年 11 月 20 日任命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同日任命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这一步棋蒋算先了一着。

另外一点就是提到“海星”号已在 12 月里被征召运过两次,一次去台湾,另一次是去厦门。1949 年 1 月以后,“海星”号及其他海关船只就拒绝再由上海外运黄金银元了,所以王树德的回忆是有误的。也许这是故意的,混淆时间,也是在强人的政权下求存求生的一种权宜之计。1978 年他退休时,蒋经国颁发景星勋章,他是在中国籍海关服务人员中唯一获得



勋章的，也许与黄金运台有功有关联。

据以上数据，这 260 万两黄金是分两次，第一次 200 万两直接由上海运到基隆，第二次 57 万两是先运厦门，再转运台湾的。另外，这 120 吨银子，依《民国档案》是与 57 万两（18 吨）黄金一齐运厦门的。

沪台中央银行众多证人

如前述，在“国民党政府撤离大陆前向台北厦门密运现金一组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提到央行各处局的众多负责人及职员，包括俞鸿钧以下的各级行员、押运员，也都曾经手黄金运台湾的史料及现场见证。

此外，据前述当年担任央行总行发行局调拨科副科长的魏曾荫在大陆回忆有关海关缉私舰时提道（《百年上海滩》，上海滩杂志社，2005 年，第 159 页）：

……其中两批直放台湾，一批到厦门中国银行仓库……

其中去厦门的一批（金子）是由魏曾荫押运的，记忆应该是不错的。第二次“海星”号去台湾，应该是从厦门运那 120 吨（1 000 箱）银元及 18 吨黄金。这位魏老先生的回忆也是很值得注意的资料：

当时在上海，这批金子原来是存放在中国银行、汇丰银行和四行储蓄会的仓库里，由中央银行发行局、国库局和业务局三方管，发行局的具体任务落实在调拨科，业务局是负责加工成一两、十两的小条、大条。库房管理制度非常严密，魏曾荫说，当时规定如他死了，发行局掌握的暗号就由局长来对。他记得运台黄金是由海关缉私舰装载，其中两批直放台湾，一批先到厦门的中国银行仓库，再转运去台。装船都是深夜在警备司令部戒严下进行的。船上的押运人员是由各科副主任充任，他们互相监督，很严密。每艘船均由军舰护航。魏曾荫本人曾参与押运一船黄金去厦门，参与押运最后一批黄金去台湾的是调拨科一位刘姓副主任，黄金运到后，他也就归不得了。（按：依



第3章中1948年11月29日的“中央银行发行局签呈”，是刘光禄副主任被派“长川驻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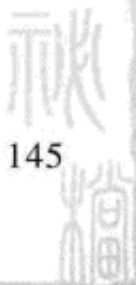
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魏曾荫提到金子在中国银行等三个仓库，而没有提中央银行。如前述，当然因为黄浦滩路24号的六层大楼仅供办公，没有仓库。他又说到金子都加工成1两、10两的小条(小黄鱼)、大条(大黄鱼)，是不正确的，我曾从亲历此事的人处知道，至少在厦门的黄金有一块重达400两的(12.5公斤)(下详)。魏说海关缉私舰曾运过金、银三次，与前述两次的记载不同。

还有陆地上中央银行负责点收的人员。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安仲英女士也在2004年(《世界日报》2004年11月13日)回忆道：

……她与父母亲于1949年4月29日自上海搭飞机到台湾，约两周后，她即在基隆港见到父亲安震宇点收的黄金。她说，1949年4月间，在上海中央银行任职的父亲工作变得很忙，29日当天回家告诉母亲说，家人们须搭乘最后一班飞机到台湾，下午四时她随家人抵台，住进台北武昌街的台湾银行宿舍。(按：这位安震宇就是前面第5章中提到在央行出纳科任职的。)

……数日之后，安震宇带着还不及十岁的安仲英和弟弟，说是去基隆抓“黄鱼”，姊弟兴高采烈同行。安仲英说，家人们当时还真的以为他是去海边抓黄鱼。她表示，那些天他父亲和两位中央银行同事陈文灿、丁同原都守在基隆港等候，没有回台北，不明就里的母亲对此还颇有微词，她与弟弟后来就在港口看见父亲们点收的箱子里，竟是一些金砖和做成鱼状的黄金(按：即1两、10两的金条，并非前头后尾的鱼形)，父亲告诉他们那就是“黄鱼”。……后来安仲英才知道，那些是国民政府运台黄金的其中一批，安震宇后来才说出，那批黄金直接运到台北的台湾银行地下室贮放，因为当时中央银行尚未在台设分行。……

……安仲英说，她父亲已过世，没有为运黄金的事留下纪录，经手运黄金的人仍在世者，可能不多，但当年中央银行“安专员”运走黄金的事，牵连到留在大陆的二叔和三叔，令他们后来受到很大的迫害，这



可间接证实确有运黄金的事。……另一个令她印象深刻的是，来自母亲对父亲的牢骚。她说，迁到台湾，家境一直清苦，当得知父亲那段时间原来是忙着安排运黄金到台湾的事，还半开玩笑地埋怨父亲和陈、丁三人怎么没想过在清点黄金时，藏一条在自己的口袋里。……

另外第二批的90余万两的军费黄金及大量纯银，由先父、蒋经国、俞鸿钧经手，在1949年1月底前后用军舰运往厦门，这就是前文所提，海关里的中共地下党不愿再用“海星”号运黄金到台湾与厦门了。海军的“昆仑”号、“峨嵋”号运输舰等都曾参与装运黄金、银元及纯银。到了2月7至9日第三批黄金空运台湾后，运输黄金任务已大致完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编的《中国国民党大事典》的2月10日（1949年）项下：“至本日止，中央银行将大部分金银运存台湾和厦门。上海只留廿万两黄金。”《中国国民党大事典》提到的主要是黄金，7000万美元的纯银到4月中旬才运走约1亿两（价值5000万美元），剩下的近千吨，到解放军入城前夕（1949年5月中）还有约300吨纯银待运，也价值十多万两黄金（详见第7及第11章）。

有一说：“昆仑”号载黄金50万两驶厦门，航途中，中校舰长沈彝懋企图起义，将舰北驶投向共产党，后失败。但查，“昆仑”号从上海南驶福州执行任务时起义未成，是在1949年4月4日。而由上文可知，上海国库早在2月10日只剩20万两，故舰上有黄金50万两是附会之说，无史实根据。

这第二批90多万两黄金及第三批空运的60万两，加上第一批的260万两，及1亿多两的银元及银砖，当然还有近亿的美金，就是今后支撑台湾和作战的经费。所以，“老先生”下野时，心中很镇定，举止“甚安祥”（按：是先父在日记中所说的于1949年1月21日蒋下野当日在杭州机场所见的生动印象）。历史上的大人物，多半也是大赌徒，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是扑克牌高手，欧战时诺曼底登陆就是一场豪赌，但是是经过精确计算的赌博。蒋老先生有这一大笔赌金，当时心里很踏实，可能在笑李宗仁：“你有什么本钱做代总统？中华民国的国库已经搬到了台湾和厦门的鼓浪屿上。”

这笔钱到了台湾与厦门的鼓浪屿之后，它的流向留在第10章及第16章里详论。



国民党军队财务署的经手人

除先父吴嵩庆的亲笔记录外,他的机要秘书詹特芳选择留在大陆,曾以批判的笔法来回忆第二批的黄金、银元、银砖及外汇的转作军费(见第1、第5及第18章)。其中黄金的量接近100万两,这批黄金约33吨左右,是用海军军舰运的,先运到厦门鼓浪屿岛上中国银行的地下仓库中,以军机(运黄金)、军舰(多是银元)先运台湾,然后依军事需要,分向各地运输,因为次数多,见证人更多(本书所列主要是见证最后运到台湾的)。如先父的部下李光烈(图9.3,第18章),以当时财务署总务科长的职务坐镇厦门,有一本密码本,专门接受先父的密电,翻译出来以后即会同厦门警备司令部提出黄金或银元运走。

1996年10月,李曾接受笔者的访问,有机会做成记录,可惜他没有任何在国共内战时的相关照片,也没有台北或厦门仓库的照片,相信这些照片在当年都是犯忌的,没有人敢照,即使照了也不敢保存。我记下他的战时回忆发表在《传记文学》(《上海中央银行黄金从厦门转运台湾的补充及一点建议》,1997年4月号)上。后来,李光烈又接受香港《亚洲周刊》(1998年4月

27日)的访问,以“揭秘”的笔法写了《南京到台北,海空运黄金》,由记者童清峰执笔:

……1949年前后,国共内战白热化,社会混乱,金圆券狂贬,货币信用丧失,国民政府为了维系国民党军队官兵士气,财务署遵照国民党总裁蒋介石指示,对主要作战部队发放黄金、银元。解放军攻下武汉后,上海中央银行即将80万两(按:应是99万两)黄金、3000万块银元运至厦



图9.3 李光烈(右)来台北三军总医院病房探候先母时(1996年),与笔者(左)曾详谈运黄金赴台事

门,存放在鼓浪屿的交通银行(按:应是中国银行)地下仓库。据吴嵩庆任财务署长时的旧属,时任财务署总务科长的李光烈告诉亚洲周刊,他被派到厦门掌管支付军费方面黄金、银元的提调。

……李光烈住宿在财务署在厦门大学(按:应是海军码头)附近包租的“厦(门)大旅社”(图9.4,今民主大厦),外有层层警力保护,但他浑然不知。他的任务是支领军费,当吴嵩庆需要提出金、银时,就发密电给他。李得密电,立即赴鼓浪屿(图9.5)提出金银,然后转交刚从陆军财务学校毕业,并刚获分发部队的军官,将金银分送到前线各主要据点,例如衡阳、柳州等地。

……李光烈回忆,黄金有小、有大,有一钱一块,也有五钱一块,最大的是五百两一块。外表都用牛皮纸包好。银元则是四千两一箱(约一百公斤),箱外有封条,写上金银重量及数目。鼓浪屿没有汽车,金银的运送全靠银行雇来的挑夫(按:还有板车),由他们把这些贵重的箱子挑上交通船送去厦门,再运上飞机或军舰。



图9.4 厦大旅社,今厦门思明西路64号之民主大厦,又称“宗教大厦”(2008年摄)



图9.5 厦门鼓浪屿岛上曾藏国库黄金银元(1948年12月—1949年8月),解放军于1949年10月中旬进入厦门,15日夜国民党军队撤出鼓浪屿(详见第10章)



……有一部份黄金则运送台湾。李光烈说,他印象中至少三次以军机押送黄金到台湾,最多一次曾运13万两,分别放在13个木桶里。他记得那次任务,只有他一人负责押送,其他三四个空勤人员,包括飞行员等,都听他指挥。当天飞机从厦门飞台湾,约飞了二十分钟,飞行员突然把驾驶舱的布幔拉起来,当时只觉得飞机震的很厉害,后来到了台北松山机场,飞行员才告诉他,飞机一具引擎坏了,刚才是用另一具引擎飞行,吓得他全身冒冷汗。

……黄金运到台北后,交给台湾收支处长王永涛(即王逸芬,见图9.6及第18章),由他负责点收、保管。李光烈说,金银是存放在财务署的库房(见图5.9右),也就是现在中正纪念堂的园地里,这里原来是日本管理军费的一个处,地下很深,面积约三百三十平方公尺。(按:据另一位曾负责看管金库的董德成回忆,他记得是在一个红砖房的地下室,“不到30平方公尺”,或是记者笔误,听成“330平方公尺”。)银元则是存放在台湾银行仓库里(图11.4)。



图9.6 台北收支处处长王逸芬(王永涛)



图9.7 董德成(右)与先父吴嵩庆(中)50年代在台北近郊登山

……国民党政府的策略是军机运黄金,兵舰运银元。李光烈指出,有一次军舰载运八百多箱银元(按:约300万枚),为了慎重起见,还由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亲自押送。当年也有一些到大陆当兵的台湾兵随舰返回台湾。……

李光烈这位目击兼经手的证人的可信度是不容怀疑的,可惜李老先生已经在2003年10月过世了。

最近蒋孝严的《蒋家门外的孩子》中曾提道,他于1949年5月赴台乘坐的中字105号登陆艇上装载有黄金,由厦门来台湾。似乎不是很正确,应该是银子,如上述,厦门黄金多是空运来台。

董德成(图9.7)是另一位家父旧属。笔者于2006至2009年在长途电话中多次访问了他,他是詹特芳文中提到过两次的当事人:一次是詹吃了我父亲的牌头(即挨了骂),“……我只好忍气吞声,幸有董德成说了句公道话,他说:这些过程,除署长一个人外,谁也搞不清楚,老头子(指蒋介石)说的话,谁也不在场。”又一次是詹特芳说道:“黄金白银由上海运到厦门,在厦门存放了一个时期,又移至台湾。当时具体负责这件工作的人,有财务署收支司副司长董德成、总务科长李光烈等。”(见第5章)

就是这位董副司长(见第18章),父亲日记中也多次提到他,2009年已是95岁高龄,他于1949年追随着先父从南京到上海、广州、重庆最后到成都,他说幸亏在成都机场上等机时被我父亲看见拉上飞机,时间是12月7日。飞机超重,大家把随身行李都抛弃了,才得起飞。

董在先父身边主要是把作军费的黄金白银分配到部队去,就是管收支的,在1949年来台湾以后常进入“财务署”在今天中正纪念堂地下的仓库(当然是迁离前,见图5.9)。金库里面有金也有银,金子都是用长方形箱子装的(与圆筒箱不同,见图11.4)。他说,藏在“财务署”地下的金银美钞可能是第二至第四批给财务署做军费的黄金所剩余的,又说大部分运台的金银都在“中央银行”而非“财务署”(是赵志华转过去的,见第16章)。这批作军费及在台作军饷所剩余的,后来就成了1950年3月以后蒋介石的“小金库”。

开办台湾《联合报》的主要资金也极可能来自财务署的地下藏金(第16章)!此外蒋总裁在没有复职前,也就是1949年1月下野到次年3月“总裁办公室”的维持费也是从这里开支的,7至8月蒋介石去菲律宾碧瑶及南朝鲜镇海与其领袖会谈的旅费、礼物等等用的美钞也是从财务署支出的!



表 9.1 预算财务署在 1949 年 9 月 1 日改组后之组织及负责人

署 长:吴嵩庆
秘 书:詹特芳、汪子柔、叶良光、邓元勋、吴士珍
副署长:陈康华、程邦藻、刘庆生
收支司:司长董德成(健在台北,接自程邦藻及钟时益)
审核司:司长奚寿康
预算司:司长林运祥、孙作仁(接赵志尧),科员于德昌(在美国)
账务司:司长罗郁纯(后在美国去世)
总务处:处长郑清怀,科长李光烈
收支处:台北处长王逸芬(又名王永涛,后在台湾办《民族晚报》) 重庆处长陈人望(原是戴笠的下属,后留大陆) (全国各大省市共有 20 多位收支处长)

董德成先生跟随在先父身边,尤其是 1949 年 4 月南京解放之后,从上海到广州,由重庆最后到成都。他知道先父的“机要秘书”是汪子柔,也是位湖北人,他很熟,常听他抱怨家父脾气太大(这的确是先父的缺点),老挨骂,也曾替汪在家父面前讲过情。以后在重庆,就如詹特芳所写的,汪认为国民党政府已经没有希望了,就弃财务署同仁而去。据董德成记得,临离开重庆时,汪还劝家父也不要走。但以家父手握重金,虽得蒋介石的信任,但他身边也一定有蒋的人加以监视或保护,如石祖德(图 11.8 立右四)、王逸芬及陈人望等。

董德成又提到重庆收支处处长陈人望是戴笠的手下,难怪我父亲日记里提到陈在重庆快被解放军攻陷时就已经表现得相当不礼貌,这或许因为先父处理离职的“资遣费”时一视同仁,没给他特别“优待”之故。但据董说,陈人望没有出来,是准备在四川打游击的,以后也没有信息了。所以,汪居然劝家父不要走,或许至少是左倾的,甚至会不会是中共地下党的人?董德成在 2008 年确定詹特芳是位“低姿态”的机要秘书(见第 18 章)。先父于 1949 年 1 至 11 月至少在日记里有四处提到詹特芳(最后在重庆,觉得无法说服詹撤退成都,是一遗憾),但从来没有提到汪子柔这个名字,看来家父比较欣赏詹特芳而非汪子柔。但刚来台湾时在父母的言谈中,我倒是亲耳听到他们提到过汪子柔。在 1949 年底,有一日的记载也把“汪詹”并列。现在老成凋谢,汪子柔比董德成大四岁,如还活着的话,也近百岁了。



运送金银的军方人士

由于海峡两岸黄金运输从厦门到台北多是用飞机,所以当年空军方面的目击证人也很多,2004年就有一位当时住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刘存才(《世界日报》12月1日)及洛杉矶附近杭亭顿滩的杨荣志(图9.8)运输机大队长(《世界日报》12月20日)都站出来说话。

杨荣志是1936年毕业于空军航校五期的飞行官,事隔多年……但他十分清楚,确实参与当年运送黄金到台湾的任务。他说,那些黄金装在箱子里,一箱箱很重,必须两个人抬起搬运到飞机上。



图9.8 杨荣志曾担任国民党政府空军运金第20大队的大队长,右图是其1936年在中央航校的毕业照

杨荣志时任空运队第20大队大队长,所辖各中队有C-46与C-47两型运输机,前者可载60人,后者可载25人。他说,那是1949年春天,大陆情况甚是危急,第20大队奉命载运人员及物资,运输机往来大陆与台湾很多趟才完成任务。杨老不幸在2007年7月于洛杉矶附近的橘县去世,享年93岁,笔者曾去参加追思礼拜。

目前旅居密苏里州的刘存才也曾间接参与运送黄金的任务。他指出,1949年他以“流亡学生”的身份抵达台湾,驻防新竹;抵台后,他担任第11中队作战室文书上士,负责登记飞行任务的时间与内容。刘存才表示:

当时中华民国的两个空军运输大队,除了在新竹的第20大队,



另有在屏东的第10大队,每个大队各有四个中队,每个中队有12架C-46运输机,有近百架的空运能力,运输机启航时都是空机,返台时都是满舱的人员与物资。(按:此处点出由大陆运出“物资”往台湾为主。)

当时负责登记物资内容的刘存才说:

那段期间的所谓“物资”,其实就是大家所知道的黄金及银元,但任务登记册上一律写明是“物资”……虽然没有机会亲眼看到载回来的一箱箱黄金打开封盖,但执行任务归来的飞行员都会透露,载回来的就是黄金及银元,且由于情况紧急,飞行员还看到来不及装运的银元洒了一地。

第20大队被称为“黄金大队”,杨荣志证实了刘存才“黄金大队”的说法。

另外,住在南加州亚凯迪亚市的陶定梁曾是前国民党政府空军“黄金大队”的一员,是前述刘存才与杨荣志的同僚,还曾经与杨荣志同机赴上海执行载运“物资”的任务。陶定梁,83岁(2004年),上海人。毕业于前国民党军队通信学校,曾担任空军第20运输大队第11中队通讯官,当时的大队长就是杨荣志。陶定梁说,当时自上海载运到台湾的不只是黄金,还有俗称“大头”的银元。

……第20大队驻在台湾新竹,1948年底大队获命赴大陆载运撤台物资,这项任务一直延续到1949年国民政府迁到台湾。

身体仍硬朗的陶定梁回忆说,乘C-46运输机飞赴上海执行任务时,他是机上通讯官,不必一直坐在定点位子,飞行中他至机舱内与“物资”押运员闲聊,看到一箱箱贴封的箱子,箱子两侧还以麻绳为提把。他从押运员口中得知,那批“国民党政府物资”就是黄金、银元,他知道事关机密,不便多问,但全队执行任务的士兵都知道是押送黄金、银元。



图9.9 陶定梁

一批批“物资”由上海载回到台北松山机

场后,队上官兵未再过问黄金、银元下落;虽未目睹开箱后的“物资”真貌,但陶定梁说:

……政府迁台之际,他时任中尉通讯官,一度军中发不出粮饷时,即以银元代替,他的官阶让他领到八个银元。……大家都知道发饷的银元就是第20大队运到台湾的“物资”之一,因为若非自大陆运到台湾,当时的台湾何来稀有袁世凯人头的“大头”银元。

若照前面李光烈说的,一般飞机运的是黄金为主;而船舰运的则以银元、银砖、银块为主。船舰运,当然就有参加运输的海军人员目击者。参与运输的军舰,除了护航“海星”号缉私舰的军舰外,也有“峨嵋”号运输舰(见附录1),先父日记中也提到在1949年6月29日由“昆仑”号运银元300余万块开赴广州(作为军饷),在5月由上海撤退时更有其他军舰,如下一位海军黄揭掀的回忆(《世界日报》2005年元旦):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某月,在上海黄浦码头遇见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上将,他说:“我们政府存放在上海中央银行的黄金银元,尚有三百余吨。预备分配十吨存放在你的舰上。”见我面有难色,桂随即说,“你不要怕,我不会要你负责的,在上海,不会要你点收,也不要你的士兵装上舰,到台湾也不要点交中央银行,更不要你的士兵卸运,只请你指定舰上存放舱位。”如此简洁的口头命令,我只得接受,不过我还是说明:“我们这艘永字号扫布雷舰已准备在打一次大战。已满载弹药、油水、粮秣,再加十吨,恐怕要超载了。”桂说:“你有安全的舱位吗?你还是等明日中央银行的人员看过后,再决定装运多少吧!……”

……次日,即有中央银行人员上舰来,选定帆缆仓的部分位置,亦即将帆缆移出部分,安放于甲板或走廊。再隔一天,央行派来搬运人员、工具、车辆来装载。只见有长方形、牛皮纸包装、麻绳捆扎、很重的大金砖,两人抬一块上舰。第三天下午,本舰舰务官以本舰水线已达满载,即请停止装载金砖,我即令将帆缆舱关闭、加锁、加封,并焊上两根铁条固牢。



……驶赴台湾,停靠左营码头。次日,即有央行人员来接洽搬卸金砖,似乎他们通讯灵便正确,工作也熟练顺利。事后,舰务官闲谈时说起,依据吃水线计算,我们舰上约载了五吨多金砖而已。……

猜想这里运的应是银砖,桂永清说是国库还有300余吨金银,就是1000万两,百分之九十以上应该是银砖。这是前面提过的3000多吨银的余数,当然可能也有极少数的金块,从央行或其他银行临撤退时“拿”的。

参与运输的还有商船,包括“大敬”轮及“汉民”轮等(陈锦昌,《蒋中正迁台记》,台北:向阳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搭乘过“大敬”轮的黄埔军校14期毕业的徐传缜(家住高雄,年已90)向《世界日报》(2004年11月13日)道出一段运送黄金的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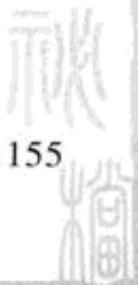
……搭乘载运黄金的“大敬轮”上,还有他家共四人,都可见证。徐传缜说,国民政府在1949年撤退到台湾时,大量银元及大批黄金待运送,银元分给海陆空三军处理,他负责指挥送(当时500多万银元,他将银元搬上“大敬轮”,由上海出发,经三天三夜才到高市13号码头,再由火车载至冈山空军基地。……

这批银元是蒋介石1949年1月下野前夕拨发给三军的银元(按:即蒋1949年3月31日的日记里提到的“海陆空抚恤基金”)之一部,后来在台湾的空军人员曾每月多领几块银元,持续了一年多。

如前所述,还有招商局的“海平”轮在1949年元旦由上海运(金子)银元到厦门。另外,当然还有陆地上参与运送的人员,据洛杉矶的谭天祥回忆(《世界日报》2004年11月21日):

……我的已故老友陆军大学同学,前淞沪警备司令部参谋长黄辉亚将军,湖南宁乡人……(1992)2月出版《宁乡文献》,撰有《彭麦良将军于烽火下抢运金砖》一文,兹摘录公诸《世界日报》,以驳斥李登辉所谓,国民党并未从大陆带来大批黄金之谬说……

……彭将军长沙人,黄埔六期,1949年淞沪保卫战役中,任淞沪民防副司令(司令由陈大庆兼),当淞沪保卫战部署之初,先总统蒋公亲自坐镇上海复兴岛,指挥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陈大庆,淞沪防卫司令



石觉。该年四月上旬战斗开始，鏖战匝月，双方伤亡惨重。五月上旬，蒋公鉴于当时战局，谕令蒋经国与汤陈两将军，将中央银行存沪之金砖及贵重物资、银元尽速转运台湾，保全国力。



图 9.10 (左图)京沪杭警备副总司令兼淞沪防卫司令陈大庆,后曾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右图)上海防卫司令石觉(着军装者,初到台湾时与笔者家对门而居)与原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初抵台湾时摄

……彭麦良临危受命,负责转运最后一批金(银)砖,由汤总部特务团副团长谢少初、淞沪警备部特务营营长郑远剑各率兵一连,负责抢运工作,并派出上校秘书杜绳武负责与央行林崇墉、李光彩、田家丰、高光汉、徐厚善等联络交接。由5月16日开始抢运至18日深夜完毕,交由中字第105号登陆舰装载妥当。虽烽火漫天,万分危险,但能安然达成任务。19日夜,运金舰离埠不久,一度发生共谍企图夺舰阴谋,彭将军当即机智制服,有惊无险。5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开始转移台湾,运金舰于5月23日驶经舟山急转基隆,6月7、8两日点交央行人员接收完毕。……

以上提及的105号登陆舰,应该就是蒋孝严当年曾乘坐的那艘。这里提到的是第四批黄金运台。与前面汤恩伯亲笔手令(1949年5月15日)及中央银行致汤恩伯的电文(5月18日)比较,时间上或许有24小时的出入,但是也许军方已经提前开始行动了。据最近公布的大溪档案电子档,是192000两黄金,在6月5日入库(表1.1),离开上海是5月19日,48小时的航程,走了半个月,原来其中还有海上起义事件,是“黄金档案”里曲折惊险的一页。



此外,高雄市籍海军陆战队退役上尉梁赤新回忆说(《世界日报》2004年11月10日):

……1949年他和数百名官兵花了半个多月时间,从黄浦江押着大批木箱运到台湾,当把木箱从冈山空军总部运到台北中央银行途中,木箱破裂,才知道里面装的是金砖银元。(按:1949年1月3日清晨在厦门和平码头也曾发生木箱跌破的情况,是“海星”号运的第一批的第二船次。)……

……梁赤新说,当年和他一起押船的海军陆战队老二团第二营五连士兵,都还有60多人活着,都可见证这段历史。……李登辉指国民党运载黄金的船在扬子江沉了,必要时他们要站出来,不排除到李登辉住的鸿禧山庄抗议。……

……住在高雄市左营区的梁赤新,目前是海军陆战队的荣退战友联谊会总干事。他说,1949年时,因江阴要塞司令叛变,长江沿岸紧急,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命令他所属的海军陆战队老二团搭乘中基舰撤退到台湾,当时杨姓营长率领四五百名官兵,花了四个晚上,从黄浦江沿岸把大小木箱搬上中基舰。“脑海里这一幕清清楚楚的,当时八人搬大木箱,四人搬小木箱”。中基舰同年4月中旬出发,5月1日抵达高雄市左营军港,官兵们又花了三个晚上时间,把木箱安置在海军左营军区地下室。……后又转运到高雄县冈山空军总部……

这批银元也是蒋1949年1月下野前夕拨发给三军的银元之一部,比上述“大敬”轮载运时间要早一个月。

前面已经提到过“海星”号的基层航员范元健在1991年回忆其参与黄金运台在船上的作业,他参与的是第一批里第一船次的黄金,由蒋介石、俞鸿钧主



图9.11“中基”号的姐妹舰“中建”号

导及作业,海关外籍总税务司李度是完全知悉的,台湾的基隆海关负责人王树德(后任“总税务司”)也得到上海海关总署的紧急密码通知,然后即刻向台湾的总税务司张申福,安排与台北中央银行的负责人员沈祖同(原任中信局副局长)办理陆地上基隆往台北的运输及入库的手续。这些人或以亲笔写回忆,或在正式文件上出现过(第3章,中央银行档案),也都是历史的见证人。

此外,军方及军民运的许多人都是当年的目击者,也是大陆黄金银元运台的一群历史证人,包括先父(与他亲笔写下的记录),一个偶然的机遇,使他与他的同僚成为大陆黄金银元运台活生生的参与者与经手人。他们曾是笔者生活的一部分,现在还有遗留的手迹与访问时的记录,然而有些墓木已拱,有些虽还健在,但已是松柏之年,无法执笔或挥动键盘。笔者仅是一旁观者,尚能执笔击键,替他们留下历史真实记录罢了。

为什么还会有人否认有金银运台湾呢？

既然有这许多的目击证人,有这许多的史料,包括两岸“中央银行”的正式档案,为什么还会有人否认有金银运台湾呢?尤其曾作为蒋经国的继任者的李登辉说:“运黄金的船沉了。”此说又从何而来?

蒋经国的《我的父亲》一书中明明白白地写着:“这一批黄金,是很顺利地运到台湾了”。近年来有自称从“经国学校”严格训练出来的李登辉,居然还说:“不要以为台湾今天的繁荣是国民党抵台时运来了960万两黄金,事实上没那个事!那艘船从南京来台湾时,早在扬子江(长江)口就沉了。”他又表示:“国民党是否有960万两黄金……查都不用查了。”讲话的轻浮,对民国近史的无知,对中国地理常识的欠缺,一副政客的脸,就在这几句话中浮现了出来。(那是2004年11月他在新竹选举时讲的,曾吸引许多海内外人士的注意,当然新闻记者的引述也许有误,但这是几家报纸与电视台相同的资讯。)

在笔者十多年来寻找的有关黄金运台的相关资料中,从来没有这个960万两黄金的数字出现过。我在《传记文学》1996年9月号曾以不完整



的资料估计,大陆运台黄金的总数量是350万两左右,到今天,有了较多的资料,总量也还是与此数相当接近的(约400余万两,但又有数十万两运回大陆,留在台湾的总数还是350万两左右,见第16章)。当然,再加上7000万美金(先父经手的),就又是200万两黄金了(35元美金一英两是当时的官价)。当然,全部外汇还不止此数。再加上第一次运台的白银120吨及后来的3000万块银元及1亿两纯银(部分由先父经手),银子总数是7000万美元,又是相当于200万两,因此,央行国库整个金银外汇总值是700万两黄金,当然市两、英两有少数差别,官价、市价也有些差异,以英两计,以今天900元美金一英两黄金价计算,时价在60多亿美金。难怪蒋经国说:“政府在拨迁来台的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就不堪设想了。”李登辉还矢口否认有黄金运来台湾,真是不知他有何根据?这还算是蒋经国的“学生”吗?

但这运载黄金船沉没的传说,又从何而来呢?前面已经说到过,在沉没的“太平”轮上有中央银行部分次要档案,并有五名押运人员丧生,以讹传讹,后来就传出运黄金的船沉了,这种传说是有可能的,但经不起求证。如果说这960万两黄金沉没在长江口,至今会没有人觊觎?没有人去打捞?李登辉作为台湾当局领导人,如果随随便便就相信这样的传言,那不是天真、无知,就是故意歪曲事实了。

另外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故意制造出来的谣言,以阻止政府有关部门去追查详细数字,当然这少数人是偷窃了一小部分黄金或是准备盗取,他们的阴谋或许已部分成功,或许在谣言初造起来时就被绳之以法,或“自作孽不可活”,沾了这人民血汗钱的边,早早病死了。绝大部分黄金纯银早已入库,对台湾50年代的金融经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见第16章)。以十分清楚内情的蒋经国的精明干练与疾恶如仇,应该不会允许大贪大奸之徒的,除非投鼠忌器涉及太高层人士如汤恩伯或财经界最高人员。即使如此,蒋经国的情治人员都曾经到过某些高官家里去撬开地板找黄金宝物,当然这些位都是失势的过气人物。

据巴图著《国民党秘密抢运内情》:陆根记营造厂的陆根泉,在1948至1949年间替汤恩伯在无锡、江阴线修筑工事,工程费是银元48万,拿不到



钱,逃到香港,向郭旭(国民党政府保密局少将经理处长)诉苦。郭告诉陆,拿不到钱的部分原因是汤恩伯曾亲口对郭说过:“由中央银行运出的黄金白银,除因一艘船遇风沉没,损失了一部分外……”后来郭又在九龙启德机场遇到当时的物质局长江杓(1900—1981,曾任台湾的“经济部长”),江杓说:“黄金白银都运往台湾,不过有一艘船遇风沉没损失了一部分……”

此外,在南京刚刚失守时,1949年4月中旬在上海召开的作战会议上,汤恩伯曾拿出一份文件为他集结主力退守上海辩护。

是蒋总裁的命令:汤恩伯激动地打开公文包,将一份“手令”……宣称,大意是:

责成上海市秘书长陈良在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因“病”请假期间代理市长一职,和汤恩伯一起负责将中央银行所存黄金、白银和积压在上海的大批物资运台湾。在这批黄金、白银未运完之前,汤恩伯应集中兵力死守上海,直到这批金银全部运出,否则,有任何差错,都拿两人是问。……

面对这份手令,在场人面面相觑,默默无语。汤恩伯此时沉重地说:“金银数目太大,上海的船舶又不多,初如怕我守不住,每船装的多一点,以致“太平号”轮船在舟山海面触礁沉没,我和陈初如都不知怎么才能逃脱总裁的责骂和惩办。”

初如(国民党政府最后一任上海市市长,见第18章)是陈良的字,是先父的



图9.12 笔者(左后)与先父(右,时年88岁)扶着陈良(时年93岁)在陈的家门口,父后为笔者小女儿(摄于1989年2月)



老上司兼老友,父亲过世(1991年)前,笔者每次返台,尤其是过旧历年时,一定要去信义路二段邻近师大附中的一个公寓楼上去探访他(图9.12就在公寓门口)。

“太平”轮是在1949年1月27日沉没的,是在先父得蒋介石手令(1月10日)与财政部订定“预支军费草约”之后,把国库黄金、银元、美钞移作军费,向厦门、台湾大量输送的时候,有可能把一小部分银元或银砖由“太平”轮运出。因为黄金部分在1月10日交给财务署的只有33吨黄金,100公斤一箱,只有300多箱,派一两连士兵只需几十分钟就可全部搬上军舰,应是1月20日前后由海军运走了(见第5章),不需要分装到别的船。而银元、银砖则有(1.3亿两)3000吨左右,如100公斤一箱,就有3万多箱,分点零头给“太平”轮装运,也有可能,但数目绝不会多,所以,在沉没的“太平”轮内,估计只有银元、银砖,而无黄金。2500吨的“太平”轮上的1500位乘客,只有37人生还,不幸死难的人中包括旅居美国的“神探”李昌钰的父亲李浩民(因此李在台湾才去上公费的警察学校)(参见林桶法《大撤退:蒋介石及政府机关与人民迁台经过之探析》,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太平”轮在舟山海面上(图4.5)与“建元”轮相撞沉没后,1949年1月28日的上海《大公报》上倒是有一文:“太平轮是怎样失事”,其中提道:“……失事主要原因是太平轮前舱甲板下塞了太多中央银行的金银,因此与建元轮一撞,就失去平衡……”但是,几天以后,2月4日的《大公报》又登载失事原因是船员很多喝醉了酒。另外,2月7日的台湾《新生报》则说是,“……因戒严缘故,两条船走快捷方式,走错了路,才撞上”。照理说,原因既然无法确定,“前舱甲板下塞了太多中央银行的金银”的说法则是没有证据的。或许有人想浑水摸鱼,就把账算在“太平”轮里,反正死无对证,这些人,其中就可能包括汤恩伯。

总之,沉没的“太平”轮上,应不会有央行的黄金(当然乘客逃难一定也有带金子的,当年打捞尸体的潜水员就有被控吞没死者钱财的),只有少数银元、银砖,对整个国库全部资金运台影响不大,无足轻重。但李登辉为什么要散布这种并无事实根据的谣言?似乎要“台独”人士相信,绝大部分黄金都已沉没于海,几乎没有什么黄金运到台湾,那他就是想一手遮天下人耳目了。

第10章 1949年上海国库金银运存厦门鼓浪屿探详

蒋介石为何将厦门作为黄金白银的转运地点

1949年里,国民党政府的金银约有半数是由厦门及鼓浪屿转运台湾的(表10.1)。在1949年8月前,蒋介石派有亲信将领石祖德为警备司令,及近侍卫戍部队(南京警察第三队)驻厦门看守这批金银。名义上都是军费,由先父担任主管的财务署监管,派有总务处的李光烈科长驻厦门提调(第9章),以密码电讯与先父单线联系,而蒋介石则以召见、电话或密电指示,于幕后掌控此金银(还有外汇)的使用。

表 10.1 1949年厦门所藏黄金、银元量对照表(参见表1.1)

金银批次 (船次)	年/月/日 (由/运到)	黄金(市两/吨) (运输船舰)	银元(块) (运输船舰)	备 注
第一批 (2)	1949/1/1 (上海/厦门)	57.3万两/18 吨(海关“海 星”号)	400万(海关 “海星”号)	中央银行档案(中国第 二历史档案馆藏,下同) [(2月7日前运台湾 55.4万两(大溪档案)]
(2)	1949/1/20 (上海/厦门)		800万(海军 “美朋”号); 1000万(商船 “海平”号)	中央银行档案

(续表)

金银批次 (船次)	年/月/日 (由/运到)	黄金(市两/吨) (运输船舰)	银元(块) (运输船舰)	备注
第二批	1949/1—2月 (上海/厦门)	90+万两/33吨 (国民党军队财务署点收99万两)(海军军舰)		刘攻芸总裁告蒋介石秘书(1949/2/8)及“黄金军费秘档”(吴嵩庆/詹特芳)
待查	1949/2/15 (广州/厦门)	33万两/10吨 (海关“福星”号)	550万(商船“海平”号)	美国合众社2月15日电(第11章)
合计		156.3万— 190.3万两	2200万— 2760万	

另有一说是,“上海、广州各地运到厦门的黄金为786540市两,此项黄金在厦门已直接拨付联勤总部财务署701540市两,及运往兰州、贵阳支付军政费85000市两,并无余额”(《尹仲容与台湾经济的重建(1949—1953)》,台北“国史馆”,2004年)云云。是该文作者误引,中央银行“厦门分行代付拨交联勤总部吴署长嵩庆黄金数量”(简称“厦行拨交吴嵩庆黄金”,图12.3)中最后一笔8月17日的22.5万余两就是余额,这与詹特芳回忆的“(11月底)到重庆解放前夕,第二批黄金在台湾财务署尚存22万两”(第16章)相合,这22万两运回到了台湾[见先父在1949年12月5日呈蒋总裁报告“吴嵩庆呈蒋中正保管之奖恤金黄金支拨情形”(大溪档案)]。

为什么蒋介石要把作为秘密军费的金银放在厦门,原因至少有三:其一是可就近发饷给他在大陆东南与西南的亲信国民党军队部队;其二是厦距离台湾最近,必要时可很快转运;其三是对当时在台湾的陈诚并不完全信任。蒋历经民国政治舞台上充满奸诈、反复及最无人性的时代,他无论什么决定都是使用多层监督与多线运作。陈诚当时在台是独大,无人可制衡,蒋内心深处极为担忧日后大陆全面溃败之际的去路,不能不隔着海留点现金现银在身边,直到他有百分之百掌握台湾内部局面的信心。这第三点在1949年的蒋介石日记里可见多处端倪。例如,8月13日日记:“十时约

见墨三(顾祝同)告以辞修(陈诚)言行病态令人忧愤、余受内外侮辱”;8月17日日记:“今日甚感辞修之病态可痛……”可见,蒋的顾虑也不是完全没有必要。这是一个动乱的大时代,尤其是在一个贫穷与教育普遍落后的国度里,是“你死我活”、不择手段的时代。先父不幸就赶上了这实行“森林禽兽律”的时代,但还是想坚持点做“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则,但已远离他刚从法国回来时所抱持的梦想(第8章,《东方杂志》1933年)。

两度专访厦门鼓浪屿寻觅运金路线

2007年12月及2008年10月笔者两度专访厦门,去勘探上海—厦门—鼓浪屿—台湾这条运金路线。第一次去厦门时,主要是要印证李光烈告诉笔者的鼓浪屿中国银行地下金库曾藏军费黄金,但我去之前在厦门不认识一个人,就在洛杉矶找了一家国内旅行社的分社,安排了一个“一人旅行团”,在网上查到鼓浪屿中国银行的地址,就莽撞地飞越太平洋来到厦门,住进鼓岛对面的鹭江宾馆。等次日晨乘轮渡到风光明媚的鼓浪屿,匆匆走进中国银行请教经理,问地下金库,他

说:这里是80年代才建成的房子,地下没有金库,也不知旧银行在哪儿。

远渡重洋竟得到如此答案,顿然若有所失,正在犹豫之间,背后传来一位老人的声音:“我知道地下金库在哪儿”。回头一看,是位七八十岁的先生,原来这位叶力先生是位建筑师,在70年代末负责拆除旧中国银行的房子,亲眼见到地下金库被工人一凿一



图 10.1 2007年12月及2008年10月,笔者两度专访厦门,登鼓浪屿不下十多次,探明运金路线(建筑师叶力摄于2007年12月10日)



鏊地敲掉,原址是在岛上观光胜地日光岩下,现在是晃岩路30号的钱币纪念馆。如此之巧,不到三分钟就无意间碰到登报都不一定寻找得到的人,巧得有些不可思议,冥冥中若有老天爷在帮忙。



图 10.2 从鼓浪屿远眺厦门港,太古码头(今和平码头,图中间有白色客轮停泊处)的南邻即 1949 年的国民党政府海军码头(图右方海面,图片由厦门大学提供,谨致谢忱)

1949 年的 1 至 2 月间,国民党政府使用军舰把金银运到厦门的海军码头(图 10.2),然后以小交通船接驳运到鼓浪屿背着厦门的一面海边,即今观海园码头(图 10.4,10.5),1949 年时是国民党政府海军码头。岛上挑夫把黄金一箱箱地从海边经过日光岩入口处前上坡的偏僻小巷(图 10.7 左图),经过福音堂前就到了晃岩路 30 号中国银行的地下金库(图 10.7 至 10.10)。此条路线保密性高,避开了鼓浪屿上民运码头的观光商业、住宅及人口密集区。



不知现今岛上还有没有当年挑运金银的工人? 也有人说曾使用岛上很普遍的人力板车(图 10.3),两位车夫,一在前拉,一在后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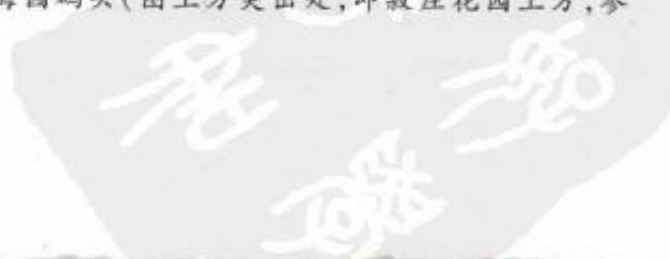
图 10.3 鼓浪屿岛上很普遍的人力板车,多年来,岛上的数百架钢琴、建筑材料等都是使用板车搬运,岛上禁用汽车,1949 年有报告显示运黄金也曾用它(翁忠展提供)



图 10.4 60 年前上海国库金银经国民党政府海军由厦门运送鼓浪屿路线图。在中华路与晃岩路的交叉口有红☆处，是晃岩路 30 号的中国银行藏金库，在今体育场北邻。由鼓岛上的海军码头（今观海园码头）经日光岩南面小路（图下方红色圈内），避开住宅、商业、人口密集区，即达金库。运黄金去台湾，也由原路送厦门海军码头后，由禾山机场军机运台，银元则由军舰运



图 10.5（左图）从日光岩上俯览鼓浪屿体育场，隔晃岩路（图中东西向街道）其北靠日光岩的红色顶及边窗的楼房即是 38 号陈文龙旧宅，沿晃岩路往东的 30 号即旧中国银行金库，从体育场向南行（左图右方）就到达旧海军（观海园）码头；再往东隔鹭江就是 1949 年厦门海军码头所在（图上方左）（右图）从日光岩上俯览西南方即见观海园码头（图上方突出处，即菽庄花园上方，参见图 10.6）





地下金库已拆除改建仅存遗迹

交通及中央银行旧址都保存至今,唯独把最有纪念性的中国银行及其地下金库拆除改建,令人不解。否则今日可发展成一个观光重点。

依照厦门大学图书馆萧德洪馆长提供的资料显示,晃岩路是当年鼓浪屿上的“华尔街”,有好几家银行:30号是中国银行,32号是交通银行,34号是中央银行(《厦门大观》,图10.9),这是因为鼓浪屿是侨汇之乡。另外,这里也是一些国内外富商、黑社会人士的逃难隐居或逃亡之所,有“万国租界”的庇护,也是“洗钱”之地,故而有可藏百万两黄金的地下金库。现居住于34号的居民告诉笔者,许多年前在后院整修时,曾挖出一具锈烂的保险箱,打开来里面没有黄金,有枪械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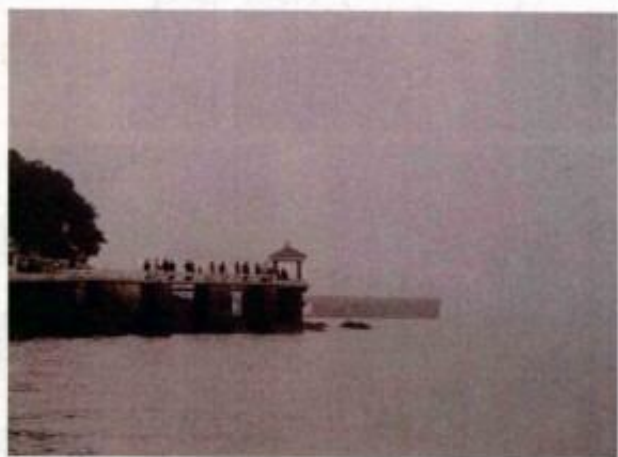


图10.6 海军交通船停泊在鼓浪屿南面背靠着厦门的一面海边,即今观海园码头(图中菽庄花园亭外方延伸出海面的浅水码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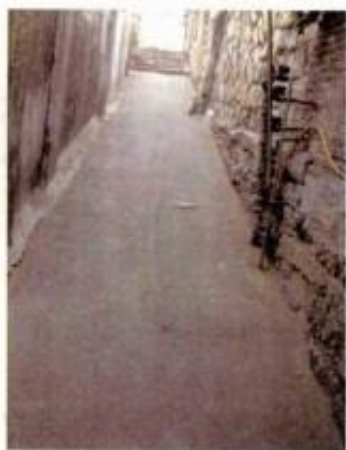


图10.7 右图的右侧是鼓浪屿岛上名胜日光岩的入口处,沿图正中蓝色围墙前下坡的偏僻小巷(左图)西行,或从体育场南行就能到海边(参见图10.4与10.5左图)

把黄金藏在鼓浪屿岛上或许是蒋介石的指示,他曾在1919年6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渡鼓浪屿至厦门,及投寓于宫保第(林祖密家),往观贷屋。”鼓岛是他旧游之地,他熟悉岛上的情况。1949年10月中旬,未放一枪,国民党军队即撤退,鼓岛幸未遭战火糜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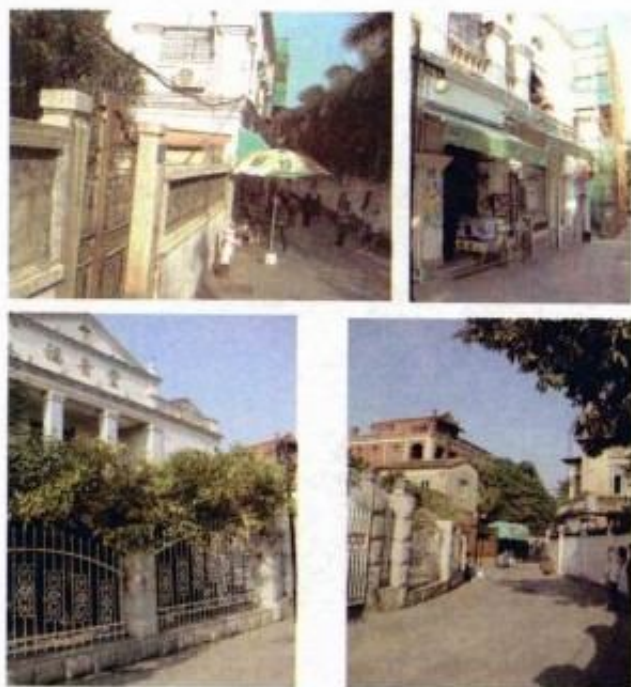


图 10.8 (上左图)晃岩路 32 号交通银行分行旧址正在整修中,同楼隔壁 34 号挂绿色横市招的是鼓浪屿上中央银行分行的旧址。上右图是 38 号大门,其内即下右图中的红色楼房(陈文龙旧宅),其邻侧是 40 号的天主福音堂(下左图)



图 10.9 (右图)晃岩路 30 号中国银行旧址,现为钱币纪念馆,在中华路口,其对面的阶梯是人民体育场的入口,隔壁是 32 号(原交通银行分行)、34 号(左图挂绿色市招的,是鼓浪屿上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分行的旧址)。向前(即西)走到底即抵 40 号的天主福音堂,由此天主堂再西行即是鼓浪屿岛上名胜日光岩的入口处(图 10.7 的右图)



图 10.10 鼓浪屿模型图(由北向南望),人民体育场(↓正下方)边上的钱币展览馆的原址地下是原国民党政府中国银行的地下藏金库(在中华路与晃岩路的交叉口,四落大厝旁),从体育场两边都可用挑担或人力板车南行到海军码头(图左上角)



图 10.11 1937 年夏,“七七”全面抗战前夕,中国银行职工在晃岩路前(现人民体育场)接受军训。上排靠山脚之白色建筑,右起为晃岩路 70 号的李武芳宅,现已拆掉的银行旧址即藏军费黄金的地下金库所在是 30 号,今为钱币纪念馆(图 10.9 右图),40 号的天主堂至 32 号的交通银行在邻近右侧(鼓浪屿中国银行苏晓虹提供)

据李光烈、詹特芳及先父的记录,在鼓浪屿的军费金银数量最高时是黄金 99 万两及银元近 3 000 万块,时间应是 1949 年 2 至 7 月。这条鼓浪屿上的偏僻小路、银行街及体育场,是李光烈常走的,宋子文、蒋介石及先父都来过。此风景不殊的美丽小岛是内战史上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将来或可与上海外滩的中国银行、四行仓库及其他银行金库和台湾的文园金库等处景点,打造成一条“黄金”观光路线,具有发展海峡两岸合作旅游的灿烂前(“钱”)景。

1949 年 7 月以后,厦门的金银主要已向台湾及西南各地输送,10 月 16 日解放军登陆鼓浪屿。后续黄金银元的流向,见下述诸章。





第11章 1948—1949年国民党政府国库金银总数

1948—1949年国民党政府的黄金储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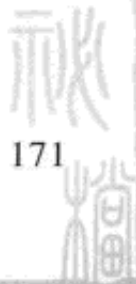
现在来探讨国民党政府在1948到1949年之间究竟有多少黄金储备？如能知道确数，那么运出上海国库的黄金量就不会超出这个上限。但这确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要是由于战乱波迁，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没有值得信赖的账目公诸于世，笔者只能从公开的资料、档案交叉求证，来获得一个比较接近事实的实数。除了战乱，这确数难以决定还由于下列三项因素：

(一) 美国运华黄金量究竟有多少？

1948年8月美国国务院公布的《白皮书》(美国与中国关系)中提道：

……从1942年4月15日起，到1946年3月13日止(按：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无条件投降)，总金额五亿美元，分11次拨付给了国民党政府。其中二亿二千万美元是购买黄金，每英两35美元，共约628万5700英两。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境内出售，以减少游资，并压低金价，以控制通货膨胀。

但一位历史教授的数据(黎东方，《平凡的我》，台北“国史馆”印行，1998年)显示：



由于美财政部次长花埃特(Harry D. White)百般刁难,到1944年6月,总共只运来不多于100万美元的黄金。其后,从1944年6月到1945年6月运来重庆的黄金,也只不过是相当于1100万美元而已。共计34万2800两。

其后,在1945年5月,宋子文以当时的中国外交部长身分与美国国务院、陆军部与财政部的高官,把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 财政部长)自己在1943年7月17日所写书面承诺拿给摩根索看,其中摩根索承诺从1942年五亿美元贷款之中,提出两亿作为购运黄金之需。……花埃特再度在1945年5月10日坦白承认:“我们扣留黄金,绝对没有法律的根据。……我们是在薄薄的冰之上溜冰,而一再用种种借口搪塞,而尽力拖延时间,拖到不能再拖为止……”



图 11.1 宋子文与盟军参谋长魏德迈将军

黎东方所说应该是有些证据的,因为蒋介石逝世(1975年4月5日)后,蒋经国以高酬邀请他替父亲写传记(《蒋公介石序传》,台湾:联经出版社1976年版)。黎曾在洛杉矶亲告笔者,他要求写书的条件是可以看一切档案,包括存在大溪的(即《蒋中正总统档案》)。但黎在这里似有些

误导读者,以为美国还欠中国几

百万两黄金,因为他没提1945年5月以后的史实:经宋子文据理力争后,美国是否开始把黄金运华。如依照美中关系《白皮书》所说,到1946年3月黄金600余万英两应已运交中国。从以下其他的资料显示,《白皮书》所述大致可信。

(二) 中央银行1946—1947年抛售黄金后还剩余多少?

李立侠在《金圆券发行的一段旧事》(《文史资料选辑》第55辑,文史



资料出版社1965年版)中叙及:

抗战胜利后不久,国民党内部就酝酿币制改革,那时中央银行掌握黄金580万两,外币外汇合七亿美元,还有根据1942年“中美互助协议”美国应偿还我国的驻军费用及垫款,1946年,宋子文任行政院院长,任命贝淞荪为中央银行总裁,决定抛售黄金、外币,以回笼货币,稳定物价,自该年3月至1947年2月,共抛售黄金350余万两以及大量美金,非但不能平抑物价,反而造成金融风潮。

另据潘君祥、王仰清主编《上海通史》(8)“民国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1946年3月至1947年2月共抛售黄金353万两,“同期法币发行增加2点56倍,央行内部人员与经销商牟得暴利”。

可以说,在金圆券发行前,央行还剩余约230万两黄金。如下述,此处央行的黄金多半来自美国。

(三) 金圆券发行后究竟兑得多少黄金?

这是最不确定的因素,也是央行为什么不愿把1948年6月以后的档案运去台湾的原因。金圆券贬值太快,账难记,当然这里面还掺杂有央行经手人谋取私利的因素。

1948年8月发行金圆券后,规定民间不得私藏金银外币,前文已提到,仅上海一地,就已公布的资料显示,即已取得黄金110万两,占全国之百分之七十五左右,也就是全国“搜括”来的黄金约147万两,这是中央银行要老百姓相信的数目,是明显地低报。这些黄金究竟占央行国库“台面上”的总量多少,现在也没有可靠数据。但照上面的估计,应占八分之三左右。

蒋经国在1948年9月底也说:

上海市民过去一个月中,曾向国家兑换110万5652两……3280万3894元美钞,再加白银、银元及港币,总合金圆券3亿7200万元。已占全国兑换总数64%。(《蒋经国先生全集》第15册,台北:“行政院”新闻局,1992年)

9月以后应该陆续还会在全国各省市有些金银兑换,数量则不详,但全国最后收兑黄金总数应远远超过150万两。此处就算兑换这些黄金花费了10亿金圆券,此笔“巨额”金圆券由于快速贬值,到1949年7月就只值一块美元了。

从上面(二)、(三)两项黄金数目相加,央行所掌握的黄金应该是350万至400万两,时间是在1948年底。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总统上台,据当时监察院财政委员会秘密会议报告:“库存全部黄金为390万英两,另有外汇(美钞)7000万元及价值7000万美元的白银。”这个数字应是相当“可靠的”明账,但时间可能是1948年底与1949年初。监察院还不知道,俞鸿钧已经把其中的260万两运存台湾,当然,台湾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省,即使在台湾,仍应算是“库存”的一部分。此外,监察院也不知道,蒋介石与俞鸿钧已经“隐藏”了部分黄金与外汇(见第12章)。

上海《申报》1948年12月11日登载:财政部“权威人士”表示,央行有黄金550万两、银元亿元及纯银至巨。《申报》与下面《大公报》的500万两,都显示出国库黄金存量远远超过390万两。1948年11月18日《大公报》有篇由龚圭复执笔的《星期论文——黄金政策能孤军应战吗?》提道:“央行负责人表示,国库现有黄金500万两,银元一亿元……”此数目与下文刘攻芸(继俞鸿钧任央行总裁)告诉蒋介石总裁的秘书周宏涛的黄金量456万两相合(减去以后两月中断断续续兑出的黄金量),与央行“明账”的差异,应就是金圆券兑得黄金超出147万两的数量,也是蒋介石想隐藏的秘密军费黄金量。而《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中所载,“到(48年)10月,政府手中大约有黄金300万英两、白银2000万两……”(第519页)是比较保守的估计。

黄金大部分来自美国

中国的资料显示,在1946至1949年,国库的黄金大部分来自美国:



1. “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开始援华。在1942年,美国估计中国国库黄金储蓄量仅约3万两。抗战胜利后,央行除原有少数库存外,接收了南京“伪中央储备银行”黄金553 000两,白银(及银元)800万两和北平“伪中国联合银行”黄金17万两及各省市银行之金银(王松,《宋子文传》,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但李立侠(央行副总裁)说:“抗战胜利后不久……那时中央银行掌握黄金580万两”(见上文)。这多出的黄金哪里来的?如《白皮书》所述,大部应该是从美国肯塔基州的诺克斯堡金库(Fort Knox,图11.2)或纽约联邦储蓄银行(New York Federal Reserve Bank,图11.6)运来的,中国在美国剩余未运的黄金应只有少数。这就和1949年2月央行总裁刘攻芸告诉蒋介石总裁的秘书周宏涛的国民党政府“放在美国(的黄金是)38万两”相符,其剩余的一半,约20万两,已于1949年8月运达台湾(见表1.1中的大溪档案)。

2. 到1947年3月,中国国库尚有黄金287万两(1946年3月至1947年2月宋子文共抛售黄金350余万两,也与《白皮书》所述相符,详见下文),其中207万两为“三九”、“四九”赤金或“千足金”,此高纯度黄金当年来源只有美国诺克斯堡或纽约联邦储蓄银行(其他欧美国家没有大量向中国输出黄金的记录),因为旧中国冶炼黄金的技术仅能达到较低纯度的“足金”(杨荫溥,《民国财政史》,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董德成(图5.8,5.9,9.7,第18章)见到藏在“财务署”金库的400两重的金砖,上面都刻有重量及阿拉伯数字“999”的成色。以此推论,美国在1945年5月至1946年3月之间,已将五六百万两黄金的大部运到上海。中国民间也广泛知道,美国运华黄金不但成色好、纯度高,而且每块近400市两(钱屿,《金银货币的鉴定》,远东出版社1993年版)。

3. 1948年8月金圆券发行,中央银行业务局提供的发行准备记录是黄金(没提成色)2 767 173英两或约253万市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历史资料汇编》第五辑,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824页),与1947年的黄金量相近。





图 11.2 (左图)美国肯塔基州诺克斯堡的金砖(Bar), 上有编号, 每块重 27.4 磅 (438 英两或 12.45 公斤, 约 400 市两), 台湾新店文园金库所存的金砖形状大部与左图左起第三行的相似(梯形) (右图)“四九”成色的黄金



图 11.3 台湾新店文园金库(台北县新乌路三段 251 号)所存的金砖形状部分与诺克斯堡的金砖(图 11.2 左图左起第三行的梯形)相似, 但也有长方块(由上往下数第三行)。梯形金砖是 60 年代以后向美国购买的, 总量占多数(与图 11.4 中大陆运来台湾的金砖相比较)



图 11.4 (“中央社”授权)1950 年 12 月前后, 台北台湾银行金库的藏金, 前面地上放的八块金砖(有↑处)与图 11.5 是部分中央银行运台湾的黄金, 与图 11.2 和 11.6 相似。另外, 中式圆桶装的应该是金圆券兑换来的中国民间的(超过 150 万两)或是中央银行原有的黄金(白纸黑字的封条上有“金圆券准备金”的字样, 这是国民党政府国库黄金运台的最佳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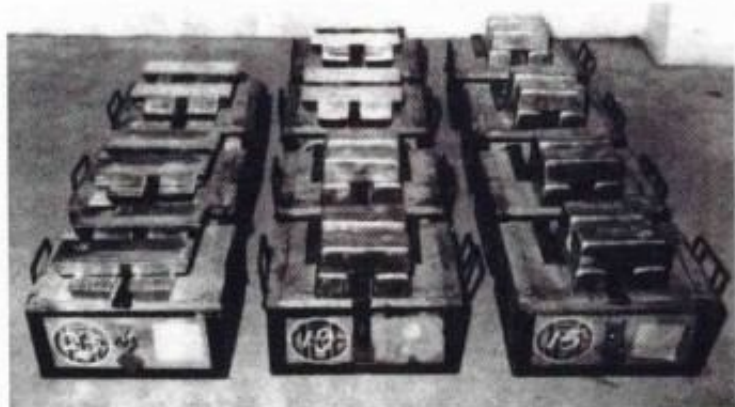


图 11.5 部分中央银行运台湾的编号 15 至 25 箱的金砖,其中第 15 至 20 箱的黄金与图 11.2 和 11.6 相似,几乎可以确定大部金砖是从美国运来的

总之,美国政府应该不会在 1948 年 8 月公布的《白皮书》里作不顾事实的官方宣称。除以上三点外,美国诺克斯堡的国库在 1946 年前后大约有 2.7 亿市两(8 500 美吨)的存金,指定运送中国的黄金不到它总库存的百分之二。照常理,美国应该不至于为这点金子而罔顾国际信誉,在国务院发表的官方文件《白皮书》里撒下漫天巨谎。



图 11.6 纽约联邦储蓄银行的金块是 18 厘米长、9 厘米宽、4 厘米厚,重 12.5 公斤或约 400 市两

但蒋介石日记 1948 年 10 月 14 日针对美国援华数字记下:

昨晚课后,翁(文灏)院长,王(云五)财长聚餐,听取王自美国国际财政会议回来之报告及召见(美驻华)司徒(雷登)大使(图 11.7),其国务院所发表之援华之数字,完全荒妄,徒为欺骗其国人,希冀掩饰其阻碍援华之罪而已。

依此而论,对《白皮书》所言也应存些疑问与保留,不能照单全收,这是近代史值得研讨的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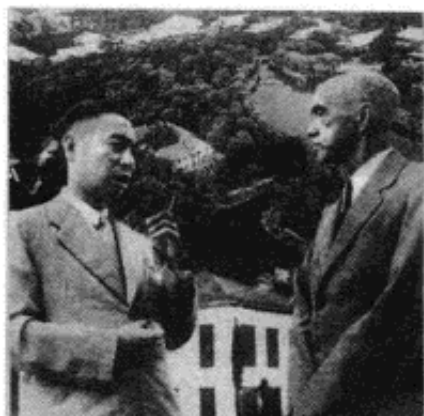


图 11.7 (左图)美驻华司徒雷登大使与周恩来 (右图)司徒雷登 2008 年入葬杭州之墓园[《世界日报》(美洲版)2008 年 12 月 20 日]

以上提到的大溪档案(即《蒋中正总统档案》),是国民党政府及蒋介石迁台湾后重要的存档的地方。汪守芝(1895—1977)从抗战重庆时候起就开始替蒋介石管档案,1949 年把档案护运来台后,汪秘书就负责看守及维护大溪的档案,台湾湿气重,遇晴天还须晒书防霉。其公子汪淮是台湾大学森林系教授(笔者知交),年少时即与工作人员帮忙搬书并防风吹、阵雨及野鸟停啄。汪是先父“侍从室”时代的老同事,我于 50 年代曾随侍先父去参观过,是一栋日式房子,有安全人员驻守,即“头寮宾馆”,蒋经国今停灵于此,日据时称作“农民讲习所”。蒋介石生前来大溪,有时也来巡视,必问有谁来过。他时而也调阅大溪存档,现在这批资料(大溪档案)都已转存到台北新店的“国史馆”。



图 11.8 蒋之侍从室及秘书人员与财务署及部分运金有些关联:(右起)夏功权、曹圣芬、周宏涛、石祖德、俞济时、宋子良、陈希曾和衣复恩(军装)及侍医熊九(左一)(周宏涛提供,谨致谢)



1949年2月8日央行总裁刘攻芸所报国库存金量

周宏涛是蒋介石下野后一直追随其于失意危难中的少数侍从人员,也是先父挚友、多年同事。周宏涛1949年2月8日奉命飞上海,去传达蒋的指示,将上海“国人的血汗钱”的央行黄金及其他资金“运至安全地区,以免落入解放军之手”。他从奉化由溪口出发,到邻近的烁社机场,乘双引擎小飞机,直飞上海龙华机场,随即到设在外滩的央行。刘攻芸总裁告诉他:

外头传言并不正确,目前全国黄金存量,运到台北260万两、厦门90万两(按:经财务署细点后才知是99万两),放在美国38万两,上海仅存28万两、承兑支用40万两,以及敌伪珠宝约1100条,准备运到香港贮存;此外还有数千万银元。

他做了通盘了解后,于次日(2月9日)转搭江轮返回奉化向蒋总裁报告。这些数字当然准确性很高,但没有说明是市两或英两(盎司),一般来说中国都是用市两,当时央行国库账面上总共有黄金456万市两或500万盎司,与上文《大公报》的数量大致相符合。



图11.9 周宏涛(右)与蒋经国在台湾

对照1949年元月28日俞鸿钧拍发给蒋介石总裁的一则密电,电文如下:

奉化总统蒋钧鉴:3906密(一)沪国行存金尚有82万余两,银元2600万元,以前因存兑金银,故不得不酌予留存,现在政策变更(按:即停止老百姓以金圆券兑黄金),无此需要,亟宜早日运出,免滋延误,除密洽刘总裁迅办外,拟请由经国兄电话催办。(二)……谨闻。
职鸿钧叩感印

此密电的发电时间,是第二批与第三批黄金运台湾的分界线。这里俞鸿钧提到的82万两应该包括刘攻芸告诉周宏涛的68万两,加上于2月5至



7日(中航专机)运台北的12万两(第三批的部分,见第6章),这也许是俞向蒋介石总裁“交了心”,交出了上海国库的“密账”。蒋纵观全局及各方电文资料,对国库的账,俞、刘的忠诚度,心里是有数的,也逼迫刘攻芸开始交出这“承兑支用”的黄金。更是在宋子文2月8日的密电后,就把第三批大部分黄金空运台湾(详见表1.1及第6章)。本来刘攻芸很犹豫,不愿把这剩余的60多万两黄金转作军费,但后来撑不住蒋介石总裁与宋子文及军方的压力,在周宏涛由溪口来“友谊”访问的第二天即2月9日,余留“承兑支用”的黄金(约48万两)就空运台湾,上海国库在2月10日就只余黄金20万两了(见蒋介石日记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编《中国国民党大事典》)。

另据财政部长徐堪1949年6月27日所呈“当前库存情形等由”(大溪档案财政金融第四卷第五号):“(财政部)编制内各地存金量为3 829 174市两”(也见徐堪呈蒋总裁的报告,第12章),此数与2月里刘攻芸所告知的黄金量相差73万两,与厦门军费藏金数相近,可不可能已经支出?应该不是,因为5月27日上海解放前,国民党军队还是大部以金圆券发饷,此外还有数千万银元,不至于使用到黄金。另一可能就是除掉了给台湾银行的准备金80万两,因为台行不在央行编制内。但如加上这80万,为什么反比2月多出7万两呢?那是因为央行糊涂,把厦门黄金少算了9万两(见第12章,先父6月7日的日记)。

另外有一点很奇怪,没提那价值六七千万美元的白银。是银砖,不是那数千万至1亿枚银元,不太引人注意,但在财政部长徐堪呈蒋总裁的报告中,6月27日中央银行除了在美国及各地铸造的数千万的银元外,还有库存2 500余万两纯银,约750吨,足可再多铸3 500万的银元(第12章)。这前后亿两以上的银子,应在第二至第四批里运到了台湾,在下面一则美国4月的新闻里倒是曾有提到。1949年4月16日的《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有则新闻来自南京:

……(行政院)送至监察院的正式报告称,国库之黄金储备之百分之七十五,在1月21日蒋委员长引退之前,已从上海运走,由于现金缺乏,使李代总统反通货膨胀的努力更为困难,另一方面没现银付



给士兵,也削弱他在此和谈的地位。……依据监察院的报告,中央银行在2月底有390万两黄金。以每两50美元的时价,应值一亿九千万美元,此外尚有七千万美元外汇,及足够铸造七千万美元之银子。……在蒋委员长之命令下,约300万两之黄金及5000万美元之银子已经南运了。……

此则新闻又提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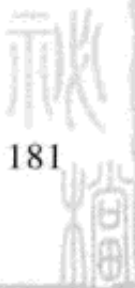
……据受访问的一些运输方面官员表示,已运出上海的现金恐还不只监察院的数字,据消息灵通方面人士深信,中央银行所公布的金银及外汇并未包括中国其它的公私银行及金融机构……

此监察院的金银外汇数字,同样也在《李宗仁传》中被引用。这篇《纽约时报》的新闻报道显然认为运到台湾及厦门的资金(黄金银元及美元外汇)比监察院所报告数目更高;这里全部运出国库的现金就接近当年的美金4亿。但这位记者(李白曼, Henry R. Lieberman)的报道也相当含蓄,他只说在1949年2月底央行还有全部黄金390万两,但没说在哪里,当然运到台湾及厦门的金银大部分是属于中央银行的,只是不在上海。

除上海以外,运台厦金银究竟有未来自其他地方?

合众社香港1949年2月15日电:“……属于中国政府的160吨以上金条银条,自广州运抵厦门……”(图11.10)这是一条突兀的消息。160吨是差不多500万两金银,其中黄金约33万两(10吨)是用另外一艘海关船或是“福星”号运输,银元是550万块(150吨)。

此电讯或是由合众社一位华人记者张国兴所发布,他也曾于该月底揭发:“暂时引退的蒋总统仍在发布命令,仍保有足够的总统权利……蒋总统经常对国防部及中央银行总裁发出各种指示……蒋氏似为李宗仁的对中共谋和,以及推行激烈的政治改革的一种障碍,阻挠和破坏李宗仁的和平努力”。张与当时的“桂系”及左倾分子或中共地下党都有联系。消息来源似是由“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等提供,来自李、白针对蒋介石的



电讯监听(侍从室电话检察官王正元等,《在蒋介石宋美龄身边的日子》,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从记者张国兴亲“桂系”的立场看,2月15日电讯的金银数字或有夸大。当时在外国通讯社的华人记者还有路透社的赵敏恒(Thomas Zhao)及合众社另一位华人记者王公达(《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对外宣传及美国记者群》,《传记文学》2009年1月号)。

√百六十吨金条运来厦门

(1949年2月16日)

[本报收听合众社香港15日]电据15日探悉,属于中国政府的160吨以上金条银条,自广州运抵厦门。据称或有更多数量的金银由上海运抵厦门,取道运往台湾。广州方面的委托者系中央银行,分两船运来。中国海关巡逻舰载10吨,中国政府运输舰海平号载150吨,海关巡逻舰所载均系金条,其价值得1200万美元。

(《江声报》1949年2月16日)

图11.10 《江声报》载合众社香港1949年2月15日电(厦门大学图书馆提供)

2月21日蒋介石日记:

美合众社侮辱余谋再起,并以余仍暗中主持军事与中央银行运移金银……此一消息当为桂系有意宣传。

虽然合众社的新闻有偏袒的言论,我们应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广州会不会运出这么多的黄金银子?中央银行在全国各大城市都有分行,广东侨汇巨多,照理不会漏掉广州的。可是,一方面,广东人独立性强,不见得会听从一位失败已几乎成定局的蒋总裁;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包括财政部在内已经迁来(1月26日),需钱孔急,会把500万两金银运出广州?但宋子文在星期三前(1月24日)才交出省主席职位,应该还是有影响力的,何况刚卸任总裁俞鸿钧家就在香港,深知蒋总裁的“宏观”大计,也许会就近督促广州央行赶快把金银运往厦门。在大溪档案里倒曾



提及：“由上海、广州各地运到厦门的黄金为786 540两”，后转财务署作为军费（大溪档案电子档“厦门分行代付拨交联勤总部吴署长嵩庆黄金数量”及《尹仲容与台湾经济的重建（1949—1953）》，表1.1, 16.4及图1.5），但只提此一个总账，而无各地运送细账，两岸的“中央银行”档案也没有记录，此有待继续追踪，以确定密藏厦门的军费黄金里，究竟有无2月里来自广州央行的黄金34万两？

至于银元，据1948年12月7日上海中央银行发行局的签呈（《民国档案》1989年）：

谨密呈者：奉交下宋主席子文亥冬（12月2日）密穗电，略以运粤银洋一千万圆，以便兑换，至为急需。已电招商局徐学禹指派航轮装运……准拨海沪轮，于12月9日启碇运粤……

正封发间……海沪轮，改于10日清晨启碇……

此时央行总裁为俞鸿钧，似唯宋子文之命是听。如果运厦银元原是从上海运穗的，那么2月里宋只是归还约半数（550万元）而已。近代史上，大家眼睛都只盯着黄金，其实这运厦银元也值七八万两金子，另外那450万块也不知宋子文是如何用掉的？这些银元大概也是金圆券兑来的，也是一笔糊涂账。一个不“透明”的政府，就会有这种乌七八糟的事情发生，这都是人民的血汗钱，但是老百姓管不了，都是央行高层在暗地里作业，这是兵荒马乱的时节。

到1949年春，广州政局与军事已不为蒋介石总裁所能掌控，蒋介石日记1949年5月21日本周反省课目：

……陈辞修不问利害与结果，如何贸然前往（广州）参加（军事会议）？如果桂系李白向其要求运出台湾存金，而彼应因不宜，甚可为其所害……

此段日记可说明两点：其一是，李宗仁、白崇禧想要在台湾的央行存金；其二是，连蒋都认为陈诚5月去广州开军事会议不安全。

入秋，广州情势更是变成反蒋了，尤其在解放前夕。先父财务署的老同事董德成在2009年回忆：在1949年10月初，“……广东省政当局擅行

禁止库存金银运出省界”，连“财务署”的存金（补给部队的）都要偷偷地才能抬上“中兴”舰（10月12日晚），13日国民党军队就撤出了广州。

笔者不能完全证实此合众社新闻的真实性，仅从银元部分着眼，记者先生的报道是可信的，台湾央行的“粗账”也支持此合众社关于黄金部分的新闻。有趣的是，解放以后，有数据显示，中共在广东一省就“兑到”700多万两黄金，在治国行政上的确比国民党政府有效率多了。

除上海、广州以外，运台的黄金纯银究竟有没有来自其他地方？这里包括大陆其他城市，或世界其他国家。答案是：一定有。

据曾任职于浙江省银行的彭晨于60年后回忆，1948年曾运“七、八千两”黄金到上海（台北《时报周刊》2008年4月）。此数目与原浙江民政厅长阮毅成日记（未出版，谨谢阮之家人提供）中提到的运沪黄金7177市两相符，是由杭州运出的。其他各省一定也有，因为金圆券发行时央行“明账”上记着，除上海外，全国各地共兑得黄金36万多两，浙江应不止7000多两，或许不仅运送了此一批。如果上述广州确有33万两黄金运厦，这些黄金极可能也是金圆券兑来的，那么全国收兑就在百万两以上了，这些“额外”黄金都是公开账上没有的，难怪蒋介石可以“密藏”黄金军费了。此外，云南卢汉在1949年12月11日起义前夕，就曾截留昆明“新滇银行”黄金13000两，还不包括当地中央银行的金子。

另外，汉口中国银行也在金圆券发行时兑得黄金18000两，并于1948年11月运抵上海[见下文中央银行发行局签呈（1949年3月3日）]；新疆也有5万多两黄金在央行[中央银行发行局签呈（1949年5月18日）]。这些零星的档案可参见《国民党政府撤离大陆向台北厦门密运现金一组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档案》1989年第2期，第69页]。

中央银行发行局签呈（1949年3月3日）：

兹准中国银行总管理处2月19日沪（38）业字第252号函开：

据敝汉口分行陈称：上年币制改革后，该分行接受汉口分行委托代兑黄金，自上年8月27日起至10月31日止，共收进大小2148包，总共毛重18812两4钱3分3厘，净重17885两4钱5分5厘。贵汉口分行（按：指中央银行）为节省手续起见，经商妥交接办法，由汉口



分行将上项黄金分装10箱,另抄清单于上年11月9日送交贵汉口分行,取具纳字第一号临时收据一纸,该项黄金俟运交贵局后再通知派员赴沪照单开启,逐件称验,然后再凭临时收据换回贵汉口分行原开寄存证。至赴沪人员往返旅费,请由贵行担任。兹闻该项黄金已于上年11月间运抵沪上……该汉口中行代兑数量不多,赴台会验周折颇多,兹取局为免除上项困难起见,拟将汉口中行交来之黄金即按照该行交存汉行时原开重量及成色作数,准其不再点验,万一将来发现多缺,概归本行以杂项损益处理,藉结悬案。是否可行,理合签请监核示遵为禱。谨呈

总 裁

副总裁

发行局 谨签

中央银行发行局出纳科、接管科签呈(1949年5月18日):

谨密呈者:职等奉钧座面谕本局库存黄金120 750.531纯市两,银元269 000元及代财部接收保管新疆省银行缴存发行准备金项下黄金50 289.304纯市两……开具列明“黄金33箱又33桶(据称17万1 141两9钱5分3厘),银元62箱(据称26万9 000元),附清单10纸”,盖有京沪警备总司令部防之平字第0351号领款收据一纸……黄金银元总清单一纸及详细箱号重量数目清单全份一并附呈,敬乞钧核。关于项金银之交出应如何做账之处,并祈核示祇遵为禱。

谨呈

局长

副局长

出纳科职 李友仁

接管科职 孙晓初

(民国)卅八年五月十八日晨四时

解放军于5月18日已攻抵外滩央行的黄浦江对岸(见图11.11中5月19日的香港《华商报》);央行两位职员清晨四点钟的签呈,数字还很正



图 11.11 1949 年 5 月 19 日的香港《华商报》

确。请留意,此篇清晨签呈也正式指出央行黄金至少有“箱与桶”两种装运方法(图 11.4 和 11.5)。

周宏涛在他的回忆录(《蒋公与我》)中也提道:“……另从美国,日本运回(黄金)……”但没提多少两。据其他方面数据显示,并不很多,美国运回是 38 万两(其中近 20 万两在 1949 年 8 月里运台,见表 1.1),日本仅 1.9 万两。因为据他算出,美、日、厦门财务署的藏金在 1949 年里总共运回台湾数十万两。加上第一批黄金的 260 万两,第三批的 60 万两及第四批的 20 万两,就是总数近于 400 万两(含又运回大陆的行政费约 60 万两,但财务署用于内战的军费黄金 80 万两并未算在里面)。

关于银子,在 1949 年 4 月 18 日,日本归还战时劫掠的白银 18 吨(仅 60 万两),这是欠中国的九牛一毛。1947 年 10 月 28 日,11 个盟国要求日本的初步赔偿是 540 亿美元,其中中国部分是 216 亿,相当于 308 亿两银子。也就是说,日本只归还了初步赔偿(包括黄金)的万分之一还不到。到 1949 年 5 月,美国就单方面决定要日本停止赔偿中国及其他盟国。

此外,1949 年国民党政府曾在旧金山新铸银元 3 000 万枚(孙大头或



船洋),该年底又从马尼拉运回银元980万枚。“中央银行”在各大城市的分行,除了金子外,还有存银,1949年1月白崇禧就曾截留武汉运广州的银元。同年11月底,笔者先父在重庆解放前夕,受“央行”之托,押运60万块银元去成都。

查大溪档案1949年台北“中央银行”付出项下:10月15日运输总行275001两(表16.1)。未提银元。另外,“财务署”于德昌少校预算官在2008年底告诉笔者,他在重庆解放前数小时,奉先父命押运存重庆“央行”金库最后的军费金银车队赴蓉,是六辆美式十轮大卡车,每辆可载重两吨半(图11.12),如以每卡车仅载2吨金银估计,全数近50多万两,大部应是银元,如有黄金应该是台北运来用剩余的。于少校的车队刚通过,由渝去蓉的交通要道的山洞隧道即被炸毁(以阻挡追兵,详见第18章于德昌小传)。



图11.12 1949年国民党军队的美制十轮大卡车,是央行经常使用的运金银车辆

先父的记录中曾经提到广州、兰州等地中央银行的黄金,但没有提数目。其实,在1949年下半年,这几个剩下在国民党政府手中的大城市,蒋已无法完全控制,广州、桂林应属于代总统李宗仁的势力范围,重庆、四川也很复杂,兰州、甘肃是回教马家军的地盘。蒋想从这些地方拿金子,哪是容易的事?即使运补部队的金银,都难以要回来;更糟糕的是,中央银行内部也不希望政府知道库存细账。



第12章 1949年6月之国民党军队军费 日志(一)

蒋介石经过多年考察,知道笔者父亲是一个“临难毋苟免,临财毋苟得”的非常本分的人,所以把央行部分现金都交给他管。父亲是财务署长,习惯了用算账的方式向央行领钱,分发到军中,自己不碰钱,都是由部下、各地收支处的财务官去做。现在突然要他去管这些“现金”——黄金银元(及美钞),如厦门的黄金就是分八次直接转拨给他本人的(见大溪档案电子档“厦门分行代付拨交联勤总部吴署长嵩庆黄金数量”,以下简称“厦行拨交吴嵩庆黄金”,图12.3),这让先父非常不习惯。在他遗篋的记录里,屡次表示希望赶快把这些在厦门的金银“分配掉”,这样他肩头的重任就卸下了。但另外又表示,如果这些“老本”用完了,怎么办?他当时显然并不很清楚,蒋介石早已把另一大批黄金(260万两)移到“安全地带”了,那不是他分内的事,他不会去打听,也不想知道。

第三、四批金银虽然也是军费,但是存储于台湾。而在厦门的第二批的百万两黄金与3000万块银元(及外汇)则主要用于1949年后半年的国民党军队军费。以下四章中先父日记里所记载的支出,由蒋介石直接控制,支应各地区国民党军队作战。从美国运回的近20万两黄金,也加入在财务署军费中,由先父掌管,使用程序同第二批秘密军费黄金,但“美”金与“厦”金相异之处在于,前者入了台湾“中央银行”的账(表1.1)上,在1949年8至9月的两周内花掉了(图13.7及第14章)。第三批是宋子文、俞鸿钧、周宏涛介入,把原来留作兑还给老百姓的80多万两黄金,“硬”从刘攻芸手里给拿出来大部分。如前章所述,蒋介石施加的一波波的压力,不是刘能



承受得了的,何况还有够吸引人的财政部长的职位(一个月后刘就入阁上任了)。在2月里由上海空运台北的60万两黄金,直接进了台北信义路的财务署金库(图5.9右图);汤恩伯、蒋经国和先父经手的20万至40万两的第四批黄金,是最后于上海解放前夕用军舰抢运台湾的。

以下这第12至第15章是参照蒋介石与先父的日记,来还原1949年6月到年底的军费调用情况,尤其是5至8月“厦”金的支出,在台湾“中央银行”档案里都无记录,目前所见的是大溪档案里只有“厦行拨交吴嵩庆黄金”这样一个总数及粗略记载。依先父日记,每笔支出都有报告呈蒋介石,但或许蒋认为这是他秘密的军费藏金,不愿其他任何人知道,猜想先父的报告也不会入档,目前只有一份1949年12月5日在成都的“吴嵩庆呈蒋中正保管之奖恤金黄金支拨情形”,现存大溪档案有关先父的档案夹里,“保管之奖恤金黄金”到内战结束前夕的账目,不是先父经营的军费黄金的主要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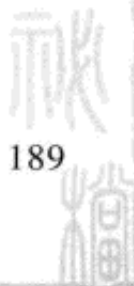
此部“奖恤金黄金”保管款的部分剩余,到1950年3月蒋“复职”后就成了他的“小金库”,让陈诚都看得眼红“有微辞”(1950年7月29日),也让先父得罪了一位“一人之下”的当权者。当然,“财务署”保管的其他大部分剩余黄金银元都转到了台湾银行,作军费开支,这里有当局派来代表赵志华的参与(第16及第18章)。

这1949年的下半年,先父以军费总管、蒋介石的“总账房或总教头”(李敖的话)的角色,应付各封疆大吏、地方军头,受过官僚责骂和旧军阀的羞辱。但先父忍辱负重,奉命于败军之际,尽责于危难之间,最后已有牺牲成仁的准备:放弃蒋介石总裁办公室安排的专机,宁愿亲自压运满载金银的车队,带少数武装人员,在离解放军前锋的半日路程上,于1949年11月底缓慢地从重庆向成都撤退,并沿途发放银饷给前线国民党军队部队。笔者将在以下各章中与读者同来重温这60年前内战中惊心动魄的一幕。



1949年国库有亿两纯银

国库有1亿两(如《纽约时报》1949年4月16日载,可足够铸造价值



7 000 万美元的银币)的银锭,不可能直接运到台湾,因为它量太大了,3 000吨,没做成银元也不好。有数据显示,1949 年国民党政府在旧金山曾新铸银元 3 000 万枚(因百姓、士兵信任银元,其价值高出当时银的成本二至三倍,铸银元是划算的),以 1934 年背面有帆船的“孙大头”或“船洋”为主(图 12.1)。徐堪部长说是“自七月十日起至九月底止分批运到”。这等于在伪造旧币,因其含银量与真的一样,市场价值也就差不多了,但钱币收藏家还是分辨得出,市价稍低。台北的中央制币分厂,在 9 月 8 日也奉命开始铸造银元,在其他城市及国家也都曾鼓铸银元(见第 16 章)。



图 12.1 上右是旧的“船洋”真银元,上左凸缘较宽的是 1949 年美国旧金山新铸银元,下面左两枚是 1949 年台币 5 角银币的正反面,下右是 1954 年的钢镍 5 角

让历史镜头聚焦到 1949 年。1 月 21 日蒋总统下野,十天之后,北平和平解放。2 月,行政院长孙科把国民政府迁往广州。4 月 23 日,解放军进入南京。一个月零四天之后即 5 月 27 日,上海也解放了。为了支应各地军费,先父旅行频繁,尤其是在台湾、厦门、广州(当时国民党政府所在)之间,这批黄金银元主要是支应各省尚在国民党军队手中的亲信队伍。在 5 月上海沦陷前的 12 天,他还赶到上海,与央行商量军费,“将全数数十万亿(金圆券)于三天内拨毕”。那时金圆券狂贬,一块银元

已近亿元了,这数十万亿只等于数十万银元了。到上海弃守之后的 7 月,一块银元就不止卖 5 亿金圆券了,国民党失败定矣!

蒋介石庆幸有人替他遮盖秘密军费与安排发行新台币

1949 年 6 月 1 日蒋介石日记:

(立法院质询)幸有前财长徐堪与央行总裁明白宣布,央行所有各种现款,只有(值)二亿七千万美金,并未如李白所报有四亿之多,



更无七千万美金之逃避……

此两个现款数字的差别,是军费密款。蒋没有说谎,是徐堪与刘攻芸(央行总裁)说的。这里面的“逃避的现款”,除作军费的外汇7 000 万外,还有军费秘密黄金160万两(第二、三批),也值8 000 万美元,此外还有银子,全部与李白所知的央行4 亿美金相比只有超出。从此段日记似乎也可看出,蒋潜意识里就已承认运台厦的现金超出李白的估计,但也庆幸有徐、刘替他遮盖秘密军费1.5 亿美元,如果央行实实在在只有2.7 亿美元,那何必言“幸”?

6月3日:

台湾改革币制基金已经拨定,今后应以台湾防务为第一矣。……

与阎面商之,鸿钧、攻芸、严家淦来见,报告外汇、头寸及台厦存金之支配,并指拨台湾银行基金共计五千万美元,此乃最重要之政策,得以强勉实施为慰。

台湾银行基金5 000 万美元,其中美金外汇是1 000 万,另加黄金80万两,以美金50元一两计,是另外4 000 万美元。台湾币制改革是未来稳定的基础,主动者是蒋介石而非陈诚。

从上面蒋介石的日记已经知道,蒋认为自己已把台湾未来的大计方针定好了,其他只是在大陆拖延时间,内心或是希望美苏直接冲突,等待转机。他的访菲、访南朝鲜,也是想加速此冲突的提前来到,金日成果然入其彀中,朝鲜战争如期爆发。

在先父的记载里,继续可以看到当时蒋介石与他是如何处置这些黄金银元军费的。6月4日先父日记(在厦门):

今访石司令(祖德),结束在厦任务,正谈间,得高雄夏武官(公权)电报,说有机自粤来,嘱即飞彼处,下午偕石司令在机场候至五时,机未到,因又回厦大(旅舍)(图12.4)。

6月4日蒋介石日记:

在东南琼、台、定(海)为基础可编成军尚有十五个军……



这里当然不包括粤、桂、滇、川、康及闽之留在大陆的部队。

6月11日先父补记：

5日(星期日)：上午又同石司令(祖德)赴机场，粤机来，天雄号亦至，因同往，同行尚有王敬久司令……

至(高雄)要塞，交来一函，知厦款均已处理，而刘部长遗漏甚多，因详向(蒋)老先生报告，请求更正。晚宿白君寓，拟报告至深夜，次晨抄正，午饭(老)先生请同席，饭前先招谈；呈所拟报告，未深阅，仅谕可将运港款减十万两(黄金)，改为五万，将所减款分配于遗漏各款，下午偕王副总司令叔铭兄(空军)及经国先生、石司令等同机回台北，叔铭驾驶甚好……

他于6日所呈蒋的军费报告应在大溪档案里，但至今尚未出现，也未列入中央银行支出账目中(见图13.7)，此是蒋介石的绝密军费。

秘密军费黄金凭空多出9万两

6月7日先父日记：

乘空军机飞粤，即商刘部长及郭总司令支配款项，闻厦金多出七万两，刘坚囑电厦着陆襄理(纪臣)即回。

8日先父日记：

八日陆君到粤，知多出九万余两，央行糊涂至此，因另拟分配办法，与央行财部详细清算，后临时又加胡(宗南)部粮款8000余两，则存金分配完矣。

此处显见“军费草约”里所规定的厦门中央银行分行与财务署人员共同掌管存金的账，否则的话，何必通知先父多出黄金的事件，“内部处理”就可皆大欢喜了。从此日起，蒋介石知道部队需要发银元黄金，如再继续发金圆券国民党军队就无法作战了，因此开始有必要动用厦门密藏的军费黄金，而且了解中央银行的一伙人算账实在有问题，就要厦门分行直接拨交先父，由财



务署同仁经管,不用央行的人夹在中间。当然,好的一面是代表蒋介石肯定先父的廉能;但“坏”的一面就是先父与整个财经界对立了,尤其是孔宋留下的一批人,包括俞鸿钧、徐柏园、严家淦、徐堪、刘攻芸等人。



图 12.2 先父 1949 年 6 月 1 至 12 日的日记

中央银行到底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笔者猜想后者居多!

这次因为有财务署的人在,不得不报告真相,照实数说。在前一日即 6 月 7 日,如不是刘攻芸坚持陆襄理当面报告,这 2 万两的差额也许就不见了。糊涂的是家父和他财务署一心为公的同仁。请想想,在那兵荒马乱的时节,正式文件上是 90 万两,多出来的,没账的,还不容易解决吗?但我父亲是个不通气的书呆子,一切公事公办,这多出来的 9 万两,还要费心跟蒋老先生商量怎样分配?他这样“古板”、不通气,国民党政府的财经界都清楚的,所以就排斥他,这就决定了他一生背十字架,好事及升迁都没份的命运了。

既然中央银行是假糊涂,故意以多报少,以俞鸿钧的过人聪明,在上海十里洋界打滚了这许多年,对人性是了解得太清楚的。黄金比账上多,见者有份,这有许多层深意在里面,央行高层交办的事,肯定会有“好处”,要尽心尽力地办,而且一定会保密,拿到好处的人,会到处去叫嚷吗?尤其是这乱世,政府败亡的机会颇高,接触这国库资金的人,在新政权眼中都有盗窃国家资金的滔天大罪,所以“领导”不但为这些经手人准备了“手续费”,而且足够让他(她)们逃亡海外。这些高层财经界人士,或许自以为是在提着头替国民党政府干掏空中国国库的勾当,这“战争保险费”或百分之十的“佣金”应该不算太多吧?反正中央银行的账,只有小圈子里

的“自己人”知道，大家心照不宣！如上所述，金圆券所搜刮的民间钱财，仅黄金一项 150 万两，贬值后，央行等于仅花了一块美元的费用就收购了全部黄金，而且这些收购黄金的细账已消失了踪迹，增减个十万八万两黄金，账上很容易就可冲销掉。直到今日，究竟央行于 1948 年 8 至 10 月底在全国是否仅仅兑进了 150 万两黄金，也无确实的第一手资料。

但不幸的是，这时的央行要跟管理军费的财务署打交道，显然这些黄金虽然已以“草约”拨为军费，但还是财务署与央行共同在管账。先父训练出来的人，只知道公事公办，不懂国民党政府高层财经界里的游戏规则，把实情给抖出来了。高层财经人士一点也不会脸红，大概只怨被“外人”搅乱了套。先父已成为他们眼中之钉，还以为是中央银行“糊涂”。笔者认为蒋经国一定了解此中内情，他上海“打虎”失败的记忆犹新，知道这些人不能得罪，其中的盘根错节，跟那与“打虎”败阵有直接关联的“扬子”、“孚中”公司一样，牵连到内廷，蒋介石也只能干瞪眼，敢怒不敢言，何况是羽翼未丰的长公子。笔者父亲把国家托付的金子变成比移交账上多出 9 万两（近 3 吨重），大概是国民党政府空前绝后的一次了。中国历朝历代不断上演着的争斗闹剧：忠与奸，一心为公之人与营私舞弊者，坚持力争大众福祉的人与少数既得权益者。当朝中的恶势力占优势，能为所欲为、无人制衡时，就是改朝换代的时候近了，这似乎是 1949 年国民党政府的写照。

如果也像第二批黄金能超出百分之五到十的话，那么第一批的 260 万两就是要多出 10 万到 20 万两，即使是点零头，价值也不菲，在台湾进了谁的口袋呢？这当然是央行及台湾银行内部的事了。在海外，知道有些财经界的子女在国外开银行、做银行家，很令人羡慕。当然，也许他们这第二代都是靠自己努力成功的，希望他们都能扪心无愧，钱不是来自他们的父兄辈，没拿中国“人民的血汗钱”！

6 月 12 日先父日记：

晨偕陆襄理抵台，即晚乘车同往高雄，呈（老先生）刘郭报告，作最后之决定。大意即：

（1）渝（重庆）、筑（贵阳）、穗（广州）款四十三万（两）仍在厦；



(2) 陕(胡宗南部及新疆、甘肃)、港款运台暂存(按:约40万两,其中原来15万两用在香港,后减为5万两,见6月5日的日记);

(3) 余十五万两交联勤(财务署),其中八万余为粮款,六万余为经费。

余即请求下午机还厦门,当晚到达,连夜办公事,次日再办一天,任务告一段落。(按:可见蒋介石在实际指挥分配此秘密军费黄金。)

以上这一重要决定在蒋介石的日记里只一笔带过。6月13日蒋介石日记(高雄要塞):

……(前一天)见雷震、(林)蔚文、(洪)兰友、许朗轩、吴署长(嵩庆)等解决各种问题。

如果不是先父的记录,只看蒋的日记,近代史会知道在1949年6月12日这一天蒋介石决定了属于中国人民的近百万两黄金之用途吗?从这里也能看到,蒋轻描淡写地就把百万两黄金支配了,都是作军事粮饷上用,无半两谋私(当然后来也发生了一件假公济私的事,是蒋交金子给自己的卫队团长,创办了台湾的《联合报》,见第16章)。用巨量黄金作军费,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史无前例的,另外还有亿两以上的银子,金银数量之大都是空前的。

6月15日先父日记:

留厦二天,详细指示(李光烈,也住厦大旅社,财务署包了一层楼,图12.4)办法,今日仍乘空军前来的专机,带款(台区经费)飞台北,即访郝副总司令,知总司令明日来,下午陈主席(诚)约谈,至招待所始略谈,伊今晚赴高雄,因往送行,徐部长可公及庞主计长亦同行,伊等下午已访过。陈主席指示三原则:(1)五月份给予,应照台区公布办法办理;(2)款先还欠;(3)士兵不能吃亏。

陈诚要求也发银元,或照日日在涨的银价发台币,否则台湾的士兵要“吃亏”。

从此日起,厦门分行的黄金开始转给财务署,由先父单线直接向蒋介石联系,支持各地国民党军队作战。中央银行“厦门分行代付拨交联勤总

部吴署长嵩庆黄金数量”共八笔款,总量是 78 万多两,其实不止此数,还有绝密的第三批黄金(大溪档案及表 16.4 中的注③)。8 月 30 日,先父还越过蒋介石,直接拨广州财政部 5 万两及成都 2 万两,在大溪档案里列在美国运回黄金的支出账上,表示除第一批的 260 万两,其他都列入军费黄金(表 16.1)。

行 銀 央 中 Cable Address
"GOVERNMENT"
THE CENTRAL BANK OF CHINA

厦門分行代付撥交聯勤總部吳署長嵩慶黃金數量

(1) 廿八年六月十四日代付撥交聯勤總部吳署長嵩慶	356,510,000	純金市兩
(2) 廿八年六月廿五日代付撥交聯勤總部吳署長嵩慶	9,113,000	"
(3) 廿八年七月五日代付撥交聯勤總部吳署長嵩慶	15,079,000	"
(4) 廿八年七月十一日代付撥交聯勤總部吳署長嵩慶	50,700,000	"
(5) 廿八年七月十八日代付撥交聯勤總部吳署長嵩慶	15,000,000	"
(6) 廿八年七月廿六日代付運交蘭州分行收	50,000,000	"
(7) 廿八年七月廿六日代付運交貴陽分行收 (附註)*	35,000,000	"
(8) 廿八年八月十七日代付撥交聯勤總部吳署長嵩慶	225,770,000	"
<u>總計</u>	786,510,000	純金市兩

图 12.3 大溪档案电子档中央银行“厦门分行代付拨交联勤总部吴署长嵩庆黄金数量”(简称“厦行拨交吴嵩庆黄金”)

图 12.3 中第七项的附注:

运交贵阳分行黄金内,少运壹块[毛重 411.600 市两@(纯度) 99.7 合纯金 410.365 市两]。奉业、发两局电,以每市两八十元(银)折合收发行局准备金账。

不知 80 元是银元,还是银圆券?如是纸钞,那么贵阳吃亏大了,黑市价可能 800 元银圆券都买不到一市两黄金,这里也可看到一块黄金的重量,大约是 400 多市两,纯度是 99.7%,应该是美国运来的金砖(见第 11 章)。



图 12.4 厦大旅社,今思明西路 64 号的民主(宗教)大厦,1949 年国民党军队财务署包租了一层(右图是旅社二楼内部),先父及李光烈来厦门都住这里,主要因它离海军码头近,去鼓浪屿的金库方便

这些经费的运用都要经过蒋老先生最后核准。先父似乎只希望把“厦金”赶快处理掉! 陕、港款没提总共多少,估计是 40 万两,其他两项共 58 万两。港款本来是 15 万两,陕款如是 25 万两,应非高估:陕款是给胡宗南(1896—1962)集团军(有 30 万人以上)、新疆陶峙岳及宁夏“马家军”的,胡此时正准备会同宁夏的马鸿逵、马步芳发动“关中会战”,企图收复西安。在 1949 年夏,胡部是蒋总裁的王牌,每月四五万两黄金,共半年预算,后来不幸果如预料,到最后的 5 万两于 12 月 6 日由台北空运到成都后(详见第 15 章),不到半个月,胡部几全部被歼,解放军在 1949 年 12 月底把国民党军队完全逐出大陆。

大溪档案中的中央银行“厦行拨交吴嵩庆黄金数量”,至少一部分是央行厦门分行从 1949 年 6 月 14 日起开始拨交先父“专管”,之前,根据“军费草约”,是央行与财务署“共管”部分黄金,现在金圆券已完全崩溃,国民党军队的军费不能不开始动用黄金银元了。此部分军费黄金是近 80 万两(详见表 16.4 和第 12 至第 16 章,以及财政部长徐堪 6 月 27 日呈蒋介石的报告)。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厦金”到 6 月中预算只剩余 15 万两(交联勤)也预定做粮款及“(台区)经费”,其后的记载,就是如何把黄金军费改造成小条(1 两及 5 两)向各指定部队分发。

此处更要留意的是,虽然已经“分配完毕”,但这近 100 万两黄金还是

在财务署保管中,主要用在6至8月的军费。港款,从15万减为5万两,大概是给在香港采购军用物资用的。据先父旧属董德成告诉笔者,10月中广州解放,先父把印章交给他,董辗转由三灶岛经澳门到香港,提出财务署存中国银行的20万港币放在手提箱里拎回台北,这或是此部分军费。为什么要赶着提出这笔钱?主要是怕香港的银行向中共“靠拢”。

6月16日蒋介石日记(于高雄要塞):

……约徐可亭(堪)谈财政金融二小时,决定其为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接替刘攻芸)……

见蒋6月1日的日记,徐在立法院质询时替蒋隐匿了军费黄金外汇,这里似乎是给予“奖赏”,而刘则有阻拦运金的动作(见第6章)。

6月17日蒋介石日记:

……朝课后,会经儿、电话徐可亭对于中央银行人事及招商局补助问题……

6月17日先父日记(在台):

下午访可公(徐堪),晚赴陈(诚)主席便饭,座中有徐(堪)庞(松舟,行政院主计长)二公及严(家淦)厅长,郭(忭)公与余,陈主席重申前议,因约明日至台(湾银)行开小组会议。

这桌饭局,都是国民党政府管钱的负责人,“前议”就是陈诚也要分秘密军费金银。

6月18日先父日记(在台):

上午在台行讨论军费及5月份给与,海空军代表及警备总部等均出席,结论陆军照台区公布给与,海空军及加给照国防部公布给与,计台行垫款约二千亿(台币),差额暂缓还,透支700余亿先还,业务费垫款500余亿预算,核定即还。下午仍在台行讨论军费以外各种垫款,决定先由各单位列表,定下星期二下午再讨论。晚随总司令赴高雄,同行贛主席方天先生,赴左营接款之庄副处长亦随往。



左营接款,即接从厦门由军舰运台湾的银元(空军运黄金)。当时,一两黄金约1000万(旧)台币,此处2000亿旧台币即近2万两黄金。按时间说,6月15日新台币已发行,全部发行额为2亿,1元兑旧台币4万,5元兑美金一块钱。银元一枚为新台币2元5角(即旧台币10万元),1949年5月份台区军费即近200万银元。这些钱,陈诚都希望先父从财务署的秘密军费金银里尽快拨出来。

6月19日蒋介石日记:

……朝课后……见郭悔吾,吴嵩庆,解说应解之款……

同一天,先父记下:

昨晚发烧,在车休息,晨稍愈,车抵高雄后,抵白宅休息,十一时上山进(晋)见(老先生)报告经费事,特别指示福建款为何未到,因将详数报告,随侍午餐后,将公文指示各点详告俞局长(济时),请再详答候批,以免变化误会。

先父怕蒋反复,依指示发了金银,但遇到责难或问题时,就“不认账”。到台湾初,蒋命先父调查周至柔与毛邦初的案子时,先父也是要蒋亲下手令。

6月21日蒋介石日记:

……到桃园机场,(陈)辞修夫妇来迎到大溪驻公会堂,风景甚美也。

此即是慈湖,未来他的停灵地,此日初见。笔者在1975年8月曾随众去谒灵,蒋经国亲自答谢。

6月24日蒋介石日记:

……九时与经儿车由大溪出发十时前到台北介寿堂即旧日总督府已新建完成矣……

此是他未来办公地,此日也初见。

6月26日蒋介石日记:

……约董显光、汤恩伯来见,对汤沪战撤退以前慌快图遁而未能



充分准备,且未及时通知将领,致被隔被俘者大半,闻之痛愤……

6月20日先父日记(回台北,准备去广州):

第一期粮款及五月份薪饷,六月份副食费之最末一批须在台换小条后带穗转发,嘱王处长(逸芬)赶办……

这些5至6月的粮款与军饷都是财务署的军费密账,在中央银行档案1949年里的支出里没有记录(图12.5及13.7)。但在“厦行拨交吴嵩庆黄金数量(表)”里,6月14日拨给先父黄金356540两,或就是此5至6月的粮饷费用。据目击者李光烈告诉笔者,厦门鼓浪屿所存黄金有大有小,大的有四五百两,应是美国来的400市两重的金砖(见第11章及表16.4),小的则只有1钱,只有另铸为1两的小条,略有些上下,方便使用。又据董德成告笔者,11月底重庆国民党军队财务署的遣散费即为2两黄金,因每块1两的重量略有出入,就编号当众抽签决定。

行 銀 央 中 Cash Address
"GOVERNMENT BANK"
THE CENTRAL BANK OF CHINA

付 出 (承前页)

(B) 厦行代表厦行付由美运台黄金(卅八年十二月廿日止)

(1) 卅八年八月廿九日拨交厦州总行	50,000.000	纯金市两
(2) 卅八年九月二日拨交厦州总行	50,031.113	"
(3) 卅八年九月五日拨付空军总部(简身银元)	66,260.163	"
(4) 卅八年九月九日拨付油库燃料部经费	5,747.126	"
(5) 卅八年九月十日拨付国防部部运署	20,000.000	"
(6) 卅八年九月十五日拨交厦行	7,000.828	"

以上共计拨付 黄金 199,039.260 纯金市两

图12.5 大溪档案转交档案分类资料,财政:国库,第十卷第五号,1955年7月27日俞鸿钧呈送“中央银行及台湾银行库存黄金数量报告表”部分报告表(全部支出参见图13.7),这是美国运回黄金部分的支出,其中(2)、(5)两项是先父单独在广州的决定(见其8月30日日记,图14.3),犯了蒋介石的大忌,但这也是拨给财务署保管为军费黄金的证据



6月21日先父日记:

……下午在台(湾银)行算账,算清军费代垫款。晚谒陈主席(诚)谈台事,伊的立场,与国防部及财政部均有冲突,事难处如是。

主要争执点是,陈诚当然希望中央政府负责台省军费,而财政部与国防部却要台湾负担国民党政府全部军政费的三分之一(见先父6月22日日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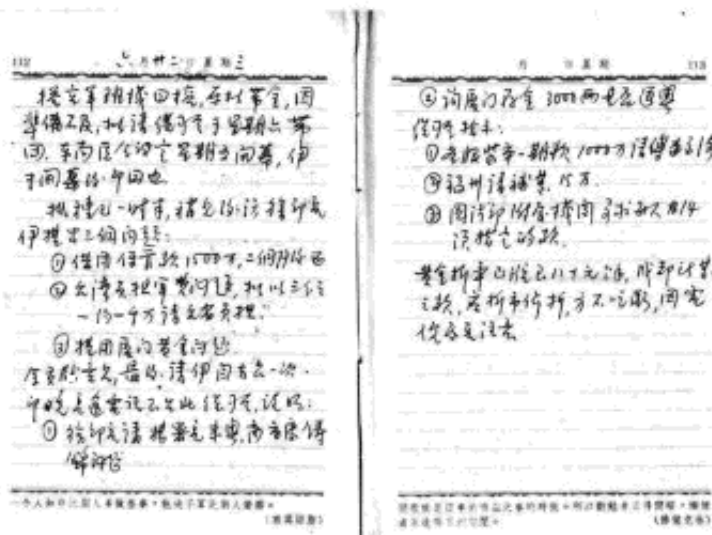


图 12.6 先父 1949 年 6 月 22 日日记

徐堪呈蒋介石报告及广州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困境

6月22日先父在广州补记(图12.6):

……抵穗已一时半,稍息后访徐(堪)部长(财政部),伊提出三个问题:

- (1) 借用保管款 1500 万(银元),二个月后还;
- (2) 台湾负担军费问题,拟以三分之一,约一千万(银元),请台省负担;
- (3) 提用厦门黄金问题。

先父怎可作主？请他自己去台（见蒋）一次，厦门黄金是秘密军费，财政部长已无权过问。

即晚长途电话至台北（郭忏）总司令，说明：

- (1) 徐部长请杨署长来粤，商重庆铸币问题；
- (2) 询厦门存金三千两是否运粤？

总司令指示：

- (1) 冬服装一期款 1 000 万（银元）请傅速交涉；
- (2) 福州请补发 15 万（银）；
- (3) 国防部附属机构要求每人 \$ 14，须指定的款。

黄金折率已涨至 80 元余（银元），成都所发之款，应折市价，方不吃亏，因电倪处长注意。

冬季服装部分款就是 1 000 万银元，如依 80 块银元折一两，就是 12 万两黄金。保管款即秘密金银预支军费，财政部长也要来借（见大溪档案徐堪 1949 年 6 月 27 日呈文）。



图 12.7 先父 1949 年 6 月 23 日日记

6 月 23 日先父日记（图 12.7），这一天下午行政院在广州开临时政务会议：

……主要为劝徐（堪，财政）部长即日就职，发言者多，徐言，现存外币（指美金）总数不到二千万（按：是作军费用的外汇 7 000 万以外



的),而存金尚不得随便动用,如要我就职,则请阎(锡山,时任行政院长)顾(祝同,时任国防部参谋总长)二公同赴台湾(见蒋)一次,台湾省府(应)负担军费(银元)1200万……阎院长谈其内定方案,将国税划归地方,提高地方职权,由地方自行发(钞)票,地方武力由各省负担,机动部队由中央负担,在平时应言收支平衡,在战时应言收支适合(举行内外债以弥补),现正穷求变通之时。

当时徐部长报告,现可靠税收每月约1000万[关税100万,盐300万,(交)通450万],而支出必需4500万,收支悬殊,实无法适合(参见下文徐6月27日上蒋总裁呈文)。

此中一插曲,朱骝先(家骅)认为无流可节只可开源。李汉魂认为无源可开只有节流;刘航琛问为何军费按每人10元平均计算,而士兵仅1元至3元,更为幼稚。[按:一般而言,如上述,当时国民党军队士兵每月薪金为1到3块银元(清末民初正规士兵月俸就有3块银元),尉官是10块,校官与将官则是15到20块;预算则为每万名士兵的部队,月需银元10万。由以下的每月饷金数,可大致推断当地“亲信”部队人数。]

最后陈立夫(图12.9,时任中央非常委员会委员)强调二点:

(1) 内阁(阎)成立已二星期,而财长尚未就职,必将影响民心士气,现赴台北请示也须就职之后;



图12.8 1949年7月蒋介石与行政院长阎锡山在广州



图12.9 陈立夫(右)与笔者(先父吴嵩庆摄于台北,约1988年)

秋

(2) 必须集中所有银元发饷,以维军心。

此话有力,于是一致通过请徐部长明日就职,至(于)是请总裁来穗或阎徐赴台,此是后话。

6月24日先父仍在广州记下(图12.10):

今日台北东南区军事会议开幕,惜未及前往参加。徐部长今日未就职,余往财部一转,知庞主计长正拟与各单位算账,余告以后天赴榕,因定明日下午五时在行政院先算军费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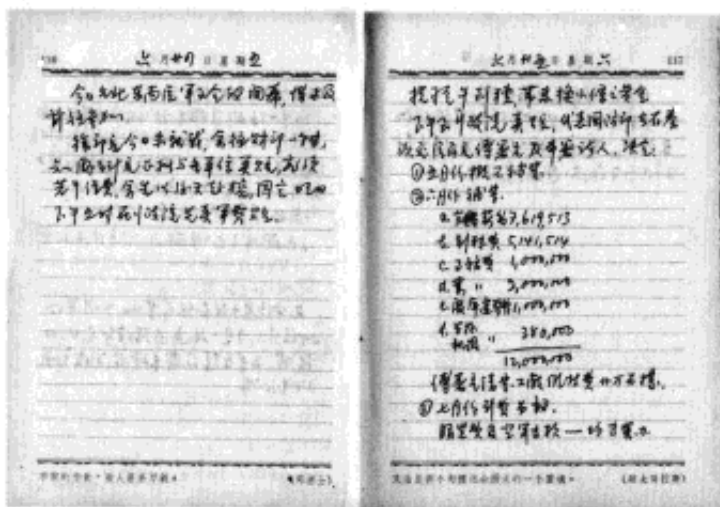


图 12.10 先父 1949 年 6 月 24 至 25 日日记

6月25日先父日记(图12.10):

总司令到穗,带了换(成)小条之黄金。下午至行政院算账,代表国防部者有秦次长、张局长、傅署长及本署诸人,决定:

- (1) 五月份概不补发;
- (2) 六月份补发:
 - a. 官兵薪饷 7 619 513(银元),
 - b. 副秣费 5 141 514,
 -
 - (共)12 000 000。

先父劝徐自己去见蒋,当面谈谈广州的困难。徐在6月27日有一篇



呈蒋总裁的报告：

谨呈者：职奉命接长财政并兼管国行，自维才轻任重，深惧弗胜乃荷。谆谆勗勉只得遵命接任，数日以来朝夕思虑，并就当前库存情形及目前急需支付军政款项，暨整理税收可能之结果，详加检讨，实觉左支右绌，其困难实超出想象之外，谨缕陈于后：

一、目前中央银行库存情形依据央行本月二十四日编制各地金银存量表计

黄金 三,八二九,一七四.七三市两

白银 二五,二一五,七五一.二四市两

银元 三,一六五,〇二〇.九四元

其次为外汇截至本月二十日止计有

美金 一二,〇一二,二六八元

英金 二,六五〇,七〇七镑

港币 一三,九一六,六八八元

印币 一四,四六六,一七七罗比

以上四项，外币其中港币部分近已大部支拨，所余无几。英金部分已动用数十万镑，美金部分亦略有支用，而待付之驻外使领馆经费，行将到期之外债本息，订购军油价款及印钞费等，为数甚巨，余存外汇，可资应用者已属无多。至央行各地库存之银元三百余万元，大多为各省军政长官封存，或已提用一部分，尚待清查交涉。所存白银，正在设法鼓铸银币，其在美铸币，约合三千万元，须自七月十日起至九月底止分批运到。

二、目前急需支付之军政款项，一为六月份以前，积欠军政各费，折合银元约五千万元左右，兹经阁院长及庞主计长，邀集各机关主管人员，详细检讨所有目前难于办到或无力办理之事项，分别停办或缓办，情势已经变迁之地方机关人事等经费，分别停支或减支，经切实核减后，综计尚需银元二千六百万，始克应付。至七月份军政各费，于七月上半月内，须支付者估计约需银元二千余万元，故在最近



数日内，必须筹妥银元五千万元以备应付。一面着手整理收入，紧缩支出，重行编订预算，并迅筹改革币制，使财政金融渐入常轨。

三、各种税收情形，暨估计整理后可能之结果：自金圆券贬值以后，本年四月间各种税费收入，即已不敷经征费用。五月以后，因金圆券价值日益低落，税收几等于零。最近多方研究整理税收办法，并拟改征银元，惟以战区扩大，内地工业商业大受打击，而一部分货物税经已决定划归地方，就目前情况及现有税源估计，关税每月约可得银元一百万元，盐税约可得银元三百万元，各种统税及直接税约可得银元四百万元，合共八百万元。惟在改制之初，税源难期畅旺，估计第一个月至多收足银元六百万元，第三个月起整理就绪且入旺季，每月当可收足一千万。

四、今后财政收支依照大体估计，每月收入仅一千万，而军政费之支出，每月须四千五百万元，其收支不敷之数达三千五百万元，为数仍属过巨。而此巨额之亏短，今后不能再以发行纸币为挹注，应付更感困难，现拟于整顿旧税之外，参照历年（或参照一次征收财产税案意义）征借粮食办法，强制派募公债，以增加一部分收入。一面实施精兵简政，再加裁并紧缩，并尽量停办不急之务，以节省一部分支出。同时酌采阎院长作战时期，加大省县地方职权案之方针，将一部分国税划归地方征收，一部分经费划归地方负担，俾能因时因地制宜便于应付，而中央收支亏短之数，尽量减少便于筹划。

五、关于币制问题，迭经邀集各有关机关首长，及专家学者详加研究，以为在此时期，欲作根本改革，树立永久适宜之制度，深感条件未备，环境未许，难以达到预期之目的。而金圆券已失去作用，不能为收付之工具，最近一两月内，国库支款几乎完全以金银外币拨用，不但实力消耗过大，穷于应付，且亦不成体制。为适合人民心理及社会需要，制止当前金融币制之紊乱，以为将来体察内外情势，再谋根本改革之张本，计目前似宜先定一过渡办法，不必侈言币制改革其办法要点拟定如左（下）：



1. 政府明令规定自本年七月一日起,恢复银圆为本位币。
2. 由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组织联合准备库及联合发行局,政府授权各该联合组织,发行纸币管理基金,藉四行联合力量巩固信用。
3. 四行联合发行局发行银圆兑换券,十足准备(六成现金四成保证)。无限制兑现其发行之银圆兑换券,仍用各该银行名义(仿照从前金城大陆盐业中南四行联合发行办法)。
4. 政府非依规定提供现金及保证准备于联合准备库,不得向四行领券使用。
5. 各级政府机关征收费,及公营事业收费,一律收受银圆兑换券。
6. 银圆兑换券发行办法,及联合准备库联合发行局组织办法另订之,其各行发行数额及其先后,依各该行准备情形定之。

六、依据上述各项情形,六月份以前欠拨款亟待支付,七月份起,用款亟待筹划,而联合发行办法,亦须早付实施。以期财政上得资周转,而社会金融经济,亦可藉以安定,兹将应行请求事项开陈于左(下):

1. 拟请自六月份起每月动支存金,以二十万两为限。
2. 初期发行银圆兑换券,为便于兑换,以固信用起见,须充分准备银元。拟请以黄金二十万两,向陆海空军存台准备之银元项下,抵借银元一千六百万元,自九月起,分两月拨还银元换回黄金。
3. 前奉准厦门存金分运重庆区各地者,请一律改运重庆,以便改铸小金块。
4. 分运重庆黄金,拟请拨足六十万两,俾作三个月之准备。

以上所请第一项每月拨用黄金二十万两,约合美金一千万元与钧座面谕阎院长之范围,尚相符合,请赐核准第二项所请抵借银元一千六百万元,系为初期维持币信所关,并乞

核准并迅令联勤总部,代为分运广州重庆两地。其三四两项,亦请令飭联勤总部迅为负责代运,俾资筹划妥为运用。谨呈

总裁

职徐堪 谨呈(印)六月二十七日

秋



这是一份很重要的档案,有关于央行库存金银外币、广州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军费及发行银圆券的内容,蒋在报告首页用红笔批了“存”,有几点值得在此重复一下:

1. 7月起每月军政各费4500万银元(约55万两黄金)。

2. 财政赤字为每月3500万银元,但蒋介石与徐堪的看法南辕北辙,差异在于,蒋想用银圆券(7月2日发行)来挹注亏空,而徐不愿干此无本生意,要求可无限兑银。徐真是不懂蒋的意图(只想少支出金银),官位难保呀。

3. 向先父那儿先借1500万的三军保管的银元,用20万两黄金抵押。财政困难重重,也导致国民党政府在广州的快速崩溃。

台湾军费“代垫款”

广州国民党政府开支浩大,要台湾每月负担1000万银元,而陈诚反要中央负责台湾地区的军费(每月200万,见先父6月18日日记),换言之,双方的差额是每个月黄金10万到15万两,是陈诚与中央无法协调的症结所在。先父总管军费,财政部长就要他去跟陈交涉;而陈认为先父是蒋介石的代表,就推他去向蒋要存台湾、厦门的金银,如上述(先父6月18日日记)台湾的代垫款,还有运往大陆“国统区”部分的台湾米糖也是算台省先垫,陈诚认为都需要以黄金或外汇归还。从这角度才能理解台省与中央之争。这使先父左右为难,尤其他是一板一眼的人,不会讲交际应酬的话来敷衍任何一方或借蒋自重,只是本分地尽职而已。有时交涉对手是台省财政厅长严家淦,严资历虽比较浅,但会做官,也有些政治头脑。另外财务署还要应付各方重臣与军头,大家都想获取黄金白银,不要纸币。

日后陈诚及严家淦认为是台省吃亏,每月“代垫”给中央,拿不到钱就把新台币的准备金移为台省军费及米粮款,新台币甫发行,陈诚即向先父诉苦,80万两黄金的准备金已抵付“中央垫款”60余万两矣,只剩下十几万两。而且,财政部与国防部认为大陆运来的大量物质、原料、车辆、机器



等,能算些钱在预算里,但陈有异议(见先父7月7日日记)。这些账目因立场不同,差额就大,到底孰是孰非,至今仍有争议。台湾有人说大陆没有多少黄金运来过,是因为包括军费及米糖等的代垫款,已经“抵销”了相当多数量的黄金,这就是那些位搞意识形态的政客,认为这三四百万两都是还欠款作军饷的,就宣称根本没有黄金运来台湾,但1949—1950年如果没有这笔黄金及等量的银及外汇,那么台湾用什么钱来支付军饷民薪,购买军实米粮,进口汽油零件及填补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年度预算赤字(见第16章)?如仅靠印刷机,台湾早就为通货膨胀的洪流所淹没,今日的台湾究竟是何光景是任谁都难说得准的。可是有一点应无异议:台湾必已经过一场战火。

但在国家动乱时期,能按照太平时代算账吗?何况,前方打仗,后方就不须支援吗?那么抗战时期,中央政府欠了四川多少钱粮?是否中央也要用千万两的黄金去归还四川省?这是“地方主义”与“本位主义”作祟。陈诚的心态可议,如上述,也让蒋不放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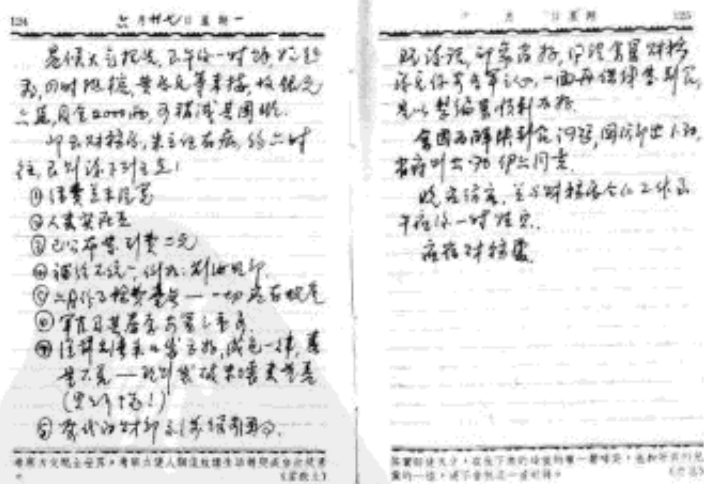


图 12.11 先父 1949 年 6 月 27 日日记

6月27日蒋介石日记:

……见顾墨三(祝同)、徐可亭……一言以蔽之,要求动用基金而已……(按:基金即国库运台湾、厦门的金银。)

从以下就处处可见到，先父夹在国民党政府要员与蒋之间，有时国民党政府高官有蒋口头的甚至拿着答应准拨款的手条，但先父还是只遵照蒋直接给他的命令，得罪拿不到金银的人就多了。但他的操守无可议之处，大家对他的公正决定也就无话可说。

27日先父日记(图12.11)：

晨候天气报告，至午后一时余，始起飞，四时抵榕(福州市)，黄处长等来接，收(支)银元六万及金2000两，可稍减其困难。

即至财务处，朱主任(绍良，1890—1963，任福州绥靖公署主任)有病，约六时往，至则谈下列各点：

1. 经费并未从宽；
2. 人数实在足；
3. 已公布发副费二元；
4. 补发不统一，例如刘汝明部；
5. 六月份事务费毫无——一切应有规定；
6. 军官及其眷属安置之重要；
7. 从前台湾米口袋甚好，成色一律，数量不差——现在袋破米坏数量差(思之可愧!)(先父内疚之言)；
8. 嘱代白财(政)部交涉保安团事。

观谈话，印象尚好，伊认余骂财务处长，系安各军之心，一面再借钱发副食，是以整编案顺利办好。予因为解决副食问题，国防部出30%，省府则出70%，伊亦同意。

28日父亲从福州转厦门飞台北的日记(图12.12)：

晨访缪司令、李司令(延年)，九时应约至保安司令部(绥署)访范参谋长，并晤三处徐处长讨论人数及与省(银)行经理讨论黄金作价问题，旋应缪司令约赴宴会，到有李司令及当时(地)各军长，饭后，又赴朱主任公馆，决定黄金作价每两78元，并决定将金块带台换小条。……(由厦门)起飞后一小时抵台北。……至寓得草山(老先生)电话，嘱即赴谒，至则为贷款央行事，总数为1000万(按：应是银



元,即6月27日徐堪报告中,财政部长要借1500万。蒋总裁只答应1000万,连中央银行都要经蒋老先生向财务署要银元,这不奇怪,因为财务署手中掌握数千万银元)。

7月10日至9月,美国新铸的3000万块银元会运到,所以徐就以为9月就可以还银了,不知徐堪届时已先下台了。借财政部的1000万及部分军费在6月29日开始安排运出(图12.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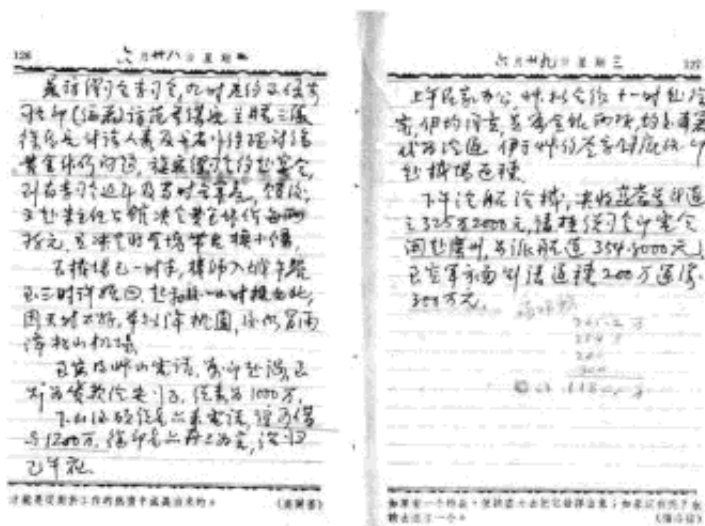


图12.12 先父1949年6月28至29日日记

6月28日蒋介石日记:

……徐提财政计划,指示其……不必动用存台基金也……约见可亭解决币制基金……(按:应是7月2日发行银圆券的准备金,与1000万银元借款有关。)

29日蒋介石日记:

……以台湾银行改革币制有储金兑现办法甚不合理,可叹。

蒋介石对台湾准备发行新台币的条例中的“黄金储蓄存款”(见附录4)办法不满。当时规定每市两黄金定价为新台币280元。次年6月又规定,黄金储蓄搭配两年偿还的“节约救国储蓄券”搭配比例,视官定金价与市场金价的差额而逐日浮动。7月,黄金储蓄改为搭配分年偿还的“爱国公

债”。10月，黄金储蓄停止搭配，但黄金官价则调整为每市两新台币410元。通过这两项黄金储蓄办法，回笼了4亿多的新台币。但这收获的代价是国库黄金流失，因官定金价比市场金价低，比国际金价更低，从而导致大量黄金外流。仅1950年黄金外流量就达5000万美元，到该年底，共有145万两黄金被卖出。虽稳定了新台币，但有点得不偿失，便宜了许多投机客。终于，在蒋的反对下，于1950年12月27日终止了这一办法，因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援助开始来了，台湾就此稳定下来，此是后话。

29日先父日记(在台北)：

上午在家办公，草拟合约，11时赴徐(堪)宅，伊均同意，并囑金、银两项，均交本署代为洽运。伊于草约签字保(留)底后，即赴机场返穗。下午洽船、洽机，决将昆仑号所运之325万2千元，请桂(永清)总司令即电令开赴广州，另派船运354万8千元；至空军方面，则请运穗200万，运渝300万。

这里的草拟中的合约，应是财政部与财务署的第二份草约，是为7月2日广州发行银圆券的准备金，内容如财政部长徐堪在前文22日提出的：借用保管款1500万(银元)，两个月后还。在蒋介石日记里是原定以9000万美金等值的金银外汇，分在台湾、重庆及广州各以3000万为准备金各发行新币，但后来以其中5000万发行了新台币，而银圆券的发行准备金就有些“缩水”了，以上的6月28日贷款1000万银元大概是头款，后来8至9月中央银行由台湾运广州黄金10万两，包括财政部长要求先父从台北空运广州的5万两(图13.7及第14章先父8月30日日记)，预备以其中5万两铸金币以示老百姓，“银圆券是有黄金作后盾的”，此8月的“违旨”运金，实犯了蒋总裁之大忌，立即要先父去重庆当面解释。

6月30日先父日记(在台北)(图12.13)：

上午与(空军)毛瀛初兄(毛邦初的堂弟)商定，于明后两天飞运穗款，(7月)4日起飞送渝款，均各两天完成，惟徐处(部)长定要我派员押运，不肯负丝毫责任，可恶。船洽妥，派福明轮，由庄副处长先至基隆视察，定本日将货装毕，今晚或明晨开船。下午参加东南区军



事会议,讨论经费问题,郝召集的小组会议,拟定给予太大,需三千余万,较全国军事预算还大,陈主席大不谓然,半天无结论。遇汤总司令(恩伯),询厦门工事费,是否由伊据领,伊不愿,认李良荣为妥,当签呈。

大会于五时闭幕,总裁主席训词大意如下:1. 官兵待遇必使吃得饱穿得暖,眷属能得安顿,最要者在官员能同甘苦共危难;……

由这会议显见蒋总裁还在主持军事。此外,要知道,银元与黄金一般之比是70到80比1(但当时银元价甚高)。1000万银元价值才13万两黄金不到,重量是270吨。银元数量大,所以多用船运,就慢得很。



图 12.13 先父 1949 年 6 月 30 日日记

用得最多的当然是银元,除非另铸,银元很快会用完。以 150 万人的国民党军队计算,如果部队都发银元、黄金的话,每月军费就是 1500 万银元或 20 万两黄金。广州国民党政府全部财政收人才每月 1000 万银元,这仗怎打得下去? 国民党政府早在美国及各地赶紧新铸银元,另外也用搭配一半数目银圆券(7月2日发行)的方式来降低金银的开支。总计,从5月底国民党军队退出上海到12月底撤出大陆,前后六七个月,总共须花费军费 1.1 亿银元,除六七千万枚的新旧银元之外,需黄金约 60 万到 80 万两(当然还搭配些银圆券,就可减少实际黄金的支出)。



第13章 1949年7月之国民党军队军费 日志(二)

蒋介石直接掌控秘密军费及中央与台省的财政冲突

7月1日先父日记(在台北)(图13.1):

晨访顾总长(祝同), 询预算, 谓未定……晚赴草山休息, 妻女等同行, 董副司长亦同往。

董副司长即董德成, 他在2008年告诉笔者, 先父要他去草山, 主要是请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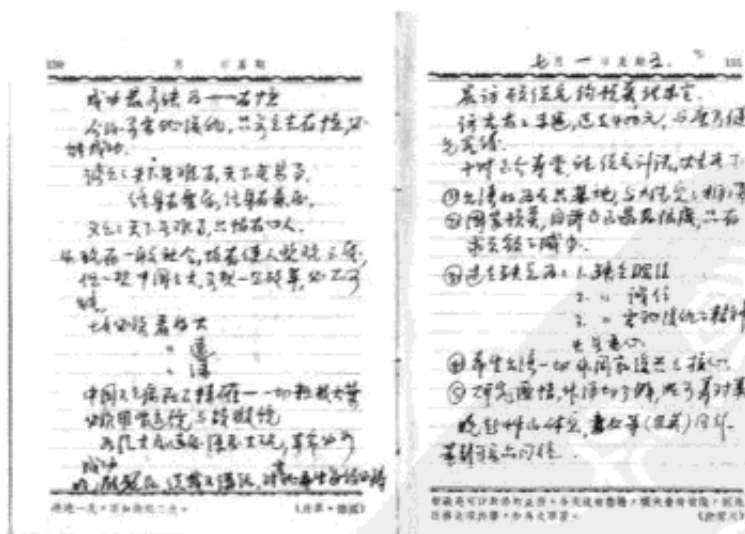


图13.1 先父1949年7月1日日记



一起回想一下军费的账,因为蒋介石的口头指示,先父回来就告诉董与詹特芳(这些机密事不能在蒋面前都笔记下来),所以一起回忆下,免得出错。蒋事事躬亲,是否身边少一位“周公”来辅佐?晚年在台湾就有蒋经国了。

7月2日蒋介石日记:

……四、中央改革币制案之宣布……

7月3日蒋介石日记:

美国务卿问顾(维钧)大使与甘介侯,“何以不用台湾存金”,定其有意挑拨我内部……

7月4日在台湾以外的“国统区”发行银圆券,一元兑银元一枚,兑金圆券5亿元(见图2.20)。此即蒋的中央币制改革,对政费与非亲信部队尽量使用纸币,目的是尽量减少金银支出,乃系使金圆券之故伎。

7月4日先父日记(图13.2):

连日约董副司长(德成),周司长,詹秘书(特芳)等办好因此次运输,所需的一切公文手续,并算清定海的账。五日赴北投休息,董(德成)、李同行,李(光烈)系由厦押运金45 079两来台(内三万两系补还昨日送穗央行之小条,余则系抵押金之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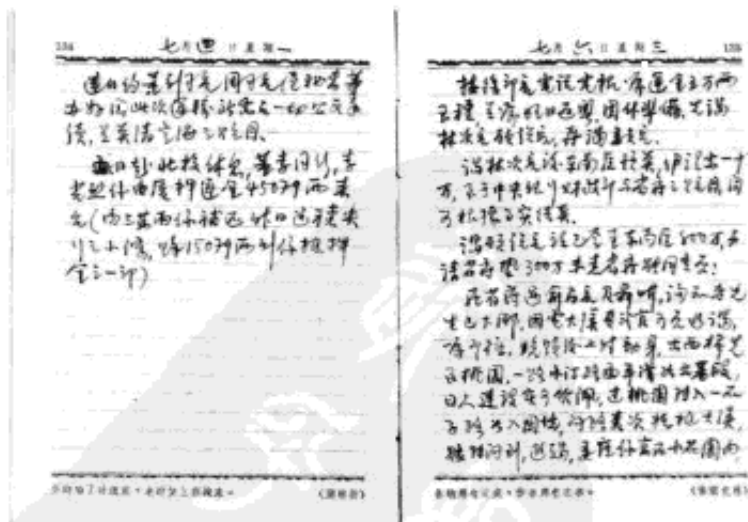


图13.2 先父1949年7月4至6日日记



此部黄金在“厦门分行代付拨交联勤总部吴署长嵩庆黄金数量”表中第三项,于7月5日才代付给先父(图12.3,表16.4),但同一天已运到了台北,显示厦门分行只是划划账而已。董、李两位都是财务署资深的干部,廉能的公务员,父亲在兵荒马乱时的得力助手。近60年后,董德成老先生在2008年8月北京奥运会时,还记得那次北投行!7月4日送广州的3万两“央行之小条”是为银圆券的发行及军政费用(见徐堪6月27日报告),也没有在台湾央行的账上(图13.7)找到。

先父在1949年7月留下极有趣的数则记事,是关于下野的蒋介石如何经过财务署“灵活”运用这些秘密黄金的。

6日先父日记(图13.2,13.5):

……接徐部长(堪)电话电报,嘱运金五万两至穗,并嘱明日返粤。因作准备,先谒林次长、顾总长(祝同),再谒委员长。

……谒林次长谈东南区预算,伊认需一千万,至于中央银行财政部与省府之账目,自可根据事实结算。谒顾总长认已签呈东南区800万,另请省府垫300万,未悉同意否?

……在省府遇俞局长(济时)及陈舜畊询知老先生已下乡,因电大溪夏武官(功权)可否晋谒,嘱即往。晚饭后七时动身出西桥先至桃园,一路水汀路面平滑如台基段。问路数次始抵大溪,辗转问到,晋谒,委座系寓在小花园内,门房甚狭小,独坐园中(图13.3),余(黑)暗中晋谒:

1. 报告徐部长请拨五万两至穗,伊(蒋)云可暂缓,重庆款可陆续运济,初认十万两内,继言五万两内,再认可明日电话再询;

2. “特种保管款”可先运台;

3. 福建省府款五千两可即拨;

4. 空军保管款,贷与央行之抵押金应集中保管;

5. 副(食)、(粮)秣费余款应作正开支,不可挪用;

6. 定海汤总司令批发奖金四万(银)元,另候批。

默察委座生活,极孤独,而脑中所想,除如何与共党斗争外,几无杂



念。而对身心之保养,生活之刻板,均表现其修养功夫。(图13.4)

与(曹)圣芬兄(图7.6)、功权兄略谈后,于9:40起车,10:45至台北,访(陈)舜畊,已赴草山,至财务处一转,回寓已过午夜。

记得那天晚上,母亲在客厅坐候,这是她一生的习惯,总是等候每位家人都回来,直到父亲90岁时去世,子女都到国外。大溪的房子,连先父都觉得狭小,蒋的确是能屈能伸,不像是一位图享乐型的历史人物。



图13.3 桃园大溪慈湖油彩图,蒋经国颇喜此画,中间红瓦闽南式小厝即今蒋介石停灵处,屋前有小园子,先父晋见蒋总裁即在此院(蒋经国,《十年风木》)。蒋介石1949年6月21日初见此园,即觉:“风景甚美也”



图13.4 1949年下野的蒋介石独坐(奉化)溪口院中沉思

这里的重庆款,就是前面6月12日提到的渝穗款43万两里面的,那时蒋的嫡系部队罗广文及宋希濂部在四川,所以这些黄金的分配是随内战局势的变动而由蒋介石亲自更改的。另外,也可看到汤恩伯虽然5月在上海总缩兵符,向央行下手令拿金子银元(第四批黄金),而此时在舟山定海要4万银元做奖金都不可得,要“另候批”,主要因为蒋对汤甚为不满:“沪战撤退以前慌忙图遁而未能充分准备,且未及时通知将领,致被隔被俘者大半,闻之痛愤……副司令石觉本为最有希望之将领竟被其牵累……不能复用。”(蒋6月26日日记)

这段记录中还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当然是蒋介石完全掌控秘密军

费黄金银元的运用,财政部长徐堪无权调拨。其次,这些指示都是口头的,没有记录,只有蒋介石知,吴嵩庆知。在桃园大溪仲夏夜的八九点钟,院中又暗,怎么记录?里面提到“特种保管款”,据詹特芳回忆是蒋介石私人存的,共黄金4200两。此款世间流传的谣言甚多,说是蒋介石有私房钱4万两黄金,这是无聊的人随便加了个零(如是照实说,只有4000多两,不足以显示蒋的“贪婪”)。此时才提到运台湾,可推想这第二批从央行提出的金银到7月还存在厦门,此与下章8月16日记的“厦门存金开始运台”及大溪档案之“厦行拨交吴嵩庆黄金”(第12章)可相印证。

1949年7月7日晚在台北,9时应约去见陈诚,先父记录如下一段话(见图1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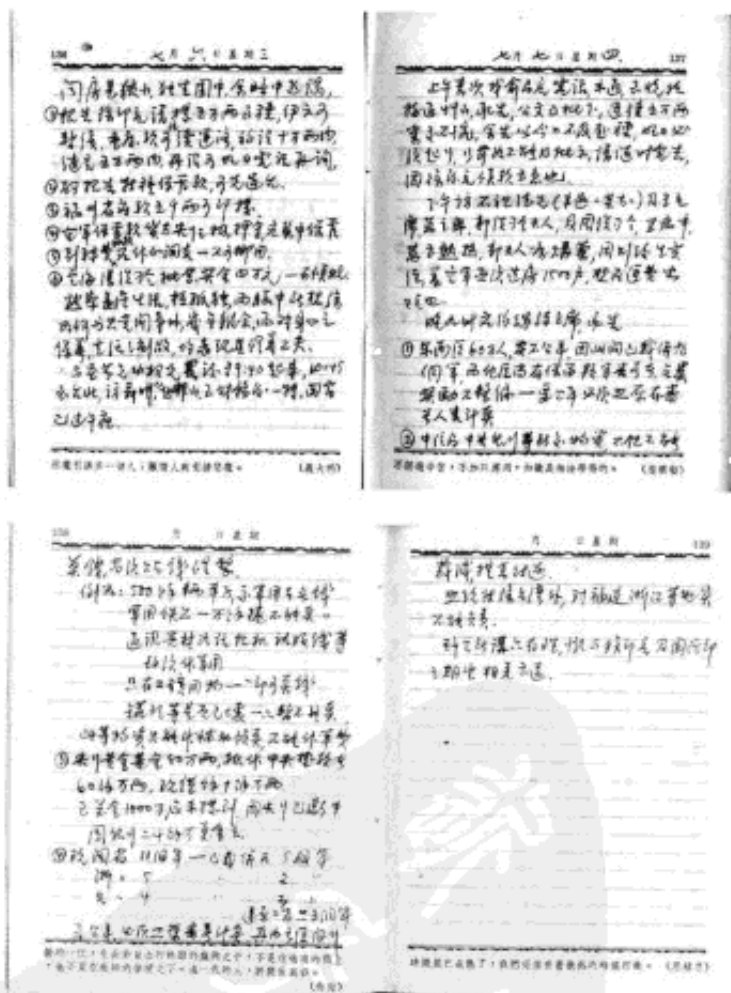


图 13.5 先父 1949 年 7 月 6(续图 13.2)至 7 日日记



(陈诚说)

1. 东南区(主要指台澎浙闽)60万人,实不公平,因此间已裁并九个军,而他区尚有保留叛军番号者,无异奖励不整编——要公平必须照原有番号人数计算;

2. 中信局、中央银行等所交物资,不但不能算钱,尚需贴钱修整。

例如:500余辆车子,交军用者无钱;军用铁丝一万余卷不能算钱;通讯器材、被服(线)等均需作军用;只有工矿用物,一部可算钱;罐头等是否已坏——亦暂不能算。此等物资只能作辅助预算,不能作军费。

3. 央行黄金基金80万两,抵作中央垫款者60余万两,现仅余10余万两。至美金一千万,迄未拨到,因央行已亏中国银行二千余万美金云。

4. 现闽省11个军——已裁并为5个军;浙省5个军已裁并为2个军;台省四个军已裁并为3个军,连原(来)两个军共5个军。

要公平必须照旧番号计算,再由各区自行裁减,提高待遇;照现状,除台湾外,对福建、浙江等地实不能负责。

(陈)辞公所讲亦有道理,惟与徐(财政)部长及国防部之期望相差甚远。

此段话,显然是陈诚的抱怨。央行经财务署应该拨给台省的外汇1000万(见前),新台币6月就已发行,正式公文上有划拨台湾银行1000万美元的记载(说6月15日已决定),此时陈诚抱怨为什么已经三个多礼拜还没有拨到?至于欠中国银行的外汇,大概是国民党政府向中国银行借的没还(它们之间关系又如何?),但是央行的俞、徐等一定在遥控。或许钱存在香港或国外,还是由蒋最后裁决。“央行黄金基金80万两(发行新台币),抵作中央垫款者60余万两,现仅余10余万两。”从陈的抱怨可看出当时中央与地方的利害关系,“抵作中央垫款”是台省自认是中央还的作台区的军费或也含台湾供大陆的军米与糖的钱。陈把先父看作为蒋介石的财务代表,想把这些话传达到蒋的耳里。

至于徐部长想要调拨的5万两(见6月27日徐堪报告),有“每月20万两”之数,应是7月发行银圆券的准备金及广州的行政费用,蒋介石可能答应过,但不想给(知道大陆迟早要丢的,纸币只作搭配现洋用,拖时间等待中共与美国发生冲突,也争取宝贵时间把台湾安顿妥当,把人员、文物、物资、金银等撤退去台湾)。这笔黄金究竟如何了?7月7日先父日记(图13.5):

……至晚始接通草山,承告,公文已批下,运穗五万两黄金案交研究。余告以今日不及赴穗,明日必须成行,以前如不能得批示,请随时电告,因徐部长候款甚急也。

到8月底,终于替徐堪从台北运了两批5万两黄金到广州[8月29日及9月3日,见图13.7及大溪档案“吴嵩庆呈蒋中正保管之奖恤金黄金支拨情形”(1949年12月5日)],后一批是先父未经蒋事先核准的“擅自”决定(见9月30日先父日记),让蒋介石极不高兴,是一次“违旨”运金。

7月9日先父日记(在广州):

接台北数次电话,谓奉(蒋)谕,发闽省府(黄金)一万两(前为五千两)并谓郝副总司令转告,老先生对军费汇拨太慢大骂,经数次变更,决定照手令送一万两。



图13.6 蒋介石与胡适(左)、陈诚(右)在台北“中央研究院”(约1958年)

“经数次变更”,就是蒋常常更改主意,拨出黄金不能太快,太慢则会影响军人士气。先父与老先生之间似有某种“默契”,但时间要拿捏得准确无误很难。蒋骂人或也是一种统御手法,有时是骂给受拨人听的:瞧我多么关心你们的补给与薪饷。但是黄金拿出去容易,收回来就难,蒋做个大当家容易吗?尤其是国脉如缕、兵败如山倒的时候,对



手又是厉害非凡。

7月11日先父日记(在穗):

上午访问(中央银行)业务局李局长、财部徐(柏园)副总裁及杨次长,汪秘书长等,洽零星案件,并商定军费今日全部进账,明日一律汇拨。

12日先父日记:

台北电话,福州快送五千两,其余五千两由高副司长等押运来穗购粮。闻上峰派俞樵峰(飞鹏)先生赴闽调查补给情形,又白长官(崇禧)确立发薪饷,闻赣江口将有军事行动,因商央行将重庆、华中、湖南、江西、福建各款,限今日汇拨,江西及陕西以北均发现(洋)。……

下午参加国防部人数检讨会议,军费总数有限(八月起\$2800万),总人数有限(300万人),在夹层中求出路,必将误事。

以上这福建1万两黄金及四川、华中、湖南、江西等地的军费支出,在台湾的大溪档案“中央银行”全部的“付出”清单(图13.7)里都未见到,但在“厦门拨交吴嵩庆黄金”表中见到黄金支出,但无细账。而且,名义上是直

行 銀 央 中		Cash Balance GOVERNMENT
THE CENTRAL BANK OF CHINA		
付出		
(A) 駐台代表處經付由滙豐台美金(四八年十月廿二日)		
(1) 四八年六月廿一日撥付台灣銀行	800,000,000	美金幣券
(2) 四八年十月廿五日撥付交通部政務司	125,000,000	*
(3) 四八年十月廿五日撥付銀行	275,001,434	*
(4) 四八年十月廿四日撥付東南海峽殖民地總督	10,000,000	*
(5) 四八年十月廿四日撥付暹羅總督	3,005,714	*
(6) 四八年十月廿四日撥付暹羅郵政總局	19,975,527	*
(7) 四八年十月廿一日撥付東南海峽殖民地總督	10,000,000	*
(8) 四八年十月廿一日撥付駐台新加坡總領事館	66,900,000	*
(9) 中行等以的款項結算一併	.981	*
以上共計撥付		美金 1,339,883,656 美金幣券
(B) 駐台代表處經付由美運台美金(四八年十二月廿二日)		
(1) 四八年八月廿九日撥付廣州銀行	50,000,000	美金幣券
(2) 四八年九月三日撥付廣州銀行	50,031,143	*
(3) 四八年九月廿四日撥付空軍總部(粵省駐台)	66,260,263	*
(4) 四八年九月廿九日撥付海軍總部(粵省駐台)	5,717,126	*
(5) 四八年九月廿四日撥付駐台總領事館	20,000,000	*
(6) 四八年九月廿五日撥付廣州銀行	7,000,828	*
以上共計撥付		美金 199,039,260 美金幣券
(C) 撥付庫台後經付(四九年二月十二日)		
(1) 四八年十二月廿六日撥付國防部軍械署軍用油	22,222,000	*
(2) 四八年十二月廿一日撥付台灣銀行	100,000,000	*
(3) 四九年一月廿四日撥付台灣銀行	126,000,000	*
(4) 四九年一月廿四日撥付國防部之軍費一併	65,000,000	*
(5) 四九年一月廿四日撥付國防部之軍費一併	17,894,597	*
(6) 四九年一月廿四日撥付國防部之軍費	60,771,820	*
(7) 四九年一月廿四日撥付國防部之軍費	13,516,554	*
(8) 四九年一月廿四日撥付國防部之軍費	16,930,218	*
(9) 中行與台美金之軍費之結算一併	6,267	*
以上共計撥付		美金 482,362,136 美金幣券
共計		2,021,266,352 美金幣券
存餘		918,705,927 美金幣券

图13.7 大溪档案转交档案分类资料,财政:国库,第十卷第五号,1955年7月27日俞鸿钧呈送“中央银行及台湾银行库存黄金数量报告表”(参见表16.1)

接拨交给先父本人的(表 16.4)。在内战军费史上,中央银行把巨量黄金划拨给某一个人,大概也别无先例,也见蒋介石对先父之倚信。

蒋介石于7月9至12日访问菲律宾(图 13.8)。12日蒋介石返台日记:



图 13.8 1949年7月9至13日访菲律宾,右起坐蒋介石、机要秘书周宏涛及季里诺总统

……(在白沙湾换机)……十四时到台南(转台北)……

这次国外访问,所用外汇是财务署军费中拨出的(见第16章)。

13日先父日记(在广州):

……接台北电,福州款今日送到,共计一万两,此亦临时抱佛脚也,此一万两,除原存五千两外,其余五千两如何开支,尚需请示。各地汇款昨已汇拨,重庆金款昨送,兰州金款明交奚(处长,寿康)送,昆明则需候班机,晚闻委座(蒋介石)已到穗。

各地汇款是新发行的银圆券,而重庆金款则是黄金(见徐堪6月27日报告),兰州金款则为5万两(见先父7月14日日记及表 16.4)。

7月14日先父日记(图 13.9):

今日得草山(蒋总裁)电,厦门存金均可照计划运送,此事办毕,可省却一心事。因作如下三措施:1. 电台北王处长(逸芬)明日准备五万两小条,后天必需飞兰(州);2. 派李光烈赴厦督办此事;3. 电告有关各方。

15日新华社北平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一)解放战争初起时,1946年7月1日,敌军(国民党军队)总数为430万,我军(解放军)为120万;(二)1949年7月敌军全部残余共149万,我军为400万(约为国民党军队的2点7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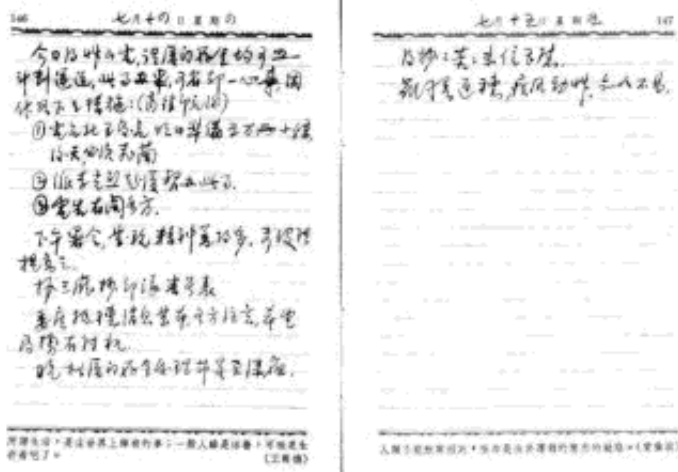


图 13.9 先父 1949 年 7 月 14 至 15 日日记

而由先父 7 月 21 日日记知广州国民党政府的国防部仍旧认为部队有 350 万人之众。

17 日先父日记(图 13.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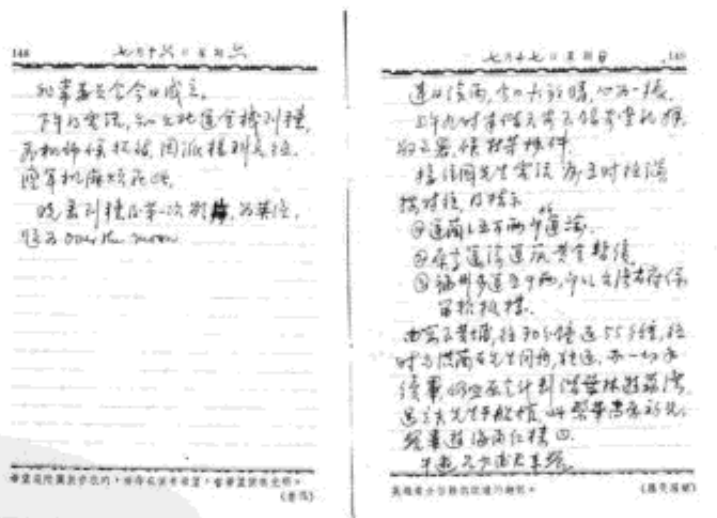


图 13.10 先父 1949 年 7 月 16 至 17 日日记

……上午……至署,候(詹)特芳抄件。接经国先生电话,嘱五时往(谒老先生),得指示:1. 运兰(州)之五万两即改运输;2. 原定运输、运筑(贵阳)黄金暂缓;3. 福州多运五千两,即以台湾省府保留款抵拨……

此兰州和福州款及上面的重庆金款都未见在台湾“中央银行”的付出清单(图 13.7)里,而兰州的 5 万两在“厦门拨交吴署长嵩庆黄金”表里,是 7 月 26 日拨的,同日也送了 3.5 万两去贵阳。

军费分拨款、发金及银三类

7 月 20 日先父日记:

……上午十一时又赴财政部讨论拨款日期及方法,分拨款、发金及银三类。西北(新疆陶峙岳部)仍发金,汉中(胡宗南部)、长沙(陈明仁,后叛,八月黄杰接任)、赣州、昆明(余程万的第 26 军,李弥的第 8 军)、海南岛发银元,余均汇发银圆券。

从发饷的方式,也可看到蒋介石在军事上布局的重点所在。发金及银,应该是他嫡系的、忠心的部队,拨款是纸币银圆券,没有人要的。西北(新疆陶峙岳部)发的黄金,也没见在图 13.7 的付出清单里。

关于当年国民党军队发给金银饷,这里有两则“旧”闻,登在香港《文汇报》(1979 年 12 月 5 日)上。其一,1959 年 4 月新疆的地质考察队在罗布泊荒原上测量时,意外地发现了四具干尸,其中一具干尸下压有“国民党时期的巨额黄金兑换券”(按:即一钱不值的“金圆券”),同时,在他身下还发现一个装有约 5 公斤(约 160 市两)的黄金块的袋子。这些金子大概就是财务署运补陶峙岳部的。其二,更令人感慨的是,1964 年 10 月上旬,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10 月 16 日)前几天,航空部队在罗布泊荒原上空侦察时,意外地发现一群约 100 多人的“国民党残部”,三天后,这群在荒原上游弋了十余年的国民党军队才被接出。真是蒋的“忠贞部队”啊!不知有多少在沙漠里成了干尸?不晓得他们在台湾“忠烈祠”中有牌位否?是值得发给黄金饷的。

7 月 21 日先父日记:

……赴国防部参加人教经费会议,由阎院长主席,自八月份起经费限定 2 800 万,现要研究如何裁减负额,至下午三时许始散,我报告



几点:1. 7月份已到月底,希望仍照上月350万人发……

国民党军队人数到7月底仍有300万以上,中共的情报是150万左右,空缺知多少?

7月22日先父日记:

……四时访谒徐部长,谈台湾情形,如拨款方法之错误不解除,将陷军费于绝境,伊认严家淦(图13.11)日内即来,可否俟严到后,再行报告阎院长,至台湾经费,囑商徐副总裁(柏园),伊即挂电话至台北囑王代表速办。

此日蒋介石访厦门,次日召见朱绍良(1949年1月任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图13.11)、汤恩伯等军政人员,指示防务并实地了解厦门藏金。先父那天在广州。



图13.11 朱绍良(中)与陈诚(右)于西安事变后

7月22日蒋介石日记:

……昨晨……即由黄埔(乘华联轮)起碇正九时也……本日七时起床……十一时船抵厦门展望鼓浪屿风光……七时后余再登鼓浪屿寄住王玉栋家中。

23日下午后登“华联”船。

24日:

抵基隆口外,即登车与薛修直赴草山行馆。

蒋对厦门鼓浪屿情有独钟,曾于1919和1920年居住在鼓岛上,此时也去日光岩下的中国银行地下金库实地视察黄金(第10章)。

23日先父日记:

……得俞局长(济时)电,兰州贵阳均可运,重庆则先运五万两,因决下星期二开始运,此后只剩重庆问题,恐仍需陆续运。(参见徐

堪6月27日报告,希望“拨足六十万两”,第12章。)

25日先父日记:

……下午三时偕董副司长(德成),应约访严厅长(家淦)于台湾银行,谈台湾军费事,有三个问题:一为军费划拨问题;二为差额问题;三为算账问题;伊似多不感兴趣。

严家淦显然比先父会做官,知道提的这三点都是细节,是中央与地方的枝节问题,而紧要重点是在蒋与陈诚的关系以及大陆的军事。1975年蒋介石去世,严低调地担任“过渡”领导人,让蒋经国顺利登上大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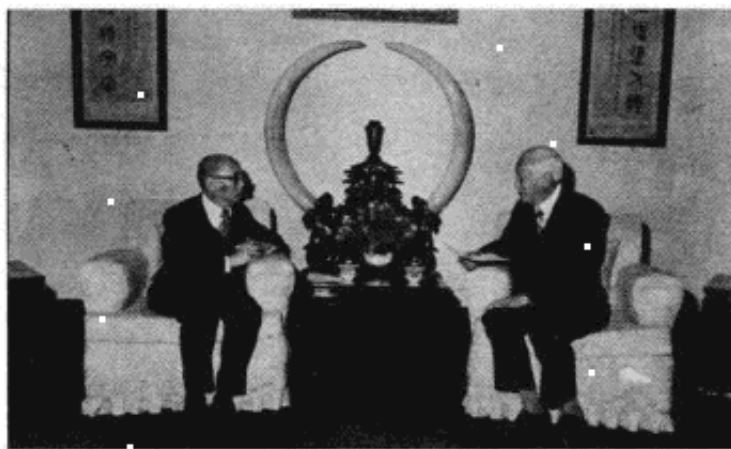


图 13.12 先父(右)与其前同僚严家淦(约1972年)

26日先父日记:

……得厦门电知今日未起飞,空军飞机之沿途延搁,常如此。为总司令拟签呈阎院长(锡山),报告关于台湾经费之困难三点:

1. 军费之拨发——财(政)部与台省纠纷;
2. 军费之差额——国防部与台省纠纷;
3. 军费之汇率——国防部与央行纠纷。

八时半亲送交贾秘书长。

这三点都是枝节问题,先父明知如此,还是要想解决,国民党失败的部分原因就在于有太多政客眼睛盯着上头,面面俱到地听指示,做“乡愿式”的



官僚,不干实事。

27至30日,李宗任来访台北。27日蒋介石日记:

……与经儿来松山机场迎德邻由榕来台……

30日:

……德邻来见约一小时,甚融洽……

李没提到“动用台湾所存的金钞”,也未触及“要蒋先生在军政大权上放手”(《李宗仁回忆录》,南粤出版社1986年版),故融洽也。

7月27日蒋介石日记:

查究下列各案:1. 最近拨发黄金案(按:财务署厦金支出军费密账,不见于央行付出记录,图13.7);2. 运输经费与输运费案(按:东南海航经费,图13.7);3. 资遣费案(按:运广州及重庆黄金,部分作军政人员资遣费用,图13.7及第15章);4. 台湾给予差额比较(按:即陈诚要求比照大陆的金银饷——“士兵不能吃亏”(6月15日先父日记,第12章)……

7月28日先父日记:

徐部长来电话嘱往谈,因昨日应提150万,仅提42万,而十三行即得消息,认央行已无银元,故银圆券抑价,央行人认为是我们泄漏消息,余答我们只有三个人来接洽,即程(邦藻)、董(德成)、司徒(光)三人。当然当嘱以后谈话要小心,但有可能也是央行中人无意泄漏,此双方面也。(参见徐堪6月27日报告,宣称银圆券是以银元为十足准备,可随时兑现的。)

此处也见先父与徐的关系有些紧张。徐是典型官僚,是位川人,跟重庆发电厂还有官商利益输送,6月里向财务署借1000万银元,是270吨,连运送都不愿意负丝毫责任,要贷款的债主把银子送到家,先父还要动员海空军及租借民船,由厦门、台北分头把这些“贵重物品”运广州、重庆,这些都跟军事无关,在兵荒马乱之际,出了事,运丢了,都与徐部长无关。



30日先父日记：

晨起头晕，勉强赴公。晨徐部长电话，嘱往一谈，其缘由为请在台换十万两小条，次为军费配拨稍微拉长，余均允之。对于前者须向上（委员长）报告，余亦提出海南岛运费案，请专案拨款，台湾以后请拨台币等等，归后向悔公报告认可，下午分电。株州失后，前二天银（圆券）价狂跌，失败局面做事不易有如此……

军事失败，银圆券更没人要了。



第14章 1949年8至10月之国民党军队军费日志(三)

宁夏、关中、浙台闽的军费

8月3日先父日记(图14.1):

晨得俞局长(济时)电话,认兰州黄金可否运回一万五千两,余认须商徐部长,伊认为商徐,则可多运回若干。余走访徐于其寓,伊说困难,允至三时再商。三时依时往,则以大块(黄金)不发生作用,运输改铸为理由,决派机往运回五万两,同时酌运银元往,使此事处理,不生痕迹。下午与毛署长(瀛初)通话未返,因急电请派机,并电俞局长请示。程潜叛,湘局危矣。

兰州央行也有黄金,与军费是两回事(见先父8月9日日记),但这5万两黄金没记入央行付出账上,是军费密账里的一部分,大溪档案也记在厦门军费密账的“厦行拨交吴嵩庆黄金”中,与此处先父的记录相呼应。此日先父得令要把在兰的黄金运出来,但又怕马家军阻挠或影响守军士气,想不着痕迹,运送少数银元去换回财务署才运去的5万两黄金军费。(按:解放军的第一野战军在7月14日攻占宝鸡后,就开始向兰州包围,8月25日兰州城破。)

8月3日蒋介石日记(在赴南朝鲜途中):

……决定下午一时起飞,在定海落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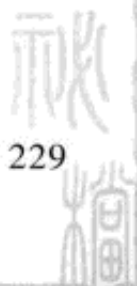




图 14.1 先父 1949 年 8 月 3 至 4 日日记

4 日：

……昨夜八时半登普渡山……

此日蒋日记中上星期反省录：

……对美国国务院发表白皮书，只觉可笑耳……十一时由定海起飞下午二时三刻即到韩……



图 14.2 1949 年 8 月 4 日蒋介石(左)经定海赴南朝鲜与李承晚总统(右)举行镇海会议，旅费也是财务署军费外汇里拨的

8 月 9 日：

……三时后返台北机场……

此行似有意将国际共产党的注意力，转移到战略上已形突出的朝鲜半岛，使台湾有喘息的机会，国库运台湾的黄金外汇也稳定了当时台湾的社会金融，没有发生像 1949 年初在上海那样黄金挤兑、通货狂贬的大风暴。

8 月 4 日先父日记：

上午与毛署长(溇初)通话，知(飞)机下午可到，因囑准备一切。同时



与老先生(通电话),知己赴韩(图14.2)(按:即与李承晚总统的镇海会议,或引起金日成之疑虑而间接促成朝鲜突袭南朝鲜,让李以后十分后悔不应邀请蒋介石来访,但此也许是他幕后主使刺杀金九的后果,晤蒋就已达达到安抚中国培养的金派复国志士的目的。人世间要做伤天害理又没后果的事,很难),复电已不可得,即照商定计划执行。晚(郭)总司令来电话,知陈明仁(按:在湖南长沙)已不稳,(郭)询已汇款若干,告知其数,并再电衡阳询问。

5日先父日记:

……上午为兰州空运事,电话与央行等联系,十时亲赴机场,始办竣,盖原定派三机,仅得一机,即嘱赴兰,其余二架,下午装银元赴定海。下午至央行会议,讨论八月份军费汇拨日期。晚招待央行同仁,决明赴港。

先父次日是第一次去香港,是陪先母去度假,也有些公务,因为财务署有存款在港(见第18章的董德成小传)。笔者跟随母亲于8月1日由台北经厦门到广州,至9月15日才回台湾,那次先父母去港,笔者被留在广州,但那几日,单独同一勤务兵住空屋的记忆犹新,当时是9岁。

6日先父日记:

……在穗机场遇奚处长,询兰(州)事,知宁夏马(步芳)言不可靠,此事实甚复杂。

8日先父日记:

……(由香港)回署,始知昨天草山来电话,催设法运回兰金,此固还会运往,运前运后,均有报告,今忽有此变,何也?非出尔反尔,盖政治为捉迷藏耳。

替老先生做事很难,如前述,他常常改变主意,但此时是由于新的情报。

9日先父日记:

晨访徐部长,对兰金不能运回,拟明日再派奚处长往,带顾(祝

同)、郭及央行函往,未悉能运会否?郭总司令认兰金与军费系两件事,不能因金事,牵及军费是也,因决军费继续运济……

黄金是央行的,不是军费黄金,但是想安西北的军政长官马步芳之心,望他好好抵挡一下解放军,故运回黄金变得很复杂,但同时回教马家军的补给还得继续由厦门送去,因兰州外围正在激战中。读者设身处地,也会觉得为难的。

厦金运台及蒋介石认陈诚“言行病态”

8月10日先父日记:

今与财部央行开会商八月份军费拨款程序,经再三商恳,大体退后五天,如能按时拨到,尚可勉渡,恐又有变化。余深怀疑,现央行办事人员盖有林(崇塘)严(家淦)等在沪时之暗影也。

先父似指林严的官僚作风,严在台湾的官场雅号是“严推事”(有不愿任事负责之意,“推事”系清代官职名称,大理院及各级审判厅都设推事,担任审理案件之职;国民党政府时期为最高法院设推事)。

此日蒋介石刚访南朝鲜回台湾,财政仍旧是他重点:

晚课后与(俞)鸿钧聚餐……

11日先父日记:

又接俞局长电话,问兰款告以处理办法,惟闻马子香(步芳)今日来穗,未知果(确)否?至晚始知已到渝,则运金仍难办到。

12日先父日记:

马子香到穗,余下午往访,遇青海省党部主委马君,言辞中对军费困难及央行基金不足,深以为震,此亦实情也,此次总望有解决办法。(陈)舜畊(蒋总裁办公室)来索款,为电台北王处长(逸芬)照拔。

13日蒋介石日记:



……十时约见(顾)墨三告以辞修言行病态令人忧愤,余受内外侮辱(见第11章)……

16日先父日记:

遵令开始运输厦门存金。

此日福州被解放军攻破,厦门存的金银当然要开始转移台湾,金存厦门而不直接运台,部分原因也许是蒋对陈的忠诚度有怀疑,蒋命先父把厦门存金运台,也有向陈诚示恩让步之意。当然,从大局而言,也不能不运台湾了。在“厦门拨交吴嵩庆黄金”表里,8月17日最后一笔22.5万余两黄金应该是剩余的“厦金”,运去台北,从此厦门鼓浪屿上中国银行的地下金库就走进了历史,1978年前后被拆除。岛上的人似完全不知它过去“辉煌的黄金”角色,今日原地上建有“钱币纪念馆”,但没有丝毫的黄金陈列来说明其闪耀的“地下”历史。如旧中国银行建筑能保留至今,当可发展为一观光点,其实鼓岛上的绝大多数建筑都能保存至今,不知为何单单拆掉这一颇有历史意义的楼房及它的地下金库?

17日蒋介石日记:

……今日甚感辞修之病态可痛(已见前述)……

19日蒋介石日记:

……辞修最后致词……表示以往过错与悔悟之诚意,闻之大慰……

显然顾祝同已警告了陈诚。这蒋陈互动也就是严家淦关注的重点,此不也是古往今来官僚、政客、党棍的视野聚焦所在?

20日先父日记(在广州):

与徐部长李局长商拨款事。请(新疆)左曙萍兄午餐,晚借(左)兄至粤卫戍司令部李副参谋长寓餐,李总司令(品仙)亦来,谈话中深感粤局有危,卫戍部决难发生作用。

20日蒋介石日记:

……晚课后约徐堪谈话，彼以中国银行不肯接受其财部命令为恨……

据大溪档案记载(表 1.1),8 月里分两次从美国运回台湾的黄金各为 99 530 余两,第一次美国库存黄金运台是 22 日,第二次是在 30 日。此两批应为 2 月 8 日刘攻芸在上海告诉周宏涛存美国 38 万两里的半数左右。这也就是中共所称:“国民党当局为了支撑内战形成的金融危局,分两次从美国撤运库存黄金到台湾”。此近 20 万两黄金中的 10 万余两(约半数)在 8 月底 9 月初运广州央行作行政费,另外 9 万余两作军费(见表 16.1)。从 8 月底起,中央银行也开始记录部分军费黄金的付出数量。

8 月 24 日先父日记:

闻本署处理黄金,为人所不谅,因令审核司查账。委员长到穗即离。

蒋介石是去了重庆,不久留广州是因为对自己的安全有顾虑。

据马宣伟《蒋介石从成都逃往台湾》(2004 年)一文:

……8 月 24 日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在广州部署完“广州保卫战”之后,于上午 9 时乘专机抵达重庆白市驿机场。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副长官兼重庆市长杨森等到机场迎接,并送蒋介石到林园的荷屋住下。蒋介石这次来川,认为四川地广人多物产丰富,为西南的大省;而西南各省又是抗日战争时期之最后基地,没有西南,抗战很难取得胜利。蒋介石这次来到一别 4 年多的重庆,妄图抓住西南各省与人民解放军顽抗,以挽回败局。蒋介石与张群商定:29 日上午十时召开西南军政人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西南军政副长官邓锡侯、杨森、钱大钧、王缙绪、唐式遵、贺国光及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贵州省主席谷正伦、川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孙震、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还有兵团司令宋希濂、罗广文等,只有云南省主席卢汉未到会。在会上,蒋介石先对各方面的形势作了检讨,然后提出,要拒中共部队于川境之外,以陇南与陕南为决战地带,而不在四川境内与中共部队周旋的方针。



先父8月25日记联勤总部撤销,财务署改组为预算财务署,与国防部预算局合并。

国防部检讨联勤结束会议,上下午举行,总长宣布:(1)陈初公(良)任补给次长;(2)赵君粟(家驥,后死于823金门炮战)任四厅长;(3)余任预算财务署长;(4)张之久任经理署长;(5)韩德勤委员代次长职务。在此时期,不能辞,亦不应辞,但艰苦当前,宜如何细心筹划耶?

26日先父日记:

……闻兰州失陷讯。

马步芳逃到重庆,蒋白白丢掉了5万两黄金,相当于300万块银元。这大笔金子大概是有一部分进了马的口袋,后来马到台湾不久,就溜到中东去闹桃色新闻,搞得当地华侨怨声载道,丢人现眼(回教徒是可以娶四位夫人的,但他用的是人民的血汗钱去胡作非为)。

先父人不是很机灵。蒋8日“来电话,催设法运回兰金”一定是有原因的,一定是知道马家军有问题,兰州吃紧了。他还以为是政治游戏。当然是老先生的总裁办公室有电台,收集各地军政情报,而父亲不知道,只能跟着蒋介石转。

一次“违旨”运黄金到广州

8月30日先父日记(在广州)(图14.3):

……徐部长(堪)数次电话,催运台金,余因一面电渝报告,一面商先运七万两,以五万两留穗,二万两转蓉。

当时蒋介石人在重庆,此7万两在中央银行账上留有记录(图13.7),是从8月里由美国运回的黄金支出的,先父能作决定,而且是运到广州的财务署,表明是军费,财政部还需要向先父“借二万两济急”(8月31日日记)。

31日先父日记(图14.3):



图 14.3 先父 8 月 30 至 31 日在广州的日记

……上午陈次长(良)、何司令约十时至国防部讨论东南区,余因至央行交涉拨款事,如无解决办法,即将黄金扣作军粮,徐部长昨谈(之)原则也。副赴会,除已知各节外,无所决定,并于下午六时由各业务署将东南区业务费分配数送署汇编后,呈陈次长。下午台湾运来黄金到,余即囑入库。晚参加高级班同学会叙餐后,赴徐部长处,会谈财政危机,徐尚言今后每月以 30 万两金及 1 000 万银元作支出,作三个月计划,余允明日由央行来(财务署)借二万两济急……

可预料的,因此次黄金由台运穗是越过蒋的,是一次故意“违旨”运黄金到广州(见下),“二万两济急”肯定是广州国民党政府的行政费吃紧,银圆券巨贬没人要,需要现洋黄金。

9 月 1 日先父日记(在广州)(图 14.4):

今日起,联勤总部取消,财署改组为预算财务署,仍由我继任。在联勤工作一年零八个月,在第一阶段有(美国)顾问在,余虽合作无间,但未善用之,中国病在不能切实做,如当时能释三五个军做实验,切实做到,已为一贡献,结果只在纸面作业,仍犯过去旧病。后一段在波迁与币值疾变之时,更觉无法处理,回首前尘,只有痛悔,只有余愧。

“犯过去旧病”就是没把吃空缺的弊病扫除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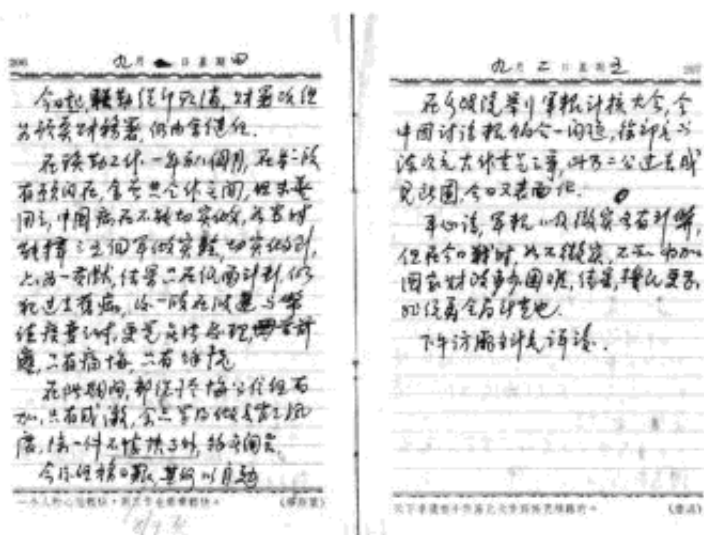


图 14.4 先父 1949 年 9 月 1 至 2 日的日记

2 日先父日记:

在行政院举行军粮计核大会,会中因讨论粮餉合一问题,徐部长(堪)与陈次长(良)大作意气之争,此乃两公过去成见所囿,今日又表明化。

外面强敌压境,“朝内大臣”还作意气之争,全不以大局为念,可叹。

3 日先父日记:

上午九时至财政部讨论军粮大会交议各案,广州周司令争华南区粮费二小时,决定华南按四八万人,每月 13 万大包,本年四个月,除征粮 15 万担(每担约 60 公斤或 120 市斤)外,余价购,按(每担)16(银)元计,需 594 万,一二期各 198 万于本月十日及月底拨付,如此则本月粮款将为 900 万左右。……下午讨论军费配拨问题,只议八月份如何善后,九月份谈不到,财政濒于绝境,奈何。……得委座(委员长)电大不满此次黄金处理,余因要求徐部长谅解,拨还款若干。

此处值得注意的是:光算广州的军粮款 9 月份就需 10 万两黄金,军队不止要吃饭,其他薪饷等还要 20 万两一个月。

4 日星期天先父日记:

……上午赴礼拜(堂)前至署得电,申斥擅自动支黄金之事,并嘱赴

渝一叙,此意中事(按:可知他是有意“违旨”)。礼拜后准备材料,并约徐柏园先生至其寓午餐,探询央行实情,并告明日赴渝,是否有带报告去。

徐柏园(1902—1980,当时在台湾办完发行新台币之任务后,赴广州担任中央银行副总裁)。先父去探“实情”,就是想知道央行还存多少金银、美钞,可见中央银行还是有些保留,不愿意“外人”知道实情,这是中国官场的陋习,只知一小撮人的利益,不顾大局。先父是进不了他们的圈子的,他太直率,没机心。更“致命”的是,他只知为“公”,缺少一个脑袋想想自己的利益。

这里也说明财政部、央行与财务署的关系很微妙。显然,如果“陪都”广州(11月是重庆)央行有库存金银,财务署就会向财政部(央行)要军费,央行内部就不愿财务署知道实际库藏数,因为央行也知道财务署在台湾、厦门另藏有黄金,所以财政部和央行与财务署(先父)之间争执不休,有时状就告到蒋介石那儿。此处先父想尽量与央行(徐柏园)沟通,以免误会,耽误国事,但最后还是发生了争执(见9月12日先父日记)。

先父是9月5日飞抵重庆的,适在重庆大火之后(按:9月2日,朝天门市中心两次遭人纵火,烧了十多小时,灾民数万人,死者达千余),所见满目疮痍,但直等到8日才见到老先生,因为云南卢汉(1895—1974,时任云南省主席,不久起义,图14.5)是6日到重庆晋见蒋介石的,来稳住蒋并提军费要求。



图 14.5 云南主席卢汉(右)9月6日来重庆晋见蒋介石(中),张群陪同(左)



9月6日蒋介石日记：

……卢汉……要求新编六个军与二千万现款……仍以为余有权将存台金银任意支配也……

9月8日先父日记：

……上午又打电话至林园，俞局长认仍恐无暇接见，经国先生接话，则请午时吃饭（按：此地就可看到蒋经国的细心处，他知道老先生还在生先父“违旨”擅自运金的气，就来安慰一下，先请一起吃顿饭。而俞济时只会“打官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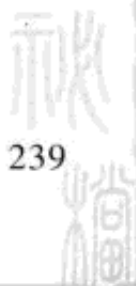
……因驱车至林园，进至门前，适委座送客出，见余，即邀往谈话，余报告擅运黄金七万两经过，并及军费支付情形及央行实力评估，当面报告，着重于老本已经吃完，应求自力更生之道，报告约一刻钟辞。

蒋也是有肚量的，以后还是没减少对先父的信任，只是晋升高层就免谈了。此次报告又有余波，因徐柏园认为对央行“实力”估计过高，其中关键似在老先生不希望把台北军费黄金拿来支持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及央行，所以认为央行还有“余力”，而央行也不愿露“实力的底”。那天中午蒋经国“宴请空军将领，饮酒为乐，归已四时许”。在小蒋先生的安慰下，又过了“违旨擅运黄金”蒋总裁这一关，先父心头重担也可放下来次畅饮了，11日就飞回广州。

9月12日先父日记（在广州）：

晨八时半至沙面徐（堪）宅，财部正因阎院长带来总裁对于央行实力估计，尚有余力，正作答辩，问余如何误会，余言余亦曾报告，或参考各种资料而成，但央行究竟实力如何，可支持多久，似应坦白报告，伊以为然，囑同往央行商之。

先父已再得罪央行，还不自知？前次央行把厦金算错9万两，他报告了蒋总裁，现在又向蒋报告广州央行“隐藏实力”（账面上比库藏少），此处显然连财政部长都未得知“央行究竟实力如何，可支持多久”。国民党政府大厦将倾，内部还是各自为政、各怀鬼胎，尤其是央行里孔宋留下的这批



同伙。结果徐堪自己于13日飞渝去跟老先生报告。

9月17日先父日记：

……至总裁交议，系军费问题，现每月只能出1300万（银元，近20万两黄金），其余1500万须交地方筹。

9月19日蒋介石日记：

……平潭岛已为占领，驻军不知去向……（陈）辞修器小不顾大局，恐误大事奈何。

9月20日先父日记：

决定总员额为250万人，至如何裁减，下午小组研究……午夜与俞局长（济时）通话，承告：（1）迪化机明晨去二架；（2）酒泉机去一架，请（将）陈处长带回；（3）余暂缓。是则西北局势大变矣。

新疆迪化（即乌鲁木齐，见第13章中7月20日先父日记）运金去两架机，应是近10万两黄金，而酒泉机一架是2万到5万两。这10余万两黄金，也没在央行账上（图13.7）。表示在8月厦门黄金运台湾之后，到9月，财务署还保有自己金库的黄金（图5.9）与军费密账。

9月21日先父日记：

上午续检讨……余发言：（1）现在每月按核实人数发饷——并非按编制人数发；（2）以后每月只有1300万，对各省采协饷办法，则如各省不能筹足的款项，将如何处理？……顾总长禁余发言……

顾祝同也是五日京兆，怕先父实话讲多了，影响广州士气与局面。

9月21日蒋介石日记：

……尤其存台现金亦移交财政委员会保管以免再受指责。

9月22日先父日记：

……晚访俞局长，知西北局势大变，送款事已告一段落。

新疆省陶峙岳部于9月26日宣布起义。



俞鸿钧弃职赴港与财政部长下台

9月24日蒋介石日记：

……回梅花村接见徐堪报告财政……

上月反省：

(六)西北自兰州于上月底失陷以后马步芳父子相约弃职逃遁……

又有上星期反省录：

……三、鸿钧不愿就任中行总裁，不辞而离穗赴港不胜为之嗟异，顿感悲感矣！

是否是先父把多出9万两的事，以及徐柏园不愿透露广州央行“实力”的事，都已由蒋转告了俞，让俞不自安而跑到香港去了？

10月1日蒋介石日记：

……乃令经儿赴港挽之同来……

3日日记：

……正午鸿钧与经儿由港回来私心为之大慰……

等俞鸿钧跑去香港，蒋才知道这些财经界高层是不能得罪的，这些在上海待久的人，早已营了狡兔三窟，不会效死效忠，只好让蒋经国去“恭请”来共患难，而“私心为之大慰”。到台湾稳定下来以后，蒋或让俞知道了点厉害，就是从不给作寿，后来又让监察院调查他，这样俞才知道蒋记得他的功，也记得他的过，他的早逝（63岁）不知是否与此心理压力有关？也就像先父这次“违旨”运金一样，终其一生升不了级职，功过蒋心里都有数，但做法上相当温厚。

回头看先父在广州的日记。9月24日先父日记：

上午至财部，徐部长告已见委座，对东南区已准先拨五万两，再派员去算账，另拨五万两铸币，余允即上报告请示……晚邀刘以弼、

董松坡(即董德成)、詹特芳三君至寓便餐,交换东南区意见。

但到27日:

……上午八时半许得经国先生电话,嘱即去见,至农林上路后,委座嘱将西北款均交胡宗南,并在台存金内扣拨作特支费,即电渝照办。下午至央行交涉,徐部长似甚不高兴。

这位徐部长在8月底已获我父帮忙拿去“渝穗款”5万两,犯了下野蒋总裁的大忌,让家父从广州远涉重庆去挨了蒋介石的骂,此时徐又在动这其他军费黄金的脑筋。

到28日先父在广州记下:

……上午十一时得徐部长电话(按:开骂了):“五万两金为何不运来,你不信我的话么?你只知道向我要钱(按:钱主要是指财政部发行的银圆券纸钞),你已耽误我五天,国家那得不亡?”……这从何说起,五万两的拨发,我当然不能凭口说,非请示得令不可,伊亦明知非如此不可,则骂我者,非骂我也。对政客翻脸,尚属初次经验,为再做报告催询,并二次电俞(济时)催询。

后知蒋对刘的黄金尚未批下。这里也显见,财务署到1949年9月底还有台北“密藏”的军费黄金,连财政部长都想要来支取。先父在9月初被蒋总裁“邀”到重庆去当面解释为何越过蒋就支出黄金,现在如何能重蹈覆辙?不要命,就只听财政部长的,这位徐先生也是太天真了点。

此处先父受了责骂,也看穿了徐部长的“政客”真面目了:只知自己的利益,不顾父亲的困难,也不顾整个全局。徐堪难道真的不知道他自己只是蒋手中的棋卒?没有准备金的银圆券,只是蒋要徐演出的一场戏,来拖延在大陆的残局,争取时间巩固台澎。

到9月下旬显然财政又到山穷水尽时,徐部长又想要先父再去台北拿黄金,但蒋介石此时已难对李宗仁的广州政府再予支持。照《李宗仁回忆录》的说法,是蒋介石故意要整垮李白的,但如真是这样,为什么还是让先父先后两次各运5万两黄金到穗,虽然是有些勉强,但蒋还是完全可以制止的。



当然,李白的部队也太脆弱,经不起解放军的攻势,到了9月蒋介石心知,广东、广西都已是中共的囊中物,再补运黄金,也是白白送给解放军的。照李宗仁的回忆,9月底,解放军已在攀越大庾岭中,蒋把嫡系胡璉的12兵团、刘安琪的21兵团从此天险撤走,让广东的门户大开。的确,蒋也不愿见桂系的李白在两广站稳脚,他或许要用解放军的力量把效忠桂系的部队全部歼灭于此,让解放军也受些损失。蒋在日记中,对解放军消灭他嫡系百万以上的部队,在下意识里都有“让中共来移除这些腐败无能的军事干部”的“幸灾乐祸”感(1948年11月24日蒋介石日记),对杂牌军则是“有意识”的了。他此时一心要“舍弃现有基业,作根本改造”,只想在西南保存实力以图东山再起,此时他还有原在陕西的胡宗南部队,想以抗战的模式,保持四川、云南、西康等地的大西南,作为“复国”基地,黄金银元当然仅只用来支撑这些忠心于蒋的嫡系部队。他的大计是,如果“大西南”不保,就在台湾“另起炉灶”,桂系杂牌军的消灭让他少了些内部掣肘,台湾未来相对也比较简单些。这是徐堪与先父想都不敢想的一项布局。先父不是政海里的人,不懂,可以理解;徐部长后知后觉,到1949年9月底还想要台北财务署的黄金来支撑粤局,就让人感觉意外。

9月30日先父日记:

……晨赴农林上路,与俞局长算账,并探徐部长请示案,适遇徐见(蒋)后出来,神色恍惚,想结果未佳。

次日,徐堪辞财政部长职,由关吉玉接(徐也辞“央行”职,由俞鸿钧继)。父亲答应关部长由台运来8000两黄金做前财政部长“结束对经费兑付之用”,后来这笔黄金到10月6日才运到“财务署”,此时政府已准备迁重庆了,解放军是10月13日进广州的。此处也显见,蒋是实际控制广州政局的。

厦门弃守与金门之战

此时值得注意的是作军费的厦门黄金已大部转移到台北,因为8月中福州、晋江被解放军攻陷,9月里解放军攻占了金门马祖之间的平潭岛。



这里让我们来看看国共内战在其他战场上的情势。1949年7月,中共在江西发动攻势,月中陷赣州,9月初进入粤东,10月初国民党政府被迫准备迁重庆。解放军10月攻厦门。10月中国国民党军队主动放弃厦门,10月16日撤出鼓浪屿岛。月底有金门古宁头之登陆战,国民党军队大败解放军[按:是叶飞部,仅不到四个团约9000余人,而守军加上战火初起后才加入的第19军胡璉(图14.6)部,则有3万人以上]。古宁头之战中共并未使足全力,毛泽东留着国民党政府在金门或是想用它拉住台湾,除非有一天他有足够的军事力量能快速占领台湾,否则金马澎湖就像“胎(台)”儿的一根脐带,吮吸着母体——大陆,台湾与大陆就永远分不开了。在西南内陆,贵阳和桂林先后在11月解放。11月底,重庆也解放了,国民党政府北迁蓉城,成都是在这一年的圣诞节的次日解放的,国民党政府迁台北,国共内战到此已近尾声,虽然西康到次年3月还有战斗。国共大战,以中共完全解放大陆终结。10月中国国民党放弃厦门时,鼓浪屿岛上的金银当然早已移到台湾了(从8月16日启运)。



图14.6 (右起)先父吴嵩庆(着军装)、刘玉章军长(参加过抗战时的台儿庄战役)、近代“草圣”书法家于右任及胡璉。胡是国民党军队将领中颇有才气的一位,也有些玩世不恭,这里大家都停下杯筷等摄影,他却旁若无人

稍回头来看看10月5日先父的日记:

……余单独二次访财部,首与汪主任秘书长,嗣与徐部长直接谈,对于运台黄金事有所解释,嗣决定由我负责先去运来八千两,以

作其结束时经费兑付之用。

此处可见,蒋总裁要徐下台,是与“东南区”要台湾的黄金10万两有关。

6日先父日记:

……十时至署,闻黄金下午可到,甚慰(八千两央行案)。

如上述,此8000两也不在央行账上,一定是从台北“财务署”军费“保管款”黄金里支出的(图13.7)。

7日先父日记:

时局日紧,闻曲江已陷,悲观主义充满各地,银元(券)跌价,人心惶惶,国防部又忙疏散矣。昨运到之黄金八千两,央行迄未提出,僧多粥少,有何办法!

8日先父日记(图14.8):

……上午随初公(陈良)访关部长,知亦无办法,本来点金有何术?……下午因黄金账,大骂(詹)特芳,结果伊亦无错,我乃失态之至,曷胜愧悔,伊之忍耐功夫可佩。

但詹特芳最后还是被骂走(或另投明主),一个多月后詹就在重庆弃先父与国民党政府而去。从另一角度看,也许这样也好,否则谁会把国民党政府军费黄金的事公诸于世?如前述,除蒋总裁、蒋经国、俞鸿钧与先父外,詹是另一基层当事人,负责先父与总裁的密码联系。这前四人,包括先父,都不会说,也不会记得细账,而詹之职责就在记账。那么国民党政府为什么会这样让这样一个深知机密的人从容而去,让蒋父子与先父都背上“盗窃国库资金”的骂名?如果没有詹和李放把先父“预支军费金银外汇”的



图14.7 厦门与金门的相关位置

秘密宣扬开来,国共内战史上这一页就是空白,反而会说他刘攻芸、周宏涛记错了(表 1.1)。

詹能从容离去,一方面是因为国民党军队纪律松懈,另一方面或是因为先父太“温情”、太讲“人性”了,连给特务打个电话都不屑于为,其实想也不曾想过,在日记中只是自己反省是否做上司有亏欠,让人不愿继续追随。詹特芳在重庆临走时,先父还给了他 2 两黄金的资遣费及等值以上的美金,从詹的角度看,或就变成“施惠”“来塞他嘴”(所以,后来在新政权下,就说先父是蒋介石的“奴才”)。其实,如真要“封他口”,在那战乱疯狂的时代还怕没有更直截了当的办法吗?只是还有人保持着人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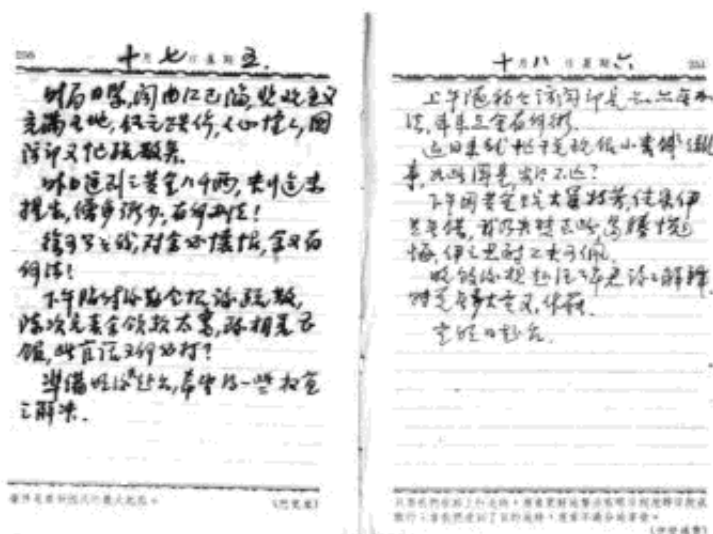


图 14.8 先父 1949 年 10 月 7 至 8 日日记

国民党政府 13 日放弃广州,16 日撤离厦门。先父 1949 年 10 月 9 至 22 日的简记(图 14.9):

10 月 9 日,赴台;10 日,回广(州);11 日,上午见林陈(良),陈宴,(有)关(吉玉)……12 日,上午在台(湾银)行讨论军费,午后见(财政部)关部长,下午再开会。14 日,决定中央机构单位金额……16 日,上午赴草山(蒋介石成立“实践研究院”,第一期开学,见图 17.7)……19 日,赴港,上午见陈林俞(鸿钧);22 日,飞渝……

国民党政府许多高官都把家放在国外或港澳,隔岸观火看台湾,俞鸿钧

1949年10月还住在香港,他家眷究竟何时到的台湾?

国民党政府在10月12日由广州迁重庆,次日国民党军队撤离广州,李“代总统”飞桂林。先父于11月17日飞重庆后,就进入国共内战在四川西南地区的最后一个月,也是他跨过生死关的一个月。

10月7日蒋介石日记:

……十时船到厦门停泊于大学前海面……

10月8日:

……起床已见马公岛……

蒋7日来厦门,来作最后之一瞥,他已准备弃城,据说是因为厦门“居民太密集”,看来似不愿见他喜爱的鹭岛为战火所糜烂。

10月11日:

……阎伯川已由穗来台……正午与伯川谈财政,彼来要求拨存金四十万两作两月支出之用,余即允之……一时……赴定海……

这40万两黄金,即10月15日“央行”运重庆的27.5万两及拨付“东南长官公署”的12.5万两[图13.7付出(A)]。此处又见证了蒋介石有台金的最后支配权。

10月22日蒋介石日记:

……正午与鸿钧谈中央(银行)存金只有150万两矣……

指第一批运台湾存金,原来是260万两,如图13.7所示,10月15日支出40万两,再减去6月21日给台湾银行80万两作新台币准备金。

10月26日蒋介石日记:



图14.9 先父1949年10月9至22日的简记,字迹比较模糊;其间国民党政府13日放弃广州,16日撤离厦门



图 14.10 蒋介石 10 月 7 日在厦门召开“防卫”会议,但九天后就弃守

……金门之敌已肃清……

10 月 25 日先父日记(在重庆):

上午赵(抡元,见第 18 章)倪二君来谈,西安经费(胡宗南部)决折发黄金一部,以抵过去之战(时)临(时)费银元。

26 日先父日记:

……为华南军费及整个军费之核算,次长限明日答复。董司长(德成)及司徒(光)科长今日回。晚得刁(培然)局长电话,请明日同往汉中,余以胡(宗南)主任今日已到渝,程司令等亦在渝,似不必往,婉辞。

28 日先父日记:

上午至央行算账,陈署长照规定计算不肯放松,康心之照央行实力不肯拨款,在两重困难下,又不见谅于陈次长(良),个人进退事小;其望国家整个之改观实不可能,余日望美援,但美援又望梅止渴,是否引起国际纠纷(导致美国干涉),均是问题。算清旧账,计 9 月应补 596 万(银元),10 月应补 204 万,共计 800 万。但如将台湾军费扣算(560 万+100 万),将仅余 140 万,有数(限)钱作无数用,决难支持。



蒋介石一定曾指示,以台湾军费优先。

29日先父日记:

上午勤务会报请陈副署长代出席,余在署清理公文及确算最近三月盈亏账目,余怪(陈)初公催急,而收支司允上午算清之账,至下午尚未完成,日迫一日,亦觉过去不上轨道。……陈次长又催汉中央行运款,以此干涉央行工作,将吃力不讨好。

30日先父日记:

……晚饭后至办公室与董司长算军费账至十一时,亏累如此,无法再干。

这里看出他的“总账房”的工作很困难,婆婆太多(蒋介石、陈良),掣肘的人也不少(财政部、央行的人),金银有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只有叹息。已有做覆巢之下“牺牲”的准备,解放军的二野(邓小平、刘伯承)、四野11月初正沿鄂川、湘川公路由东南面向国民党军队“嫡系”宋希濂部进击,宋部节节向西溃退。

11月4日先父日记:

与央行交涉军费,上午已至摊牌时期,至午后一时半始散,决定先拨9月份约300万(银元)弱,10月份副食费400万(扣去220万)。

其实当时“央行”有刚从台湾运来的不少金银,先父11月29日就替他们押运了60万块银元赴蓉。另据看守重庆“国库”的于德昌(“财务署”少校预算官)2009年在洛杉矶告诉笔者,在先父走后几个小时,他押运了六辆大卡车的金银去成都(见第18章),也近60万两。看“央行”的账,重庆总行在10月中才拿到从台北运来的27万余两黄金[图13.7(A)],那是10月11日蒋介石答应“行政院长”阎锡山的40万两中的一部分。

11月5日先父日记:

上午赴四厂开勤务会议,余报告10月底之经费情形,陈次长又强调10月之一切经费已否清发,对于过去亏空暂不置理,余亦强调奉次长谕,今后经费不挪用业务费,闻余早退席后,陈又言急要之事



不能不垫,如此,则事更难办矣。退席后即赴央行交涉带琼(海南)黄金及汇款,张署长至拍桌大骂,余再三劝解方得下台,今日困难下,实无法做事,国家艰苦,至今至极。

蒋介石在11月下旬记他由台湾飞渝及在重庆的最后时刻。11月13日:

……本日决心从速飞渝督导军务……

14日:

……十时三刻由台北起飞……四时后安着重庆……入林园接见军政要员……

19日:

……昨晚阎(锡山)提滇卢(汉)态度急变为可虑……

21日:

……李(宗仁)出国既不辞职亦不表示退意……

25日:

……乃知杨(森)言完全子虚(骗人谎言),罗(广文)部转进时,川(东)完全放弃……

29日:

……(脯)谒林园告辞……

30日:

……(昨)本已早睡,尚未入寐约十时许经儿来报,园后机枪声大作,乃起床……各厂爆炸声不绝而山洞园前汽车拥塞不通行,予于人声吵杂形成混乱……决至机场,乃于午夜始达……

蒋父子究竟是如何撤离重庆的,见下章。

再回头几天,看先父日记,11月6至15日他在海南岛:



(6日)晨飞海口……7日,上午赴五公祠附近苗圃谒省府薛(岳)主席,言谈中对琼事不管,粤事已成尾声,对发(海南银行钞票)券事,表示不可能,至粮食情况严重,特表关切。决定所带万两金,由陈长官伯公(济棠)带台五千两购粮,晚将手续办妥。11日,由余主任(汉谋)召集华南补给会议。15日飞台北。

这“万两金”,显然是由重庆带出来的。

16日先父日记(在台北):

……晚访问陈主席(诚)二次未晤,嗣打电话来找,报告赴琼经过及明赴渝情形,伊对国防部驻台单位应归并长官部特予强调。

陈诚是希望先父转达给蒋介石。



第15章 1949年11—12月(大陆国共内战最后30天)之国民党军队军费日志(四)

先父在11月下旬见证了国民党政府在渝最终时段的乱象。17日：

晨由台北直飞重庆。原定王叔铭副总司令来渝，余及李文范，马超俊二先生与其余人员同行，旋王不来，余等仍乘建国号直飞，过赣湘黔川上空，感慨万端。三时抵九龙坡，入城问情况。……八时半至关部长(财政部)寓开会讨论经费问题，早归。

“国民党政府”面临解散：资遣离职人员

11月18日先父日记：

……下午五时至国防部参加讨论资遣办法，余早退席赴央行交涉经费，承关(吉玉，财政部长)允费(金)5千两，银元20万，余拨银圆券，央行内员工包围，看其中数人面目，其得意得可憎。午约詹(特芳)来便饭；晚约叶(良光)、邓(元勳)、王来便饭，均谈去留事(按：后叶邓两位都撤退到台湾)。

这部分黄金是“中央银行”在重庆“国库”内的，是10月中旬由台北“央行”运来的27万余两[见图13.7及表16.1，重庆“央行”在11月还剩余不少金银(见第18章的于德昌小传)]。先父去交涉遣散的是行政费，不是军费。解放军已经由东南面围向重庆。

21日先父日记：



……昨夜三时半,(财务)署前发生民众蜂拥过街,一说是兑现,一说是暴动,当然前者成分确,卫兵制止,据云夺枪走火,打死一人,秩序已乱矣。金融误国,甚矣!

兑现就是老百姓想把急速贬值、快要一文不值的银圆券换回银元,卫兵开枪的事件也同样发生在重庆及成都“财政部”的金库前面(见本章后文及第18章)。

“国防部”的资遣办法中的资遣金是以这批5000两黄金支付的,政府的大崩溃在即。24日先父日记:

……资遣费只按黄金块数计算(按:每块约近1两,但略有出入),不按纯金量计算,以资简捷。决定:……每块黄金编号,每人抽签取金,大家同意。……

据董德成于2009年告诉笔者,是每人2两黄金的资遣费用。60年前,他任“预算财务署收支处长”,目击此一抽签现场及经过。当时他在重庆正当壮年,才35岁。

25日先父日记:

……今日发放资遣费,除若干单位外,均于今日发清。……晚湖北随来同仁来谈,余贡献临别的意见,事后尹本义涕泣求相从,余鉴于詹(特芳)君之前车,不觉灰心,婉慰之。

据董德成回忆,临从重庆撤退时,署里200人缩编为15人“战斗内阁型”单位。詹之不肯同行退去成都,确让先父伤心,另一必须考虑的是,此人知道太多机密。

26日先父日记:

……与晏司令(玉琮)通电话,请派机送同仁眷属飞台,伊请借现洋一万元,作交换条件,余答应,请明日来借。

此时调拨空军飞机都要有交换条件了,后来这1万银元算运费,只是一架飞机,送眷属到台湾。解放军在30日就攻入重庆了。晏司令也算是先父在航空委员会时的老同事(刘凤翰,《国民党军事制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后来离开重庆时把十架飞机都自毁于机场,让蒋介石



心痛不已。此人到台湾后即转任副职,在空军的前途就此终止了。

11月28日,解放军已攻占綦江(重庆南面),兵团司令罗广文只身逃脱来到重庆。这时重庆外围已趋危急,蒋介石急召“参谋总长”顾祝同及张群、杨森等商议,认为如果撤退太早,则解放军必能在半个月内到达成都,这样,西南大陆将整个为解放军所控制。故决定缓撤重庆守军,并在沿江设防,以确保成都。哪知解放军很快攻抵重庆市郊南温泉,重庆危在旦夕。

当天午后,蒋介石在蒋经国、俞济时的陪同下乘车巡视了重庆市区,见沿途车辆拥挤,交通阻梗,宪兵、警察已无法维持交通秩序。老百姓更是焦急彷徨,愁容满面,散兵、流氓四处乱窜,趁火打劫。“国民政府行政院”已迁成都办公。

29日午后,蒋介石在重庆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新的作战计划,令第一军最后撤退。前方战况激烈,蒋介石的心腹干将宋希濂率部节节败退。情势危急,重庆除西北面外已被包围,到晚上10点,林园后面枪声大作,蒋经国向蒋介石报告实情,劝他离开这个危险地区。蒋介石见部队已被解放军击溃,又不断传来周围各兵工厂的爆炸声,这才决定离开林园,先到白市驿机场宿营。这时,公路上撤退的汽车拥挤,秩序混乱,蒋介石的座车在途中被阻塞三次,无法通行。蒋介石不得已只好下车步行,然后再改乘吉普车前进。午夜才到达白市驿机场,蒋介石等随即登上“中美”号专机夜宿。

次日晨6时,蒋介石的专机才起飞。专机起飞后,蒋介石得到报告:在江口过江的解放军已逼近重庆白市驿机场的前方20里。这时机场上响起一片爆炸声,是机场的晏玉琮将停在机场上的四架驱逐机和六架高级教练机一并炸毁。蒋介石日记11月31日的记载对晏司令极不满:

(本一日为余结婚第廿三年……昨卅日,六时起飞据报在江口过江之匪已逼近白市驿机场之前方二十五华里处行程……七时到新津换美龄号转飞成都……机场……飞机炸毁……)晏玉琮司令扣管之重要物质甚多,未知确实,惟报亦未来接命令,乃即慌乱撞逃命不负职责……

另据蒋介石座机驾驶员衣复恩(图11.8)回忆:

……当蒋介石、蒋经国、顾祝同、俞济时、陈良、吴嵩庆等一行,赶



到白市驿机场时,已是十一月二十九日午夜时分。蒋介石一言不发登上飞机,进了舱房,即行就寝。……

衣驾驶的回忆是不完全正确的,11月29日午夜先父并没上蒋介石的专机,陈良的确是登了机,此处或许蒋是在等陈与先父,衣复恩在驾驶舱内,只等命令起飞逃离,以为陈良最后上了飞机,先父与陈是同时离开重庆的,也一定一起来了。他错了,先父此时在白市驿机场外不远的公路上,押运着满载银元(及少量黄金)的车队,到清晨3点才到白市驿机场叉道,继续向铜梁方向进发,执意亲自去给沿途前线部队发饷,并送40万块银元去成都“中央银行”(详见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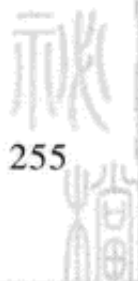
“预算财务署长”亲自押运金银车队

有人或会以为,先父这样得蒋介石重托,掌握了许多金银,在国民党这样一个“腐败”的政权里,一定作威作福,必然在人民把国民党“埋葬”之前,好好享受一番了。怎能想象他非但没退避去享乐,而且还以中将“预算财务署长”之尊,冒着被俘或牺牲的危险,挺身而出,亲自押运金银车队到前线去发饷?他在解放军到的前一天从重庆撤退到成都,以下是他日记中所记的,生前没有发表过。我在纪念他的“五周年”文(台北《传记文学》1996年9月号)中记下:



图15.1 空军C-47型运输机在撤退人员

11月28日重庆外围已趋危急,解放军已攻抵南温泉,父亲尚在危城之中,28日晚宿国防部次长陈良家,深夜12时得电话,“嘱往关部长(吉玉,财政部)处,交涉银元20万元,顺利答应,但嘱代运40万元至蓉,陈(良)答应,因此同仁工作至次晨未睡,余亦于晨5时(29日)始返陈宅”。谁督运这60万银元及财务署存的黄金,先父当仁不让,这60万



银元是 16 公吨,还有财务署自己的一点军费银元,需要约八辆大卡车。

解放军是 11 月 30 日攻进重庆的。29 日早上,先父在重庆因监督清点“央行”银元,一夜未睡。

晨六时三刻,张主任及陈处长人望,应约至嘉陵新村陈宅,余催即打铺盖,带同赴四厂,后初公(陈良)问如何将行李带走,并请晚仍住在彼寓宿,余答带行李不过备应变,晚自当回彼。明日仍当如此办。至四厂知银元六十万,均已运到,因发洋五万,警察一万……至午,知解放军已到江边,陈次长(良)催银元车速行,余亦同行,三时抵山洞,至海总联络(国防部所在地),候后车至晚,在暗中路上发款若干,并需发杨森部等十四万余,余答现车仅十万,陈嘱向前追,忽接报知一辆在附近抛锚,勿派车往援,共可凑足十五万余元,足敷发款,所差无几,嗣接报提前十时赴机场(按:陈良即离队赴机场,见上一段文),余守候杨总司令(森)提款未至,后至清晨一时,始载款启程。在最后两小时中,炮声不绝,令人脸无人色,再三催促动身,余镇定处之,可知最后五分钟之不易也……(图 1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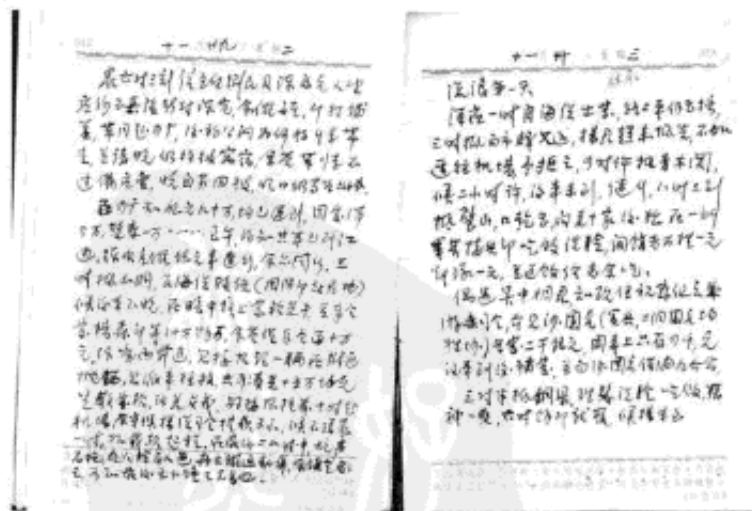


图 15.2 先父 1949 年 11 月 29 至 30 日的日记,记录那两天押运金银车队,在炮声中拒绝坐飞机逃命,坚持在拥挤的重庆去成都公路上去给国民党军队发饷。同行的还有李光烈、叶良光,机要秘书詹特芳已在重庆出发前道别,重庆是 30 日解放的



次日,父亲记下(图15.2):

流浪第一天。深夜一时自海总出发,路上车仍甚挤,三时抵白市驿叉道,杨君(继承)赶来低告,不如径往机场,余拒之(按:如此时赴机场,蒋总裁专机还未起飞,先父是五小时前就接到官邸通知上飞机的,而且已算尽职尽责,坚持到最后一刻了,但他一定要把这金银送到成都,因为答应过陈良。而1949年11月30日蒋总裁在飞机上从午夜一直等到清晨六点,他究竟在等谁或为什么等?应该不会只等天亮吧。几个钟头后,解放军进入重庆),四时许抵青木关,候二小时许,后车未到,继行,八时三刻抵璧山,口干甚,问数十家后,始在六十九军某接兵部吃饭洗脸,开销老百姓一元,部队一元,并送饭给老余(司机)吃。偶遇吴中相君,知(是)现任视察组长兼游击司令,介见沙团长(宪兵),二个团长均姓沙。各发二千银元。因车上只有四千,允后车到补发,并向沙团长借油九加仑。三时半抵铜梁,理发洗脸吃饭,精神一爽,六时余即就寝,候杨(森)未至。

12月1日,先父继续北行(图15.3)。

晨派余司机至路口接车,至下午四时回报。未见来车,期间访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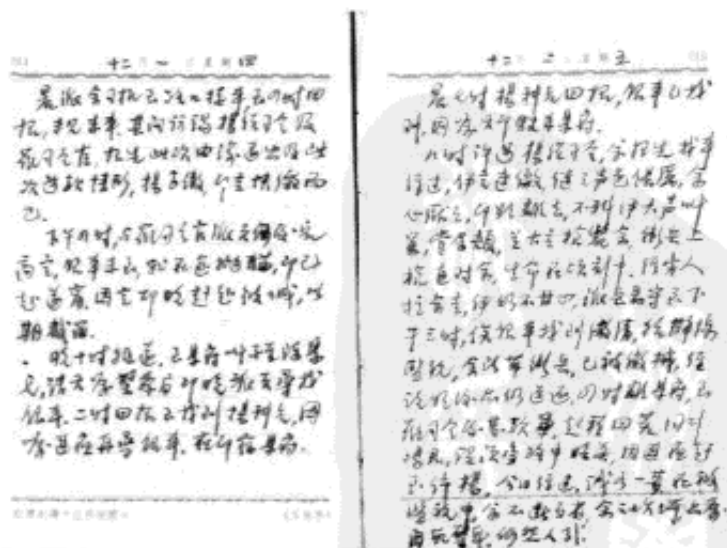


图15.3 先父1949年12月1至2日的日记,记录那两天押运金银车队时遇杨森(原重庆防卫司令),见到四川旧军阀的真面目

总司令(森)及罗司令官(广文),报告此次由渝退出后此次送款情形,杨甚傲,即言快缴(银元)而已。四时与罗司令官所派何处长商定,银车未至,非在途抛锚,即已赴遂宁,因定即晚赶赴彼城,以期截留。晚十时抵遂,至县府见县长,请伊囑警察局即晚派员寻找银车,二时回报找到杨科长,因囑连夜再寻找银车,夜即宿县府。晨七时杨科长回报,银车已找到,因囑伊即驶来县府……

没想到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以法国留学生从事军中财务的先父,就见到了极不讲理的土军阀杨森的真面目。由于以下这段事件,不但他自己引为平生奇耻大辱,很少再提这件事,也影响了杨森的后半辈子。因为蒋老先生知道了这段经过以后,从此再也不用杨森,这位妻妾众多的四川军阀,只能在台湾干干民间活动以终其天年。经过是这样的:

……八时许遇杨总司令,余报告找车经过,伊(彼)又言速缴(银元),继之声色俱厉,余心厌之,即预离去,不料伊大声叫骂,掌余颊,并大言枪毙余,卫兵上枪直对余,生命在顷刻中,经旁人拉余走,伊仍不甘心,派兵看守至下午三时,俟银车找到缴清,始解除监视。余所带卫兵,已被缴械,经说明后,亦能送还枪械。四时离县府,至罗司令处,发款毕,起程赴蓉。同行冯君,认需防路中暗算,因连夜赶至绵阳,今日经过,诚如一梦,在被监视中,余不断反省,余之坎坷,亦属自取辱耳,何怨人哉!

本来他就不需要以中将“署长”之尊,亲自押送银元的,更不必把银元送到杨森处。如果银元先送到成都,要杨森派人来领,就没有这场“自取之辱”了。全部60万银元只相当于不到1万两黄金,只是他经手的巨金的一点零头。早已飞到成都的蒋介石、蒋经国及陈良久久不见父亲归队,都以为他已经被俘。杨之“跋扈卤莽”(是蒋介石日记中用词),除了是军阀本色外,面对强大的解放军,打败仗当然肝火旺,还有可能或是以为先父是代蒋来“查哨”,看他是否还在岗位上,没开溜。先父一心只想到热心尽责,没考虑前方将领的心态。突然惊见“御前”军费大总管来到战事万分吃紧的前线,是仅仅来发饷这么单纯吗?不免会产生其他联想。先父一根“直



肚肠”，在中国官场里“吃瘪”，是不让人觉得意外的。

杨森妻妾众多(有十二金钗之称)，子女有40余位，在中国军阀史上是“臭名”昭著的。到了90岁，他在台湾又娶一房小妾，是芳龄17岁的高中学生，杨真是一个不知羞耻的异类。

12月3日先父由绵阳押着银元车到成都。

下午四时许抵蓉，即往报告陈次长，伊表示多发罗广文部十二月之经费六万银元殊不值得。晚细思如不将在遂宁经过报告于上峰，恐反不妥，拟明日再报告，晚宿收支组。此次流浪四天，最大感想，即前线太苦，后方过奢，如不能纠正，失败定矣，噫！

这条自重庆—璧山—铜梁—遂宁去成都的路是东线，靠近前线，因为解放军是从东南面围攻的，危险性高，如途中任何一点被突破，就有被截击或被俘的可能，先父选择这条东线是为给前线将士发饷，是一番好意的冒险。其他“财务署”同仁，如于德昌(见第18章)押运大批央行金银，则走西线，经内江、简阳到成都，则安全得多。



图15.4 1949年重庆去成都有两条路：东线(E)是经璧山—铜梁—遂宁去成都的路(图右)，靠近前线；西线(W)是经内江、简阳到成都，安全得多。解放军是从东南面向渝蓉进击的

先父督运着大量金银的车队，与麇集的难民、散兵游勇，拥挤于成渝东线道上，“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他这项工作的危险度之高，是不可想象的。在这步步危机里，父亲一心一意，尽忠职守，以其儒家的传统家风，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生死也置之度外。在这风雨如晦的时节，他只是站在自己的职务岗位上，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把自己分内的一项工作做好。

在12月3日下午4时，先父坐着押运银元的车队抵达成都，其中部分银元已发放给不久起义的罗广文与骄横的军阀杨森。据李光烈回忆，临离开重庆时，“财务署”的柜台上有三块重约四五百两一块的金砖，没人要，父亲要他们也搬上车，后来一直存在台北“财务署”的金库里，都是账上没有的。詹特芳也有同样记载，但数量与李光烈所说不同，是七块，2000多两（65公斤左右），说他也帮忙抬了（那是詹与先父相聚的最后一刻）。

因为先父已失踪多日，从11月29日由重庆启程（见图15.2中他29至30日的亲笔记录），没去白市驿机场上飞机，成都的总裁办公室就失去了他的消息，次日重庆就解放了。带着启程的“央行”的40万及“财务署”的20余万军费银元及一些金子，在那战乱的时段，是人人想要的“硬货”，不止解放军想得而甘之，从重庆到成都的乱兵游勇如得知的话，一个七八辆卡车的车队，区区一点护车兵力是绝对不够的。所以，那几天，蒋老先生、经国及他们的随从，都以为“吴军需”一定已经被俘或牺牲了。没想到他有祖上荫蔽，在“失踪”五天之后，又出现在成都，足够让大家惊奇了。

几乎把他送上十字架的陈良次长（是陈29日在重庆答应“央行”把这批银元运到成都的），自己跟着蒋坐“中美”号转“美龄”号专机，早飞来成都了，此时见着先父，还怪他不应该把6万银元发给罗广文司令官（15军团）。唉，看看这些位国民党高官！但先父一生都尊重陈良为长官，晚年在台从来没废了礼数（见图9.12），这就是中华文化的典型士大夫，也是先祖父要求他的，做人要忠厚。

蒋介石怒骂杨森

12月4日清晨：



(先父)再谒陈次长,又谒总长(顾祝同),报告在遂宁情形,余认为二次大战,美司令官因打一士兵被撤职。余以一高级长官而受辱,正式报告徒增上峰处理之困难,只认为个人之纠纷,不愿再作书面报告,国事如麻,军阀依然,真为党国伤心耳……

而蒋介石这些天在成都也是忙着军事部署。12月3日,盛文奉胡宗南令,负责组建成都“防卫总司令部”,准备接替不值得信任也没战斗力的川军,担任成都城防。盛文令第3军17师(师长邓洪仪),负责驻防成都南门外至新津的通道要点;254师(师长陈岗陵)——是由蒋介石的警卫旅改编而成的,全部美式装备——驻成都市区,师部驻西校场,所属各团分驻东、西、南门及北校场附近,派萧树琴营驻城外北凤凰山机场。

5日上午:

(先父在成都找)关部长(吉玉),半日未遇,央行、财部均乱一团,处处如此,可叹。(陈)次长指定派陈副署长(康华)带款金一万两、银五万两飞昆(明)……

在大溪档案里找到先父同日上蒋介石报告(“吴嵩庆呈蒋中正保管之奖恤金黄金支拨情形”,1949年12月5日于成都),共有三页:

谨将奉令保管之奖恤金黄金8万7500两支拨情形,报告如后:

1. 垫兵工经费向台行抵押200万元,折一万9500两。
2. 本日由台运出来蓉临时费1万两。

尚存台北5万8000两。谨呈

总裁蒋

职 吴嵩庆

此“保管之奖恤金黄金”应与数千万块银元一样,是拨给三军的。在第二至三页又呈机密报告一份,报告里的胡主任即“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

谨将奉令保管各款支拨情形,报告如后:

一、存台汉中款五万两案

1. 胡主任特别费100万元、留渝候令40万元,共折金1万



6 470 两。

2. 拨胡主任 1 万 5 000 两。

尚存金 1 万 8 530 两(存台)

二、由厦运台 22 万 5 778 两案

1. 运广州央行三次,共计 10 万 8 000 两。

2. 东南区扣军费 9 200 两。

3. 海军修舰费新台币 380 万余元

(奉令由军费专案拨运)折 1 万 2 874 两。

尚存 1 万 2 904 两(存台)

注:在上款内垫付驻台中央机关经费 9 500 两,俟财部拨款后即可归垫。

三、留渝候令动支肆拾万元案(见一项)

1. 原数 140 万元,折金 1 万 6 470 两,内应拨还军费 100 万元,折金 1 万两。(胡主任特支费 100 万元,已由军费内垫付硬币,此一万两仍拨胡主任作应领之经费)

尚存 6 470 两(存蓉)

四、购美金拾万元,赢余 3 万 6 468 元案。

前奉令购发汤总司令美金 10 万元,原已由军费垫付,拨金归还时,因金价上涨,赢余 3 万 6 468 元。陈组长(舜畊)囑购存美金 1 万 7 622 元,此款已交俞局长。谨呈

总裁蒋

职 吴嵩庆

先父刚渡过一个生死关,还要细细跟蒋总裁算账,一丝不苟:

1. “存台汉中款”是 6 月 12 日军费密账里陕西款的余数,给胡宗南兵团的。“尚存金”的数字是总结以前的报告,这里的支出只是一部分。

2. “厦运台 22 万 5 778 两案”即是大溪档案中“厦门分行代付拨交联勤总部吴署长嵩庆黄金数量”中的第 8 项(见表 16.4)。此处款是厦门密金的剩余。这部分黄金,在中央银行账上是算在美国运回的黄金里的(表



16.1,8月29日至9月15日)。此中似又有隐情,还是先父另拨给广州中央银行的10万余两,其中包括没经蒋总裁先批准的5万两黄金。“尚存金”的数字同上1,也是继续以前的报告。

3. 此140万元,是银元。

4. 打仗时,购买美金还赚了3万多银元,换为美金1.7万余,上缴了。原是账上没有的,也可列入“乱世奇谈”,这算总裁办公室的“额外收入”。

到6日晨,蒋老先生召见先父:

至知询此次在途杨森威迫经过,因详报告,认(杨)为一时冲动,请勿计较。而此次亲送银元,一番心意,因处理不善,反出意外,殊觉惭愧。委座慰勉有加,认为此乃精神表现。……俞局长(济时)嘱明日即行,适运一万两之机至,原机归本署支配,决乘此机回……(图15.5)

此1万两黄金即“由台运出来蓉临时费”,是从“财务署”军费密账中“保管之奖恤金黄金”里支出的,因为在“中央银行”的付出清单(图13.7)里没见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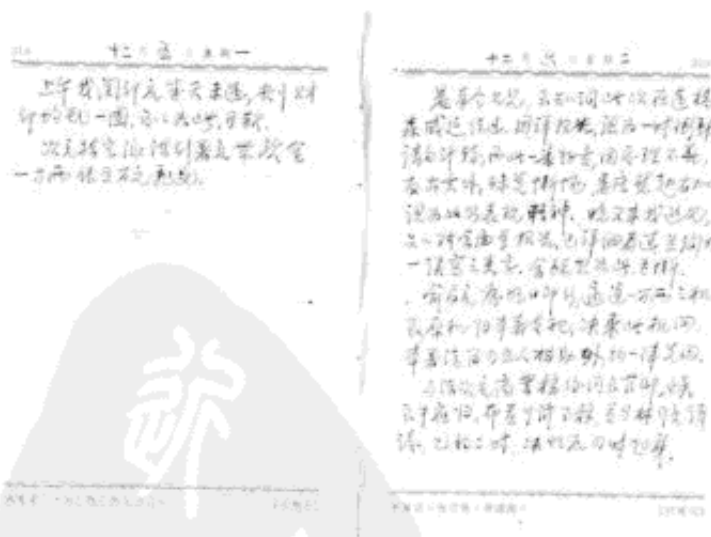


图15.5 先父1949年12月5至6日的日记,记录那两天在成都见蒋介石,并奉命去台湾

蒋介石那天的日记:

……晚为叔铭生日聚餐对杨森跋扈卤莽、手批国防部吴署长之颊,其行动闹之怒,乃出言不慎,悔之……

大概蒋当着先父面对杨森这个土军阀骂了粗话,反而后悔,不过究竟是骂了什么,先父日记没写下来,也算近代史一谜。其实,依照长期追随蒋介石、滞留大陆的汪日章秘书(图 8.5)的说法,根据六年的近距离观察,蒋是极少骂人粗话或“出言不慎”的。有些大众媒体工作者处心积虑地丑化某些政治人物,而且随风转舵、信口开河。希望那时代再也不重返,实事求是地面对历史人物。此外,杨森与蒋介石还是亲家,杨的女儿嫁给了蒋所喜爱的外甥竺培风(第 8 章),在竺遭空难后,蒋还资助这位年轻媳妇去美国留学另嫁,这是蒋开明的一面。毛泽东家也曾有类似情况,毛也极开通。

此外,12月6日,“财务署”还空运了5万两黄金到成都(见图 15.6 及表 16.1),与大溪档案记录相互印证,此笔黄金在“中央银行”的付出清单(图 13.7)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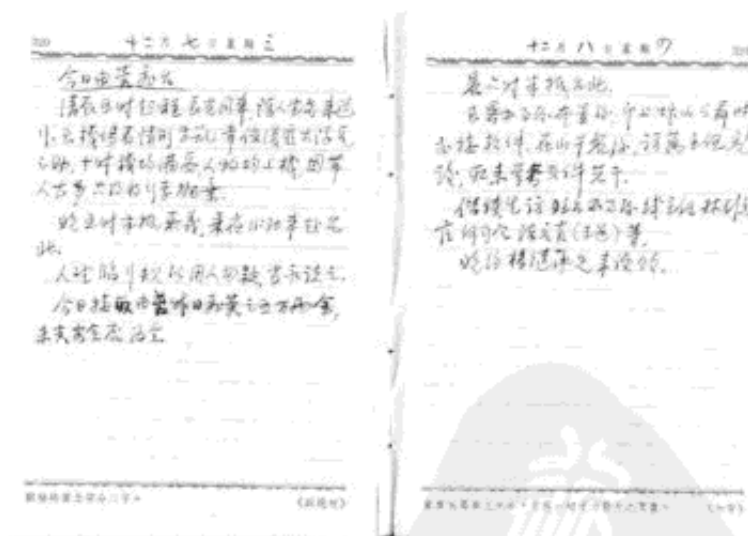


图 15.6 先父 1949 年 12 月 7 至 8 日的日记,记录那两天由成都飞台北,并提到 12 月 6 至 7 日前后共运了 6 万两黄金到蓉城

胡宗南部队最后一次的黄金饷

其中 5 万两黄金由台北补给胡宗南(图 15.7)部,由李光烈押运。此批运到成都,总数据台湾“中央银行”档案为 49 975 两,是 12 月 6 日入账

的[图13.7,表16.1]。差25两到5万两,大概是给五位押运员每人5两作旅费之故,李光烈就拿到5两。



图 15.7 胡宗南与黄埔一期同学贺袁寒



图 15.8 蒋介石(中坐)1949年与王陵基(戴墨镜)

这5万两黄金到了成都,交给“中央银行”分局刁培然局长。但当时行内人手不够,由警卫用“央行”仓库的门闩,两人一箱地抬进去。这些黄金,一部分是1两一条的“小条”(“小黄鱼”)。抬进仓库之后,是刁培然发给押运人员每人5两金子作旅费,“财务署”押运员李光烈把亲眼目睹的当年实况细节告诉了笔者。

据王陵基(字方舟,1886—1967,当时任四川省主席,图15.8)回忆说:

……财政部部长关吉玉和(国防部)次长陈良先后打电话给我,说有几万两黄金要交给我,叫我马上去领。我当时也感到黄金没什么用了,不想去要。他们一再在电话中催我,说非去领不可。我只好带着财政厅长任望南、经理处长罗有邻赶到中央银行。这时只有中央银行发行局局长和成都分行经理等两三个人在焦急地等着我。我一去,他们就催我打领条,说有四万多两黄金正在造币厂改铸(锯开),他们已通知交我领。我便在一张写好的收据上签了名,他们拿着立刻就走。我一问,原来阎锡山和关吉玉、陈良等早已去新津机场,只等拿到我的收条就起飞,好去台湾交账。

另据先父旧属赵抡元(驻成都,第六预算财务处处长,见第18章)的回忆,这4万两黄金(按:数目与“财务署”有1万两的差距)是罗列(胡宗南部的参



图 15.9 右起是先父吴嵩庆、何应钦、罗列、蒋坚忍及万中选(先父秘书),是祝贺何的生日(约 1970 年摄)

谋长,图 15.9)派他去“中央银行”领出来的,就在从台北运到成都的当天,共 40 箱,每箱 1 000 两,但并非全是 1 两重的小金条,而多是 500 两一块的大金砖。急须送造币厂,连夜赶工“切割”成 1 两 1 块,作为胡宗南部队急待的军饷。赵到“中央银行成都分行”是 12 月 7 日,赵是这样描写国民党政府在成都的最后时刻的:

已近黄昏,门前横尸数具,警卫森严。据说某部散兵,持械来抢劫,为宪警所击毙。……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高级岳姓行员……走出银行后门,绕了几个曲折窄巷,最后来到一个小小客栈……只见两位老者……右坐者是当时财政部长关吉玉,左坐是次长王钦……关部长大笔一挥写了照发两字……

关部长如此隐秘,难怪 5 日那天(图 15.5 先父日记)先父找不着他,此外赵的回忆与上面王陵基所说有些出入。

赵抡元继续写:

(当晚)赶到成都军官学校,求见后勤次长陈良将军……请求第四厅供给(部队人数)资料……即请来副厅长宋达(即宋楚瑜的父亲),处长王征萍……会同核定各部队人数……(作发饷依据)……

又据大陆资料,这部分黄金原是国民党军队在大陆西南的军费,每月 5 万两(按:约等于 400 万枚银元,够补给 40 万的部队)。如果仅算国民党军队败退入川的(胡宗南部)11 月、12 月两个月,也该有 10 万两,再加上发给四川的国民党政府各机关单位的行政费用,共计近 20 万两。而这些黄金多数没来得及分配使用(这里有前面军费的渝穗款及蒋介石答应“行政院长”阎锡山于 10 月 15 日由“央行”付运重庆的 27 万余两,图 13.7),



更来不及运回台湾,都到哪里去了呢?(按:照上述赵抡元的回忆,军费部分已发放给国民党军队。)据王陵基等人的数据,这些黄金部分在战乱中化整为零散失,还有成都的“央行”存金大部分在解放后被中共缴获。

12月7日先父奉命离蓉的同时,蒋介石在成都等候刘文辉、邓锡侯来开会,等了一个下午都不见人影,晚上才知道刘、邓已与中共代表联系好,下决心起义,已离开了成都。蒋当即下了两道命令:一、政府迁台北,并在西昌设大本营,统帅海陆空军在大陆指挥作战。二、又令(一)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呈请辞职,张群准予免职。(二)特派顾祝同兼西南军政长官。(三)西安绥靖公署着即撤销。(四)派胡宗南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参谋长。(五)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着即撤销。(六)派杨森为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兼代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七)派王纘绪为西南第一路游击总司令,唐式遵为西南第二路游击总司令。(八)派盛文为成都防卫总司令,余锦源、严啸虎为成都防卫副总司令,严啸虎仍兼成都警备司令。(九)西昌警备司令部着改为西昌警备总司令部,并派贺国光为警备总司令。这是7日晚蒋介石在成都作出的最后决定和部署。

晚上,张群从昆明飞回成都,向蒋介石报告卢汉的动向,谓彼正在戒烟,态度反常,只想要钱,公义私情皆所不顾。10日晨,截到云南省主席卢汉打给刘文辉的电文,建议四川军人发起第二次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为人民立功。蒋介石即召见胡宗南、顾祝同、萧毅肃等人,商讨对云南处理的方案。在座的文武官员都劝蒋介石速离成都飞台湾,蒋才决定离去。

10日蒋介石日记:

乃召集顾(祝同)、胡(宗南)、王方舟(陵基)、萧毅肃等人,研讨……文武人员皆要求余离蓉飞台,不先飞西昌……午餐后起行到凤凰山上机,十四时起飞,二十半到台北,与辞修同车入草庐……

1949年12月10日下午2时,是蒋介石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刻,他的专机起飞,从此再也没有踏足大陆。到1949年底,国民党政府已几乎完全被逐出大陆,败退到台澎金马。但当时海南岛及舟山群岛仍控制在国民党军队手中(直到次年5月)。

12月12日先父日记:

……洽定飞送海口华中、华南两区经费，计华中一万两，华南七千八百两。另与关部长洽妥，由央行拨金五千两，银元廿四万元，以解决未兑支票问题，余派董司长（德成）解往（海南岛），希望此行能了悬案也，定明日起飞[按：另查对董德成手稿《忆往事励来兹》（1989）也相契合]。又恰妥运银元机四架赴成都，定明日起飞二架，接回公教人员。

运海南岛等地的金银，是由董德成押运的，总数据台湾“中央银行”档案为22 222两（与先父日记数字略差），是12月26日入账的（图13.7，表16.1）。到14日，“空军认为（运款）赴滇都不可能”。国民党在大陆的军费支出，就此永远画下了句点，以后的黄金军费支出主要是台湾及离岛。

1949年12月7日是先父在国共内战期间在大陆的最后一日，以后他工作的重点就只在台澎金马了。蒋还是要倚重他管军费，次年1月6日大溪档案有“吴嵩庆呈蒋中正阎锡山请核示三十九年度军费概算”。1月8日蒋介石日记道：“朝课后见吴嵩庆研讨对军费总预算数目及筹备”，而台湾在1950年的最大宗支出就是军费，是用大陆运台黄金在贴补（表16.1），才免于被通货膨胀的洪流所冲毁。叨朝鲜半岛战争之“福”，从1951年起美国援助就补上了这大缺口。

1950年2月25日先父日记：

军费审核小组谈话会记录，今后军费预算照下列规定办理：3月份军费总额仍为2 777万元（银元），除由台湾省政府在物质处理、爱国公债、防卫捐项下拨补1 472万元外，其余1 305万元（约合黄金14万两），先由国库拨发黄金10万两……4月份军费由国库拨发黄金10万两，5月份国库拨发黄金8万两，6月份起每月均由国库拨发黄金6万两，非有特殊原因，不予增减。

刚到台湾，还是用黄金银元计算军费，这里黄金一两折算银元93块，如折算为新台币就是280元。这一天也刚巧是先父49岁生日，蒋介石要先父又继续管理了以后整整12年的台湾军费，直到1962年，其间经历了国共不断的沿海军事冲突，包括争夺海峡制空权与制海权，以及几乎引起中美直接冲突的金门炮战。



第16章 国民党政府上海国库资金运台湾后的流向

台湾“中央银行”档案及军费支出黄金数量(1949年5月—1950年12月)

从表 16.1 的台湾“中央银行”档案及军费支出黄金数量(1949年5月—1950年12月)可以看出,除新台币准备金 80 万两及 1949 年年底前后 22.6 万两拨台湾银行外,其余全为国民党政府行政费及军费,财务署另有秘密存金(★)并未完全列入央行支出的账上(参见表 1.1 及图 13.7),而仅列入厦门分行账中(表 16.4)。大溪档案仅有 299 万两的黄金收入(表 1.1 及图 1.4),而账面上的支出及剩余就达到 409 万两,此两项数字的差数整整是 110 万两或更多(表 16.5),也就是军费密账里运厦门的第二批及第三批的一部。如果没有这笔军费秘密黄金,账就对不起来。

表 16.1 台湾“中央银行”档案及军费支出黄金数量略计(1949年5月—1950年12月)

日期(月/日)	支出项目	黄金(市两)	相关资料	备注
1949年				
6/21	拨付台湾银行作新台币准备金	800 000	“央行”付出(A-1)	第一批沪运台黄金
(6/14—8/17)	(厦门秘密军费)(★)	(786 540)	大溪档案电子档“厦门拨交吴嵩庆黄金”	第二批沪运厦黄金,列入厦门分行账 ^①



(续表)

日期(月/日)	支出项目	黄金(市两)	相关资料	备注
8/16	—	—	—	厦门存金开始运台
8/29	拨运广州总行	50 000	“央行”付出(B-1)	美国运台黄金
9/3	拨运广州总行	50 031	“央行”付出(B-2) (吴嵩庆拨款) ^②	美国运台黄金
9/5	拨付空军总部(价售银元)	66 260	“央行”付出(B-3)	美国运台黄金
9/9	拨付海军总部修舰费	5 747	“央行”付出(B-4)	美国运台黄金
9/10	拨付预算财务署运蓉	20 000	“央行”付出(B-5) (吴嵩庆拨款) ^②	美国运台黄金
9/15	拨运总行	7 000	“央行”付出(B-6)	美国运台黄金
		小合计	199 038	美国运台黄金支出 ^①
10/15	拨付东南军政长官公署	125 000	“央行”付出(A-2)	“财务署”拨交台湾银行 ^③
10/15	运重庆总行	275 001	“央行”付出(A-3)	作西南地区军政费
11/24	拨付东南海航经费抵押	10 000	“央行”付出(A-4)	
11/30	拨运定海分行	3 005	“央行”付出(A-5)	
12/6	拨运成都分行	49 975	“央行”付出(A-6)	“财务署”李光烈督运 ^④
12/11	拨付东南海航经费抵押	10 000	“央行”付出(A-7)	
12/11	拨付预算财务署军费	66 900	“央行”付出(A-8)	
		小合计	539 881	①
	总行迁台湾后给付			
12/26	拨付预财署海口军费	22 222	“央行”付出(C-1)	“财务署”董德成督运 ^②
12/31	拨付台湾银行	100 000	“央行”付出(C-2)	
1950年				
1/20	拨付台湾银行借用	126 000	“央行”付出(C-3)	
1/20	拨付1月军费(1)	65 000	“央行”付出(C-4)	

(续表)

日期(月/日)	支出项目	黄金(市两)	相关资料	备注
1/27	拨付2月军费(1)	47 894	“央行”付出(C-5)	
1/31	拨付1月军费(2)	60 771	“央行”付出(C-6)	
2/7	拨付1月军费(3)	13 516	“央行”付出(C-7)	
2/7	拨付2月军费(2)	46 930	“央行”付出(C-8)	
—	购军米(泰国)	19 400		“财务署”
		小合计	501 733	①
合计		2 827 192		含厦门军费支出
2月				“央行”剩余 92.9 万两 ^②
3—4月	3—4月份军费	224 000		“央行”剩余 71.5 万两(估)
5月	5月份军费	214 000		“央行”剩余 48.8 万两 ^①
6—8月	6—8月份军费	103 000		“央行”剩余 38.5 万两 ^①
9月	9月份军费	150 000		“央行”剩余 37.0 万两 ^⑤ 台行剩余 38.0 万两
10—12月	10—12月军费(预算)	? 180 000		每月 6 万两
总合计	至 1950 年 12 月底	4 098 192^⑥		含“央行”台行 120 万两 ^⑦

注：① 据大溪档案电子档“厦门分行代付拨交联勤总部吴署长嵩庆黄金数量”(图12.3)、图13.7及表16.4。

② 据吴嵩庆军费日志(1949年8月30日)的对照记录。

③ 见大溪档案“台湾银行黄金收付表(截至卅八年十二月廿二日止)”：库存……33 848.963市两，收进……202 018.085市两，最近联勤总部财务署交来 125 000.000市两。共计 360 867.048市两，付出……248 678.924市两，余存 112 188.124市两，另存货币准备基金 800 000.000市两(表16.2)。

④ 李光烈口述。

⑤ 据周宏涛《蒋公与我》。

⑥ 如照表16.5的估计，黄金总数在 3 945 700 至 4 545 700(市)两之间(含新台币准备金)，其中包括 1949—1950年，军政费用于大陆 155 万两，于台湾 133 万两，新台币准备金 120 万两及兑给台湾民间 215 万两，则近 500 万两是高估，如用于台湾的部分军政费也同时算在兑出民间黄金里，另外部分运大陆黄金，又运回台湾后再支出，故有重复计算之处。

⑦ 依据 IMF(国际货币基金会)之《国际财政统计》，1950年底，台湾当局有 130 万英两(即约 120 万市两)的黄金储备。

据大溪档案(图 13.7),1950 年的军费支出与最后 IMF(国际货币基金基金会)的数字有一缺口,补这些黄金的差数,应就是藏财务署的剩余秘密军费黄金量。如上一章先父在 1950 年 2 月 25 日记中关于“军费审核小组”的记录:每月平均军费预算补助 10 万两黄金,从 5 月以后减少至 8 万两,6 到 8 月减至每月 6 万两,如照此预算,3 至 12 月军费黄金支出为 74 万两,但如表 16.1 所示,账上至 9 月已支出 69 万两,而 10 至 12 月应再花费掉 18 万两。那么,包括“中央”及台湾银行藏金,到年底应只剩余不到 60 万两,而 IMF 的报告是此数一倍,如非来自财务署,不知另有何财源?

第一批黄金:主要作新台币准备金及稳定新台币

1948 年第一批金银运台,是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中共几乎丝毫不知情,桂系李宗仁也不知道。除了前述那位英国记者在 12 月 1 日深夜目睹那一幕,也只是猜测挑夫所挑的是黄金,在左派报纸(其他上海报纸如《大公报》及《申报》只字未载)上发表“路透社”电后,大家还是半信半疑。老百姓完全没有想到,7 个月前才当选中华民国总统的蒋介石已经在做逃亡台湾的准备。这一批黄金 260 万两到了台湾,就存入台湾银行金库,因为中央银行那时还没有在台复业。

据笔者直觉推测,这一批黄金应该不止 260 万两这个数字(表 1.1)。根据是什么?根据父亲经管的第二批黄金,央行说是 90 万两,到了厦门后多出 9 万余两。那么请问,260 万两可能会多出多少?这是将来可以研究的课题。

上列第一批 260 万两黄金运台以后到哪儿去了呢?最大一笔之一是:“(1949 年)6 月 15 日,台湾省政府(省主席陈诚),以中央银行拨还台湾银行的 80 万两黄金及一千万美元外汇做进口贸易资金,公告新台币发行办法。”这是新台币最初发行额 2 亿的准备金(表 16.2, 16.3 及图 1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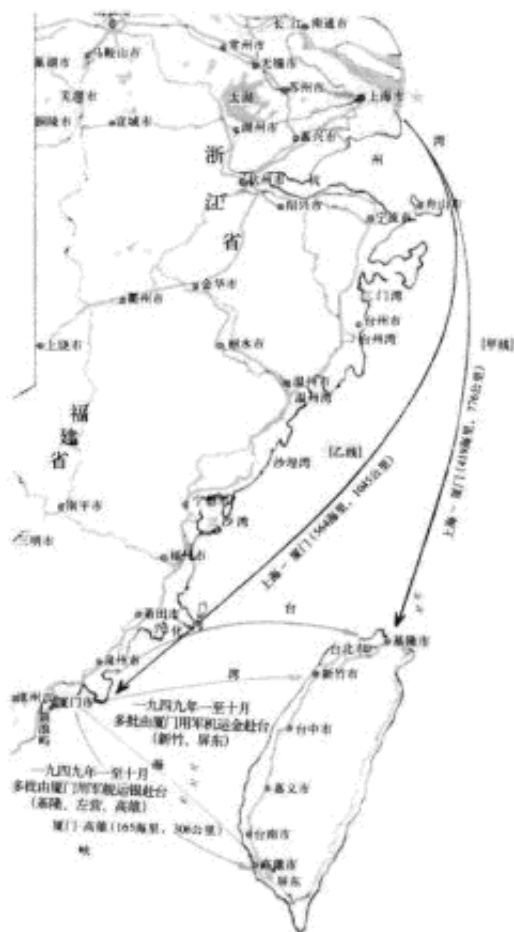


图 16.1 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 1948—1949 年分四批由上海将国库资金由各路线运台。甲线：1948 年 12 月 1 至 3 日第一批第一船次运黄金 200 万两（海关的“海星”号）；1949 年 2 至 5 月又有多批（主要运银块）。乙线：第一批第二船次运黄金 57 万两（海关的“海星”号），在 1948 年 12 月底到次年初运到厦门，存中央银行仓库，后转运台北，即大溪档案 1949 年 2 月 7 日入账的 55 万两；1949 年 1 至 2 月间，由军舰运金 90 万两以上，预支为军费，但仍为央行保管在鼓浪屿上之中国银行地下仓库（到 6 月初会同财务署清点，才知多出 9 万两），与军用银元（2 至 5 月由军舰走乙线运）放在一起。在解放军进入福建后，存厦门的军费金银就以海（运银）、空（运金）军之舰只、飞机运台湾。2 月 7 至 9 日曾以民用飞机、军机从上海秘密空运送 60 万两黄金进入台北财务署库房（第三批）。5 月 18 日又从上海海运 20 万两赴台（第四批）。各省市也有黄金银元运台湾、厦门，如浙江（杭州）、新疆、湖北（汉口）、广东（广州）等地

表 16.2 大溪档案里的台湾银行黄金收付表（截至 1949 年 12 月 22 日止）

项目	时间(年/月/日)	黄金(市两)	备注
原存	49/5/15 以前	33 848	台湾省银行原有库存黄金
收进	49/5/15 以后	202 018	开办黄金储蓄 ^① 以后
联勤财务署交来	49/10/15	125 000	拨付东南长官公署 ^②
	共计	360 866	
付出	49/5/15 以后	(248 678)	开办黄金储蓄以后
	余存	112 188	
另存货币准备基金	49/12/22	800 000	

注：① 见下文及附录 4。

② 是财务署拨付东南长官公署的军费，也见于表 16.1。

表 16.3 1948—1949 年国民党政府国库及国有黄金简表 (单位:百万市两)

分 类	黄金量	来源/去处	备 注
国库及国有	4.60—4.95		
	2.50	美国及原存国库	美国运来总数是 5.70(白皮书),是“三九”以上纯金;宋子文主持卖出 3.53,以支持法币(1946 年 4 月至 1947 年 2 月)
	1.50	金圆券发行所兑	1948 年 8 至 10 月
	0.95	公私银行	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各省银行(部分金圆券所兑)
运到台湾	3.80—4.10		其中约 60 万两又运返大陆,用于内战(见表 16.1,16.4)
	2.15	收回新台币,“藏富台湾民间”	1949 年 1 月至 1950 年 12 月,部分用于国民党军队在台薪饷并稳定新台币
	1.20	台湾银行	1950 年底 IMF(国际货币基金)之统计,是新台币之发行准备金 130 万英两
用于大陆	1.55	用于大陆内战军政费用(包括厦门存金)	1949 年 1 至 12 月,另有亿元左右银元(大溪档案,表 16.1,16.4,16.5)



图 16.2 台湾银行金库(图 11.4,“中央社”授权)。封条上有 1950 年 12 月的“新台币发行准备金”的字样,加盖在“金圆券发行准备金”的印字上(↓),这是国民党政府把“金圆券”准备金运来台湾作为“新台币”准备金之用的铁证



另据当年代表蒋介石在“财务署”管黄金的赵志华回忆，“曾在近 9 个月中经手约 12 次，每次以 10 万两黄金，以每两 280 元，换为新台币 2 800 万元做为国民党军队薪饷”（台北《传记文学》1997 年 12 月号）。

这位赵志华（图 16.3）是在 1950 年蒋“复职”后一个月就来到“财务署”任出纳科副主任，代表当局（据董德成先生于 2008 年回忆，还有另一



图 16.3 安全室主计室主任赵志华（右）2006 年在洛杉矶接受笔者（左）访问（郝亦尘摄）

位，是高梦男，比赵在蒋介石身边还要资深些），并拥有“财务署”金库（图 5.9）三把钥匙之一（另一把为叶良光所持，见第 8 章及第 18 章）。从 1950 年 4 月 1 日到年底，每次 10 万两转给“中央银行”，当时业务局长是刁培然，科长是何柏枏，此部分黄金转入台湾银行（业务部主任是应昌期，图 16.4）以后流入台湾民间（详见下）。



图 16.4 （左图）1949 年台北台湾银行营业处主任应昌期（右图）其晚年设立“应氏围棋基金会”，每次比赛奖金动辄数十万美金

如以 280 元一两计，这 100 多万两就已经超过 3 亿新台币。请留意，此处点明，当时“财务署”有 100 多万两黄金，这里可能包括了第三、四批



的一部分及国外(美国、日本)运回的,加上国共内战结束时第二批作军费用黄金剩余 20 万两左右(见表 1.1)。如果是央行的第一批黄金(260 万两),那就与“财务署”毫无关联,赵志华是不会参与的。

另外,依照周宏涛(图 11.8 及 11.9,见《蒋公与我》)的记忆是,“……平均每月 18 万两纯金作军费……几个月下来,就花掉 215 万两……”(按:不是每月 18 万,应是一年才会用掉此数,这是“周书”几处明显笔误小疵之一。)这 215 万两就已经超过 6 亿新台币。他引“中央银行”总裁在 1950 年 6 月 7 日呈蒋总统报告里指出的:“运台纯金,只够再支撑三个月”。请注意,这里只提了“中央银行”,没提台湾银行的黄金。这 215 万两,不可能完全是国库黄金,因为俞鸿钧的第一批国库黄金全部是 260 万两,其中 80 万两已转账给台湾银行作新台币的准备金,10 至 12 月又拨给大陆舟山军政费用 54 万两(表 16.1),余下最多是 126 万两,此处说还剩下三个月的金子,那就是 54 万两。这里用简单的算术就可推演出:这 215 万两中,中央银行的金子只占 72 万两,那其他 143 万两是从哪里来的?最可能就是赵志华开“财务署”的库房门拿的军费黄金(第二、三、四批)。这两位回忆,算是相当契合。如果有错误的话,应是由“中央银行”公开档案来纠正笔者的推理。请读者留意,赵志华是 1950 年底才离开“财务署”的,此意味着大陆内战结束后的“军费黄金”总数至少在百万两以上。如图 16.5 所示,1949 年内,从 8 月至 12 月共转给台湾银行 197 万两,即使算上最初的 80 万两,还差约 120 万两,但台湾“中央银行”档案(表 16.1)在 1949 年内只给了台湾银行 10 万两(12 月 31 日),相差的约 100 万两应该是军费黄金剩余,从“财务署”金库里转去台湾银行的。

但这花掉的 215 万两金子去了哪里?请参看见袁颖生著《光复前后的台湾经济》,他根据徐柏园的“政府迁台后之外汇管理初稿”写的。

变售黄金以支应开支及以黄金折发军饷,主要系发生在民国三十八、九年(1949 和 1950 年)仅是黄金的变售价款,估计在此两年就分别有新台币超过一亿六千五百万元(约 60 万两)及接近三亿九千四百万元(约 140 万两)。……此两年度省财政岁入分别不过一亿六

百万元,及三亿八千七百万,则变售黄金价款在1949年即高出年度省财政岁入的56.53%之巨,1950年仍略多1.86%,自为政府的巨额收入,而在省财政及“中央财政”的岁入中,都未见列记……

此200万两黄金数量与前五次公告之新台币发行之准备金(部分又被“变卖”回收新台币)极相近。可能部分就是把“央行”黄金(部分为“财务署”保管的黄金)转给台湾银行发行新台币,大张旗鼓地公告(图16.5),把超额发行的新台币用来作军饷,然后又“一鱼两吃”,静静地把部分黄金变卖(参见下文的“黄金储蓄存款”办法),收回民间新台币,来防止通货膨胀,而在老百姓眼花缭乱之际,台湾的财政经济就稳定下来了。这是朝鲜战争爆发前后的台湾,而新台币总发行额从1949年6月15日初发行的2亿,到1950年底已增加为2.9倍,黄金储备则只多20%,换言之,通货膨胀近2.5倍(于宗先总主编,《台湾货币与金融论文集》,台湾:联经出版社1975年版)。



图16.5 新台币发行以黄金为准备金,从1949年8月5日至12月5日共公告五次约200万两黄金(共发行新台币约5亿6千万:第一次是8月5日以黄金28万两为准备金。以后每月公告,9月黄金33万余两,10月40万余两,11月43万余两及12月52万两)(引许之远的资料)

据台湾当局1950年的政府总决算审核报告书:

该年度(1950)岁出决算12亿9625万元新台币,岁入加计其他收入总计9亿多,不足百分之31点5,以举债9646万元、赊借收入3亿1313万元弥补;赊借收入中有黄金及美金等各式外币及新台币,1950年底止,政府向央行质押透支之黄金为258万4873两,其中1949年以前积欠151万6351两,1950年度结欠106万8522两。

上面周文与袁文中黄金200余万两,加上外汇美金1000余万,再加上举部分债款,则与“央行”质押透支之黄金为258万数相近。根据国际货币基金(IMF)之《国际财政统计》,在1950年底台湾有“剩余”130万英两的黄金储备,此黄金储备与变买新台币的黄金量相加,就与大陆沪厦运台黄金总量相近(见表16.1)。

这些钱,其中一部分如上述就是赵志华记忆中12次的黄金换来的,黄金以每市两换取新台币280元,由台湾银行或台北的四家银楼“金瑞山”、“金再兴”、“益记”、“美华”,以新台币折成“黄金储蓄存款”之存折,向台湾银行十足提取黄金。这“黄金储蓄存款”(见附录4)是国民党政府在1949年5月公布,后于6月15日在新台币发行办法第十条规定:“凡持有新台币者,得照台湾省进出口贸易及汇兑金银管理办法之规定,结购外汇或照黄金储蓄存款办法之规定,折存黄金储蓄存款……”这是国民党政府为巩固新台币的币信,规定市民可以公价直接换取黄金或美钞,政府公价当然比“黑市”便宜(约百分之七十以上利润),有钱人有福也有“富”了。依于宗先的资料:“从49年6月15日至50年底的一年半内计抛售黄金145万两,美金6600万元,以建立台湾人民对新台币的信心”(于宗先总主编,《台湾货币与金融论文集》,台湾:联经出版社1975年版)。这里卖掉的美金,就是藏在台湾银行里的“财务署”的军费账上的7000万(见第5章),是蒋介石1949年1月下野前,要先父以订“草约”方式,从财政部长徐堪那儿转来台湾银行的,是内战经费的一部分,藏得比黄金还密,只有蒋介石才能动用。

前第12章中已述,蒋介石对此黄金储蓄兑现的办法极不满意,他在1949年6月29日的日记中提及:“……以台湾银行改革币制有储金兑现办法甚不合理,可叹。”7月10日又再提他计划:“……台湾银行储金规则



之取消。”直到1950年12月27日才实际公告取消。

如上述,总共200多万两黄金和大量美金,就经由台湾银行,大部经由银楼流入民间。结果稳定了新台币,提供了公教人员和士兵的米粮、军队的薪饷及军火零件汽油的补给,军心民心也安定了。美国国务院在1950年3月也收到“台湾情势趋稳定的好消息”(《美国国家档案纪录局文件》,1950年3月9日),应该主要是上海国库资金起的重要作用。



图 16.6 唯一在台湾流通过的银质5角辅币(1949—1954)

这就是朝鲜战争爆发(1950年6月25日)前的台湾。黄金、美钞这样流入民间,当然“藏富于台湾人民”也没有什么不好,但这是一个无底洞,何况,还有国外、国内的投机客。前面提到的四大银楼,后来都因投机取巧和套汇,被法院起诉。资金外流也严重。其实,几乎没有任何国家的政府会把黄金便宜地卖给人民换回自己印的纸钞,再拿纸币发给军人、公务员、教师。美国有这样做吗?美国是靠借钱、卖公债过日子的。当局虽然“傻”,但台湾老百姓不傻,能拿新台币换得到金子、美钞,就对政府的新钞票有信心了。当时笔者就在台北念小学,社会秩序非常安定,新台币也很稳定,每天使用的5角辅币是银质的,五个这小银角子的重量就相当于一块银元(图3.15,3.16,12.1,16.6),没有人留着5角银币不用,也流通了好几年,这许多银币一定是用上海运台湾的以千吨计的银锭铸造的,这些纯银也起到了稳定新台币币信的积极作用。

台湾当年“黑市”的黄金价格要比当局公告的280元一市两高近两

倍,通常视美金官价与“黑市”价之比,譬如台湾银行的官订外汇价格是5元新台币购买一元美金,而国际市场黄金价格是56美元一市两,这就是向台湾银行或指定银楼购买黄金储蓄的价格:280元新台币买一市两。而事实上,台湾当年一般人要买美金一元,需要出新台币10元向一般银楼买,也就是说,转手之间就赚近一倍利润。明显地,这就吸引了许多岛内外的投机客,黄金就大量流失,外汇也流出一千万美元以上,当然也暂时稳定了新台币。如果不是朝鲜战争爆发,美援来台湾,黄金美钞卖光,通货一定又剧烈膨胀,这是师宋子文战后卖黄金想稳定法币之故伎。当年发国难财的就是这批财经界内部人士,酿成“黄金风潮”,是蒋介石在大陆大崩溃的开始。这批白蚁1949年又在台湾重施同样的伎俩,这次在没把政府搞垮前,朝鲜战争就爆发,或是大意外。

就像法币,在卖黄金外汇的同时,新台币的发行量继续在剧增,以应付大量军费、政费及建设的支出。后来,在黄金还没完全卖完前(国际货币基金记录:至1950年底还剩余130万英两),由于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美国军经援助,以及当局实行高利率政策(鼓励储蓄与购买国债)才渡过难关,这是运气,财经界的俞鸿钧、徐柏园等,还有陈诚、严家淦、吴国桢等位真不懂吗?最后,在蒋介石的坚持下,才停止这出卖家当过日子的败家子行为,但许多人已发了财,直到今天,他们的子子孙孙还在国内外住豪宅并呼风唤雨,毫不以羞耻为意。

如《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许涤新、吴承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的作者所说:“出售黄金外汇……此举完全是悖理的,因为黄金外汇原是国库发行纸币和国家银行信贷的准备,不能作为财政用途……此举只是出卖家底,是一种倾家荡产的政策。”该书主要是评1946至1947年的“黄金风潮”,国民党政府的宋子文、贝祖贻抛售了黄金351万两,外汇7.7亿美元,央行内部人员与有勾结的经销商牟得暴利。不料到了台湾,这批私心重的人还是如法炮制,尤其是手上有了钱以后,在笑贫不笑娼的时代,政商两界更是得心应手。

无独有偶,几乎同时,新中国在上海也遭遇了类似的财政问题,看看



他们是怎样做来稳定人民币的。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规定一元旧人民币兑换10万金圆券,黄金每两3.91万元,银元一枚是660元。不到十天,银元上涨到一枚1800元,黄金一两涨到11万元。早已奉命停业的证券交易所,每天有数千人光顾。到6月8日达到8万人,街头还有数万银元贩子从事金银买卖,每枚银元已涨到2000多人民币。上海人很得意地声称:“共产党打得过蒋光头,打不过袁大头”。上海市长陈毅6月10日以“铁腕手段,下令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包围查封了这个证券交易所,逮捕了一千人,并下令禁止黄金,银元,外币的计价流通和私下买卖……”到第二天,银元价就跌了一半。以后,再经“三反”、“五反”运动,“镇压”了一批人后,老百姓就没人敢投机倒把、买卖金银了(《百年上海滩》,上海滩杂志社,200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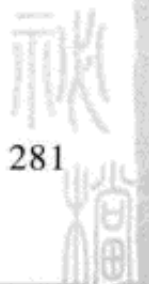
比起中共的“铁腕”,当局在台湾的做法是否太“软弱”了点?让这些投机“刁民”欺负,几乎把“国库”黄金掏空(如前述)。即使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7月,台北“中央银行”存金不及50万两(按:当时先父认为“央行”的这些数字有问题,曾想去探“实情”,但被拒绝),而台湾银行也只剩下38万两(此数也应存疑),台省财政陷入危机。蒋介石仅仅指示,“设法维持黄金库存,非不得已不再动用”,那年12月,才停止自由外汇。次年,美援也来了。台湾就从此稳定下来。

台湾有两种模糊的说法。有些人说:“国民党有从大陆运黄金来,是骗人的!”(如前面第9章里李登辉说的,这些没根据的话,不值一驳。)另有人说:“大陆这些‘乞食’带来的黄金早就用完了,大陆来的人,是靠台湾人养的。以后别再提黄金的事了。”现在只问问:如果没有这笔黄金,当年台湾会如何呢?

美国阿拉巴马大学前经济学教授郑治明是这样评估的(翻译自他给笔者的英文信):

……这300多万两,从大陆来的黄金以及外汇(按:没提那1亿多两纯银及外汇),可以说是救了当年“饥饿的台湾婴儿”,没有这瓶水,这婴儿早在沙漠里干死了,即使是那1951年开始的美援,也回天乏术。

此处设想,当年台湾如果没有这笔金银外汇,新台币也会像金圆



券一样狂贬,不容置疑地会引起社会极度不安,发生像在上海的那种“黄金挤兑”(图 3.13,3.14),成千上万群众包围台湾银行,急着以日夜贬值的新台币换回黄金、美钞,互相践踏造成许多伤亡,物价暴涨,动乱纷起。

美国前驻苏联大使蒲立德(William C. Bullitt)就曾在分析 1949 至 1950 年台湾的经济与财政时指出:

台湾面积仅为波多黎各的四倍,它怎能维持 60 万(按:应该是 70 万)的武装部队呢?这完全靠蒋先生将大陆的黄金运台才安定台湾军人的生活。没有蒋先生由大陆运台价值 10 亿美元的黄金(资金),台湾的经济将被通货膨胀的洪流所淹没。[《展望》(LOOK Magazine)]

郑教授继称:

……依据 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国际财政统计》,在 1950 年底,台湾有 130 万两黄金储备,大概应该是原先 375 万两(按:包括第二、三、四批及海外各地运来的)所剩余的。……一般来说,台湾经济从 1951 年开始已正常运作,黄金作为货币的准备金,不能做别的用途,政府开支,均需在预算以内;超出之数就需以政府债券开支。由于外销成长,外汇,黄金开始积累。……如果说原先 375 万两黄金的“原璧”还在国库里,那是不切时际,也是不必要地。应该说那瓶水救活的孩子,已长大成人。已经能担来更多的水了。

此结论应该是中肯的。新台币的发行是成功的,有足够的准备金,也给未来宝岛的经济立下一块坚固的垫脚石。

有人戏称蒋介石一生有两次“豪赌”,都在千钧一发之际,因对手犯错或国际局势的突变而“转运”。其一是抗战进入第四年,国民党政府已是精疲力竭,而日寇自犯战略上的错误,挑衅美国,偷袭珍珠港,而让汪精卫在南京伪府中惊叹蒋的好运:“输得连裤子都押上了……”(汪之长子在美国洛杉矶亲告笔者)另一次就是这 1949—1950 年,黄金、外汇、银元都快花光了,突然间,朝鲜战争爆发,他又时来运转,把台湾局势给稳下来了。当然



这是粗俗的比喻,抗战与台湾问题不是蒋个人的“赌博”,但他在这20世纪中国的两大事件里居于主导角色是不容否认的。历史的是非功过,自会有亿万百姓心头上的一把尺去细细掂量。

上海国库“余金”在台湾的储存(2008年)

1998年4月,香港《亚洲周刊》记者在访问李光烈时,也访问了台北“中央银行”副总裁许嘉栋,许表示:

央行在台复业时,有部份数据已不可考,因此无法确知当初究竟是从大陆运出多少黄金,央行目前库存黄金约460吨(约1300多万两),其中仅33吨(约94万两)来自大陆,占全部黄金存量的百分之7点99。(按:许嘉栋的话,也直接驳斥了李登辉无黄金运台的谎言!)

除“央行在台复业时,有部份资料已不可考”云云,尤其是央行在1949年除了胡乱称金子外,部分档案(如第4章所述,可能是抗战胜利至1948年6月前的次要档案)沉在“太平”轮里面。此外,由于有中共地下党阻挡,国民党政府数次波迁,没能把另一部分档案运到台湾,其中最重要的部分:1948年8月金圆券发行到1949年底,尤其是收兑民间黄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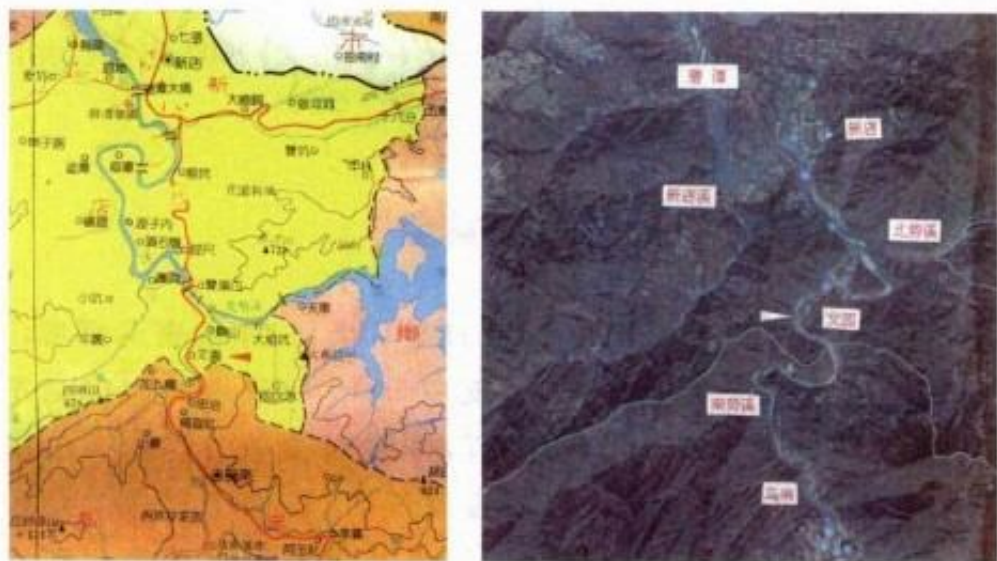


图 16.7 在台北市南郊的文园,是“中央银行”金库所在(箭头)



图 16.8 台北县文园新乌路三段 251 号是金库大门,2008 年 4 月的台北《时报周刊》报道内藏黄金 1 300 万英两(与 1997 年同),其中上海运台黄金占总量的百分之七,比香港《亚洲周刊》十年前的报道少了 0.99%

的账册,由于后来金圆券剧烈贬值,等于是向民间“白拿”的。1948 年底前所强行收兑的黄金全国共 147 万两,平均以 500 元金圆券兑换一两,约 7.4 亿元金圆券,半年后,这点金圆券换不到一元美金。换句话说,就是一块美金,或两块银元,买了 150 万市两黄金!“全国共 147 万两”的数字也极可能是虚假的低报。

如果央行无账可寻,经手人就有可让老百姓议论处,也难怪中央银行给先父军费的 90 万两,居然比账上多出近 3 吨,所以可以说是一笔糊涂账。即使那整个 90 余万两黄金,是财务署保管的军费密账,央行也无记录(图 13.7,表 16.1)。这在大动乱的时代也不奇怪,只是对两岸人民并不公平,近 60 年来都没交代(直到笔者的《黄金档案》2007 年在台北出版才部分说明此事)。

第二批存厦门秘密军费黄金

这是先父经手,1949 年 1 月 10 日至月底,以军舰密运到厦门的“军费”部分,由蒋介石直接控制,支应 1949 年年内的国民党军队作战。据大溪档案(表 16.1),厦门军费黄金在 1949 年内用去 786 540 市两,另有 3 000 万块银元运到厦门,也做了军费。剩余约 22 万余两在 8 月运台湾后与第三、四批及美国运回黄金合存一起(表 16.3),约 100 万两以上(如表 16.1 所示),部分又继续支持



1949年内国民党军队作战。

在大溪档案中,最近得见中央银行“厦门分行代付拨交联勤总部吴署长嵩庆黄金数量”(图12.3),见表16.4中的第(1)至(8)项,是1949年内用去786 540市两的细账,但这不是全部的秘密军费。

表 16.4 1949年秘密军费黄金预算及支出概数

	时间 (年/月/日)	黄金 (万两)	用 途	备 注
第二批	49/1/10	99.0		军舰运厦门
预算 (蒋介石)	49/6/12	43.0	重庆、贵阳、广州款	在厦门
		37.0	陕西、新疆、甘肃款	运台湾存财务署
		5.0	香港款	存财务署
		8.0	粮款	存财务署
		6.0	经费	存财务署
厦门分行	(1) 49/6/14	35.654	代付拨交联勤总部吴署长嵩庆	大溪档案 ^①
厦门分行	(2) 49/6/25	0.914 3	代付拨交联勤总部吴署长嵩庆	大溪档案 ^①
厦门分行	(3) 49/7/5	4.507 9	代付拨交联勤总部吴署长嵩庆	大溪档案 ^①
厦门分行	(4) 49/7/11	5.0	代付拨交联勤总部吴署长嵩庆	大溪档案 ^①
厦门分行	(5) 49/7/18	1.5	代付拨交联勤总部吴署长嵩庆	大溪档案 ^①
厦门分行	(6) 49/7/26	5.0	代付运交兰州分行收	大溪档案 ^①
厦门分行	(7) 49/7/26	3.5	代付运交贵阳分行收 ^②	大溪档案 ^①
厦门分行	(8) 49/8/17	22.577 8	代付拨交联勤总部吴署长嵩庆	大溪档案 ^①
支军费	(至8月中)	(78.654)	军费列入厦门分行,但未记入台湾“央行”账上(图13.7)	大溪档案 ^①
	49/10/15	12.500	财务署交台湾银行(表16.2)	大溪档案 ^①
	(财务署军费支出合计)	(91.054)		
第三批	49/2/9	60.0	是2/8—2/9两天运出的	上海空运到台

(续表)

	时间 (年/月/日)	黄金 (万两)	用途	备注
第四批	49/5/18	19.5		军舰运台湾
美国运回	49/8	19.9	见图 13.7 央行支出(B)	大溪档案
日本运回		1.9		
全部军费		200.3	估计内战剩余约 101.8 万两	作 1950 年台湾军费 (表 16.1)

注：① 大溪档案电子档中央银行“厦门分行代付拨交联勤总部吴署长嵩庆黄金数量”(图 12.3)。

② “厦门分行代付拨交联勤总部吴署长嵩庆黄金数量”原件里的(附注)：运交贵阳分行黄金内，少运壹块[毛重 411.600 市两@ (纯度)99.7 合纯金 410.365 市两]。奉业、发两局电，以每市两八十元(银)折合收发行局准备金账。[按：此处金砖一块约 412 两，但纯度是 99.7%，近于赤金纯度，应该是“美国货”(见第 12 章)]。

③ 见表 16.1 中 1949 年 10 月 15 日拨付东南长官公署。

军费在内战时使用更多的是银元，近亿块，价值超过百万两黄金。其次还有 1 亿两的银锭，这些银子，可能部分运到台湾，铸成银币才能用。有数据显示，1949 年国民党政府在旧金山曾新铸银元 3 000 万枚(因百姓信任银元，铸银元是划算的)，以民国 23 年(1934)背面有帆船的“孙大头”或“船洋”为主(见第 12 章，图 3.15, 12.1)。

这批黄金银元的支出主要是支应各省尚在国民党军队手中的“国统区”亲信部队！在 5 月上海解放前 12 天，先父奉命赶到上海，与央行商量军费(也“顺便”把家眷送到台湾)。为了支应各地军事需要，先父旅行频繁，各处奔走，在 5 月里飞行了 14 次，6 月 11 次。尤其是台北、高雄、马公、定海、厦门、福州、广州、重庆、成都及海口，都是当时国民党军队控制区，蒋介石也随时随地会突然召见。

在以上第 5 章至第 15 章已详细交代第二批黄金、银元及外汇作为国民党政府军费及财政，到 1949 年 12 月底的支出。

国民党政府在国内新铸银元

至于从上海运出的数千万块的银元，应该是全部在内战中消耗了。

在1949年,广州政府都是以银元发军饷与工资,徐堪部长就曾在这年8月31日向父亲说过政府今后每月以30万两金及1000万银元作支出,作三个月计划云云。如先父军费日记记载,6至7月,“昆仑”号、“福明”轮及军机就运到广州、重庆等地近于2000余万枚银元,那是广州、重庆发行银圆券前夕财政部长徐堪向财务署借的(见6月27日呈蒋总裁报告),另外还有每月的军费。

由于银元容易发放,又甚保值,作为薪水,军民收到也甚为欢迎[前面曾提到空军人员在台湾就收到银元(“袁大头”)的薪水,见第9章],用得比较多,也用得快。由于银元容易使用,也得人们信任,对于国民党军队士气的维系极为重要。尤其当时银元价高涨,抗战(1937年)前一市两黄金可兑110块银元,而1949年5月中共进上海时,只能换三四十块(价高过美金,因为一市两金子可兑55美元),所以,国民党政府以国际市场



图 16.9 上一行为正反“孙大头”,下一行为正反“袁大头”

价购纯银和以上海国库银子,在世界各地大量铸造新银元,以美金计,便宜二三倍,即使加运费也划算。在1949年,国民党政府在美国旧金山(还有墨西哥、澳大利亚)就新铸了3000万块以上的银元(以孙中山头像的“船洋”为主,图16.9上一行;以“袁大头”为辅,图16.9下一行),作为军饷,并与7月初国民党政府银圆券的发行相呼应(见下)。

到该年底的12月28日,台湾当局还从马尼拉运回台所存银元980万枚。国共内战中,国民党政府使用银元共达7000万到1亿枚,还不包括中央银行在广州、重庆及其他各地分行所存银元。由菲律宾运回之银元可能全数还在“央行”,因为运回台湾时大陆已解放,国民党军队业已以新台币发饷。但如第9章中所述,来台后,空军就曾以银元发饷,所以也有可能已发放作薪金了,据空军高阶人员说,曾在14个月里每月每人加发3块银元。以撤退到台湾的空军8.2万计算,就是350万块,是1949年以军

舰运存台南(或岗山)空军基地的,是蒋介石1月21日下野前夕直接配给海空军的银元。海军银元数量不详,估计不会超过200万块。陆军的银元,因人数多,估计是二三千万元。在蒋介石日记中提到的陆海空三军的抚恤金,就是他下野前在南京指拨给三军的,据空军资深人员称就是这近400万银元,以抚恤金名义拨的。对照1949年3月31日蒋介石日记:“昨下午二时半约见郭谏黄仁霖等复谈海陆空抚恤基金,现银仍需集中保管,不得由各军擅自自动用事……”这几千万银元,就是集中保管在财务署的。6月底,准备发行银圆券,财政部长徐堪还来借了1200万元(见上)。

9月5日央行有笔从美国运回的军费黄金的支出是拨空军总部为“价售银元”,共6.6万余两[图13.7付出(B)],如以70块银元兑一两计,则约460万块,部分可能是此抚恤金,另一部分可能是空军运费所得(见第15章,11月25日先父安排军机撤退重庆“财务署”同仁,就花了1万银元运费)。把空军所有的银元换为黄金,“财务署”就不必到市场上兑银元去补给大陆的部队了。台湾当年市面上是不用银元的,也没有人买卖银元。而空军得黄金,就可在台湾兴建眷村宿舍,笔者在台北所见的空军眷舍,比陆军的较为宽大整饬并交通方便,这或许是维系军心的办法,国民党政府的空军撤退到台湾比较完整,也少起义倒戈事件,空军福利好是一因素。

当时国民党政府在川粤云贵闽都使用银元(图3.15,12.1,16.9)发薪水给亲信部队。但是100块银元就重达2.7公斤,不是很方便。广东省银行发行的大洋票(图16.10)就填补了这个空白,但只流通了一个月。这些也都是地方政府解决财政问题的办法。1949—1950年,海南岛也发行了“海南银行”的纸钞(图16.10,最高是10元)。当时海南岛的广东省银行还赶铸了些只有“袁大头”八成银的银元,因为原在广州的铸币厂撤退到了海口市,这些都是战乱时旧军阀“无法无天”的行径,也是促使它快速崩溃的原因。而在台湾有陈诚、蒋经国把关,不允许这些“军阀式”行为。后来,这些旧军阀在台湾就不敢有任何歪行了,如杨森、陈济棠(当时就在海南岛)等位。



图 16.10 1949 年广东省银行发行的大洋票(左),海南岛也发行了“海南银行”的纸钞(右),以减少国民党政府金银的支出

台北制币厂也在 1949 年 9 月奉命赶铸银元。如上述,在新台币初发行时的 5 角硬币就是银制的(5 克重,图 16.6),五个就相当于一块银元重量(27 克),这正是新台币刚刚发行时的银元的兑换率(2 元 5 角),也使用了五六年,直到后来“劣币驱逐良币”,台币慢慢贬值,就渐由铜镍合金取代,这里只有从图上去欣赏了(见图 12.1 下左两枚,有民国三十八年字样及台湾地图,到 1954 年就被下右边 1954 年发行的铜镍 5 角取代)。这种银币在 1949 和 1950 年也曾带给台湾老百姓对新台币的信心,国民党政府把大量银子运到台湾,也起到了稳定社会金融的作用。

前面估计过,如果铸造了 1 亿枚 5 角银币(85 纯度),就用掉了约 1 400 万两银子。这银子是哪里来的?应该就是前面监察院提过的金银外汇中的“价值 7 千万美元的白银”,请注意,是等于 200 万两黄金,蒋不会忽略。如前述,《纽约时报》在 1949 年 4 月报道过,从上海已运走价值 5 000 万美元的白银。

白银价格在 1949 年是约美金 7 角一市两。这 7 000 万美元的白银就是 1 亿市两纯银或相当于 1.4 亿块银元,一块银元含七钱二分纯银(约 22.5 克,即 85% 的纯度,见图 3.16 的光绪通宝)。至今,第一批加第二批银元,提到的只是约 4 000 万块,那其他近 1 亿多两银呢?是银锭,银砖是无法使用的。

一部分可能就运国外,如前述,主要是美国的旧金山(也可能还有墨西哥、澳大利亚)。1949 年里赶铸了新的银元,每百枚约用纯银 71 市两,以孙中山头像(称“孙大头”,背面是帆船)最多,其次或有袁世凯头像(称“袁大头”)或开国纪念币(有孙的小头像,见图 3.15)。也有可能是以外汇在美国购买纯银。从台湾运银去花费大,成本太高,而且时间也不许

可,当时一块银元价在大陆比一元美金高(见前),使用银元发饷要比用黄金划算。这些新铸银元现在在钱币市场上很多,价钱比较便宜。稍有经验的收集者,都能与“古董旧币”分辨开来(图 12.1 说明)。这批新银元,确定“7月10日起至9月底分批运到”广州(见“徐堪 1949年6月27日上蒋总裁的报告”,应该是支持银圆券及支付当时在广州市的国民党政府政费。因此,这些新币含银量与旧银元一样或许稍高,因为旧的“袁大头”在历史上至少有两批是每枚含银量低于七钱二分[请参考爱德华·肯著《中国硬币图谱》(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Chinese Coins,1966)]。

另外,爱德华·肯还提到,1949年8月,国民党政府在广州也开始铸造银元,成都和台北(9月8日)也曾铸银元,但由于解放军进展太快,铸成量“极少”。如上述,该年11月、12月里,广州的铸造厂搬到了海口,也铸造了些成色不足的银元。剩余的纯银大部应该转存台湾银行了,还在台湾的“国库”;一小部分就铸成新台币初发行时的5角硬币及以后50余年的各种“纪念银币”。希望将来有在各地铸币厂工作过的朋友,能为大家提供新数据。

据大溪档案中财政部长“徐堪 1949年6月27日上蒋总裁的报告”,中央银行“库存白银是25 215 751市两,银元是3 165 020元”,但到10月,“库存(黄金、美金硬币、银块、银元)数字(截至1949年10月7日止)”,“央行”存有“银块186块(重)195 193盎司,银元195 549元,银半圆260 092元”,大部白银铸成新银元(及新台币的辅币),与旧银元都用于大陆7至9月的军政费。银块平均约1 049盎司一块,这应该是锻铸银元及5角新台币银质辅币的剩余。

蒋介石下野期间(1949年1月下旬到1950年3月1日)的总裁办公费

1997年9月,笔者回台湾担任短期访问教授。留台期间,在先父的一个公文柜中找出一张借据(见图 16.11)。这是30多年前笔者留美时,为筹措旅费,先父向经国先生借的新台币6万元(当时合美金1 500元)。看到这张借条上印有“主计室主任赵志华”,并批有“奉准照借”四个字。笔

者来美不到一年如数归还后，把借条拿回，“奉准照借”四字是赵志华的手笔，边上盖的就是主计室主任赵志华的印章。

这位赵主任与笔者亲历的(1964年1月的)台北附近“湖口兵变”中的主角(请见第17章,图17.8),凑巧是同名同姓,但并非同一人,一位是文官,管主计的,一位是装甲兵的副司令,是军人。这张借据上的赵志华(见第18章及图16.3),2008年高龄85,脑筋还非常清晰,只是行动有些不便,住台北。1962年12月他在这张借据上签章时,担任“国家安全局”主计室主任。据他说,签批“奉准照借”当然是奉蒋



图 16.11 先父向蒋经国借新台币6万元的借条

经国(当时担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统一掌管情报)之命借的。这张借据,是先父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向人借贷,是为他儿子筹措旅费。到我来美不足一年,就在美国中部的圣路易城以一张美金支票归还全数了。见借据上父亲以红笔写上“作废”二字,并把签名也划上了几道,可惜没有注明日期,想他这样做,可能是以防万一被人拿去,再要他还钱吧。如真是这样,他是实在拿不出来的。当时,他刚从联勤副总司令退伍(全部退役金才10万元新台币,是2500美元),担任唐荣钢铁公司董事长的新职。这是台湾经济起飞前,做公务员的窘态。相信这是在三四十年前台湾军、公、教人员及家属所共有过的经验。

从1997年的电话长谈中得知,赵志华于1949—1950年间在侍从室工作。2006年我们在美国洛杉矶又有多次机会长谈,才知道先父经管的财务署的“军费”也照顾了下野的蒋介石总裁。赵志华回忆道,在溪口期间,他在第九组(组长陈舜畊),当时总裁办公室编制总共不到100人。大家都没有薪水,每个月夏功权(见图11.8)到宁波市银行去“借”伙食费。随从人员生活很苦,赵志华说:“三餐只有酸菜、毛豆等蔬食下饭。偶尔大家吃点荤肉,就挨总裁骂。”在离开溪口转往马公、上海(复兴岛)前后,曾得

毛人凤“赈济”银元4万块。

另据侍从医官熊丸(图16.12)于1991年回忆(《中外杂志》):

尔后财务署署长吴嵩庆(即先父)为我们带了银元来溪口,那时我拿到两百大头,和曹圣芬各拿了一百大头托张岳公(群)替我们带回四川家里。但没带到。

蒋总裁是4月底离开溪口的。赵志华可能忘了这一段。

1949年7月10日,蒋总裁应菲律宾总统季里诺之邀,有碧瑶会议(图



图16.12 蒋介石侍从医官熊丸

13.8);8月6日应南朝鲜李承晚总统之邀,有镇海会议。在这之前,据赵志华说,先父以“军费节余16万美金,交总裁办公室,方得出国访问”。譬如,到菲律宾,预算为5万美金,包括购买珊瑚等礼物在内。在1950年蒋介石复职前,毛和先父转拨的这两笔款子,据赵志华记忆,除了宁波市银行的少数生活费外,是“总裁办公室”仅有的两大笔收入。

其实赵志华不一定知道全部细节,在父亲的记录里,就看见有“(陈)舜畊来索款,为电台北王处长(逸芬)照拨”(1949年8月12日)。从前文已知,先父与蒋的渊源有一部分是由于有共同深知的陈舜畊,陈此时担任蒋总裁身边的第九组组长,替蒋老先生管理总务,也就是照管大家生活所需。

1950年1月,父亲有一则记录颇堪玩味:“舜畊来办公室,送来账单一叠,囑研究。即邀往公园坐后,说蒋教育长(按:指经国)有事转达,但吞吐其词,此已为第三次,不知究为何事,实属不解。”以后几天里,两人又见了面,但始终没有再记此事。关键在于这叠账单究竟是谁的?如果是蒋经国的,以他当时的职位(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应该不能向“财务署”直接报销的(蒋介石到3月才复职,蒋经国出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才有政府公职);如果是蒋介石的,那就无须吞吞吐吐了。先父不是搞政治的人,换个人这就是拉拢蒋经国的良机,有何不可解呢?也是明知故问的,要站稳脚跟,不愿去做讨好奉迎的事。



世界各国退休或刚离职的总统,多能以公费继续维持一个办公室(虽然当时国民党政府还没有建立此制度),陈舜畊向先父替前总统要点生活费用,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何况“总裁办公室”的人的生活也是自我克制的,没有大吃大喝,其实是十分清苦,如果不是赵志华说出这些生活细节,大家不会相信在蒋身边会这样苦。早年中共宣传的蒋介石,是一个腐败集团的中心。台湾也有些人以为两蒋强人时代,党国不分。如果真的不分,在掌管这许多金银美钞的笔者父亲那儿,尽可予取予求,蒋总裁身边的人(熊丸医官也有相同回忆),生活何必那样寒酸呢?

董德成老先生(图5.9)最近告诉笔者一件颇有趣的事,那就是“财务署”掌管的钱,在蒋介石复职之后,就成为他的“小金库”。在50年代,台湾经济尚未起飞,预算很紧缩,蒋介石就用其应付一些额外的需要。先父就记下了一项:“送林可胜出国5千元美金……”林可胜教授是国防医学院的创始人(Robert K. S. Lin, 1897—1969, 1947年成立国防医学院于上海,以军医署长兼国防医学院院长,1948年12月出任卫生署长,1949年5月辞职,赴美任伊利诺大学医学院访问教授,是研究止痛药理的先驱,是英国爱丁堡大学毕业的医学专家)。这些都是蒋介石为公家的支出。以下有关《民族报》、《联合报》的黄金也是当年奉蒋命令转拨的。

《联合报》拿去了多少黄金?

——看蒋介石“亲信”如何打军费黄金外汇的主意

2005年2月号的台北《传记文学》有一篇颇有趣味的文章,为习贤德所写《王惕吾、王永涛与民族报崛起的相关考证》,开始也没有怎样留意,细细一读才知道,联合报系的崛起与第二批黄金军费有关。王永涛即王逸芬(图5.8,此图是“财务署”在台北的旧属为我父祝寿时摄,王立左一,从他所站位置,读者可大致估计他在“财务署”的资深程度),就是派驻台北收支处的那位处长。那时全国有二十几个收支处。当然,台北收支处的处长有些特殊,是蒋的亲信,帮忙看管军费金银。王比起先父要“聪明”太多了,他已经想到用些军费金子去发展自己未来的事业,1960年以少将退



伍就变成台北《民族晚报》报社的发行人(见下文)。在1987年报禁开放前夕,报载王的家人想出价2亿新台币卖掉,当时记得有人愿出1亿来买(那也有300万美金),但没谈成,后来不到半载,台湾报禁一开,大概就不值那么多了。现在请看这些蒋介石周围的亲信人物,怎样把老百姓的金子作为自己新闻事业的“开办费”,当然名义上大概是为“党国”办报纸。

习贤德在《传记文学》上是这样写的:

……联合报系[按:包括《世界日报》(美洲版),2008年约年赚美金200万元汇回台湾]能有今日的规模,一般人都会推崇:这是王惕吾先生睿智和魄力的心血结晶。但是,若要论及“联合报”前身“全民日报、民族报、经济时报联合版”之前“民族报”时代的创业故事,早年真正令惕老感恩戴德,而视为至友的王永涛先生,才是全力扶植当年“民族报”逐步茁壮的重要幕后金主兼重要推手;如果没有王永涛的适时配合挹注,很可能就不会有今天的“联合报”。

……“民族报”创刊于民国38(1949)年5月4日……王永涛为创办人,贺楚强为监事长兼总主笔。民国39年元月,发行人、社长均请辞,由王惕吾自同年2月1日起担任发行人兼社长。

……至于“民族晚报”原系“民族报”为因应50年6月25日韩战爆发后的国际形势,自是年7月5日起每日下午三时发行,并专差免费赠阅订户的第二次版。后为遵守法令,乃另行登记报社名称,于50年12月1日正式创刊,由王惕吾、王永涛、李汉仪为创办人,王惕吾兼发行人,李汉仪任社长。直至60年八月,王永涛以少将阶自军中退役并主动向王惕吾提出要求后,“民族晚报”发行人职务始于61年6月1日起“归返”当年创业有功的恩人。

到这里,读者不禁会问,作为一位少将收支处长,有什么经济能力“开办”《民族报》,又有什么力量做王惕吾的“重要幕后金主”?且看习文怎样描写先父财务署的这位下属王逸芬(永涛)处长:

……49年1月21日,蒋中正总统宣布下野前,特别将王逸芬由国民政府警备司令部军需处长,调往台湾,担任联勤总司令部(按:中



间还有财务署)台湾收支处主任。王逸芬的继配王爱筠为浙江奉化人,故在此危疑震撼的关键时刻,能受到层峰高度信赖,成为协同看管……抢运来台的80万两黄金(按:有误,见此书前数章)、白银、外汇美钞等国有财资的重要角色。

读者到此大概也明白了,习文写的王逸芬变成了掌握运台黄金的主角了,或许已认定他是负责看守整个国库的。连提到国库黄金总量,也少得离谱。[按:其实笔者有关军费黄金的来龙去脉,早十多年前(1996—1997)同一杂志《传记文学》就发表过,王逸芬在财务署的角色也叙说得很清楚。编者、作者似乎都不须查资料,就可闭门、关(电)脑编写鸿文公诸于世。但还是没有说清楚,王逸芬怎么会让王惕吾感恩戴德是他“恩人”。但这里面又牵扯到陈诚与蒋的权力角逐,习文继续写道:

依照叶邦宗所著《蒋介石秘史:我在官邸的日子与一段遭到留白的历史》一书所述,1947年底,彭孟緝于“228事件”之后向中央建议:台湾需要派驻一支部队并规划人选;军务局长俞济时乃向蒋中正总统建言,由于大陆情势恶化,台湾是最后的落脚地,必须以精锐的亲兵屯驻,于是搁置彭孟緝自行预为规划的建议人选名册,官佐全部都由总统府警卫总队派任,主要干部名单为:警卫总队副总队长任世桂少将为旅长,俞济时的机要刘铁君上校为参谋长,总队附王瑞钟上校为第二团团团长,其他营长、连长、排长、班长全由官邸派出,浩浩荡荡于1948年2月来台成军。

这里的王瑞钟就是王惕吾。习文继续写道:

……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陈诚,突于49年5月下令:将王瑞钟上校调为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高级参谋,改派追随陈诚多年的汪奉曾上校接任。

但除了蒋总裁、俞济时(图11.8及18.8,是总裁办公室主任),官邸人马一向无人能下令替换,此举立即引起第二团全团官兵大哗,几乎演成兵变。



结果,汪上校没有到差,原团长王瑞钟抗命不交,人就躲在台北市杭州南路前联勤总部(按:即财务署内,图 5.9)由该团看管的黄金仓库里头,这个仓库的门需要三道钥匙会合才能开启进入内部,彭孟缉虽派了很多情治人员四处抓拿失踪的王团长,但毫无下落。

所幸,陈诚这道干犯官邸人事大忌的调职令发布第二天,蒋总裁即飞抵澎湖马公,俞济时面告紧急求见申诉的王瑞钟:“再忍耐,老先生很清楚”。同年6月,王瑞钟调任高参的命令只发布了一个月,即又改为:升任台湾省警备旅上校参谋长,表面上,似乎结束了一场卡位的明争暗斗大戏,但亦赤裸裸地预告了王惕吾在军中求取发展的末路……

按习的说法:

(1949年底)当王惕吾决定退役投身新闻事业之际,“民族报”亦正陷于社论文字肇祸而停刊的低潮。引起当局不满的原因,是一篇呼吁军公教人员应该调薪,标题为“非不能也,是不为也!”的社论,撰稿人是“民族报”主笔殷海光。[按:此大误,主笔及撰稿人是张铁君(见张铁君,《遽然梦觉录续集》,台北:学园月刊社,1974年),其外孙女即华人旅美作家张纯如(父母同姓),她用英文写作《南京大屠杀》(Iris Chang, *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1997)。纯如母亲张盈盈赠送笔者已绝版的《遽然梦觉录续集》。现南京的“大屠杀纪念馆”有张纯如的铜像,她也是笔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校友。]

……“民族报”登载这篇看似无奇的社论当天清晨,偏巧被即将登机飞往大陆巡视的蒋总裁看到,总裁大为光火,立即用红笔在报纸上批示:“如此社论!如此荒谬!”并且交代陈诚必须停刊惩处。据了解内情者指出,当时蒋表示:“如果那是别人办的报纸,我可能没办法处理,但是“民族报”是我自己出钱办的报纸,我就用家法处理!”于是创刊仅三个月的“民族报”于同年8月宣告停刊。

……但何以蒋总裁看了社论后竟会脱口表示:“民族报”是他自己出钱办的呢?原因即在该报筹备时的主要资金,部分来自当时姓



名还是王逸芬的王永涛负责看管的央行存金,数目是100根金条。

这100根金条一定是10两重的“大条”,那就是1000两,应该是属于先父交王逸芬看管在财务署的第二至第四批黄金,不可能是“央行”国库黄金。习没分别清楚“央行”与财务署黄金的区别。先父命王逸芬保管的是财务署的军费黄金,属于第二至第四批(表1.1);有别于第一批260万两的“央行”国库黄金。

……“民族报”被迫停刊将近满月时,社内干部包括王逸芬等在内的湖北同乡,央请同为鄂省乡亲的军委会侍从室文胆出身的陶希圣出面向蒋公请示:该报停刊快一个月了,是否可以准许复刊?

……王惕吾接掌“民族报”的时机,即出现在蒋先生同意复刊之后。俞济时奉蒋总裁指示着手调处复刊问题时,即召集王逸芬等重要干部面商大计。俞济时建议彼时对办报又颇有兴趣的王惕吾,即使没有什么可供大用的退伍金,亦无实际办报的经验,但为另辟生涯出路,无妨考虑接下正待复刊改组的“民族报”。

……王惕吾考虑后便同意了,但亦向俞济时坦率表示:“我总不能空着两只手去接啊!”于是,俞济时指示王逸芬第二次动用了央行紧急转运来台的资金。据说,这回共拨交了200根金条另加一笔美金给王惕吾,让其风风光光的能以独资的方式,力取经营实权,跃居“民族报”重新出发的发行人兼社长……

此时是1949年底,先父正冒着生命危险,押运金子银元车队挣扎在重庆撤退到成都的东线公路上,想亲自给前线军队发饷,激励士气。国民党政府也正是岌岌可危,国民党军队面临被大规模歼灭的穷途。而王逸芬、王惕吾就在这紧要关头打军费黄金的主意。背景则是高层的争权夺利,岂不令人浩叹?国民党到今天是否已真正洗面革新,吸取了历史教训,摒弃了“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的积习?

这里要指出的是,王逸芬没经过他顶头上司我父亲的核准,岂敢动用,俞济时一定得蒋介石指示先父才能给。但若仔细一想,也不一定。为什么?像蒋周围的一批人如俞某等,原来都是大军头(俞黄埔



一期,曾任军长、集团军副总司令),会尊重父亲的职权?尤其是已得到蒋的指示之后,也许就要王逸芬开库房门先拿了再报账。后来因为俞太专权,与蒋经国发生了冲突,被整调(第18章)。

以上习、叶所说如属实的话,《联合报》以《民族报》起家,前后就从财务署保管的黄金中总共拿了3000两,另加一笔数目不详的美金。美金外汇一定是用来购买国外印刷机以及纸张的。仅仅黄金,如以3万新台币一两算,就是近亿元新台币(加上外汇),即使在今日也是个大数目。“联合报系”今天当然不在乎这笔钱,是否考虑拿出这笔钱来回馈两岸,捐作下文提到的“中华世纪黄金教育基金”的种子钱(seed money),加不加息,就让继承王惕吾遗产的后代来决定。从另一角度看,《联合报》也应属于国民党的“党产”。但是,追究这个“党产”的人,应该是两岸的老百姓。当然,有一种小的可能性是,这数千两黄金系支出自蒋存在财务署的那4200两私人的“特种保管款”(见本章前节),这也许是蒋为什么说是他“自己出钱办的”原因。但此可能性似乎不大,因为财务署到1961年还存有黄金6000多两,应含这“特种保管款”在内。



图 16.13 以《民族报》起家的联合报系之创办人王惕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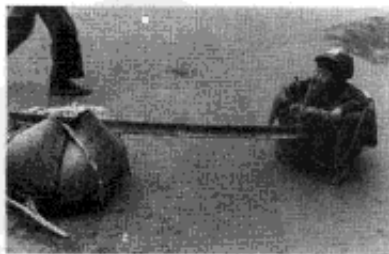


图 16.14 (左图)2008年8月《世界日报》(美洲版)所刊载的宣扬其母报“台湾联合报系”之产业——“古朴幽静”之庭园楼阁(右图)1949年的难民小孩。从该年1月1日至19日,仅仅上海街头就收童尸2000具以上。金圆券巨跌,老百姓流离失所,生活艰苦,运台湾的黄金是沾有人民血泪的,“联合报系”王惕吾的财产继承人能不知道吗?



除了王惕吾与王永涛以外,军费黄金有没有支持过其他报人呢?在1950年以后的几年中,笔者在家中曾见过王惕吾与余纪忠同时来便餐。不知余纪忠名下的当时台北另一大报《中国时报》有没有从财务署保管的黄金中得到资助?照常理来看,如果“中时”知道对手“联合”从总统府拿了几千两金子,难道不会要求同等看待?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题目。

第三、四批运离上海的黄金纯银

在第6章已提到,在1949年2月7至9日,曾有黄金60万两由上海直接空运到台北。这笔黄金是宋子文在2月里给蒋介石的密电里提到的,也是央行前后两位总裁提及的原准备让老百姓用金圆券可兑换的黄金,由于黄金挤兑惨案而停止,总数是82万两(俞鸿钧1949年1月28日给蒋介石的密电),但到2月10日央行就只剩下20万两,是刘攻芸在国民党政府极巨大的压力下同意让民航(2月7日)、军机(2月8—9日)搬走60万两到台北财务署的金库——大溪档案里没入账,这是绝密的军费黄金,与空军衣复恩(图16.15)的回忆相契合(第6章),这是第三批军费黄金。



图16.15 衣复恩(左前)的这架C-47运输机就可能运过黄金。他回忆,在1949年(5月前),曾率“七、八架飞机奉空军周至柔总司令命令运一批东西从上海到台湾,后来他(周)有当面对他们说这是黄金”(是第三批)



图16.16 1949年黄浦江边正在装载运台“物质”

到5月15日,汤恩伯向上海中央银行下手令,剩余20万两里,除5000两黄金及30万块银元之外,都转作军用(按:即第四批黄金也作为军费)。央行清单里,就有黄金近20万两,银元120万块(包括“半圆”,即“中圆”,其重量只有“袁大头”的一半,每枚是13.5克,见图3.15),用船舰运走。前述许多目击证人都指出,从5月18日到27日,国民党军队弃守上海,金银大都能运出,少数银元、银锭没运走,就抛弃在码头上。

这些金银,由于参加运输的人员、船只(见图16.16)众多,账也难算,相信它们一运到台湾,就被转运到台北集中管理,但缴到哪里,缺少数据。但在本章第2节中赵志华提及1950年经手“财务署”金库兑换黄金(换成台币)有12次之多,就近百万两,应是第二批剩余的20万两,加入了第三、四批(表1.1)及国外运回的黄金。

汤恩伯有没有拿到“好处”?请看周宏涛的记录:

……被师枢安(Robert C. Strong,美国驻台代办)指为无能的汤恩伯,就闹出一个影响民心的谣言。(1950年)2月2日,“路透社”自东京报导,蒋公“透过一位中国的高层官员在日本东京近郊买了栋有22间房间的华宅”。这是绝对错误的消息,我奉命向东京查究,否认了此报导,驻东京代表团团长朱世明覆电说,确实有个中国外交顾问花了3万美金买了那栋房子,此人为王文成,是汤恩伯向蒋公介绍派到驻日代表团担任编制外顾问,王文成已经向朱世明承认,他是代汤恩伯准备的。汤恩伯在1948年底举报了曾对他有恩的陈仪意图投共,其后奉命防卫上海、金厦。政府迁台后没多久,他以召募日籍志愿军为由,没透过外交部门任何安排,买了机票就企图赴日,因未获签证在机场被拦住。汤恩伯在国家危难之际,却有此举措,蒋公因而在得知他在日购屋的隔日,就下令管制所有官员出国……(《蒋公与我》)

看过上一段,请读者自己下结论吧!

这第四批金银也是军费。到了台湾,黄金银元部分可能转到财务署,



而银锭、银砖最可能就是上缴到“中央银行”台北的负责人,然后转存台湾银行。这些金银,由于参加运输的船只、飞机人员众多,除非将来有新的资料出现,账是无法算清楚的。连黄金究竟是20万两,还是1975年4月29日《中央日报》所称这最后一批蒋经国、汤恩伯督运的黄金一共是40万两(甚至更多),都无定论。我们应知道,兵荒马乱中,军舰和船只是主要的运输工具,在12艘以上。在炮声中,都是装载满就开航,无人监运、无人记录。



图16.17 1949年5月守上海的汤恩伯,争取转移最后一批国库金银运台湾的时间,但蒋介石6月26日日记:“……约董显光、汤恩伯来见,对汤沪战撤退以前慌忙困遁而未能充份准备,且未及时通知将领,致被隔被俘者大半,闻之痛愤……”此次面训后,汤当然心不安,或导致其1950年2月意图出走日本

内战结束时“财务署”保管军费还剩多少?

到大陆军事行动结束后,“财务署”还剩下多少军费黄金?这确数是没有人知道的,如表16.3估计是近100万两。从前文已知,早在那年6月中旬已由蒋“分配完毕”(表16.4),这分配,其实就是预算,并没有“花掉或用掉”,如前述的“渝穗款”43万两就是在财务署保管中,是各方想争取的。如表16.1所示,剩余的与第三、四批及美国运回黄金合并,均作军费用。但到军事行动在大陆结束后,到底还有没有剩余,据詹特芳(第18章)回忆:“(11月底)到重庆解放前夕,第二批黄金在台湾财务署尚存22万两。”从表16.1与图12.3看,先父记录与大溪档案相比较,此20万两左右的余数,是可信的。12月还有剩余(先父12月5日在成都呈蒋介石报告,第15章)。

但詹特芳秘书没有介入第三、四批黄金,此两笔数是80万两。如上述,6月底在广州时,财政部长即曾说每月军费是1500万银元,约20万两

黄金。1949年6月国民党军队部分已以金银发饷(见第12章),6月底陈立夫更主张以银元发薪以维军心,总之,到12月底,新旧银元六七千万枚已用尽(由菲律宾运回的除外),而黄金也用去60万到80万两,而大溪档案记录是厦门黄金用去78万余两(表16.1)。

后来撤到成都之后,又陆续由台北运了七八万两到蓉城及海口作军费。这些黄金在“央行”的记录里有[见图13.7中的(A)和(C)],是1949年12月6至26日支出的。这些“财务署”保管的黄金,也向“中央银行”报备,是李光烈和董德成参与押运的。

作军费用存在厦门的黄金(1949年的第二批),在这年内战时,由先父经手在内战时用去了78万两。但又补上上海直接空运到台湾的第三、四批的70万至80万两(表1.1,16.4),略超出原来的99万两。最后,赵志华点明(见本章第2节),当时(1950年初)“财务署”有100万两左右的黄金。美国、日本等地运回的黄金在大溪档案中就有近24万两(表1.1),但都已用于8月29日至9月15日广州、成都的军政费[图13.7中的(B)]。半个月就用去20万两,其中包括先父“违旨”运广州、成都的7万两(参见8月30日先父日记,第14章),这里也旁证了1949年8月美国运回台湾的黄金也在财务署保管的军费里,否则先父怎么可以不经蒋介石或中央银行同意就可支出,由台北直运广州,存财务署收支处里,让“财政部长来借用”?

1949年1月央行转存财务署7000万美元外汇作为军费(按:此处仅算存于中央银行,未计入中国、交通及农民三家国家银行,显然,除军费外,还有其他外汇储存。而且军费“草约”只拿国库里的半数),另外用于军费的其他外汇更少被提到,只有上文提及的于宗先的资料:“从49年6月15日至50年底的一年半内计抛售黄金145万两,美金6600万元,以建立台湾人民对新台币的信心”(于宗先总主编,《台湾货币与金融论文集》,台湾:联经出版社1975年版。于宗先博士曾经担任台湾大学教授、“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现任“中国经济企业研究所”所长、台湾“中研院”院士)。显然,在1949年1月,先父与财政部长订“草约”时,国库极可能有1.4亿美元外汇,先父保管其中的“半数”,也就是詹特芳所说的8000万美元,也就是蒋介石1949年6月1日日记中的“七千万美金之逃



避”(第12章)。试想,如无隐藏的7000万外汇作为军费,大陆作战一年后,还能有6600万美元抛售在台湾,来维护新台币的币信?

1951年2月9日的台湾当局财经汇报上提道:“黄金、银元集中央行保管。”此时,“财务署”“保管款”里的大量黄金已由赵志华(代表当局)等人经手,逐月逐旬转给台湾银行“购买”新台币,作为军饷发放出去了,这些黄金也就成为新台币准备金的一部(图16.5)。整整十年后,到1961年6月底,先父记下:“财务署尚存:黄金6013两;银元25359元;美钞45516元……”这些金、银、美钞必是早年剩余的,可能包括蒋介石私人的“特种保管款”4200两黄金在内。余下可能就是重庆财务署柜台上李光烈、詹特芳所说的那几大块无主的黄金2000两左右。据董德成2009年再提醒笔者,“财务署”存的这些金银外汇,是蒋介石1950年3月“复职”后的“小金库”,当然以上数目是蒋介石用剩的。

黄金支出总账

关于上海运出黄金的总量,1958年俞鸿钧以“行政院长”的身份在台湾“立法院”回答质询时说:“库存黄金抢运台湾,因系于非常情势之下奉命作紧急撤退,致携带账册不全,且所有原经办会计出纳等人员未能来台,致对撤退账务无法清理……”其后,因应外界传言有黄金短缺之嫌,1953年3月台北地方法院向“央行”调查卷宗,之后至1956年的三年多里,陆续有“监察院”三次及“审计部”一次的调查,“详查有关案卷及账册凭证,惟因账表残缺不全”,遂不了了之。

笔者以所公开的档案与先父有关军费的记录,来作一综合的总结。从表1.1可见,1948—1949年,国民党政府总共“收入”黄金在465万至487万两,蒋介石把其中约160万两命先父的财务署掌管,作秘密黄金军费,以避免立法院及李宗仁的监督与追讨,因而均不详见于大溪档案及两岸“中央银行”档案卷宗里,大溪档案里只有约300万两(表1.1)。但其他100余万两泄露于刘攻芸(央行总裁)、徐堪



(财政部长)及周宏涛(蒋介石秘书)的记录里,笔者已把这些资料于前数章呈现给读者。

最为模糊的部分是金圆券发行初全国向民间及私营银行金融机构所收兑的黄金量,这是中央银行档案里最为“残缺不全”的部分,也是最为人民痛心诟病之所在,也是央行内部最容易“上下其手”的地方。如这批档案不在台湾,第一选项应是已被央行“别有用心”的人士销毁,其次也有可能是在战乱中遗失。如还在大陆,部分应在广州或重庆的“央行”里,除非已被保存,否则时间过了一甲子,沧海桑田,找到的机会是渺茫的。

现在要来看看这些黄金是用在何处,用途为何?从表 16.5 可见,如以全部 480 万两黄金来算,1949 年用于大陆军政费用是 155 万两(其中 24.9 万又运返台湾,见表 1.1),其余近 330 万两在 1949 和 1950 两年用存于台湾,其中军费为 110 万两,政费为 90 万两,其余为新台币准备金,至今尚有约 100 万两上海黄金储存在台湾文园“国库”里。

表 16.5 上海运出国库黄金之用途(1949 年 2 月—1950 年 12 月)

支出项目	黄金(市两)	相关资料	备注
拨付台湾银行	1 200 000 ^①	新台币准备金	现尚余存约 100 万两大陆黄金
财务署军费(大陆 1)	786 500	大溪档案	第二批沪运厦黄金,22.6 万运返台 表 16.4
(大陆 2)	383 100	大溪档案	表 16.1
(台湾)	1 105 100 ^②		包括 1950 年 10—12 月每月 6 万两军费预算
补助政府经费(大陆)	385 000	2.3 万运返台	表 16.1
(台湾)	226 000 ^②		表 16.1
(估计财务署保管秘密军费中支出台湾军政费用)	(600 000)		注②



(续表)

支出项目	黄金(市两)	相关资料	备注
台湾《联合报》开办费	3 000		及不知数的外汇
财务署剩余保管黄金	6 000		1961年先父记录
合计	3 945 700 (4 545 700)		

注：① 1950年底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是1 300 000英两,是新台币之发行准备金。

② 此两项使用在台湾的军政费用,在公开的大溪档案里仅约133万两,但据徐柏园(“央行”副总裁,著有《光复前后的台湾经济》)及周宏涛(《蒋公与我》)的资料,在1949—1950这两年内,补助台湾军政费的黄金在200万到215万两,与大溪档案相差就达60万—80万两。

1949年用于大陆的军政费用,当然不能只计155万两的黄金,也使用了近亿的银元,又价值100余万两黄金,以及数千万的美元。这最后一项,很缺资料,“内战时美元外汇的使用”将是个很可作的论文题目,如上文于宗先的论文中提及的可信的外汇数据,内战中的有关资料应在台北的“国史馆”等处。



第17章 自述——旁观运金的岁月

从一个大环境看,作为一个海外的流浪华人,实在是微不足道,但笔者觉得,野人献曝,也许个人的一些亲身经历可供国内年青朋友参考。谈谈笔者这个平凡的小人物,也能反映出国共内战时的众生像及那运金岁月的点点滴滴。

幼年与教育

一个平凡的人,出身于一个平凡的家庭,幼无大志,只想平平淡淡地过此生。作为一家老六,我常常想,如果再晚些年,一般家庭不会生五六个小孩的,这个老六是多余的,尤其是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我是不应该到这个世界走这一趟的。但是,既来之则安之,本本分分地做一个人应该做的事,尽一个人应尽的义务,受应受的教育,在社会做一份工作,养一个家,平平静静地走完这一趟人生。但是,由于一个念头,一个决心,使我走上了一条崎岖的人生道路。这条比较艰难曲折的路,说来应与先父无关,但是他如果稍为“尽”一点做父亲的心意的话,也许我的路会比较平坦点,少些转折回旋,少走点“冤枉路”。但是,当走过了这一段崎岖向上攀登的道路后,我不禁长嘘一口气,幸亏在海外没有先父经济上的助力,现在可以引以为傲地说,靠自己两条腿走出了自己的路,在国外奋斗了40多年,没靠父母亲一个钱,即使是来美国的机票也归还了先父向公家借的钱。这使笔者心甚安,尤其是后来知道了先父曾参与了具有争议



性的上海央行的大部资金(金银及外汇)转运台湾。

读者一定会问,他接触了这样庞大的资金,有没有拿非分之财,说明白点,也就是问他有没有贪污过?经过了十多年的寻觅,料理过他的后事,了解了他的全部积蓄,我可以骄傲地宣称,他没有贪污国家、人民一毛钱。但如问,他有没有接受蒋介石及上级的馈赠与“赏金”?那我只能承认说:“有”。至于他的上级给了他多少,他在1948年底到1949年的上半年拿到了两笔上级的馈赠,前一笔早已公之于世,是詹特芳披露的,是蒋介石给的,为乡下叔曾祖母的治丧费;后一笔是个谜,据我手上的有限数据显示,是由他的顶头上司联勤总司令“逼着拿”的,先父“接受”得似乎不情愿,十分勉强,也许他认为有问题,是“不义之财”。据年长的亲人在2009年告诉笔者,当时先父曾说:“如不拿或会被‘灭口’”,可能连先母都不知道,但曾立即向蒋介石报告过,也批准了(见敝著《黄金档案》及陈舜畊著《铁氏外传》)。

这后一笔钱到手就捐掉、分掉了,多半资助了部下和有需要的亲友、学校(如台北沪江中学、镇海北仑的七星延陵学堂)以及老人福利机构(如台北“松柏之家”)。这是他去世后我在偶然的会里才知道的,是他一生心中的一个“结”,如果他逝后有知的话,会赞成把它公之于世的,我也愿意说清楚。笔者心中坦然,从中没有得到一分一厘。何况他一生对国民党政府、对社会的贡献早已超过此数的十倍、百倍。更何况那些曾受他资助的人,也多是诚诚恳恳为国家默默工作的人们。受他捐助的学校、老人福利事业,都是社会教育公益机构(第8章)。如有兴趣知道细节,请看笔者另一本书《黄金档案》(台北时英出版社2007年版),此处只能从简。

现在回来谈个人。最早的记忆是在大人的肩上向下望,是一条黑石炭铺出来的小径,大概是在成都的空军宿舍外面,据母亲说,我那时大约是两三岁。1939年秋,在日寇的一次白日轰炸下,我生于华西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半个多世纪以后,我1996年第一次访问大陆,就是去成都华西医科大学访问的。

从有记忆开始,家里用度就很“拮据节俭”。成都是伤心之地,小妹妹兴静不到3岁就夭折了。“穷”、“营养不良”都是当年抗战中大多数公务



员的共同遭遇,吃的是发霉的军粮,三餐除了霉米,没有什么下饭的菜。卫生条件不好,身上长满了疥疮。母亲生我时已四十高龄,接着又怀了妹妹,我没奶喝,是喝米汤活下来的,真是先天不足后天又失调,能活下来到古稀之年,没跟着妹妹一起夭折,实在是幸运的。在重庆念小学,不记得有任何玩具,只记得生活跟垃圾场很接近,洗疥疮在垃圾场边,上学校走的也是经过垃圾场的小径。现在想起来,住的一定不是什么高尚住宅区。



图 17.1 1940 年蒋介石(前)在重庆复兴关“中央训练团”,右为实际主持人王东原

抗战还没胜利,先父就被湖北省主席王东原(图 17.1)拉去做财政厅长,日本投降后并兼管敌产,这当然都是“肥缺”,但是王东老很聪明,知道先父不只是可以做事的人,而且是不易腐化的人。那时湖北战时省会在恩施,父亲还没有上任,在途中就被抢劫了,那当然让战区长官陈诚很丢人。事后,劫匪都被抓到正法了。母亲和我幸而没跟在边上,没遇上这惊险镜头。抢了一个两袖清风、还没上任的财政厅长,土匪也是够倒霉的[见冉光海著《中国土匪》(重庆出版集团 2008 年版)及第 8 章],至于省政府人员的薪金及办公费有没有在车上一起带过去,就不得而知了。

我和先母是抗战胜利以后才去恩施的,记得坐着一部已于前述的两吨半十轮美式大卡车,同行的人中有位熊行长,去接任湖北省银行行长的。只记得山路迂回曲折,原本就易晕车,这种山路更是让人躺着爬不起来。跟在母亲边上,我看到一个镜头,就是熊行长在途中停下来时候把玩一把银色手枪,当然车队还有其他武装人员,这次省政府的家眷不能再被抢了。

对恩施的印象不是很清晰,感觉上是落后与阴暗,灯草油灯就是在这儿看到的。续行到汉口,住省银行的宿舍,是邻街的楼房。只记得后园里有很多橡皮筋,红红绿绿的丢了一大堆。大概是日本投降后,不愿把这些



物资老老实实在地交出来。日本岛国褊狭,人也心胸狭窄,专会搞这些小动作,以后还见证了其他类似的情形。不久就迁到武昌了,财政厅长的官舍是在兵工厂外的一栋两层楼房,大概是接受的敌产。初去,后院还有用砖头造的防空洞,省府还叫来徒手日本降兵搬砖,我在房边看他们“嗨哟嗨哟”地叫着传递砖头。这些日本兵,大概是原来驻守兵工厂的。印象中,这些兵比较矮小,难怪古称他们为“倭人”。



图 17.2 (左图)日本天皇裕仁无条件投降的诏书 (右图)日本降兵

曾见到拖吊进坦克车,这个兵工厂的规模应是不小。去我们家要经过一个足球场大小的池塘,也在这兵工厂边上的大院子里,池塘里有鱼,周遭就有人钓鱼,大概也都是省府或与兵工厂有关的人们,常常就看到钓起炸弹、武器等物,这当然又是日本人不愿把武器交给胜利国,就抛弃在这池塘里,幸亏炸弹没有爆炸,否则像我这样不知厉害的小孩跟着看热闹就倒霉了。钓鱼当然是春夏风和日丽的时候。有一天,池边出现一条比小手臂还长的乌鱼,在外围垂钓的人们呼叫来了兵工厂的卫兵,用步枪一枪就打中了,那条鱼大概是为士兵们晚上加了菜(按:这样的射击军纪也让人咋舌)。

到了1947年底,父亲就离开了武昌到南京去做国民党军队财务署长,历史的大舞台正把他推移到一个大漩涡的中心。他是一个奉公的公务员,从不去钻营谋取自己的前程,所有职务都是听上级的调遣。家人是1948年初乘江轮由武汉到南京的,记得那是一次愉快的旅行,两岸风景宜人,我在船弦两边跑来跑去,记得江面辽阔,长江水很清,不像我

1996年去三峡、武昌时看到的水那么浑。近南京的时候,岸边的霓虹灯以前比较少见,觉得很亮丽新鲜。到南京住进华侨路的新家,在新街口附近。

在南京待了差不多前后一年。1948年的南京是很热闹的,这里是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年初就准备召开国民大会,美国早在两年前已宣布放弃调停国共冲突,内战正轰轰烈烈地在东北及其他各地燃烧着。到了4月,总统副总统选举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暑假快结束时发行金圆券(8月19日),记得回学校(第五区国民小学)去注册念四年级,带了张5元的淡绿色有林森头像的新币(见图2.8)去,换找了很多零钱回来。新币是美国钞票公司印的,纸张好,印得精美,又很“值钱”,让人爱不释手,没想到,不到几个月,这张钞票丢在马路上都没人捡了。

小学里,老师教唱左派歌曲,“天快亮,更黑暗,路难行,跌倒是常事情……”这是1947年延安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的时候唱的。到1948年,国民党军队在军事上都不顺利,开始走下坡路。入秋以后,临近的新街口是新闻发布中心。

1949年过了阴历年就搬到了上海,入住多伦路31号的一栋两层楼弄堂式房子,转学进入临近的崇农小学,那时后面是铁道,不像是很高级的房子。但多年后回上海,铁道已撤除,才知道这里是名人巷,以前鲁迅常



图 17.3 多伦路家后面就是铁路,1949年入春难民很多,有时连火车顶都挤满了人(谨谢网络图片)

去的,他日本友人开的“内山书店”也在巷内,还兴建了路边的铜像。知道过去居住的名士们,真令人感到“与有荣焉”。但那时上小学,走路要绕过铁道很远,而学校就在住房后面越过铁道就是,有时懒,就翻墙越轨,跨过铁路就到学校了。这年入春,难民很多,有时连火车顶都挤满了人,弄不好就被电缆刮掉到铁道上碾死,有一次同学就带去看了一具被压碎的尸首。

到了4月里,战时的气氛就很浓,街

头巷尾都有矩马沙包(图 17.4),由国民党军队驻守。进了5月,就听到炮声隆隆,父亲更忙,经常不在,因为从1月起(如前述)他肩上就加了看管中央银行国库大部资金转作为军费的责任。金银等存在厦门、台湾,政府已经搬到广州,所以他等于在四个城市上班。何况还要支援各地的军费,像福州、汕头、海南岛、重庆等地。此外,蒋介石总裁随时召见,高雄、澎湖、舟山都是蒋驻蹕之处。母亲那时已



图 17.4 1949年4月里上海的战时景象,街头巷尾都堆着沙包,由国军驻守,士兵的左侧是外滩黄浦滩路,尖形大厦即海关大楼(见图 3.7 至图 3.10)

已经被不安定的搬家生活给搬怕了,八年抗战也是搬来迁去,生活苦不堪言,这次她似乎有意不再动了,认为何况这次敌人是自己中国人,她是完全不懂政治的,她的教育程度是初中,根本连共产党是什么性质都不清楚。大哥、二哥在大学,受左派宣传,都认为中共来只是“解放”,国家的前景会更美好,老百姓的日子也会更幸福。先父的工作当然是保密的,他又是守口如瓶,在家从不谈公事的,那时已经是献身“党国”了,跟着失败的蒋介石,自己将来葬身何地都不知道,怎样劝服自己家人去跟他去“吃苦”,走艰难的“流亡”之路——去台湾?

有人说蒋父子怕亲信叛变,就强迫地把他们家属先送台湾,但这似乎不适用于先父。那时上海已被围,笔者是一个小学四年级学生,当然没有发言权,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5月14日,父亲从广州飞来上海,是奉蒋介石的命令,来搬走央行最后一点黄金(近20万两,第四批),他记下“多伦路已列入警戒线,出入不太方便”。请留意此处,父亲仅仅感到进出不方便,并没有写下“这个家要不要赶紧逃命”,这也表示他根本没有受到蒋的任何压力或指示,要他把家眷转到“安全地区”,间接地表示了蒋介石父子绝对信任他的忠诚。15日晨,他还同周至柔(空军)总司令飞去大场、龙华、浦东上空视察前线,只见到处都是火头,表示解放军已经在东面、南

面、西面合围了上海。下了飞机,蒋经国也刚由台北飞到,在机场会面,随着还一起用餐,这一天他忙着公事。

先父第二天(16日)上午去了汤恩伯的总司令部,再送(军费)节略到周(至柔)公馆,转交蒋经国。在谈话之间,周顺便问先父:“你的家眷呢?”周与父亲是多年老友,在抗战前的航空委员会时代就是老同事,所以才关心到父亲的家眷。父亲告诉他还在上海,周至柔就说:“赶快走,川沙今早已经‘陷落’了!”川沙在上海东南面海边(图 17.5),表示上海的国民党军队除了海、空路以外,陆路已完全断绝了,四周被包围了。这时已快中午,父亲赶回家,问母亲要不要走,说是周至柔劝的,母亲知道周是个精明能干的人,就临时决定走了。不到两个小时收拾简单行李,坐吉普车去江湾军用机场(虹桥与龙华民用机场已近战火),那天是淡淡的阴天,“隆隆”的炮声中去机场的路上仍历历如在眼前。



图 17.5 国民党军队守将石觉在回忆 1949 年 5 月 13 日前后的上海保卫战的攻守时手画的图,红色是解放军的攻势,川沙是 16 日易手的[《石觉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口述历史丛书(10),1986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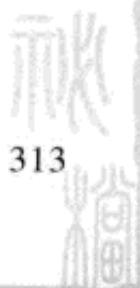
我们乘坐的是一架 C-47 型军机,走道靠机门边上,都是小木箱,里面装的是炮弹,这架飞机很空,除了我们这家人外,几乎是空机,如要装载黄金的话,三四万两应该没问题。看先父日记:“……因赶往机场送行,俟三时起飞后回……”

C-47 巡航速度为每小时 175 英里或 280 公里,上海到台北距离是 800 公里,飞行时间约三小时。松山机场下机应是春末下午的六七点,天还很亮,是财务署台北收支处处长王逸芬来接的。从机场出来,道路两旁蕉树水田,白鹭飞翔,一片南国景象。那是 1949 年 5 月 16 日夕阳西斜近黄昏的时刻,踏上台湾的土地,是笔者生命中一个重要的分界点。15 年后,我从同一机场挥别台湾与父母,去美留学,又是另一起点。浮生如梦,梦中也有段落。

此时,空军子弟小学已在台北复校,就在附近信义路的空军总部边上。1951 年我升学考,没能考上台北的省立三个中学(建中、附中及成功),最后只好上近郊的县立板桥中学,这是一个三流的初中,专收容从台北落第的三流学生。初中三年混毕业,又要经过台湾严格的升学考试,还是糊里糊涂,随遇而安。父亲还是忙着他的“军国大事”,大概连我上几年级也不知道,完全是“自由主义”,也就是让我们自由发展,“自生自灭”。结果也不知道是什么运气,以最后一名挂尾进了台北的省立师院附中(后来改为师大附中)。这下,第三流的初中生,进了一流的高中,开始吃苦了。又准备投考台大医科,那科系是全省最难考的,需要最高分的,更须加倍努力。我们家没人上私立学校的,那时高雄医学院刚成立,但学费较公立学校贵 20 倍,入学志愿是不会填它的。另外,像台中的东海这样的私立大学也不敢填。

漫长学医历程

经过三年的努力,1957 年夏大专联考,结果台大医科是六门课平均 67 分录取,又是全台最高录取分的科系,我考了 66 分,只能录取第二志愿。我忍受了六年的牙科生涯,中间曾去见周宏涛夫人朱光润(那时住台



北新生北路),她是位留美牙科教授(图 17.6 左图),去请教她美国学医情况及牙医前途[朱大夫不幸于 1972 年去世,两年后周与“乔”结良缘(图 17.6 右图)]。



图 17.6 (左图)先父老友周宏涛与夫人朱光润医师,一位留美牙科教授(50 年代)(右图)周宏涛与续弦夫人“乔”在台北园山大饭店前(1980 年)

周宏涛与其先后两位夫人都与笔者有“一面之缘”。我于 1980 年回台省亲,这对“乔、涛”“新婚”夫妇曾邀先父与笔者在台北园山大饭店(图 17.6 右图背景)晚餐,可惜没请教运黄金往事(当时笔者也欠缺对此事件的基本了解与兴趣)。依照他的日记资料写的《蒋公与我》是近代史的重要参考书,不幸是请报人代笔的,不但失去“原味”,而且没有参考其他关键文件,只以他手头的资料以偏概全,至今为一些别有用心人士断章取义地引用。有两个明显的例子:其一就是书中偏低的央行“剩余”黄金量;其二是仅仅隐约地提到密运的军费金银外汇事。以他的历史和职位很可以在书出版(2003 年)前作进一步探讨,而未能把握机会为民国史留下完整的记录。手不够勤或又误托非人,是国民党高级党政干部官僚的通病,写书的一番美意反成一历史憾事,或许也包括蒋经国误用李登辉,为其表面恭顺所蒙骗在内,当然这是笔者春秋责备贤者的管见。

到了大学第四年以后,幸亏遇到一位外省同学,也是牙科,但是高两班“留级”下来的一位喜欢写文章的同学王尚义,也就是后来在台湾校园文学史上颇有名气的作家,以写《野鸽子黄昏》、《从异乡人到失落的一代》等书而闻名的。那时候他已“超越”了牙科医科界限,似乎已经到了



“较高”的一个层次，走上文学、哲学的路。有这么一位“同病相怜”、相濡以沫的同班同学，我才稍稍转移了学“牙”的抑郁心情（详见《黄金档案》）。

我是1963年6月从台大毕业的，毕业就要当兵是天经地义的。先父绝不会认为他的子弟应有任何特殊。我进入台北近郊卫勤学校预备军官十二期的第三梯次，是次年8月底结业。我被分发到湖口装甲兵，离台北一小时左右车程。1963年1月21日我亲身经历了一位名叫赵志华的副司令（图17.8）的意图叛变。赵司令与前文那位代表总统府管财务署地下金库的赵志华同名同姓，但不是同一人。



图17.7 笔者1963—1964年在国民党军队装甲师担任卫生连的军医（后排左二），老友朱乃欣教授（中排左二）是神经内科名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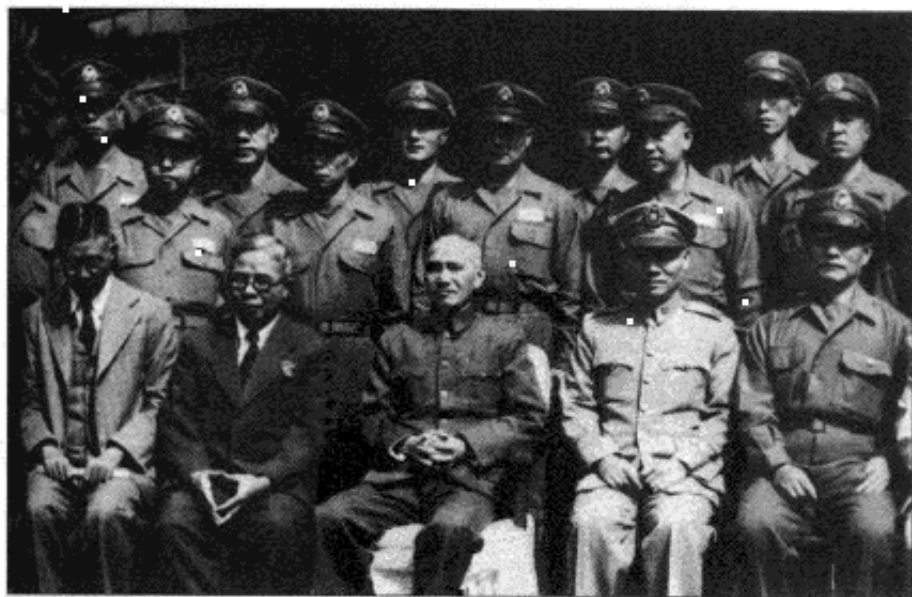


图17.8 1949年10月16日台北草山（后改为阳明山）革命实践研究院第一期开学典礼，蒋介石中坐，赵志华（最后排右一，高瘦者）是蒋纬国推荐参加的学员，14年后，笔者在装甲师服兵役时，亲历台湾唯一一次军事政变企图的整个经过，就是目睹这位赵将军公开鼓动的



图 17.9 1964 年 8 月笔者出国前夕与先父及先母

“兵变”之前后,笔者办了留学申请的诸般繁杂事项。当年台湾出国还要经过留学考试,留学考早在入伍前已发榜,英文考了 70 分,算是不错的,因为 70 分已够公费留学资格了。这是一年多来收听台北“美军电台”的效果。并获得圣路易华盛顿大学的生理化学科全部奖学金,除免学费外,还有月俸。先父向蒋经国负责的“国安局”借了约 1 500 元美金,买了一张去洛杉矶的单程机票用去 325 元。我于 1964 年 9 月乘华航班机飞洛杉矶。

到了美国,坐灰狗巴士(为的是比坐飞机节省 50 多美元)从洛杉矶去圣路易城走了整整两天两夜。我在日记本上记下:“出国负债总额共美金 720 元”。来美不到一年,母亲写信来说已经来讨债了,并告诉我,当时先父很感慨,告诉母亲:“这是生平第一次被人讨债!”幸而,我来美后省吃俭用,住在一位老太太家中的阁楼上,每周只要 10 美元的租金,积蓄的钱刚好够还债。由银行开出一张 1 500 美元的支票后,全部存款就只剩下几十元了,但心中却还是满踏实的,这大概就是因为有年轻人的朝气吧。相信我个人的这点自食其力的经验,是 60 年代大多数台湾留学生所共同的。

初去,就被教授罗森索(Harold Rosenthal,图 17.10)指定一定要修一门校总区化学系开的课“物理化学”,这门

“兵变”之前后,笔者办了留学申请的诸般繁杂事项。当年台湾出国还要经过留学考试,留学考早在入伍前已发榜,英文考了 70 分,算是不错的,因为 70 分已够公费留学资格了。这是一年多来收听台北“美军电台”的效果。并获得圣路易华盛顿大学的生理化学科全部奖学金,除免学费外,还有月俸。先父向蒋经国负责的“国安局”借了约 1 500 元美金,买了一张去洛杉矶的单程机票用去 325 元。我于 1964 年 9 月乘华航班机飞洛杉矶。



图 17.10 使笔者有机会来美念书的罗森索教授夫妇,20 年后(1985 年)他们来探望笔者(与大女儿)



课需要微积分与化学的基础,是这位犹太教授测试外国来的学生的一个“试金石”,如果能通过,念博士就没有问题,因为一般美国教授对外国学生的程度都很难确定,就用这种方法来分辨学生的程度。在第一次物理化学月考之后,罗教授的观感就完全改观了。那次月考,我认为很容易,差一点拿了全班六七十位同学里的第一。一个学期过去了,班上三分之一的同学拿到F被刷掉了,我没拿到A只拿了个B,这是研究生起码的及格成绩,但罗教授已经很满意了。但我觉得这个科太小,除他外,只有另一位印度籍助教授,似乎也不太满意,言谈之间这位助教授也想要走,所以我就又开始申请学校。那时有位板桥老同学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那边中国同学多,大家相处都很愉快。那时还没有大陆的学生,也没有什么“台独”活动,台湾来的同学都还比较单纯。华大的生化在美国也是很著名的,后来更是出名,90年代还出了两位诺贝尔奖金得主,都是当时的老师,教酵素学的。

1965年夏天,又坐灰狗长途车离开圣路易城,那年密西西比河边上不锈钢建的新月弓形的“去西部之门”刚完成。过加拿大,沿着美国的北部90号公路到西海岸的西雅图,那时刚开完西雅图的世博会,新建的太空针(Space Needle)很壮观。

生化系的功课很紧,同学的水平很高,所请的教授也都是第一流的。后来,1992年,克莱布(Edwin Krebs)及费雪教授(Edmond Fischer)就得了诺贝尔奖金,当时实在看不出这两位并不像很“司马特”(smart)的教授会得诺贝尔奖(酵素学)。凑巧那时病理科的史沫克勒教授(Edward Smuckler, M. D., Ph. D.)正要找一位研究生,他也是犹太人,非常聪明,极不信任一般的美国白人学生,一见到我就希望我转去他的实验室。由于史教授有医学博士的背景,我感觉在他的实验室会做比较接近临床医学的研究,对将来继续进医学院会有帮助,就在那年秋天转到史教授的实验室,做有关“化学启癌”的研究,这个决定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史教授的实验病理科里面的几位教授在血管硬化、癌细胞生长等方面都是位居世界前列的,所以我后来决定在拿到博士学位后再进医学



图 17.11 1969—1971 年笔者在巴尔的摩城的霍普金斯医学院就读

院,他们都很支持。我在史教授那里不到三年就顺利写完论文,在1969年就拿到博士学位,开始申请读医学院。很侥幸的是,我申请到东海岸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科(图17.11),这个学校的医学院当时排名全美第一(近年似也仅次于哈佛大学医科)。虽然这个学校是私立,学费相当昂贵,但幸而美国医学院的大门并非如一般人的错误印象以为仅是为有钱人所开的。史教授很可惜,才五十几岁就英年早逝。他太胖,事业正处于巅峰,在旧金山加大医学院任病理系主任的任内去世。

1969年初秋,我离开了山明水秀的西雅图,腰怀过去四年奖学金所存下的一点点钱,加上卖掉破汽车、照相机、望远镜和一切可变卖的东西所换来的现金,横过美洲大陆去巴尔的摩城。霍普金斯医学院给我部分学费奖学金,另外借些生活费用。周末或节日,美国同学去度假,而我这班上唯一的一个外国学生在这世界闻名的医院检验室里值夜班,从晚上8点到清晨8点,一夜可以赚上60美元,这样半工半借半读,两年后读完了医学博士的课。

转去芝加哥大学附属医院当实习医生时,我共欠了霍普金斯大学约5000美元,年息三分,毕业两年后开始,分十年还清。我终于凭借自己的努力,在1972年成为一名医师,医学博士,比起差一分进不了的台大医科,我所就读的医学院在世界医学院的排名上或是稍稍领先,但多走了七年的弯路。这整个学医过程,再从头来看,由于父亲的廉洁,没有自私地去攫取国家人民的钱财(虽然机会是太多了),而没有溺纵坏他的子女,我在这之前奋斗的14年,虽然曾经抑郁,有些彷徨,但从来没有气馁过,物质生活虽然很苦,但都撑过来了。如果当年他能“拿”或“留”些钱出来让我去念台湾的那些私立学校,会节省七年的曲折路径,但笔者无怨无悔,



这多花的许多年使人生更增经历,有更多值得记忆与回味的东西。



图 17.12 1981 年 2 月回台湾,亲祝先父 80 寿辰,蒋经国来亲贺,在台北家中与家母、笔者寒暄

甲状腺学研究 36 载

回西雅图华大做内分泌研究员是在 1973—1975 年。这一节是比较为医学专业者写的,如年青朋友希望将来走上医学或研究道路的,也请留意。

1971 年我在芝加哥大学实习,遇到几位内分泌方面的名教授,如 Leslie DeGroot, Sam Refetoff 及 Arthur Rubenstein。那年 Refetoff 是刚从东欧来的助教授,还在为他的终身教授职(tenure)努力。由于这几位甲状腺学方面的师长,也促使我两年后又返回西雅图华大做内分泌的研究生。当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华大有 Robert Williams 教授,他编的《内分泌学》是当时的标准教科书。由于对甲状腺学有偏好,就选了 Prof. William L. Green(卫格林教授)的实验室,他是哈佛大学英格巴教授(Sidney Ingbar)(图 17.17)的学生,而英格巴教授编的《甲状腺学》(*The Thyroid*)也是关于该专题世界上最著名的教科书。英格巴是位犹太裔教授,极为聪明,但无法戒掉烟,得了肺癌,六十出头点就过世了(1926—1988)。在华大内分泌科那两年,正是甲状腺素外围代谢的萌芽期,恩师卫格林教授(图 17.18)在这方面已做了些研究。我觉得他的柱状(column)法分离活性甲状腺素 T₃(由 T₄ 转换)过于复杂,就发展了 T₃ 的放免检测法(RIA),此放

射免疫定量法在那时正是发展的高峰期。1977年另一位犹太女教授雅萝(Rosalyn S. Yalow)竟然以此得诺贝尔奖,其实她不是发明人,是以前雇她做研究的教授伯尔森(Solomon A. Berson)发现的。对她的得奖医学界都觉意外,有人说大概因为她是犹太人,犹太人在诺贝尔奖的竞争中似乎是有些优势的,他们聪明、努力、团结,并且互相提携。

1974年暑期我返国探亲,就介绍有关T3放免检测法及临床应用给台大、台北“荣民”及三军总医院,这都要感谢台湾内分泌学会后来的创会主力台大陈芳武教授及“荣总”尹宗高教授的安排。那年暑假中,我也把T3放免检测法的抗体制作及技术转移给台大及“荣总”。在台大一群病童的血清测定中,我发现T3值偏低,尤其是脑膜炎及肺炎等感染较严重的病童。这也可能是现已被统称为NTI(非甲状腺疾病,Non-thyroidal Illnesses)在台湾较早的观察。

1975年的台北“国建会”与洛杉矶加大:W复合物的发现

1975年,由于我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担任内分泌科研究员时比较热心于华人小区服务,如每周一次义诊及其他社会服务(与华大同学创立人人服务社),而被推荐参加该年的“国建会”。“国建会”是“海外学人国家建设讨论会”的简称,有人说这是台湾当局的“政治大拜拜”,被选上的人以国民党党员居多,海外人士中既是学人又是国民党政府放心的人就不多,入选上的与真正的学人就有些落差,在美国西部就有开旅行社、做生意的学士和硕士也登上“国建会”海外学人的行列,让人替他们捏把汗。那一年参加的医界人士还有哥大的钱煦、华大的王三聘及夏大的黄昆岩,其他的学人有如佛教博士张圣严(即法鼓山圣严法师)(图17.13, 17.14)、文学界的吴纳孙(即鹿桥)、政界的陈履安(陈诚的公子)等。

其他名人高士甚多(最年轻、最资浅的大概就是笔者了,严格讲也不够资格)。张圣严在大会上提出的建议是有关妓女的福利及社会问题,让人起敬。会议期间,他还带着笔者两人到台北济南路的华严精舍去吃素菜席,那精美的素席让我这还在做研究的穷医生大开眼界。回美后,法师



图 17.13 1975 年蒋经国接见“国建会”行列：前右起依次为（张）圣严（法师）、笔者及钱煦教授夫妇



图 17.14 圣严法师与笔者 20 年后重逢于洛杉矶，法师已在 2009 年 2 月于台湾去世

也到了美国东部，在纽约附近修行并推广禅坐，我还留了些他寄来的资料。很高兴看到他声誉日隆，信徒日众，创立了法鼓山，在精神上洗涤社会众生，在海内外都做出了重大贡献。当年就看得出他确是位出世的高人，可惜已于 2009 年 2 月因拒绝肾脏移植，坚持“把健康的肾脏留给年轻人”而“提前”往生，享年 80。

2008 年我在网上见到法师在《从东洋到西洋》（1979 年）一书中提及 1975 年 8 月参加“国建会”期间的往事：“……由陈君驾车拜访了回国学人吴兴镛博士在台北市的老家，因他邀约了原任台大哲学系的教授陈鼓应，王晓波……”这也打开了笔者尘封的旧忆，当年陈、王等位是“台大哲学系事件”（按：国民党在 1972 年 12 月至 1975 年 6 月间整肃台大自由主义者殷海光教授的事件）里的敏感人物，但笔者是个无党无教无派无群、独来独往的人，不太注意政治风向球。是圣严法师在他的回忆录里提起此次聚会，才唤起我已遗忘的细节，现今法师已



图 17.15 先父（左）喜欢请客略作小饮，时年 88 岁（与笔者于 1989 年 10 月）

离尘世，骨灰业已散洒在台北“法鼓山”上的树林间（林葬），谨记于此，以纪念他这位继弘一法师之后的中华高僧。

那次邀宴“敏感”人物的盛会，先父也是全程参与的。这又让笔者想起另一桩先父自己邀请“敏感”人物来家共餐的往事，那人是柏杨。1953年春的一个中午，先父介绍了一位年轻客人“郭（衣洞）先生”，用餐时，只



图 17.16 1975 年“国建会”中与鹿桥（吴纳孙，《未央歌》著者，左）夫妇在台湾第一条东西横贯的公路上

听郭侃侃而谈：去年刚出狱，年初又被“（基督教）青年会”辞退了工作，认为外国人对中国人不公平，才开始写第一篇散文赚点钱。此次餐会也是《柏杨回忆录》里提到，才唤起笔者记忆的。那天，柏杨记下了先父对他的鼓励：“向我肯定一个基督徒也有爱自己国家的权利！”（台北《新新闻》2008 年），这是先父做人的原则，只有是与非，不管利与害。

哥大的钱煦是名教授，是台大老校长钱思亮的公子。那年带了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孩子，听说那时回台主要是为探他父亲的病，近年已被圣地亚哥市的加大拉了过来，2008 年加大还量身打造设立一个新的研究所请他主持。

另外，鹿桥也是位不世出的雅人（图 17.16），在两周会议期里，住中国大饭店，大概按姓氏分房是隔邻，谈起话来，哲思如涌泉，令人有荡气回肠之感。有一天，陈鼓应（台大哲学系）来见他，敲错了门，找到了我，我就带他去隔壁，讲到警备总部的刑讯，让人不寒而栗。陈走后，鹿桥跟我谈了些对人的“心中感应”，他说世人有好几种，有吉人，有凶人，有清人，有浊人，一谈话，甚至看一眼，他就可以感应到接触的是何种人。吴纳孙教授是智者、勤者，他的大著《未央歌》是他 25 岁时完稿的。美国圣路易的华盛顿大学，简称就是吴（WU），这就是他的车牌，当他从华大的考古学系



(曾任系主任)退休时,就把此一车牌送给了校长,为当年圣路易市的一大佳话,可惜他业已过世了。

1975 年我离开华大,转到 UCLA(洛杉矶加州大学),此后两年跟 Prof. David Solomon 继续做有关甲状腺的体外(InVitro)及体内的代谢研究。



图 17.17 1975 年 11 月在麦当劳老板别墅召开的西海岸甲状腺会议,二排中为太老师、英年早逝的英格巴教授,其后为笔者,前中为麦当劳汉堡创业人的哥哥(Dr. Robert Kroc),是位甲状腺学者

1977 年我离开洛杉矶的加州大学,就到长堤荣民医院开始自己独立的研究,至今已 32 年,很幸运地一直都得到荣民部(VA)在研究费方面的支持,1983 年在内分泌学杂志(*Endocrinology*)上发表了一篇有关 TSH 刺激狗甲状腺内去碘酵素的论文,当时算是一项创新发现,就接到费雪教授(Professor Delbert A. Fisher)的电话,那时他担任美国临床内分泌杂志(*J. Clin. Endocrinol. & Metab.*)的主编,表示希望能合作,把他那世界颇有名气的洛城加大海港(Harbor-UCLA)医学中心的临近出生(Perinatal Lab)的羊实验室的组织、血清等都送到长堤笔者的实验室来测定酵素及其他的定量,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于是,从 1985—1986 年开始,我们发表了一系列甲状腺素去碘酵素在胎羊各组织中成熟的过程,并对胎儿之低 T3 及出生时 T3 急剧增加的机制加以探讨。

1988 年我与洛杉矶的几位教授,像 Drs. Solomon, Fisher 及 Hershman 等谈起,南加州算是研究甲状腺素代谢的重镇,是否可以来一次国际会



议。一番努力之后,在许多前辈的支持下,于1989年9月美国劳动节的周末,在长堤海滨的玛丽皇后邮轮(The Queen Mary)上举办了第一届国际甲状腺素代谢会议。宾主到了一百多位,其中三分之一来自美国以外的14个国家及地区。日本包括长泷重信教授在内就来了十位,台湾地区也有代表。

这种交流对推动研究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在这会后,笔者的实验室就开始发展T4S及其他甲状腺素代谢的硫酸化合物的放免测定(RIA),T4S、T3S及rT3S的各种RIA都逐渐建立,就开始测羊及人胎儿血清,果不出所料,量非常之高。由Constant Infusion方法测定至少有百分之六十的T4在胎儿体是转换为硫酸化合物。由于测定方法的限制,这些硫酸化的T4、T3及rT3过去一直没有被人发现。在第一次大会后,笔者和费雪教授的实验室就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硫酸化的论文。到了1993年,由于该年美国内分泌年会将在洛杉矶附近的赌城拉斯维加斯举行,于是又筹备了第二届国际甲状腺素代谢会议。另一方面是有关甲状腺素去碘酶的研究。哈佛大学的Larsen教授的实验室有突破,发现第一型去碘酶(Type 1 Deiodinase)是一含硒蛋白质(selenoprotein),于1993年6月在长堤Sheraton Hotel召开的第二届大会主题是“分子生物学与替代径路”(Molecular Biology and Alternate Pathways)。

1995年,由甲状腺素代谢的硫酸化径路,无意中发现了个颇奇怪的化合物,它只在孕妇及胎儿血尿中才有,只可用笔者实验室发展出的二碘甲状腺素硫酸代谢物(T2S)的放免检测法验得出来。化学构造尚不清楚,可能与T2S相近,但不是同一物,命名为W复合物。而甲状腺学界中有人以为是吴氏复合物。有趣的是,小孩一出世,妊娠终结一周左右,就从孕妇血液中消失。由羊的实验中知道,此复合物最可能是从胎儿甲状腺素的硫酸代谢物(即T2S)进入母体后转换而成,可作胎儿甲状腺的功能指针,而甲状腺的功能对胎儿中枢神经系统(包括大脑、小脑)的重要性是勿庸赘言的。美国还给了专利权。1997年,天津医学院卢、方两位教授邀访,就把这测定技术赠送国内,期望能将此项研究发扬光大,将来普及,对世界上由甲状腺功能异常所引起的脑发育病变有所帮助。



千禧年,在台北来来大饭店又召开了第三届国际甲状腺素代谢会议(图 17.18),来了数百位国内外工作者。台北地主招待极为周到,全球各角落来的宾客都十分满意。2009 年 9 月又在加州长堤召开了第四届国际会议。



图 17.18 2000 年在台北召开第三届国际甲状腺素代谢会议,集全球精英,前右一为费雪教授,右三是大会主席林宏达,右五为恩师卫格林(大白胡子),前左三即是《甲状腺学》教科书的主编布瑞福曼教授,笔者立后排中

“中华世纪黄金教育基金”的构想:如何释出海峡两岸间善意

为何草此书?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要有公是公非,要求得史实真相。即使先父做错了什么事,也要找出来。有人会说他追随着蒋介石“助纣为虐”,把中国人民的血汗钱都“偷运”到台湾去了。这就是大错,是吗?蒋介石到了台湾,把央行的黄金做了新台币的准备金,曾把台湾建设成一个经济起飞、亚洲四小龙之首的经济小巨人(附录 4),在中国近代史上,除了他是抗战时期的领袖外(现在大陆已经慢慢有了公正的、超党派的评价了),他父子建设宝岛台湾也应是正面多于负面的。即使把眼光放大去看全球,今天台商游走在海峡两岸,尤其对中国大陆的现代化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这些也是与蒋父子有关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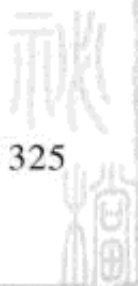




图 17.19 1998 年访问中国大陆时,蒙北京肿瘤医院张梅颖院长(左)百忙中盛意款待,曾在北京医院作专题医学讨论

1997 年 4 月,笔者在台北访问了先父旧属李光烈(图 9.3),写了一篇《上海中央银行黄金从厦门转运台湾的补充及一点建议》,在《传记文学》(第 70 卷第 4 期)上发表,提出以大陆央行运台黄金的一部分所生出的利息,建立一个“中华世纪黄金教育基金”,支持两岸交流,互相交换学生,以降低敌意,争取两岸和平的愿景。此文一出,一位资深报人金尧如(1923—2004,前香港《文汇报》总编辑)立刻响应写了《我举双手赞成吴兴镛教授之构想》一文(《传记文学》1997 年)。此“中华世纪黄金教育基金”之刍议,此外也承蒙医界先进北京肿瘤医院张梅颖教授(图 17.19)赐函鼓励:“您的建言抓住了根本点,如能实施,两岸年轻一代通过互

往学习教育,骨肉同胞消除隔阂,其意义之深远不可估量。他们将共同创造 21 世纪华人的光辉明天……”(1998 年 7 月 11 日)言简意赅,突显她为国谋之热忱。

金总编辑在《传记文学》上是这样写的:

……吴教授其文之最可贵处在于文末所提出的“一点建议”:关于成立“中华世纪黄金教育基金”之构想。这个构想就充分发扬了“医者仁心,医国医人”的中华文化之传统精神。

……我(按:指金尧如)在这里要请读者再体念一遍吴教授构想的源头:“1948—1949 年,大陆中央银行黄金(按:还有银及外汇)分批运到台湾,为早期台湾币值的稳定、经济的开展,及人民的向心,曾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在海峡的另一边,都认为这些黄金是以没有准备金的金圆券,以不合法兑换的手段搜括得来的。他们认为这些都是全中国人民的血汗钱。”



……在这一桩两岸人民历史沉积下的恩怨中,吴教授想到的是如何在两岸人民之间泯旧仇、添新恩,他体认到“两岸不能永远敌对下去”。他更希望:“从20世纪的九十年代起,海峡两岸应以和平竞争的方式来比赛,看谁能在21世纪的华人世纪的奠基上出力多。”

……这几句话,精神立现。不单是为消解眼前两岸“民怨”,更为21世纪的华人世纪的前程设想,他立即想到了大陆人民。他说:“华人的世纪奠基,最重要的也是大陆急待解决的问题是教育。我提出一个野人献曝的小小建议:可否把一部分大陆运台的黄金,做为‘中华世纪’教育的基金,这笔‘黄金教育基金’,保留在台湾……这笔基金的利息主要用来支付海峡两岸交换学生的费用上。以大陆的高中、大学及研究生来台就读为主,台湾学生赴大陆就读为辅。至于是否允许支持大陆的‘希望工程’,也可以细则规定之。”

……我非常赞成这个建议。我们知道教育为树人之道;树人为建国之本。吴兴镛教授这一建议对我们海峡两岸而言,尤其是对大陆,可为“医国教人”兼而有之。“台湾经验”更足以为大陆借鉴。1949年国民政府播迁台湾时,正是中日八年战争之后四年,台湾学龄儿童大部分失学。蒋介石主政之首要任务是坚持九年义务教育制(按:是1968年开始的),普及中华文化。他即从大陆运往台湾之黄金白银,亦即大陆所谓“人民血汗钱”,抽调一部分用之于办学。今日之小学、中学遍及于台湾城镇乡村,即始于昔年受日本文化侵略和疮痍满目之地。我(按:指金尧如)在1947年春执教于台北和平中学(即吴教授母校师大附中的前身),我深感台湾儿童教育受日本侵略者摧残之严重。我当班主任之三年级学生有只识日文而不识汉文、汉语者,至于当时在台北市的文盲儿童更难统计。

……我看台湾政坛中生代风流人物、文化界的俊士硕彦、工商界之亿万富豪,无不孕育于1950年代的小学、中学。台湾之有今日……亦全仗今日上述之政、文、经三大方面之中生代人才。

……设立“中华世纪黄金教育基金”帮助大陆,专注于农村儿童



教育之“希望工程”。为了确保基金用于“希望工程”与办小学……“中华世纪黄金教育基金”也应征集有志之士前往大陆内部协同研究基金办学之方案(按:以海内、外退休志愿工作者最佳),并监督其使用与运作情况。这个做法也有先例。

……日前(按:指1997年)美国电视报导美国华裔和热心于儿童扫盲的美国人士合组一“滋根基金会”(按:至2009年已届20周年),派一组又一组人员到中国大陆乡村办学,甚受当地的县、镇、乡政府之欢迎。这个“滋根基金会”足迹所到已有云南、贵州、广西、湖南、安徽等省,知其事者,千家万户。……

……我(金)想,台湾国民党政府如果能拨出十亿美金(按:是台湾文园“国库”目前所存,原从上海运来的一百万两黄金的时价),用“中华世纪黄金教育基金”之户名存入银行,规定以年利一亿美金(按:或2000万美金,因近时利息调降)用之于两岸互派学生留学和大陆儿童教育“希望工程”……

当然,从1997年上面的“金文”到今天,已过12年,两岸情势有相当的变化,今日大陆和台湾与12年前都大不相同,但有一点没变,那就是极需要促进两岸善意的交流。台湾当局如能协助设立“黄金教育基金”,以前瞻性的步骤来积极回应及总结此历史事件,将是纪念大陆黄金运台甲子周年的一项双赢的做法。未来对台湾当局的历史评价,将会是很正面的。金老之诤言,真是一帖苦口的良药,所费少而收益巨大。

至2009年初,世界经济危机也对对中国有严重冲击,百万计的失业民工回乡,或许会造成一些社会不稳定因素,但危机也是转机(虽然入秋政府的宏观调节已见功效,经济在回春中),目前倒是让部分失业工人进修的最佳良机:他(她)们反有时间来学习新知、新技术。如果能广设成人识字班与电脑班,请退休志愿工作者或待业中的大专毕业生来教学,可帮忙解决部分就业及文盲失学问题。这些都是设立“黄金教育基金”为当务之急的需要所在。台湾当局如能拿出尤存于台北文园,原从大陆运来的近百万两黄金所滋生的利息,作为开始,此当焚香以求,拭目以待。何况拿出这点库里藏的黄金来生利息(不到总存数的百分之八),也不致影响台



湾的经济。

2009年,台湾当局已开始承认中国大陆的学历,是两岸交流很适时正面的一步,何况这笔奖学金大部分用在台湾的各公私大学,也能刺激当地消费,给低迷的经济添加些活力。8月台湾南部遭受巨大洪灾,大陆政府以快速的步伐隔海相助,在民心向背、两岸交流方面有极正面的影响(就如四川大地震时台湾民众施以援手一样)。当此60周年之际,台湾当局应设立或协助“黄金教育基金”,以积极步骤,来总结此运金历史恩怨。从长远的世界竞争力来看,增进两岸中国人整体的“品质”,教育上的投资也是节省不得的。



第 18 章 国民党政府国库资金运台时期 有关人物小传

(一) 财务署同仁之一：詹特芳、董德成、于德昌

蒋介石于 1949 年 1 月下野前后，将上海国库的剩余资金，以“预支军费”的名义，分批交先父的财务署同仁，在 1949 年内运台湾与厦门（即前述的第二、三、四批金银运台湾），支持国民党军队作战。这些位财务署同仁中，笔者有幸访问过董德成、赵志华、于德昌与李光烈，记录了他们当年亲身经历的回忆。

詹特芳

詹特芳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笔者没有机会见到他，他是先父的机要秘书，跟着先父整整三年。从 1946 年冬招取为甲级税务人员，派为湖北浠水县税务局长，解放军解放浠水后，调回财政厅任视察员，1947 年冬又随先父到南京财务署任职，1948 年 5 月 4 日调任机要秘书，直到 1949 年 11 月底重庆解放为止。

当我整理先父内战时的日记时，他跨过时空，反而成为一位比较熟悉的人物。他对追踪内战时国民党政府国库黄金是有贡献的，但不知不觉里也误导了一些“忙碌的”近代史学者，其中不幸就包括了些位颇有名气与影响力的，如李敖（图 18.1）。当然吾人也不能忽略李对追踪国民党政府国库黄金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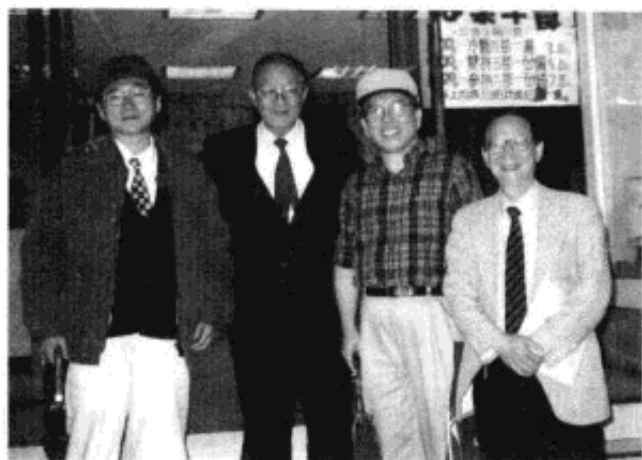


图 18.1 (左起)李敖、刘绍唐与笔者(右一)。李敖首先“发现”詹特芳与先父在 1949 年国民党政府运金中所担任的显要角色,并称先父为蒋介石的“总账房”;刘绍唐为台北《传记文学》社创始人,对民国史有卓越贡献,夫人刘王爱生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捐设有“刘绍唐先生奖励基金”,鼓励青年学子从事史学研究,可惜刘夫人已于 2009 年 7 月逝世(1998 年摄)

李敖根据詹特芳在大陆的一篇短短的“坦白交代”(收录在李敖编著的《蒋介石研究》中),首先爆出先父与詹在蒋总统下野前“盗窃”国库金银中所扮演的角色。由于詹提及他在先父办公室里“记忆”的黄金数字 92 万两,李没经交叉求证,就以偏概全,一口咬定这就是运台湾的全部黄金总量,这是中国文人不求甚解的积习。但李与詹的最大贡献在于披露出“军费黄金”的史实,引起笔者的兴趣,从而业余客观地追踪国民党政府国库资金运台,以补中国近代史的空白。

1948 年“五四”(5 月 4 日)在南京,先父把詹(特芳)调进财务署的署长办公室。先父称:“……决定找詹君在办公室帮理,下午来到差,其原职则派常君继任,詹君稳重,或有所助”。在前两天(5 月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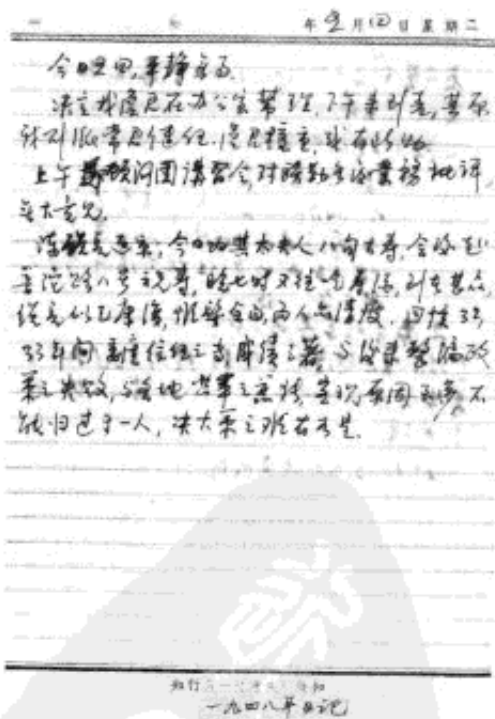


图 18.2 1948 年 5 月 4 日在南京,先父把詹(特芳)调进财务署署长办公室:“詹君稳重,或有所助”。同日陈诚(参谋总长)母亲八旬大寿

日)先父也记下:“……下午与詹君谈,此君决可用。”为寻一管机要的秘书,先父已考虑了数日。再前,3月27日提:“……詹特芳来告……”先父已对他颇注意。

詹特芳是湖北人,依据先父一位资深部属董德成的回忆,他矮矮小小的身材,“稳重”而且沉默寡言,在南京、上海、广州、重庆都是与先父同一间办公室。印证詹自己的叙述,他是中校职级,在财务署长办公室的具体任务是:守电话,整天不离开办公室,不参加任何会议,经管先父与蒋侍从室的一本专用密电码本,翻译电报及主要是缮写(不是拟稿,稿由先父亲自拟)呈蒋(介石)的报告(见第5章)。由于这些参与,使他自称:“了解一点蒋介石核心层的内幕及黄金、银元的盗用情况……”(詹特芳,《蒋介石盗取黄金银元及外币的经过》,载李放编著《蒋介石研究》第一集,台湾:天元图书公司1985年版)

由于詹特芳整天不离开办公室,不参加任何会议,让董德成这位曾替他在挨先父责骂时缓过颊的同事都印象不深,足见詹有极好的修养与内敛功夫,是一位上选的机要人才。可惜,与先父共事三年后,在最艰难困苦的时代,即重庆解放前夕就弃职而走。

先父常提及他,如1949年10月8日日记(图14.8):

……下午因黄金账,大骂(詹)特芳,结果伊亦无错,我乃失态之至,曷胜愧悔,伊之忍耐功夫可佩。

但最后还是被骂走(或另投明主),11月底詹就在重庆弃先父与国民党政府而去。他是否是中共地下党员,有可能,但不大,否则在解放军解放涪水时就可“归队”,此外他与中共也没联系,要不然,先父押运的金银车队,不会有惊无险地安抵成都。

从另一角度看,也许这样也好,否则谁会把国民党政府在厦门的秘密军费黄金的事公诸于世?如前述,除蒋介石、蒋经国、俞鸿钧与先父外,詹是另一当事人,负责先父与蒋的密码联系。这前四人包括父亲在内都会保密,而詹所爆的机要事、所知道的,就是他在解放区谋生存的“本钱”。那么国民党政府为什么会这样让这样一个深知机密的人从容挥袖而去,让蒋父子与先父都背上“盗窃国库资金”的骂名。这也



许一方面是因为国民党军队纪律松懈,另一方面或是因为先父太“温情”了、太讲“人性”了。重庆临走,还给了他2两黄金的资遣费及等值以上的美金。但詹所知的也有限,他仅仅知道密存厦门的(第二批)现金,其他在台北的黄金,包括第一、三、四批及美国运回的,他是茫然无知。

1949年11月25日先父日记:

……晚湖北随来同仁来谈,余贡献临别的意见,事后尹本义涕泣求相从,余鉴于詹(特芳)君之前车,不觉灰心,婉慰之。

据董德成回忆,临从重庆撤退时,署里缩编,十仅留一二,但要留詹。詹之不肯同行撤退去成都,确让先父痛心。

该年底(12月10日),刚从成都撤退到台湾时,先父记下:

……此次在渝(重庆),遣散旧部化1000元,托友寄家分途送1500元,此后三五年,经此措置,略可心安。寄家托汪[子柔]、詹[特芳]、叶、王[诚]、王[勤]五人……(按:刚撤到台湾时,国民党政府上下都以为三五年就可“反攻”回大陆。)

这里的钱是一笔蒋介石核准的美金(是1万元,是顶头上司“逼着塞给他”的,见《黄金档案》一书),在50年代分光,先父去世后笔者才“发现”此美金事。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11月在重庆,他已分掉了2500元。首先选择留在大陆的母亲(笔者祖母)、两位妹妹(姑母)及三个儿子,经由各种方式转给他们每人两三百美元。如果他的属下或朋友不愿来台湾的,除了给每人一笔安家费外,还委托以上五位“可靠的人”,请这五位把美金转给他的母亲、孩儿与亲人。不愿来台湾的人里,当然包括那位在大陆骂他是“蒋介石的奴才”的詹特芳,父亲一直对他很器重,也一定给了一两百美金的安家费,此外也托他带美金给家人,不晓得带到没有。从詹写的数字里,似乎从没提拿美金的事。

詹特芳如还在世,据董德成说,比他年纪大,应近百龄了,希望借此书的问世,有读者知道詹的下落的,给笔者捎个信(singering8@yahoo.com)。

董德成

依照詹特芳的记录,前面已提及:



图 18.3 2008 年 8 月董德成于 94 岁高龄赠笔者之《德成七八回忆录》,为本节主要参考书

……黄金是 90 万两,美钞是 8 000 万及银元 3 000 万。以上这些人民血汗钱,经由吴嵩庆以军费名义全部提走后,其中黄金及银元用了一艘海军兵舰,由上海运到厦门,在厦门存放了一个时期,又移至台湾。当时具体负责这件工作的人,有财务署收支司副司长董德成、总务科长李光烈等,但他们都是临时抽调的,有的人可能还不知道其中内幕。(李敖编著,《蒋介石研究》第一集,台湾:天元图书公司 1985 年版)

董确也曾在詹特芳挨骂时,替他讲过好话。詹说吃了我父亲的牌头(是宁波话,即挨了骂)后:

……我只好忍气吞声,幸有董德成说了句公道话,他说:这些过程,除署长一个人外,谁也搞不清楚,老头子(指蒋介石)说的话,谁也不在场。

这位董德成当时是上校,比詹级别高,籍贯是河北深县西安庄,生于 1915 年 9 月,现年(2009 年)95 岁,仍健在台北。世代务农,1930 年夏,借同学董松坡文凭考入河北省立第十初中,故又号松坡,先父日记里,数处以号称之。1934 年进入河北省立第 17 高中,未一年即考入南京军政部军需学校第八期。两年半毕业,深觉读书不足,尤其以缺外国语学习为憾。1943 年娶妻王曼汝(安徽安庆人)。

军需学校毕业后参加国民党军队服务,1938 年 6 至 8 月在庐山训练团实习,首派进(未到职)南京孝陵卫教导总队(总队长桂永清,20 年后任海军总司令;军需处长为徐凤鸣)。抗战期间(1938 年 10 月至 1945 年 4 月)在陆军 52 师及 63 师所属的第三战区任军需官,曾追随冷欣及顾



祝同。

日本投降后,调陆军总部财务处副处长,1948年6月调联勤总部财务署收支司副司长,开始参与上海军费金银的南运。1949年9月联勤总部财务署改制为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预算财务署,先父连任署长,董德成升任财务署收支司司长,负责国民党军队薪饷的发放,有权决定部队所发金银与纸币(银圆券)之比例。

在先父1949年的日记里多次提到松坡(他的字号)及董(副司长)德成。2006到2009年之间,笔者有幸能每一两个月越洋通次话,来印证及回忆先父日记中的记载。如第12章先父1949年7月4至5日日记:

连日约董副司长(德成),周司长,詹秘书(特芳)等办好因此次运输,所需的一切公文手续,并算清定海的账。五日赴北投休息,董、李(光烈)同行……

在2008年8月北京奥运会时的电话里,他还记得那次在北投洗温泉澡,主要是先父要他帮忙回想“老先生”(蒋介石)交代黄金的细账,“老先生”告诉先父发给某部队、运某地多少黄金银元,都是口头的,回办公室就转告詹特芳、董德成,也没要他们记录下来,大概是“最高军事机密”,没有命令,谁也不敢动笔。那天到北投洗温泉澡,也就是要“大家帮忙回想一下”来确定蒋介石的口头命令。当然,即使这样小心,如前述,蒋因局势的变化,尤其国民党军队败得太快,口头讲定的自己也不记得,或来个“不认账”。

1949年10月12日,董在广州将财务署所存金银于解放军进入前夕运上“中兴”舰。13日上午,他临行对着五羊城作最后一瞥:

……广州市内关门闭户,马路上行人稀少,一片风雨欲来情势,但为确知所运黄金银元,是否达到舰上,乃派出纳叶春景先生前往黄埔码头查看,叶尚未返来,忽奉通知,李代总统及顾(祝同)总长专机已先后起飞离穗,嘱即刻撤离。……水陆均已不通,幸本署控制一架备运黄金银元之中央航空公司小型飞机(见图18.4的新闻标题),即与(国防部)四厅及财(务)经(理)两署重要人员在下午二时左右,同机飞港……(《德成七八回忆录》)

到香港,因机场人员发现机上载有武器(手枪)被拒入境,只好继续飞三灶岛(在西江口),再坐小船经澳门抵香港。先父早把印章交给他,提出“财务署”存中国银行的20万港币,有惊无险地瞒过香港海关,放在手提箱里拎回台北。为什么要赶着提出这笔钱?主要是怕香港的银行向中共“靠拢”。此任务原是准备交给叶良光(见本章下文)的,因叶一直管先父公事印章。此事足显董的胆大心细与负责尽职,由于这件事,也让顾祝同对他(参谋总长)印象良深,11月在重庆缩编时,向先父指定要他留任。

10月底奉先父命经香港去重庆,11月29日又撤退成都,他记下:

我们出城时,适遇先总统蒋公进城视察警备总部,无奈出城人车潮涌,曾见经国先生、黄少谷先生下车亲自指挥交通开进。而重庆亦于次(30)日失守……(《德成七八回忆录》)

笔者在2008年曾问他:“出城是什么时候?”“是约上午9点。”“对面见到蒋父子当时坐什么样车子?”“是几辆黑色轿车,没看到蒋老先生本人,应在车内。”“蒋进城去见何人?”“应该是去警备总部视察杨森部众”。董与以下蒋经国描写的路况相似,但时间上相差12小时,上午是迎面相逢,蒋父子是自东南进城,不是撤出重庆。最后离开渝城时已是晚上。从董德成这位目击者在危城之所见,蒋父子是有胆的。

蒋经国11月29日日记:

……下午十时,林园后面已枪声大作,我只好向父亲告实情,希望早离此危险地区。同时罗广文自前线回来报告,知其军力已被匪部击散,而周围各兵工厂爆炸之声四起。连续不绝。此时山洞林园前,汽车拥挤,路不通行,混乱嘈杂,前所未有的。故不能再事稽延,乃决定赴机场宿营,途中为车辆阻塞者三次,无法前进。父亲(指蒋介石)不得已,乃下车步行,通过后改乘吉普车前进,午夜始达机场,即登中美号专机夜宿。

同日,先父比董要晚走约四五个小时,先父记下(见图15.2):

至午,知解放军已到江边,陈次长(良)催银元车速行,余亦同行,三时抵山洞,至海总联络(国防部所在地),候后车至晚……嗣接报提



前十时赴机场,余守候杨总司令(森)提款未至,后至清晨一时,始载款启程。在最后两小时中,炮声不绝……

此处先父的记录:“嗣接报提前十时赴机场”,应是蒋总裁官邸的通报,冬日天黑得早,大约是七八点之前,不像是蒋经国所说的是“下午十时”才决定走,也许原来是“下午七时”要走,被蒋介石拖到晚上十点才动身。如确是十时应是“晚上”,不是“下午”。另外,先父听到的炮声,可能是蒋经国所提“周围各兵工厂爆炸之声四起。连续不绝”。据下文里,先父另一位旧属于德昌在该夜到清晨在出城路上,没听到炮声,罗广文的部队已被打散,警备司令杨森的川军也没什么抵抗力,解放军已无须用炮兵攻坚了。重庆西北面的“山洞”是30日清晨被炸毁的,是先父车队通过后五六个小时(见下文)。

次日(11月30日)父亲记下(见图15.2):

……深夜一时自海总出发,路上车仍甚挤,三时抵白市驿叉道,杨君(继承,湖北人,财务署中校)赶来低告,不如径往机场,余拒之(按:此时蒋介石还坐在白市驿机场上的“中美”号专机里,后到新津机场转上“美龄”号,等到清晨六时才起飞),四时许抵青木关,候二小时许,后车未到,继行,八时三刻抵璧山……

如前述,这个金银车队是走璧山、铜梁、遂宁的路线(图15.4),比较东面,而且靠前线,12月3日才抵达成都的。

董是1日就已到蓉城,“二日仍未见吴嵩老到达成都,各处探询,均不知情,大家为他非常担心”《德成七八回忆录》。此时先父已失踪数日,大伙都在寻其下落,他是3日才到蓉的(见第15章)。董智齿发炎,住医院高烧不退,6日先父要他先去台湾疗养,但无法登上飞机,12月7日蒋老先生命先父乘运金回程机撤退台湾,董在机场等机的时候被拉上来同机赴台。

刚到台湾,1950年4月“预算财务署”改为“军需署”,董出任“军需署”办公室主任,负责定期清点金库内的黄金银元(图5.9),那金库是署区内唯一一栋红砖房子,原是日本占据台湾时后勤单位的金库。黄金是长方形小木箱,与下文于德昌所见相同,两边有粗绳把,箱外写有黄金重



量,里面每块黄金都刻有 999 成色、重量并以牛皮纸包裹,外面也有说明,此也与李光烈回忆同。

去台湾后,曾任“经理署”、“财务署”等副署长,被服厂厂长等职,自军中退伍后任农民银行储蓄部经理,在农行副总经理的任上于 1980 年届龄退休。董有五子一女都在台湾,各有成就,家庭生活幸福美满,均健在。

于德昌

在 1949 年 11 月的重庆,董德成是上校,詹特芳是中校,于德昌是少校,三位级别不同,所见层次与角度都不太一样,但都辗转于渝城先父主管的预算财务署里。

于是浙江绍兴人,1929 年生,现居洛杉矶。他原是在国防部预算局任职,1949 年 9 月国民党政府在广州将国防部预算局与联勤财务署合并为国防部预算财务署,他就来到财务署的预算司工作。10 月 13 日广州解放前夕,董德成和于德昌都是乘坐最后一批飞机离穗的。于的飞机就是被机场守卫枪击的那架央航机(见图 18.4 标题),他告诉笔者,他在那架飞机上把手指插入弹孔,好不容易才拔出来,因而受伤僵直,在旅途中都不能弯曲。飞机在三灶岛上检查过,子弹没伤到机件,就立刻转飞重庆,他入住“中央银行”驻渝的金库内。

于之所以住“央行”金库内,是职务要求,他遵循所编列预算,代表“财务署”向“中央银行”提款(银圆券、现洋及黄金)。金库就在大马路边上,曾被暴民抢劫,卫兵警告无效,在库门十步距离才开



图 18.4 1949 年 10 月 13 日香港《华商报》报道广州一架“央航”机被机场守卫枪击,标题中的“白华”相对于“白俄”,这些半苏俄式的名词,同“国统区”一词一样,对台湾出来的人都极陌生



枪,打死三人,陈尸路侧示众数日,他在房内隔着门与死尸相伴,几乎无法饮食安睡。“财务署”的卫兵在11月21日也因“夺枪走火”打死一人。总之,当时重庆秩序很乱(参见第15章)。

11月29日傍晚(比董德成出城晚八小时),他奉命率领六辆十轮大卡车,据他回忆每车都平放装金银的小长方形木箱,装黄金的约比鞋盒箱略大,但颇重,双手提起只能走两三步,估计约50公斤(约四块大金砖,每块重400市两),银元箱略大。每车约平放两层,高度约与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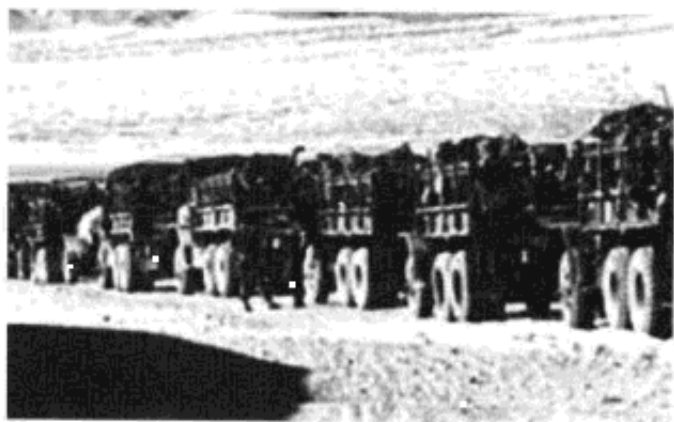


图18.5 11月29日晚,这样的六辆美制2½吨十轮大卡车的车队,装运重庆央行金银走“西线”经内江、资阳到成都(参见图15.4)

面铁门齐(图18.5),并配属六七名持卡宾枪士兵。

30日清晨天微熹,车队才过山洞(中梁山隧道),不到三五分钟,即听到后方爆炸声,路面都为之震动,是国民党军队炸毁山洞以阻追兵,他经内江、资阳走四天才到达成都(此线较远,但比铜梁、绥宁线为安全,距解放军远些,见图15.4)。同车有“中央银行”发行局聂副局长夫妇及一女,抵蓉即卸金银于“央行”金库,12月8日他就飞往台湾。

🐉 (二) 财务署同仁之二:李光烈、赵志华、王逸芬

李光烈

李光烈(图9.3)是湖北汉川人,生于1917年阴历2月,1947年底追随先父从湖北财政厅进入财务署担任总务科长,其他湖北来的同仁还有詹特芳、杨继承等位。他工作努力可靠,在1949年7月先父要他长驻厦门的厦大旅舍,经手储存在鼓浪屿上的金银的提调,他的考绩在十五位

科长里是甲等(先父7月20日日记)。

到台湾的最初几年,他还是担任“财务(军需)署”总务科长的职位,每当阴历年来拜年时总会见到他,家中偶有装修杂务,也是去请“李科长”来帮忙,故与笔者也相熟。他话不多,任劳任怨,是一位能做事、可让人信赖的人,但从未想到,他还有过那一段“辉煌”的黄金历史,那年代“运金”是没人敢触及的话题。

1996年先父去世五周年前后,由于在先父日记里读到他在厦门的工作记录,就访问了他,发表在台北《传记文学》1997年4月号的《上海中央银行黄金从厦门转运台湾的补充及一点建议》中,后来李光烈又接受香港《亚洲周刊》(1998年4月27日)的访问,以“揭密”的笔法写了《南京到台北,海空运黄金》(由记者童清峰执笔),李光烈至少参与了三次使用军机由厦门押送黄金到台北,存入财务署的金库。

先父1949年7月4至6日的日记(图13.2)中,4日提及由厦门运金4万余两来台,约董德成及詹秘书(特芳)等安排,由李光烈押运。7月14日,先父在广州记下(图13.9):“今日得草山(蒋总裁)电,厦门存金均可照计划运送,此事办毕,可省却一心事。因作如下三措施:1. 电台北王处长(逸芬)明日准备五万两小条,后天必需飞兰(州);2. 派李光烈赴厦督办此事”。

1949年12月6日,他又奉命由台北押运5万两黄金到成都,补给胡宗南部队[第15章,图13.7付出(A)],运到后,由央行刁培然局长发了每人5两黄金作路费,想从云南昆明走滇缅路回台复命,但因卢汉于12月11日起义,他们这几位“财务署”的人员只好隐姓埋名,走解放区,回重庆经由水路,出三峡南下转广州到香港,真是历经千辛万苦长途跋涉,最后由先父派人去香港把他们接到台湾。

2003年10月李光烈逝于台北。

赵志华

赵是浙江新昌县人,生于1924年,现年85岁。他在1949年1月至次年3月任蒋介石总裁办公室事务员。



总裁办公室主任俞济时的自传《八十虚度追忆》一书，曾数次提到他。当蒋介石在1949年1月21日引退，次日抵达溪口时，俞济时重组总裁随从人员，提道：“经理股，以高梦男为股长（按：后在1950年也曾被派到“财务署”）。事务员，赵志华……”同年4月，决定离溪口计划中，又提道：“侍从武官兼组长夏功权，副官王新标，事务员赵志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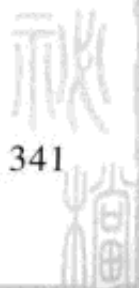
是他告诉了笔者在蒋老先生身边的亲历经验，笔者才知道先父经管的财务署的“军费”也照顾了下野的蒋总裁。赵志华回忆道，在溪口期间，他在第九组（组长陈舜畊）。他曾在1949年7—8月里经手美金数万元购置访问菲律宾及南朝鲜的礼物，据赵在台北和洛杉矶约十年的时段里数次告笔者，此笔经费也是由财务署管理的军费外汇里支出的（参见第16章）。

1950年蒋“复职”一个月后，赵就来到“财务署”（时已改组为“军需署”）任出纳科副主任，代表总统府（据董德成先生于2008年回忆，还有另一位比较资深些的，是高梦男）拥有“财务署”地下金库三把钥匙之一。如第16章所述，1950年4月1日到1951年年底，有10次以上，每次10万两转给“中央银行”（转存台湾银行），换新台币为国民党军队薪饷（据周宏涛的回忆，黄金支出每月总数是18万两）。

在蒋经国担任台湾当局资料室主任（“国家安全局”的前身），统筹台湾的情治工作时，赵志华被调到安全室管主计，也经手了先父为笔者出国旅费的借款（1962年，图16.11）。在2008年，他来去居住于洛杉矶、台北与上海各地。

王逸芬

王逸芬，又名王永涛，别号翊群。湖北咸宁县人，生于1907年，逝年约1971年。1940年毕业于重庆军需学校，1941至1948年任职国民政府警卫总队的军需部门，从团、旅主任到师军需处长，追随俞济时、石祖德，算是蒋介石“官邸”的亲信。1948年8月1日被派到财务署担任第12收支处（台湾）处长，这可显示蒋在那年的6至7月早已在部署台湾的退路。王任台北收支处处长直到1950年1月底，那时他的长官、“财务署长”（先



父)业已撤退到台湾,国民党政府控制下的地盘主要就剩下几个海岛了,台湾已毋须他再负责,就被调为“财务署”预算财务组组长的闲差,并送台北阳明山实践研究院受训(见图 18.6)。

王逸芬在 1949 年国民党政府运金的过程中,主要是看守台北财务署的金库(存第二至第四批黄金),并且监督把 400 两一块的金砖,在台北铸为 1 市两重的小条,即“小黄鱼”,发放给忠于蒋的国民党军队。还有就是先父派他到各地接洽金银运台湾或算账,或许有“让官邸的人来直接碰金银”的意思在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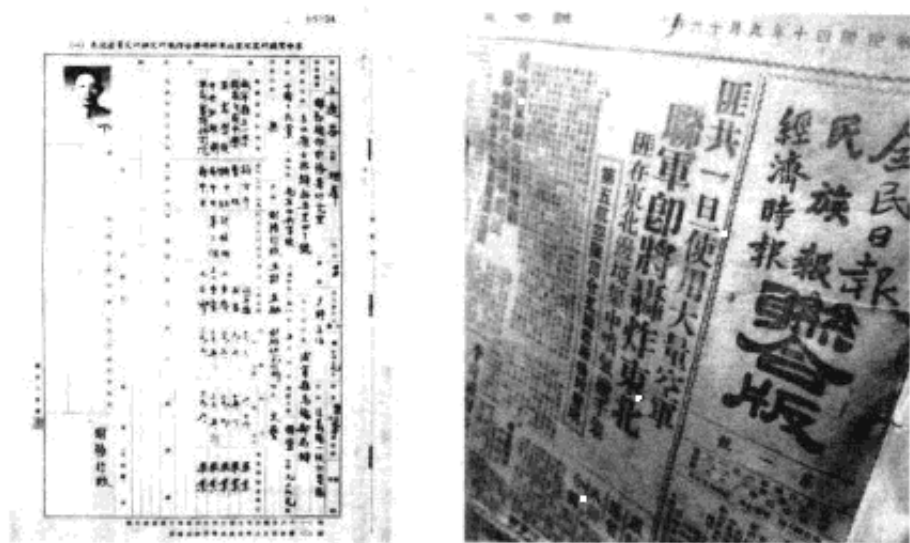


图 18.6 (左图)1950 年 7 月王逸芬在台北阳明山实践研究院受训所填履历(右图)王惕吾的“联合版”(“联合报”)1951 年 9 月 16 日开始发行

第 16 章里提到,台湾《民族报》于 1949 年 5 月创刊,仅三个月后,于同年 8 月宣告停刊,蒋介石曾说是他自己出钱办的报,这是为何?“原因即在该报筹备时的主要资金,来自当时姓名还是王逸芬的王永涛负责看管的台北财务署存金,数目是 100 根金条”。王惕吾(“联合报系”的创办人,见第 16 章)在军中受到彭孟緝、陈诚的排挤,俞济时要他去接《民族报》,但王亦坦率表示:“我总不能空着两只手去接啊!”于是,“俞济时指示王逸芬第二次动用了央行紧急转运来台的资金。据说,这回共拨交了 200 根金条另加一笔美金给王惕吾”(叶邦宗,《蒋介石秘史:我在官邸的



日子与一段遭到留白的历史》，台北：四方书城有限公司2002年版）。

此时是1949年底，先父正冒着生命危险，押运金子银元的车队在重庆撤退到成都的公路上，而王逸芬、王惕吾就在这紧要关头打军费黄金的主意。王逸芬与王惕吾交情匪浅，后来因为报社利益之争，两人闹翻，对簿公堂多年，经过俞济时大力斡旋才和解，这段经过，《联合报》的“正史”并未记载。王逸芬1960年自军中退下来，向王惕吾强要回《民族晚报》，就脱离了与先父部属的关系，但是每年农历新年与先父生日总一定在家中见得着他的，他正当盛年就去世了。



（三）陈良、俞济时、赵聚钰、赵抡元

陈良

2008年上海市的网站上，有关陈良的一条如下：

陈良	浙江临海	1949年(民国38年)5月5日任 1949年(民国38年)5月17日免	市长
----	------	---	----

他只做了12天的上海市市长，是因为当时国民党政府原任市长吴国桢见解放军压境、势头不妙，就请了病假。这样的人品，蒋介石为争取美国支持，到了台湾还得升吴市长的官，请他出任台湾省主席。

但1949年5月1日蒋介石日记(在上海复兴岛)：

……朝课后记事，批阅，约中央银行各局长及外交部驻沪特派员与陈良市长，商议经济与米煤来源……

在蒋介石心目中，陈良在5月1日已是上海市长了。前文数处已提及有关陈良在黄金运台的角色(见第9、第14和第15章)。

陈良(图5.8,9.12)字初如，生于1896年9月12日，1994年10月9日逝于台北。1917年东渡日本，入东京农业大学，1921年返国任教浙江省第六师范学校。在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时，赴粤。1925年4月奉命



返浙江,在陈果夫领导下秘密募兵,8月又回黄埔担任军校政治部科长(政治部主任为周恩来),旋任经理科长。1927年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时,任军校经理处长,1934年改任军政部军需署副署长。



图 18.7 陈良 1926 年 8 月回黄埔担任军校政治部科长,旋任经理科长,据说发行了此张形式的粮秣兑换券,上有国共两位主要人物的签章,右为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左为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此为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

1935 年转任军政部会计长,1940 年改任军政部军需署署长(1944 年延揽先父吴嵩庆为副署长)。1945 年日本投降,获青天白日勋章。1946 年 6 月出任联勤总部副总司令(总司令为黄镇球),1948 年 3 月任粮食部次长,1949 年 4 月蒋介石命陈转任上海市秘书长(市长吴国桢),5 月 5 日代市长职,是国民党政府最后一任

上海市长,主要任务是监督汤恩伯,把上海最后的国库资金与沪上所存重要物质运去台湾。

1949 年 9 月在广州任国防部参谋次长,主持后勤业务,又为先父职务上司。11 月在重庆解放前夕要先父的“财务署”代央行运 40 万银元及不明数目的黄金去成都,先父当仁不让,亲自押运金银车队,而陈自己却跟蒋介石乘专机直飞成都。先父几乎为此趟差事丢了命,急风劲草,此事蒋父子看在眼里,记在心头,到台湾后陈就难获重用了。1950 年初到台湾,上半年担任了两个月的“交通部长”,五个月的“主计长”,9 月就改任“行政院”顾问的闲差,1971 年退休。1994 年去世,享年 99 岁。

俞济时

俞济时(图 18.8),浙江省奉化县人,1904 年农历 5 月 1 日生。早年在县城当学徒,1921 年在慈北鸣鹤场当民信局信差,次年任福建浦城县政府庶务。后投身到族叔黄埔军官学校军需处长俞飞鹏处,得保荐考入黄埔军校。1924 年 12 月自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参加东征、北伐诸役。

1928年12月奉调国民政府警卫团少将团长；次年12月奉令兼代中央宪兵司令。1942年11月担任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时，奉调军事委员会侍卫长。

侍卫长室分三组办公，另辖建制为两个团的警卫旅（俞济时：《八十虚度追忆》），其中一位团长是石祖德（后任厦门警备司令，在1949年1至9月间是蒋介石亲信，负责看守储存厦门国库及密藏鼓浪屿上的军费金银），旅长是楼秉国，还有一位本名王



图 18.8 俞济时晚年在台湾

瑞钟的王惕吾担任军委会警卫旅中校营长（后用军费黄金开办台湾《联合报》，是俞济时居中联系促成，先父奉命拨款的）。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下野，俞出任蒋总裁办公室主任，负责蒋之安全及与各方的联系，先父日记里多次提到他，是位很典型的国民党高级官僚，有些像前朝皇帝身边的太监总管。1949年9月，蒋介石要先父飞重庆进谒“解释”为何没经过批准，就擅自空运7万两黄金由台北赴广州，俞济时在重庆就挡住不让进见，还是蒋经国出面邀先父进林园官邸（见第15章），从这里也可管窥“宫廷”内“太监总管”与“太子”的关系，到了台湾之后，很快被蒋经国逐出权力核心。但1949年12月6日先父日记：“俞局长（济时）嘱明日即行”，虽然俞仅是替蒋介石传话的，却是先父能脱离危地的一句关键话。

1949年12月由成都去台湾，先后任台湾当局第二局局长及战略顾问、“国策顾问”。1990年逝于台北。

赵聚钰

赵聚钰（1913—1981），湖南衡山人，上海复旦大学及国民革命军陆军步兵学校毕业。其叔赵君迈（湖南军阀赵恒惕之堂弟）在对日抗战时曾在衡阳市长任内，与方先觉同守衡阳。赵君迈与蒋经国相熟，日本投降后，

被罗致去长春当市长,解放军克城时被俘,由此蒋经国特别照顾其侄。

抗战期间,赵先后于国民党政府湖北省建设厅、军委会审计厅服务,日本投降后则进入国民党政府中央信托局担任杭州分局经理。1949年调台湾分局经理兼“央行”驻台副代表(后一职务并未见于他小传,见下文;协助“央行”驻台湾代表沈祖同)。在1949年,蒋介石、蒋经国和先父日记及俞鸿钧传中都未提及他。网上有人说他是“央行”黄金运台的“实务主事人”,不知其主何实务?总要有点证据,应该也要经得起交叉求证的。现今已公开的两岸“中央银行”档案里也从未见提到他,主要因为即使赵的“央行”兼差属实,也只是沈祖同的短暂助手,而沈是俞鸿钧的亲信。

最近浮现的大溪档案“陈诚卅八年二月廿三日上溪口蒋总裁丑文台二电”(0713,来电编号A-893):

……中央银行库存黄金,将尽运台,惟主持人沈祖同虽是(刘)攻芸妹夫,但为(张学良)汉卿旧属,人极滑头,以之在台负此重责,似不甚妥,可否电知刘总裁攻芸,将沈改调他职,另遵委员主持之处,谨电核夺。职陈诚丑文台二印。

这份密电,对沈的杀伤力应是很大,是否俞鸿钧就改派赵来监督,现无资料支持此说。赵当时资历尚浅,是跟随蒋经国的,在那运金的1949年,连蒋经国都算不上是央行黄金运台的“主事人”。赵是1949年才调台北的,如本书所述史实,央行最主要的第一批黄金260万两早已在他上任前的1948年底就运到了台湾。到陈诚2月23日上密电时,上海黄金除5月的第四批外,其他都已运台厦。厦门、上海中央银行的档案记录,台厦的负责接运人等,在笔者2007年的《黄金档案》一书中已交代得很清楚,未见他参与的踪迹,那时赵人在杭州,还没有调到台湾。

赵聚钰在1981年过世,替他写小传的是刘绍唐先生(台北《传记文学》社创始社长,见图18.1),提到他把中央信托局的外汇运台:

……在中央信托局台湾分局暨中央存台剩余物资处理委员会主



任委员的任内,亲赴香港、澳门、广州等地的中信局人员、外汇移转台湾。……曾奉蒋介石总裁命,以中信局外汇购买泰国米两万吨运台湾。(《传记文学》1981年8月号)

这里也完全没有他曾参与黄金运台或担任央行的职务,更何况“变”成了央行黄金运台的“主事人”,笔者倒是希望能见到赵曾参与黄金运台的原始资料,尤其是在陈诚打了那封密电,1949年2月时,央行主要第一批黄金运台早已入库(表1.1),之后主要是第三、四批,是军费,央行的角色已经淡了。但本书为历史存真是主旨,不在于谁居其“功或过”,主要看证据。

1950年赵调“中央信托局”人寿保险处经理(职位还是不高,不像曾有“主事”运金的分量),1957年转入台湾“行政院”国民党军队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担任秘书长,襄助先后主任委员严家淦及蒋经国,1964年接主任委员职(此时才晋入高层,因蒋经国即将出任“国防部长”)。1981年6月在任上逝世于美国,后归葬台北。

1963年,蒋经国原希望先父从军中退役后去辅导会担任副主任委员,那时蒋还是主任委员,但先父选择了有挑战性的工作——去整顿亏负累累、员工上千的高雄唐荣钢铁公司。也许先父不愿蒋经国为难,为将来谁来接这主任委员的位子伤脑筋。果然,不到一年,蒋就把棒子交给了赵,但他还是辅导会决策人,如交给先父,就没那么“得心应手”,何况他也不愿意用父兄辈的人,而赵是他提拔的“追随者”。

赵抡元

赵抡元(1914—1996),河北清苑人,1932年由军需学校毕业。1932年派任第33集团军军需处长(总司令胡宗南),1949年底在成都任第六预算财务处处长,曾点收12月6日运补胡宗南部队的5万两军费黄金(见第15章)。他曾写过这段回忆,为近代史留下了见证。

去台湾后,历任陆军经理署长,1962年晋升中将并转任陆军供应司令部副司令,后在高雄硫酸亚厂总经理职务上退休。



（四）徐堪、刘攻芸

此二人在黄金运出上海的事件中的角色有些不同，徐堪开始有些犹豫，但在蒋介石下野期间十分配合，后来国民党政府迁广州期间又出任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而刘攻芸则不止举棋不定，而且曾阻拦第二、三批金银运出上海，蒋的日记里对刘十分不满，最后刘赴台湾一转，就立刻出亡海外，保得晚年平安。

记一财政官僚徐堪

徐堪(1888—1969)，字可亭(故有时被称为“可公”，是民国时期的官场习俗)，四川三台县人，生于清光绪14年，17岁中秀才，次年进成都四川通省师范学堂，1907年加入同盟会，一度变姓名潜逃武昌，1909年返蓉入四川高等警官学堂。辛亥革命后，曾任第四标统带(团长)，1919年当选国会补选委员。

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后，任财政部金融管理局、钱币司、公债司长诸职。1935年升任财政部次长，协助实施法币政策，迄至1941年6月，都是襄助部长孔祥熙。1935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41年任粮食部长。



图 18.9 1949 年二度出任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的徐堪

1945年出任主计长，1947年推荐先父出任财务署长。1949年1月出任财政部长(表3.1)，徐不识外国语(与刘攻芸完全不同)，在留学生充斥的国民党政府财政金融界里能出头也属异数，可能是蒋介石为平衡孔宋欧美系，而放在财经界里的一只棋。

在蒋介石总统下野前夕，他核准把央行存上海的金银外汇拨为“预支军费”，交给财务署负责(签了“草约”，见



第6章),3月何应钦组阁时辞职。曾想出任央行总裁,为蒋介石所阻,见蒋介石1949年3月24日日记:“朝课后约见吴经熊与徐可亭,示意徐不再争中央银行而专注于党费之筹措……”其后6月1日在立法院替蒋介石遮掩密藏台湾厦门之军费金银外汇,为蒋所喜,在6月下旬二度出任财政部长才兼任中央银行总裁。但在1949年8至9月间逼迫先父从台北运5万两黄金至广州铸金币(未铸成),以支撑7月发行之银圆券,此一“擅自行动”犯了蒋总裁之大忌,10月被革职(见第14章)。赴台湾后,于1969年去世。

在先父记录里,徐开会不带秘书,也不做笔记,似有蜀人摆“龙门阵”(茶馆聊天)的架式。

央行总裁刘攻芸

刘攻芸(1900—1973,图5.7),原名刘驷业,福建侯官人。留学美国西北大学得商学硕士,英国伦敦大学博士,1927年返国,曾任教于清华大学经济系及中央大学商学院。1929年任中国银行总账室主任,1935年任中央信托局副局长,1938年任交通部邮政总局副局长,任内发起全国“节约储蓄运动”。1940年担任四行联合总办事处秘书长(主任委员孔祥熙)。

抗战胜利后,转任中央信托局局长。1947年3月出任中央银行(总裁张公权)副总裁,1949年1月继俞鸿钧为央行总裁。为“阻挡”第二、三批国库资金转作军费,为蒋介石总裁所恼怒,如蒋1月27日日记:

……约见林崇墉谈中央银行现货运厦门,闻刘公芸有难色,殊为疑虑,世人皆利临(令)智昏……”

3月,孙科内阁总辞,何应钦组阁,邀宋(子文)系之刘攻芸出长财政部。蒋4月2日日记:

俞鸿钧谈刘攻芸言行……

4月24日:

……刘攻芸来访,商谈金融方针,对军饷发给现洋,余极反对……

4月25日：

……刘攻芸来谈，余切嘱其速发兑现币券（即“银圆券”），以延长军饷发现（洋）之有效时期也……

显然，蒋介石对刘极不放心，还要听俞鸿钧打的“小报告”。蒋要自己控制现洋，不愿刘直接发银元黄金（如果全部国民党军队都发黄金银元，那很快就会用罄，金银只发给嫡系部队，而用纸币去敷衍杂牌军），而刘似也不愿发行欺骗老百姓的银圆券，两者矛盾不少，当然这是鸡蛋碰石头，6月刘即黯然下台，赋闲在野。

刘攻芸心知蒋介石对他不满，1950年春即离开台湾赴新加坡，1973年病逝于星洲。

（五）陈舜畊与叶良光

记父亲老友陈舜畊

前面第8章曾提过，蒋介石能对父亲一开始就十分信任，部分原因可能是他们有共同熟知的陈舜畊。舜老（图18.10，左立）是浙江奉化县人，生于1901年，是先父嵩庆公一生最要好的朋友。而且，1949年1月至1950年3月蒋介石下野期间，陈担任总裁办公室第九组组长，管总务，总裁办公室的办公费就是他经手向先父保管的“军费”中提拨的。



图18.10 陈舜畊(左)与笔者

1991年4月30日，在台北亲人的随侍下，他静寂地走完了91年颇不平凡的一生。“小阿姐”陈练雪（志坚）长他六岁（图18.11），是蒋经国母亲毛福梅的义妹。

1922至1925年之间，他参与照顾在上海念中学的蒋经国，蒋介石在家书中曾有“缺钱时，



可向舜畊及果夫哥取用”的话。舜老晚年在台北也曾亲口告诉笔者,1927年往返于上海、奉化间,传递蒋给毛氏夫人的离婚讯息。1949年在蒋介石下野的日子里,他又在总裁办公室担任第九组组长,管总务。并于1949年4月24日下午在雨中从奉化乘“美龄”号专机护送蒋方良、孝文、孝章这蒋经国一家子人到台湾。

赴台后,1961年1月出任台湾省铁路局局长,但是好景不长,两年后,因与蒋经国发生“误会”,这位台省铁路局史上颇为人称道的局长,在社会大众的嗟叹声中去职了。在千余铁路员工含泪送别后,又因散发“小册子”向“监察院”陈情,竟然在台北警各总部演出了“捉放陈”这颇具戏剧性的一幕。当时,先父嵩庆公立即出面做保人,并应蒋的邀托,居间沟通,结了这“可大可小的案子”(蒋经国的话)。从此,他就不再担任公职。对于那位从小叫他“舜畊哥”的“强人”,他认为“咎不在我”,拒绝和解。也因为这莫须有的案子,担任了数十年公职,离职后,竟然没拿到一文退休金。舜老一生不写回忆生平的文章,总以“不好写”回绝邀稿,在“强人”主政时,文字贾祸,岂能再蹈覆辙。而蒋经国猝逝时(1988年1月),他已是88岁高龄,往事如烟,与豪门的恩怨都不堪回首。笔者幸得其家人供给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包括舜老初渡台时的《自传》(交代人事资料)及《铁氏外传》(1989年,台北松柏之家印行的自述),并得检视先父嵩庆公遗篋中有关的记述及亲聆他晚年谈的逸闻,得以草成此节。

出身与家世

民国前11年(1901)生于浙江奉化。陈舜畊对他曾祖及祖父的生平都不详。父杏南公在县衙粮房任师爷,收入颇有限,但对其叔(陈杏佳)的



图 18.11 陈练雪(志坚),时年80岁,是蒋经国生母毛福梅的义妹,陈舜畊的姐姐

教育未曾忽略。母鲍夫人是奉化海边打渔人家，嫁到陈家为继室，前妻无所出。鲍氏共生子女 11 人，长大成人除他外，仅大姊、小阿姐志坚（练雪）及一妹。大姊早亡，无子无女。二姐（小阿姐）终身不嫁，侍奉母亲。并与蒋经国母亲毛福梅结为异姓姐妹，为陈舜畊一生与蒋家父子两代恩怨之始。

其父去世时，陈的求学费用就只靠叔叔张罗了。他先在奉化城内的俞家祠堂家塾就读，业师就是后来国民党政府军需界的前辈、宁波两级师范学校毕业的俞飞鹏（1884—1966，字樵峰，浙江奉化人，曾任国民党政府军需署长、交通部长，也提拔过陈良，见前）。俞受其叔之托，对这位资质聪敏的学生十分照顾，竭力推荐陈去宁波继续升学。叔叔只好借债让他去宁波念工业学校，此时他 15 岁。当时先父嵩庆公比陈舜畊小一岁，正在宁波教会办的斐迪中学念书。

陈在宁波念工业学校学机械工程毕业，由于师长们的力荐继续念大学，陈的叔叔只好咬着牙再借债让他去沪江大学读化工，此时是 1920 年，他年 20 岁，又与在沪江念商科的先父同了学。读了两年后，他叔父实在无力继续供他读书，只好要他去找当时正在上海的奉化老乡，“与他父叔都有世谊的蒋介石先生”（陈志坚语），本意是找蒋介绍学做生意。当时陈是带着面临辍学的懊丧心情去看望这位日后在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的，不料蒋见面就问他读书一年所需，知道后，略一沉吟说：“钱不多，不必半途而废了，在这里拿钱把书读完吧。”

结识蒋家父子

这次会面是陈一生的转折点，此一资助续学之恩，也决定了他从此与蒋家生死荣辱相共。蒋介石在给蒋经国的家书中就曾提到“再囑你请果夫哥哥寄陈舜畊银二十元给其做学费为要”（1923 年 5 月 13 日，见蒋经国《我的父亲》，1956 年）。20 块银元大概是一学期的学费，的确不多，但对一位负债去广州的军人来说，这 20 块大洋也不算少，这钱可能还是陈果夫垫付的。陈是 1924 年春末毕业的，就留在沪江大学担任助教，教了一年半的物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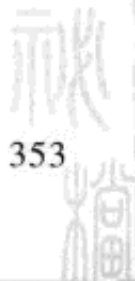
在沪江受老先生(陈对蒋介石的尊称)帮助续学的后两年及留校教书这段时间,也就是1922到1925年,阴差阳错地让他结识了决定他后半辈子命运的“少先生”。蒋经国是1922年3月从奉化乡下来到上海的,当时12岁,进了万竹小学,次年转入浦东中学。此时蒋介石奔走革命,已不常住在上海,监护责任除了长一辈的竺枝珊(图8.15,蒋介石妹夫,后在台湾任农民银行董事长)外,同一辈的大哥哥们就是陈果夫及陈舜畊了。虽然“少先生”仅初中的年龄,此时的上海革命浪潮正汹涌澎湃,以他那能体验出“潮流在变”的先觉者,应是比较接近有新知的“陈舜畊哥哥”,但另一方面来说,两人可能个性“相冲”,都是比较会用心计的,晚年的交恶,也就不难理解了。

蒋介石从广州来的家书:“缺钱用,可向舜畊及果夫哥哥取用。”当时“少先生”每月零用钱是大洋三块(见蒋经国《我的父亲》)。其实,照理说,蒋经国的母亲与陈志坚(陈的小阿姐)是结拜姐妹,这位陈大哥还高他半辈哩。

到黄埔并参与蒋府家事

在舜老生前,笔者每次返台省亲,必定会到他的府上拜访,有一年他告诉笔者:“与毛氏夫人离婚的信,是我送去的,老先生的信没有封,表示可以让我看,但是毛氏夫人看后,一点未动声色,真是了不起!”估算时间,送这封信应是在蒋宋联姻的前夕,也就是1927年11月左右,此时陈舜畊已在老先生身边,与闻其家事了。

在沪江大学教书到1925年底。那年10月底他陪着蒋经国去广州向其父亲辞行,11月他在沪送别“少先生”赴俄,此时他在上海的部分任务(照料少先生)已了。1926年初,在征得蒋介石同意后就到广州,起初未能即入黄埔军校任职,只在当时的俄国顾问办事处(在东山)担任中译英的工作,就是把中文报纸的有关消息翻译成英文。两三个月后才进入黄埔军校当一名上尉书记,同时加入国民党。在军校他也教教物理、化学,但课不多,主要是在蒋身边担任文书机要工作,顶头上司是刚留美回国的陈立夫。那年7月蒋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



令,积极准备北伐,总司令部秘书长为邵力子,秘书处长是马文车,下设机要科和文书科,陈立夫为秘书兼机要科长,他与蒋坚忍(图15.9)为秘书,周雍能(图4.3,就是后来把俞鸿钧推荐给蒋介石的那位)为秘书兼文书科长。

北伐与出国

1926年7月9日誓师北伐,据《周雍能回忆》[“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口述历史丛书(5),1984],陈舜畊负责管总司令的印章及密码本,所以身上常背着个大皮包,随侍在蒋介石身边。到了南昌之后,陈立夫因病去汉口就医,继任机要科长的是黄埔一期生湖南人蒋先云,在当时是有名的共产党人,但保举陈从上尉升到少校。

北伐军进入南京是1927年3月,蒋介石派他去上海办事,据猜想跟该年年底的“蒋宋联姻”有关,如上一节提到,他已像是老先生的家臣。前些年在上海照顾蒋经国,此刻去上海(转奉化),也负有与毛氏夫人沟通的任务。此外,他的女友费素娥(以后的费氏夫人)也在上海,一举两得。到了8月,蒋总司令下野东渡,随行人员中就有陈舜畊,他也就在日本与费结了婚。11月随蒋返沪,12月1日蒋在上海与宋美龄女士成婚,翌年1月蒋总司令复职。此刻他以为老先生事业已入巅峰,是他离开左右去欧美留学以充实学问的时机了,就向蒋请准出国读书。

留学美欧与服务铁路、空军

1928年1月2日,他在上海火车站送走蒋介石去南京复职后,就准备渡洋去美国。继任他工作的是刚留法归国的毛庆祥(见第8章),以后毛是特务总管戴笠(图8.5)的顶头上司。他先去美国中部名校芝加哥大学,一年后就转到法国巴黎大学,正巧先父嵩庆公在北伐军抵达北京后得蔡元培之助,这时在巴黎大学攻读市政,同学中有汪日章(是蒋介石的远亲,不久就转学去巴黎艺术学院)。两年后,我父亲硕士毕业返国,陈就转赴德国柏林大学。在法、德,他都是选修有关管理方面的



课程,这以后在铁路工作方面是用得上的。他是1931年于去国三载后返国的。

回国后,到津浦铁路车务处任副处长,那是1932年2月,到次年10月升充处长。1935年10月,他调充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委员,长住南京并在后方勤务部兼任参议,直到抗战军兴才离开胶济路局。卢沟桥“七七事变”后,他在宁波时的老师俞飞鹏主持后勤部,他就转任后勤部少将参议,曾在南昌短期办公,由于战事进展很快,他处理后勤铁路运输事务只有半年多。

先父嵩庆公从法国留学回国后(1931年),由于没有“奥援”,为糊口在铁道部总务司觅得一科员职,在南京待了一年多,到1933年夏经汪日章推介任军委会机要室少校秘书(第8章)。次年由于蒋介石兼任航空委员会委员长,被调到航委会,参与中国空军的建军。1936年西安事变时,宋美龄为秘书长,调先父为其秘书,参与空军应变。事变结束后,先父升任航委会主任秘书。抗战进入第二年,沿海被封锁,向法国购买的飞机及零件都须从越南海防经滇越铁路内运,航委会在海防设有办事处,此时先父就推荐他任办事处主任,这是陈在空军任职的开始。海防一年多后,又由先父推荐他出任航委会人事处副处长,那是1939年7月。当时空军内部人事复杂,主要是广东(黄光锐)及其他各省投奔国民党政府的空军人员与笕桥中央航校的“正牌”形成派系摩擦,急需一位较公正而又与空军无渊源的人事主管。陈上任之后,以公正、平等原则协调各方,因此一些感到受排挤想离去的开始打消去意,军心趋于稳定。

但新建空军的另一人事问题是,周至柔(图18.12)与毛邦初(图18.13,是蒋经国生母毛福梅的远房侄儿)之间不和,当时周任主任,为航空委员会五巨头之首,其他四位是陈庆云、黄光锐、毛邦初及黄秉衡。但是毛有些跋扈,常和周主任相左,陈舜畊从空军的大处着想,认为应进行确保周的领导地位的人事调整,经蒋委员长核准,将毛邦初调任空军参谋学校教育长。1940年8月,陈晋升为航委会人事处处长。





图 18.12 先父(立右一)在聚精会神地观看周至柔(坐右一,旁坐为石觉)与围棋国手吴清源(左)对弈(约 1960 年)



图 18.13 毛邦初(左)与在联合国任职的何应钦(1947 年)

抗战胜利再回铁路

从 1938 年 1 月到 1945 年 2 月,陈一直在空军服务。其间第一次缅甸战争时,日寇于 1942 年 3 月在仰光登陆,英缅军无法抵抗,向北溃退,逼不得已向中国乞援,蒋委员长派第 5 军(杜聿明)、第 6 军(甘丽初)及第 66 军(含孙立人师)入缅远征。陈被短期由空军调去搞军事运输,曾经风尘仆仆于腊戍、曼德勒等地,但第一次缅甸战争很快就结束了,他的任务也就完成了。1945 年 8 月日寇无条件投降。9 月出任平津区铁路接收委员会委员兼济南区铁路管理局局长,和他一起接收的有北平铁路局的石志仁、武汉铁路的莫衡等。到济南后,接收工作并不顺手。1946 年 3 月调充津浦铁路局局长,管理津浦和胶济两条铁路。由于内战,实际管的线段日渐短缩,他去青岛、徐州等地视察铁路,还要靠空军的老同事协调军机。

铁路自战事起后军运较多,加以路线常遭破坏,运费调整跟不上贬值,政府为避免外间批评交通事业领头涨价,往往加以补贴。由于运价相对便宜,走“单帮”(贩货)者从中渔利非常普遍,且有作无谓的旅行,结果铁路客货营运日渐繁忙,而政府大赔其本,亦铁路史上一大怪事。到 1948 年 8 月 19 日金圆券发行,而 9 月济南解放,锦州被围,太原外围也开始激战。陈当时认为戡乱胜利的希望日微,曾告其已在北平清华大学入学的



儿子：“我是二十多年的国民党员，只能胜败存亡与之相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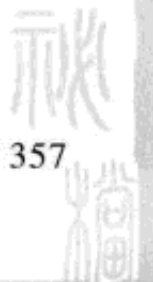
1949年8月1日蒋介石成立办公室于台北草山（阳明山），设立九个组，他任第九组组长，管总务。其实，在此之前，早在4月他已去溪口看望过下野的总裁，并把蒋经国的家人护送到台湾。这时老先生身边原来侍从室的“老人”像汪日章、李惟果、毛庆祥等位都已离蒋远去，而陈布雷又自杀殉知己。随侍的，就是蒋经国。

在台湾的工作

1949年晚春，他与家人——郭氏夫人及长女与次子，分头抵达台北。初到台北，在总裁办公室，要照顾随侍人员衣食。1950年3月蒋介石“复职”，总裁办公室解散，随侍人员多有安排，而他想到老先生日理万机，不愿为自己出处去打扰，就由原在航委会的老同事钱昌祚安排，出任农林公司总经理。为配合“耕者有其田”的实施，1955年台湾四大公司——工矿、农林、纸业及水泥——开放民营，在民营之前，他原兼任茶叶公司经理。1958年7月出任台湾航业公司总经理，经过他的大力整顿及员工的共同努力，到1959年已颇有盈余。

台湾省主席周至柔于1961年邀他出任台湾省铁路局局长，在他的“台铁两年”（1961年1月至1963年2月）中，夫子自道。“台铁两年”后无法留任的近因，是蒋经国当时担任国民党军队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这对早期台湾的安定也是极为重要的工作，对退除役官兵辅导就业，少不了要向各级机构安插人。而他认为才根据政府的命令在铁路局裁撤了3000人还没多久，现在辅导会来函要安插数百人，认为很难办到，就挡了回去。要辅导会行文省政府周主席批准，即使省政府核准安插人员，也须先训练铁路技术。答复也颇合理，但他忘记了此时的“少先生”已不是那位在1923至1924年间在上海叫他舜畊哥哥的初中生了，尤其蒋经国那时正与陈诚争权，对退除役官兵辅导就业的成败，也是台湾安定的重要项目。

陈下任后，还到处发表文章，更得罪了蒋经国，被警备总部传讯，当晚陈大庆总司令即刻找到先父吴嵩庆到警总，保释他回家，从此寂静地度过



28 载的余生，逝世于 1991 年。（部分转载自《传记文学》）

记父亲老友及财务署同事叶良光

前面多次提到叶良光(图 8.1, 18.14)。1949 年 11 月底,先父在国民党军队“财务署长”任上,坚守岗位,由危城重庆,冒着被俘之险,距离挺进中的解放军不到一日的行程,兵荒马乱中,押运着银元、黄金车队退向成都。陪伴着他的有多位财务署同仁,除了前文提到的李光烈、杨继承等位,也有叶良光。



图 18.14 三位上海沪江大学老同学:右起陈舜畊、吴嵩庆与叶良光(叶曾掌进入财务署金库三把钥匙之一,参与军费黄金的管理)

前面(第 8 章)已提到叶良光是父亲中学时的老同学,叶是浙江宁波人。从 1948 年初父亲接财务署长职,他就开始在署内服务。从南京撤退到上海,到广州,到重庆、成都,最后到台北,在国民党政府处境最危急的时刻,叶都坚守在“财务署”,在他大学老同学先父的身边,掌管机要与图章。如前面提到的财务署黄金金库有三把

锁,其中一把钥匙在他手上。他不求名也不求利,只晋升到上校副主任,是奉公守法、“沉默大众”型的公务员。他单身随家父来台,只有一位公子在台湾。

但到 1959 年底,他满 60 岁,该届龄退休,那时退伍只能领到微薄的退休金。因为他一直住在“财务署”台北宝庆路的单身宿舍里,一旦离开公职,连住处都成问题。父亲一生对人勿论亲疏,一律公事公办,对自己及家人也不例外,没有设身处地为老友着想,这一下叶良光火了,责备他对老友照顾不周。先父一面本着基督徒的精神,自我引咎反省:“……良光事,于我管教,此乃神的杖,神的竿”,另一面只好去找照顾退除役官兵的大家长蒋经国,请他约见叶良光,并派工作。后来,蒋特别接见过叶,并安



排了他退役后的工作,还替他押租住屋,晚年才算有比较圆满的安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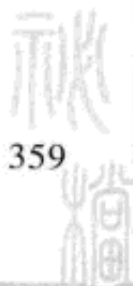
(六) 王东原

王将军(图 8.13, 17.1)是先父嵩庆公的老长官,虽然与黄金运台无关,但他曾邀先父出任湖北省财政厅长(1944 到 1947 年),几乎使父亲完全脱离国民党军队军需系统,如果后来没有脱离湖北,调到南京财务署,回到军需老本行,就不会参加这运金行列撤退到台湾了。在那动乱的大时代中,以先父尽忠职守的性格,在中共席卷神州之际,他很可能以身殉职(按:1949 年 12 月初由重庆撤出时,就曾有牺牲成仁的准备,见第 15 章),全家也可能就“陷”在武昌。所以,对先父及笔者一生,王老也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何况他晚年住在洛杉矶,跟我成了忘年交(见图 8.13)。

王东原是安徽全椒县人,生于 1898 年阴历 1 月 22 日,一生经历颇是不凡。抗战时,担任重庆复兴关中央训练团教育长(团长蒋介石),负责实际训练达五年半之久(1939 年 3 月至 1944 年 6 月),调训全国党政军的中、上级干部(图 17.1)。国府及台湾早期“大佬级”政坛人物多出自他的门下,包括蒋经国、俞国华、倪文亚、黄朝琴、连震东(子连战)等位,不胜枚举。多年前,在寒舍为王老庆生的宴席上,名记者陆大声即席挥毫,赠王老对联一副:“门前桃李三千将,眼底乾坤九万春”。先父也是在高级班受过训,以“成绩优越”被他罗致到湖北省府任财政厅长职的。

1971 年 12 月移居加州,居海滨威尼斯一平民化公寓,对门而居即一黑人,而王老随遇而安,欣然自得。而我也幸得先父介绍认识王老。那时先父老友邵毓麟(日本问题专家)尚在世,此一“中国村”中尚有吴俊升老教育家[曾任北大教育系主任,是“少年中国学会”108 位(包括毛泽东在内)会员之一]也在近邻。

王老去世前十年写作很勤。书架上就有四部他亲自赠送的著作。第一部是传记文学社 1987 年出版的《浮生简述》,并题了短文在书扉上。其次是新闻天地社 1990 年出版的《五大洲纪游》,记述他畅游名山大川,在



大陆时曾登四岳(缺北岳),远赴新疆,立马天山,退休后又遍游五大洲,以92岁高龄远赴埃及。第三部是他公子王克明替他印行的《翰墨因缘》(1994年元月)。第四部是由大陆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何键、王东原日记》(1993年3月内部发行)。原来大陆在印行前征求他的意见,准备出版《王东原、何键日记》,王老为尊敬老长官何键(1887—1956),坚持用现在的书名。何键为湖南军阀,曾杀害毛泽东的第一任夫人杨开慧,此也突显出今日中国的开放程度。

抗战时周恩来辞去政治部副部长职位(陈诚任部长),就是王老接周的职位。他不止一次告诉我:“周恩来真是一位人才,可惜不能为国民党所用”。另一则是他亲历的事。1949年4月,他随侍蒋介石于奉化,一天,张治中从北平来电话,他正在门外,当时张任国共和谈代表,与蒋谈了很久。王老对我说,从那次谈话,他深深感觉到张治中不是投共,而是老先生放在大陆的一着棋。笔者于2008年读蒋介石内战时的日记(1947至1950年),深深地感觉到蒋身边就缺少位“周公”来辅佐。

王老最令笔者折服的,是他的一种积极的人生观和潇洒的生活态度,以及简单易行的养生之道,十多年的耳濡目染,得益良多。与王老接触,最大的感受就是他的宁静与乐观。王老在养生上真是令人佩服,以他90高龄仍爱好旅行,非要有很健康的身体不可。

在精神方面,他除了淡泊,深信“不必等到死后才进天堂,天堂就在现在”外,他提出:“首要的是心理上不矛盾;有些人要做官,依然不肯为五斗米折腰,是矛盾;到了退休以后,依然不忘情于旧时的荣华,是矛盾;心中一有矛盾,内心便会忐忑不安,心理不安是健康的最大敌人。”其次,他认为:“天生吾人身体,是一部巧妙灵活的机器,每一部分、每一关节、每一细胞各有其作用,如不予运用,便会自然衰退,甚或失去其功能。根据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道理,人的每一关节,每天应有其经常活动,以保全其机能。”

20多年前他教了笔者一套简单易行的脚部运动,只有四个动作:“拐、绷、蹬、抓”。“拐”,两腿伸直,两脚自然并拢,脚尖向外拐,再返回,双脚同时做。“绷”,双脚尖尽量向前平伸,使脚尖与小腿绷成一条直线,

脚尖再拉回,膝部平贴床面。“蹬”,两膝弯曲,两脚抬起,然后用力(让脚跟在前)蹬出去。这个蹬的动作,运动量较大,对肠胃、腰杆、脚底保健效果最佳。“抓”,这是在“蹬”以后一项比较轻松的动作,是让你想象脚掌像手掌一般,把脚趾尽力叉开,向外旋转,像手掌去“抓”,这个动作看似简单,却有意想不到的妙处。这个动作等于自己在按摩整个脚掌。在睡醒起来前,在床上采仰卧位置,每个动作做64次以上。我每日认真练习,深深感受到这种运动对身体的好处,它非常契合医学卫生的原理,能强健腰腹部肌肉,改善全身血液循环。我持续地做此运动,近20年来从不间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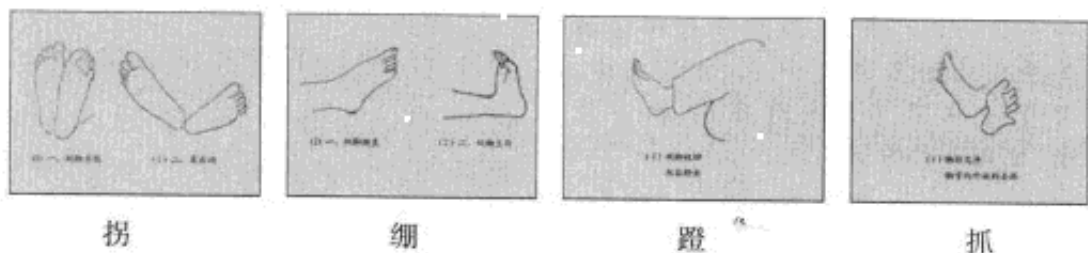


图 18.15 简单易行的脚部运动:“扬、绷、蹬、抓”

王东原元疾逝于1995年4月8日,健康地享年98岁。

❧ (七) 母亲吴林熿与三舅林国珪(围棋名人林海峰的父亲)^①

母亲享寿百龄,于千禧年(2000年)11月19日凌晨逝世,为她中风七年与病魔的奋战画下句点。母亲于民国前12年(1900年)阴历9月15日诞生于浙江镇海乡下石高塘祖屋。父亲景翰公,母亲袁太夫人。14岁丧母。她17岁时就与从未见过面的父亲(年16)结婚,到先父嵩庆公在1991年去世时(享年90),两老在世上已共度了73个寒暑。父亲能廉洁奉公,掌管巨大的军费十多年,终其一生能得清廉的令名,母亲节俭持家,做其后盾,应是有一份功劳的。父亲脾气不好,发起火来时,也幸而有母亲的高度忍耐力(还有那位前文提到的詹特芳,也有忍的功夫)。

^① 部分转载自《传记文学》之笔者2002年1月作。



图 18.16 蒋经国(中)很敬重先母吴林煊(右),见面总是口称“大嫂”(称呼先父为“大哥”),像图中这样紧握其手在蒋图集中或少见,左是笔者。背着光,又没用闪光灯照相,故不清晰,但颇有纪念性

母亲因为早年丧母,虽然出嫁到吴家祖宅(此屋在抗战初起就被登陆日寇焚毁,因为围墙上有关抗日标语)时仅是中学年龄,但已深知人世艰苦。吴家是个大家庭,上有太婆(我叔曾祖母,就是后来在1948年底办的丧事)、公公(吉三公,1874—1935)、婆婆(我祖母,1873—1969,解放后在上海过世,享年97岁),下有两位小叔(都夭逝)、两位小姑,一家28口。父亲婚后还在宁波念高中,后到上海念

沪江大学。母亲留在乡下侍奉公婆,一天忙到晚,连一点坐下来休息的时间都没有。大着肚子,怀的孩子快生了,还在田里屋里忙着,收割、晒谷、洗衣、烧饭,样样都做。长子(兴归)、次子(兴来)先后来到世上,带孩子都没有人帮忙,那时请位帮工佣人只需两毛钱一天(每月6元),但吴家俭省,这花费也免了。晚上为节省灯油,只能跟婆婆、全家妇女都在一间房里做针线,白天辛劳,到晚上此时虽疲倦欲眠,也不能随便离开就寝。这种在乡下做小媳妇的日子,直到父亲大学毕业留学法国近三年回来(1931年),长女(兴柔)出世后,才能随夫离乡。

先父一生,从1932年进入铁道部当科员开始,到1976年由唐荣钢铁公司董事长任上退休为止,做了45年的公务员。做公务员,在台湾经济未“起飞”前,薪津菲薄,是母亲刻苦勤俭持家,使父亲无后顾之忧,才能“公尔忘私,国尔忘家……其对国家贡献,无异今之萧何”(王东原将军的评语,台北《传记文学》1992年4月号),全心全意为国家奉献出力,但母亲及我们家人也付出不小的代价。尤其在抗战期间,由于营养不良,我们的发育健康都深受影响。如前文已述及,在成都,不到3岁的幼女(兴静)因为痼疾,冤枉地夭折了。长女兴柔也因之染上了肺病,以致在高中毕业后休学。在重庆,全家六口挤在一间房内,吃发霉、含稗石的配给米,煮前



米需一粒粒地捡。当时父亲担任军政部粮秣司司长,忙得很,很少见得到他,全家衣食住行,都是母亲一手照应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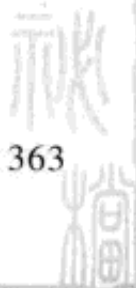
抗战胜利后,父亲担任湖北省财政厅长,家庭经济上并没有什么改善。到1947年底,到南京担任国民党军队财务署长,管理国民党军队军费,这是在1949年1月蒋总统下野前夕所安排的。随着国民党军队不断地“转进”(“败退”的新闻名词),先父到处奔波,没有母亲替他理家,他怎能这样全心全意地投入公务?那年5月中旬,家在上海,整日听到“隆隆”的炮声,先父公而忘私,完全没有考虑到家人的安危与后果,幸亏“恰巧”蒋介石派蒋经国及先父来沪上,要把最后上海国库黄金(20万到40万两,第四批)转作军费,借这个出差的机会,得周至柔总司令的提醒,到最后一刻才安排母亲及孩子乘军机撤到台湾。

刚到台湾的那些年,经济尚未“起飞”,军人眷属尤须“克难”,都靠母亲勤俭持家。念书只能进学费低廉的公立学校,像师大、台大。父亲能够以“清廉”闻于世,不掉入那大染缸中,母亲的功劳最大。她的处事为人时时为别人着想的性格,是父亲长官、同事、部属、亲友所称道的。虽然她生长于旧社会,没有机会受到高等教育(仅初中程度),但出外应酬,与留学巴黎的父亲相比毫不逊色。她的聪明才智,在亲友中,有许多人还认为在先父之上。尤其她那惊人的记忆力,简直像数字照相机,众多亲友的电话号码、生日年龄等等,就像记事本一样,永刻脑中。这可能与她的遗传基因有关,难怪有围棋国手林海峰这样的亲侄子。

母亲的祖上是以航海经商致富,传到她父亲景翰公(秀才及第)时,尚有海舟三艘,良田数百亩。当清朝末,列强经济大举入侵,旧式帆船怎能竞争,又逢海难、火灾,船只损失殆尽,家道中落。

母亲有四兄一姐(辅臣、国瑜、国珪、国瓚及凤卿),笔者这几位舅舅似乎都很聪敏,以大舅辅臣为例,最具慧思,幼以才子著称于乡,20岁出头即中秀才,可惜越年以肺癆咯血而亡。

母亲三兄林国珪先生字湘臣,生于民国前18年(1894—1955),长我母六岁,早年留学东瀛,原习工科,后入东京帝大主修经济,毕业后返国进外交界。北伐后,曾任中华民国驻台北(日据时)“领事馆”的副领事。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下旗返上海。这位三舅舅留学东大，当然是敌伪网络争取的对象，但他坚守中国读书人的气节，“贫贱不能移”，屡次峻拒出任伪职。然而，收入断绝，在上海的生活极为艰困，都沾上了肺结核，而其幼子林海峰（图 18.17）也几乎被过继给母舅洪家而滞留上海。



图 18.17 先母吴林煊（前中与其外孙）、家姐吴兴柔（前左）与笔者（前右），后排是林海涛（右）及林海峰（先父吴嵩庆摄于1964年）

林海峰 10 岁时，踏着他父亲的足迹东渡日本，到 23 岁时，成为最年轻的围棋“名人”，日后也多次获得日本围棋界“本因坊”、“名人”、“棋圣”等桂冠，至今仍享誉于世界棋坛。与他那位滞留在上海、早逝的小哥哥相比，真有天壤之别，人生际遇往往取决于偶然，如过继娘舅洪家，那海峰的人生路途就截然不同了。



附录1 黄金、银元重量换算,海空运输工具与银行建筑历史

重量的换算

银 圆

银元平均每块重约 26.697 克(含银 88.0%,合纯银 23.493 448 克)(图 3.15 及 12.1)。例如:10 万块银元重约 2.7 吨。

“半圆”其重量只有“袁大头”的一半(图 3.15),每枚是 13.5 克。在第四批金银中,就有“半圆”64 万块合银元 32 万枚(《民国档案》1989 年第 2 期)。

黄 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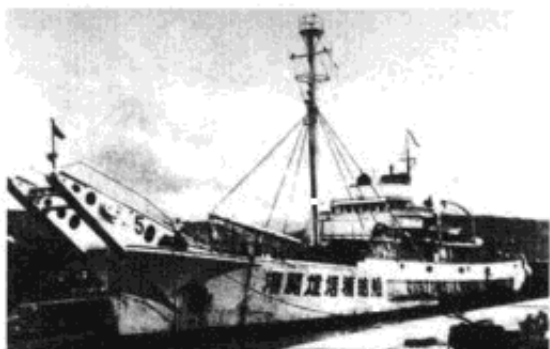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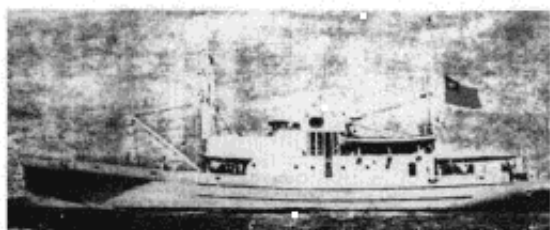
中央银行或台湾银行及任何民国方面的资料,都是以市两计算,一市两等于 31.25 克。而国际市场以美金计价,则是一英两(盎司)等于 28.35 克。如黄金以美金计价,则须把每英两价加一成,即乘以 1.1,换成每市两的价钱。

市两	英两	(公)吨	美吨	英吨
1 万	11 023	0.312 5	0.344 5	0.307 5
10 万	110 229	3.125	3.445	3.075
100 万	1 102 293	31.25	34.45	30.75

运输船舰

“海星”号

海关缉私舰,是运送第一批黄金银元到台湾的船。总长度为163呎,宽度约30.5呎,空重是500吨,满载700吨,也就是说载货150吨左右应无问题。黄金最多一次是2 004 000市两,不过70吨;400万银元(即1 000箱),不到120吨。“海星”号缉私舰停泊在黄浦江边中国银行的专用码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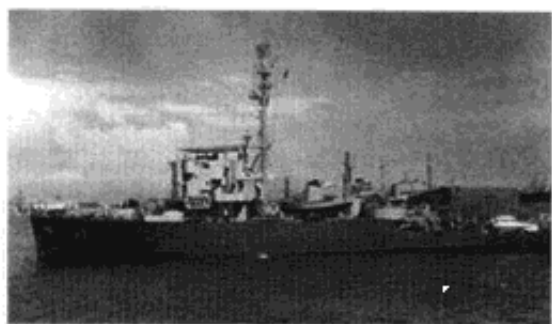
图附.1 (上图)“海星”号的同型舰艇
(中图)海关缉私同型舰“联星”号
(下图)另一同型舰服役于法国海军,轮廓相似

用它运黄金银元,就不会像军舰那样引人注目。中共渗透在1948年底也比较少。“海星”号是上海江海关海务部门里四艘较大型的缉私艇之一,属AN型舰艇,是美国“二战”后退役的防潜艇(Fleet Auxiliary Netlayer),其他三艘是“春星”、“流星”及“联星”号。但到1949年1月底,中共已动员“海星”号船员拒绝为国民党政府运国库金银了。到2月,国民党政府只好用较小的“福星”号从广州运金去厦门(只载10吨)。据《厦门文史资料》(第17辑),1949年9月12日总税司李度(Lester Little)从台北发来申令:“福星”号运输舰于9月24日调台北关,10月中厦门解放。



永字号(M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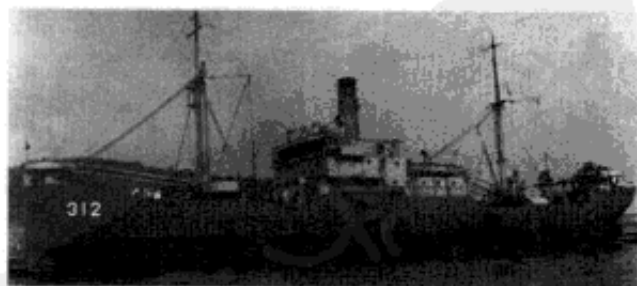
1944年前后建造于美国,为扫雷艇,排水量满载880吨;舰长为184.6呎,宽度为33.8呎。曾于1949年5月从上海运送金子银元去台湾。



图附.2 (上图)多艘永字号扫雷艇(如图示)参与护送从上海运送金银去台湾(右图)海关缉私舰“鸿星”号(下图)海关灯塔补给舰“运星”号(与海军永字号舰同型)

“昆仑”号(AK312)

1919年建造于英国,为轻型运输舰,排水量是1612吨;舰长为262呎,宽度为43.5呎。曾于1949年4月由上海运金银经福建马尾去台,途中曾发生舰长起义事件。6月运送300多万块银元从基隆去广州,是财务署保管的秘密金银军费“借给”中央银行的贷款。



图附.3 “昆仑”号



“峨嵋”号(AG309)

1915年建造于美国,为供应修理舰,排水量满载14 550吨;舰长为475.7呎,宽度为56呎。有五门3英寸炮、十门20—40 mm机枪。5千匹马力柴油引擎,航速每小时达14节。其运载能力为7 850吨,可一次运走上海国库的全部银子(1.4亿两,不到5 000吨)及黄金(400万两,仅130吨)。它有四个大货舱,两部吊运机。曾于1949年1月运送金子银元由上海去厦门,并曾运银元银锭去台湾。



图附.4 “峨嵋”号

中字号(LST)

中字号登陆艇,1946年前后建造于美国,排水量满载3 776吨;舰长为327.9呎,宽度为50呎。1949年5月,多艘中字号参与从上海运送金子银元去台湾。其中“中基”舰曾于5月1日运央行存银(块)到左营。据



图附.5 “中建”号与多艘中字号参与从上海运送金子银元去台湾



目击及亲身参与者回忆,在那年4月底,陆战队数百人用四夜才装完毕。财务署的第二批军费银子总数有2000多吨(见第5章)。银块从1949年1月起至5月底,一直在陆续运离上海。

美字号(LS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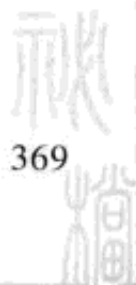
1945年前后建造于美国,为中型登陆艇,排水量满载912吨;舰长为203.5呎,宽度为34.5呎。1948年12月至1949年1月,“美盛”号与“美朋”号(LSM-344)曾参与护航“海星”号去厦门和台湾。1949年4月“美盛”号起义投共,而“美朋”号5月26日在长江口参与上海“最后一次海战”,并从上海运送第四批金银去台湾。



图附.6 1997年有50年舰龄的美字号登陆艇,但在1949年前后有数艘在国民党政府运金史上扮演重要角色

国民党政府空军运输机

在1949年以C-46,C-47型为主。在飞越海峡时,常常一次运5万两黄金,不到2吨,而C-46可以载重1万磅,约4吨,C-47也可载重3吨,都绰绰有余。每小时航速约280公里,恰好约海峡的宽度。有报道显示,1949年1月中旬,在蒋介石下野前夕,以24架次的C-46军机(12架)在两日内运走96吨上海国库金银,在2月初也曾军机运黄金(第三批)。





图附.7 C-46型军机,可载重4吨,10万两黄金才3.2吨



图附.8 C-47型军机、民航机,可载重3吨,5万两黄金才不到2吨



图附.9 DC-4型(即C-54型“空中霸王”)民航机,可载重33吨(是近百万两黄金的重量)。1949年2月7日,中国航空公司一架包机曾空运黄金由上海飞台北(第三批内)



银行建筑历史^①

中国银行(图附.10)是原黄浦滩路(今中山东路)23号,原址是上海德国总会,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中国接管。中国银行后来以63万两银子买进,在1922年改建为银行营业大楼。1934至1937年间,由国人自己设计(为外滩众多建筑里唯一一栋)及建造今日所见的共17层新大楼。是外滩有中国传统方形楼顶的最高建筑物,地下两层含有“远东第一大库”之称的金库。

中央银行(图附.10)1948—1949年时在中国银行隔壁,是原黄浦滩路(今中山东路)24号。原产业为沙逊所有,1923年横滨正金银行购入重建今楼,高六层,为英商所设计。日本投降后,为中华民国没收,改名中央大楼,成为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行址。此楼无金库设备,故部分国库金银藏于隔邻的中国银行于1937年建成的“远东第一大库”内(见第3章)。



图附.10 原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有白点)是原黄浦滩路(今中山东路)24号,其左侧最高平顶楼是中国银行

^① 参考本书插页上海外滩长图。



附录2 大事记(1948年1月至1950年12月)

1948年

1月

- 10日:蒋介石飞沈阳巡视并接见傅作义。
17日:设置“东北剿匪总司令部”,以卫立煌为东北行辕副主任。
19日:台币对法币之汇率为1:95。
27日:新任美军驻华顾问团团长巴大维抵达南京。

2月

- 1日:“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解放军攻击辽南。
5日:行政院长张群向立法院报告,上半年国家支出为(法币)96万亿,收入是58万亿。
7日:解放军攻占辽阳。
8日:傅作义出任北平行辕副主任。
16日:朝鲜金日成政府成立,拥有苏式装备陆军20万。
25日:解放军攻占营口。民盟主要分子千家驹等逃至香港,公开反对国民党政府。
28日:伪政府周佛海病毙南京狱中。

3月

- 10日:国民党政府国务会议决定以4亿美元交中央银行为法币准备金。



16日:中国文物宝藏600箱由上海运台湾。

26日:中央研究院选出萧公权等81位院士。

4月

3日:苏联复国民党政府抗议运输机被击落,称中国在东北无自由行动主权。

5月

1日:蒋介石、李宗仁当选国民党政府民选正副总统。

13日:陈诚被免去东北行辕主任(1947年8月起兼任)。

17日:台湾银行发行500元及1000元大钞。

18日:国民党政府颁布“全国总动员令”,表明“戡乱到底”之决策。

24日:国民党政府翁文灏组阁,俞鸿钧为中央银行总裁。

31日:王云五为财政部长。白崇禧为“华中剿匪总司令”。

6月

15日:全国各地米价高涨,重庆发生抢米暴动。

7月

3日:中美签双边协定,美援4亿美元,美方保有随时停止援助之权。

17日:解放军攻占襄阳。

18日:中央银行发行最高额关金25万元,等兑法币500万元。

20日:李承晚当选南朝鲜总统。

8月

8日: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发表半年“剿匪”战绩,解放军总人数达240万。现国共兵力为2:1,过去为3:1。[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曾发表,解放战争初起时(1946年7月1日),国民党军队总数为430万,解放军为120万]。

11日:蒋孟麟、沈宗瀚出任“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委员。

19日:公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其要点为:将发行金圆券,1元合法币300万元,2元兑银元一枚,4元兑美金1元。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

秋



21日：蒋经国出任上海“经济管制督导员”。

23日：发行金圆券，以20亿为上限。

9月

1日：上海《文汇报》在香港复刊。

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金日成出任总理。

27日：解放军攻占济南。

10月

2日：蒋经国上海“经济管制”（打虎）失败。

8日：蒋介石赴上海。

9日：蒋介石接见俞鸿钧及蒋经国（可能决定第一批黄金运台）。

23日：解放军攻占包头、郑州、开封、长春。

11月

2日：解放军攻占沈阳。

10日：王云五辞财政部长职，徐堪继任。傅斯年、王世杰等决定将伦敦故宫精品500箱，中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及中央图书馆之珍贵古物运台湾。

11日：蒋廷黻在联合国指责苏联扶助中共。

12日：日本战犯东条英机等七人被判死刑。

13日：陈布雷自杀于南京。

22日：黄百韬碾庄兵败自杀。

26日：国民党政府翁文灏辞职，蒋总统提名孙科组阁。

28日：宋美龄飞美争取美援。

30日：国民党军队放弃徐州。

12月

1日：上海国库金银开始运台湾（第一批是黄金260万两）。

15日：傅斯年被任命为国立台湾大学校长，国民党政府派机赴北平接出胡适等学者。

20日：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



1949年

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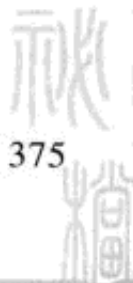
- 6日:中央研究院文物4000余箱运台湾。
- 10日:邱清泉兵败陈官庄自杀。杜聿明被俘。
- 11日:蒋经国、俞鸿钧及吴嵩庆奉蒋总统命,立“草约”将上海国库99万两黄金、3000万块银元及7000万美元“预支为军费”交国民党军队财务署监管。国民党政府以军舰、民船及军民机将金银从上海南运台湾及厦门。
- 13日:白崇禧在汉口截回央行运广州银元。
- 14日:“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结束。银元一枚已价值金圆券1000元。
- 20日:第二批上海国库金银启运厦门鼓浪屿。
- 21日:蒋介石总统宣布暂时引退。
- 22日:国民党蒋总裁抵溪口。
- 23日:解放军进入北平。
- 26日:国民党政府开始迁广州。解放军抵南京对岸浦口。
- 27日:“太平”轮与“建元”轮相撞在舟山群岛附近沉没,据说船上有央行档案与少数库存金银。

2月

- 7日:中央银行又运出第三批黄金去台湾,于次两日内完成,约60万两。
- 10日:中央银行金银已大部转运台湾及厦门,上海只余黄金20万两。
- 17日:李宗仁“代总统”命央行总裁刘攻芸不得将库存金银他运。
- 25日:巡洋舰“重庆”号起义。

3月

- 12日:何应钦组阁。
- 22日:李宗仁“代总统”命央行总裁刘攻芸将转运台湾及厦门金银运返。



30日：台币与金圆券的汇率为3比1。

4月

1日：南京学生游行反内战。

5日：国共和谈开始。

20日：江阴要塞起义，陈毅挥军渡江。

21日：国共和谈破裂。

23日：南京解放，银元一枚价值金圆券1 000万元。台湾实行“三七五减租”。

25日：太原解放。

5月

3日：国民党政府李代总统要求国民党蒋总裁早日出国。

4日：杭州解放。

12日：美国决定停止日本对中国（初步是216亿美元）、菲、荷、英四国赔偿。

18日：汤恩伯开始运出第四批国库金（20万到40万两）银（300吨）。

27日：国民党军队撤离上海。

30日：何应钦内阁总辞，台币与金圆券的汇率为1比2 000。

6月

10日：阎锡山组阁，徐堪出任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

15日：新台币发行，旧币4万折合一元，银元一枚折合二元五角，美金一元换5元新币。

24日：蒋介石在台北草山成立“总裁办公室”。

26日：南朝鲜独立运动领袖金九被刺殒命。

7月

1日：中共在北平开始筹备“开国大典”。

2日：国民党政府发行以银为本位之“银圆券”，5亿金圆券换银元（券）一枚（元）。

10日：蒋介石飞菲举行“碧瑶会议”。



15日：“新华社”北平电：“49年7月敌(国)军全部残余共149万，我(解放)军为400万”(约为国民党军队的2.7倍)。

21日：南昌解放。

8月

5日：美国国务院公布“白皮书”(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6日：蒋介石飞南朝鲜举行“镇海会议”。

16日：福州解放。

17日：赣州解放。

27日：兰州解放。

28日：苏联举行原子弹试爆。

9月

2日：重庆市区大火。

17日：解放军攻陷福建平潭岛。国民党军队增援厦门、金门、马祖。

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北京。徐堪辞职，由关吉玉接任。

12日：“国民党政府”由广州迁重庆。

16日：厦门“国民党军队”撤离。

26日：金门战役。

29日：“国民党政府”在联合国指控苏联在东北劫夺价值30余亿美元资产。

11月

9日：中国及中央航空公司两负责人率12架民航机起义。

15日：解放军攻克贵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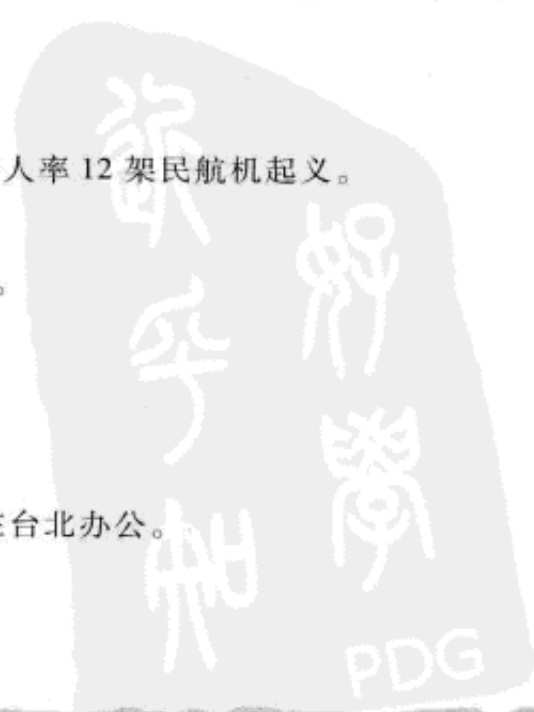
21日：“国民党政府”决定迁成都。

30日：解放军攻克重庆。

12月

5日：李宗仁“代总统”赴美就医。

9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开始在台北办公。



- 10日：蒋介石离蓉飞台。
11日：昆明卢汉起义。
16日：毛泽东赴莫斯科。
23日：罗广文起义投共。
26日：“国民党军队”撤离成都。
28日：“国民党政府”存马尼拉银元980万枚运台。

1950年

1月

- 5日：美国杜鲁门总统发表声明：“根据开罗会议及波茨坦宣言，台湾应归还中国。美继续经济援助国民党政府。”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13日：宋美龄自美返台湾。

2月

- 14日：中共（毛泽东、周恩来）与苏联订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3月

- 1日：蒋介石于台北复行视事。

4月

- 11日：第一期台湾“爱国奖券”开始发行。

5月

- 2日：“国民党军队”撤离海南岛。
16日：“国民党军队”撤离舟山群岛。

6月

- 18日：台湾省前行政长官陈仪被枪决。
25日：朝鲜战争爆发。
28日：美国第七舰队巡航台湾海峡。

附录3 吴嵩庆先生年谱

1901年阴历正月初九出生于浙江镇海(父吴吉三,夫人吴林熿是1900年阴历9月15日生)。

1906年(5岁) 入镇海青峙学堂。

1907年(6岁) 入七星延陵学堂(祖父吉三先生所创设)。

1914年(13岁) 毕业于延陵学堂。

1916年(15岁) 留延陵学堂,进修国学。

1917年(16岁) 插班宁波斐迪学校(English Methodist College)二年级。

1918年(17岁) 结婚(夫人婚前未见过面)。

1921年(20岁) 申请入上海沪江大学。

1922年(21岁) 正式升入沪江大学商科。

1925年(24岁) 沪江大学毕业。任职宁波四明中学商科主任一年半。

1927年(26岁) 陈舜畊介绍入北伐军上海卫戍司令部(司令白崇禧)任少校秘书。

1928年(27岁) 赴法国里昂,修习法文。

1929年(28岁) 正式入巴黎大学法科市政学院。

1931年(30岁) 夏,毕业。据曾任北京大学教育系主任的吴俊升说是同船返国。

1932年(31岁) 入铁道部总务司(司长李浩驹)任一等科员。



1933年(32岁) 上庐山谒蒋委员长(汪日章介绍)。被任为少校秘书,兼秘本股长,半年后晋升中校。

1934年(33岁) 任航空委员会秘书。

1936年(35岁) 任航委会秘书长(蒋宋美龄)之秘书。

1937年(36岁) 升任航委会主任秘书。

1939年(38岁) 升航委会军政厅(主任下另设有军令厅)经理处副处长,旋升处长(航委会主任周至柔,人事处长陈舜畊,军政厅长黄光锐)。(8月笔者吴兴镛出世于成都。)

1943年(42岁) 中央训练团党政高级班受训结业,调任军政部军需署粮秣司少将司长(军需署长为陈良),移居重庆。

1944年(43岁) 升军需署副署长,秋兼任兵役部经理处处长(部长鹿钟麟)。

1945年(44岁) 任湖北省财政厅厅长(省主席王东原)(于赴湖北恩施途中遇劫)。后转武昌。

1948年(47岁) 转联勤总部(受财政部监督,部长徐堪)财务署署长,转南京任职。

1949年(48岁) 1月受任管理国库之军费黄金纯银及外汇。9月任国防部预算财务署长,晋升中将。12月7日去台湾。

1950年(49岁) 4月出任台湾“联勤总部军需署署长”,兼管原财务与经理两署职务。

1954年(53岁) 创设“国民党军队”财务经理学校。

1958年(57岁) 成立沪江中学于台北景美,任董事长。

1959年(58岁) 升“联勤”副总司令,兼“预算财务署长”。2月,成立“同袍储蓄会”(蒋介石原欲成立“军友银行”,为陈诚及财经界人士所杯葛)。

1962年(61岁) 专任“联勤”副总司令。

1964年(63岁) 军中退役。转任唐荣钢铁公司董事长。

1966年(65岁) 成立“中国钢铁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1968年(67岁) 建成中兴钢铁厂。

1969年(68岁) 创《钢铁研究》季刊。

1971年(70岁) 3月在台湾南部公路上遭遇车祸,头部受重创,空军派专机送台北三军总医院治疗。

1972年(71岁) 建成中兴合金钢厂。出任“国际基甸会”台湾地区理事长,至1978年。

1974年(73岁) 筹建海绵铁厂赴美。婉谢纽约圣若望大学赠博士学位。

1976年(75岁) 辞唐荣钢铁公司董事长(转任私营万邦公司董事长)。

1979年(78岁) 成立“大同老人福利基金会”。

1981年(80岁) 成立台北市“松柏之家”。

1983年(82岁) 召开“国际军官基督徒协会”亚洲第二次大会于台北。

1986年(85岁) 出任“国际资深公民协会”副会长。

1988年(87岁) 10月召开“国际资深公民协会”第13次大会于台中。成立“松柏学苑”。12月庆祝结婚70周年。

1991年(90岁) 9月首次还乡后,返台当日去世。



附录4 名词简介

大溪档案

即《蒋中正总统档案》，现存台北新店北宜路上的“国史馆”中，原存台湾桃园大溪之头寮宾馆，但1949年的“军费秘档”只有节略。

中央银行档案

中央银行档案在海峡两岸各有一部分，在台湾的“中央银行”档案是在大溪档案里，收藏在台北“国史馆”；另外，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也有极珍贵的收集。

中央银行(国库)资金、存金、现金、现货、准备金

“资金”、“存金”、“现金”、“现货”、“准备金”等名词散见于蒋介石日记(1946—1955)，都是国库黄金、纯银、银元及外汇、外币的总称。他用这些名词，一方面或有避人耳目、隐藏证据的私意在，但另一方面也表明他私生活相当克己，不像是个爱财之人(有别于宋美龄)，他私衷于阳明哲学，也或有不屑提此“阿堵物”的潜意识在。他之所以紧捏着财权，主要是为打内战，或可从他的传承者蒋经国的一生中得些印证。

“资金”、“存金”、“现金”、“现货”、“准备金”等名词，在蒋介石日记中，多指黄金、纯银、银元及外汇、外币而言。如1946年10月10日日记：“今日美金1000元，折合国币1000元，折合黄金1000元，折合纯银1000元，折合银元1000元，折合现货1000元，折合准备金1000元。”



台湾“经济奇迹”(1970—2000)

1979年,台湾与香港、韩国、新加坡等被国际经济组织列入新兴工业化社会,被世人称为亚洲“四小龙”,台湾“经济奇迹”之名远扬。到1992年,台湾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000亿美元,跃居世界第20位;人均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居世界第25位;外贸总额达到1500亿美元,高居世界第14位;外汇储备900多亿美元,居世界第3位。到2000年,台湾国民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4万美元;对外贸易进出口额双双突破1400亿美元,总额达2800亿美元,外汇储备达1067亿美元。

早期台湾经济成功发展的原因众多,但最为关键的或是国民党在1949年带去了许多人才,以及对国际经济形势的准确判断与采取切实可行的经济政策,而最初上海国库的黄金银子及外汇稳定了新台币,以后的高利率政策及美援维护了1950—1960年的金融安定与发展。如以人均计算,1949年运台国库全部资金4亿美元(或800万两黄金),每人分配约50美元,此戈戈数显然不是台湾经济起飞的原因。其次是当局能人尽其才,重视教育(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但现在大陆已后来居上了。

台湾(新台币)改革币制基金

此基金就是蒋介石1949年6月3日的日记里提及发行的新台币准备金,共值5000万美元,是中央银行拨台湾省银行80万两黄金(每两以50美元计算)与1000万美元外汇之和,新台币于1949年6月15日发行后,已稳固流通了六十年。

军费“草约”(1949年1月)

蒋介石在1949年下野前,命国民党军队财务署署长吴嵩庆与财政部、中央银行(国库)在1月11日订立之“草约”,即把上海国库金银外汇等“现金”,至少先拨出半数“预支”作为军费,其总数约90万两黄金(后“多”出9万两,即第二批运台厦黄金)、3000万块银元及7000万美元外



汇,后来其他半数也陆续加入(即第三、四批)作军费。“草约”上应有吴嵩庆、财政部长徐堪及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的签字及印信,但此“草约”原件现不在南京中央银行档案或台北“国史馆”大溪档案中。

“预支军费”,即“保管款”,也就是“秘密金银军费”

国民党军队财务署与财政部、中央银行(国库)1949年1月11日订立“草约”后,即把当时上海国库的金银外汇等“现金”,至少先拨“半数”“预支”作为军费,其总数约99万两黄金、3000万块银元及7000万美元外汇,以后又加上由美国运回的20万两及上海的第三、四批黄金,都列入为军费。其中约160万两未列入在大溪档案“央行”收入(表1.1)中。

这是蒋在下野前所安排的对抗中共的密藏军费。为什么要秘密藏起来?至少有三个原因:

其一,下野已成定局,不能再拖,代总统李宗仁(十天以后)就要上任,到时候他就无权使用国库金银外汇了。

其二,藏起金银外汇,就毋需受立法院监督。

其三,经由财务署吴嵩庆掌管的军费,用起来不但方便而且有“效率”,对维系作战部队的士气至为重要。无须费事费时地经过行政院,申请财政部拨款,不必受主计系统的监督和预算的限制。

“金圆券”当时已没人要了,要国民党军队将士继续作战,至少需要粮食、制服、汽油、子弹炮弹、枪械零件等等,无一不需现金外汇购买。

在当时央行总裁和财政部长的报告、蒋总裁的秘书周宏涛之记录、宋子文及俞鸿钧的密电、詹特芳和先父的记录(1950年2月2日日记,第5章)及蒋介石的日记里,都可得到可互相交叉印证的史实、数据。

国民党当局在台湾的和平土地改革(1949—1953)

1949年3月实行“三七五减租”。意思是地主对佃农的租额不得超过全年收获的37.5%,所以简称“三七五减租”。从1949年4月开始,根据当时的统计,因为减租而受益的佃农有近30万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44.5%。1951年又实行“公地放领”。台湾光复后,从日本人手里接收过



来的耕地叫“公地”。国民党政府将这些“公地”陆续卖给农民，地价为耕地主要产物全年收获量的 2.5 倍。1952 至 1953 年继续实行“耕者有其田”。主要内容有：地主可以保留相当于中等水田 3 甲（43.5 亩）或者旱地不超过 6 甲，超过的耕地一律由当局征收后放领给农民；征耕地价也是按耕地主要产物全年收获量的 2.5 倍，当局用债券和股票的形式支付给地主。

“黄金储蓄存款”

“黄金储蓄存款”是国民党政府在 1949 年 5 月公布，后于 6 月 15 日在新台币发行办法第十条中规定的：“凡持有新台币者，得照台湾省进出口贸易及汇兑金银管理办法之规定，结购外汇或照黄金储蓄存款办法之规定，折存黄金储蓄存款……”老百姓拿“黄金储蓄存款”之存折，向台湾银行十足提取黄金。这是国民党政府为巩固新台币的币信，市民可以公价直接换取黄金或美钞，政府公价当然比“黑市”便宜，利润在七成以上。（按：在第 12 章中已述，蒋介石对此黄金储蓄兑现的办法极不满意，他在 1949 年 6 月 29 日的日记中提及：“……以台湾银行改革币制有储金兑现办法甚不合理，可叹。”7 月 10 日又再提他计划：“……台湾银行储金规则之取消。”直到 1950 年 12 月 27 日才实际公告取消，已有 200 余万两流失民间，半数业已走私海外，但也稳定了朝鲜战争爆发前后的新台币与台湾金融。）

“黄金军费日记”或“黄金军费秘档”

国民党军队财务署（1947 年 12 月至 1949 年 8 月 31 日），即“预算财务署”（1949 年 9 月 1 日至 1950 年 3 月 31 日），也即“军需署”（1950 年 4 月 1 日起改组）署长吴嵩庆，是“国民党政府”军费总监，他在内战时的日记，记载了 1949 年前后中央银行依照“草约”划拨给财务署的秘密金银外汇“预支军费”转运厦门、台湾、重庆、成都等地支应国民党军队作战的账目。尤其是 1949 年 5 至 8 月的军费支出，由于是军事机密，不在大溪档案或台湾“中央银行”的账上，但部分现踪于大溪档案电子档中的“厦门分行

代付拨交联勤总部吴署长嵩庆黄金数量”的公文里,即把黄金拨交吴嵩庆个人,或者因他是军费“草约”的签字人,其中黄金就约99万两,以及数千万银元及千万元以上的美金外汇,是研究黄金运台、内战争费及近代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厦门鼓浪屿中国银行金库

在鼓浪屿晃岩路30号今钱币纪念馆的地下,原是中国银行金库,曾存蓄国民党军队秘密军费黄金银元,时间在1949年1至8月,总量近100万两黄金及数千万银元。

蒋介石日记

从1917年(30岁)至1923年和从1925年至1972年(85岁)的原件,现藏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其影印原件至2009年7月已全部公开。其中关键年份1946—1955年的日记于2008年7月才公诸于世,但只能在馆内手抄,不能复印。图书馆周一至周五早上8时至下午5时开放给公众。

海陆空三军抚恤金

蒋介石于1949年1月21日下野前夕,命中央银行拨给三军将士的数千万银元,其中空军约500万元,海军约300万元,陆军则在2000万以上。海空军各自保存,陆军款在财务署。

曹圣芬三原则

曹圣芬是蒋介石的秘书(1949年5月),因应各方要求使用运台湾的黄金。曹乃建议蒋以下三项原则(见蒋5月21日日记):

- 甲、此金必须用于剿共之军费;
- 乙、此金应仍为改革币制之基金,不宜过于分散;
- 丙、运金地点必须比台湾更为安全,切勿为匪所劫夺。

“青马”与“宁马”

青海的马步芳是为“青马”，而在宁夏的马鸿逵是为“宁马”，都为回教徒，同姓而不同宗，是西北的地方军阀。1949年8月国民党政府为黄金运兰州事颇为伤神的，是镇守兰州的马步芳的马家军。会同胡宗南部发动“关中会战”想反攻西安，有两马的军队参战（第14章），当时两马“主席”同在兰州，马步芳部队为主力（《张庆恩先生回忆录》，见主要参考资料）。



主要参考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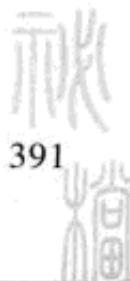
一、正式出版图书

1. 巴图. 国民党秘密抢运内情. 群众出版社, 2001
2. 百年上海滩. 上海滩杂志社, 2005
3. 布赖恩·克罗泽. 蒋介石传. 封长虹译. 远方出版社
4. 陈虎. 解放日记——1949年的故事.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4
5. 陈宇. 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一百天. 台北: 巴比伦出版社, 1995
6. 陈宇. 蓉城歼灭战.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7
7. 陈锦昌. 蒋中正迁台记. 台北: 向阳文化出版社, 2005
8. 丁永隆, 孙宅魏. 南京政府崩溃始末. 台北: 巴比伦出版社, 1992
9. 杜聿明等. 国共内战秘录. 台北: 巴比伦出版社, 1992
10. 冈村宁次回忆录. 中华书局, 1981
11. 顾维钧回忆录. 第八分册. 中华书局, 1988
12. 郭太风. 王云五评传. 上海书局, 1999
13. 郭廷以. 近代中国史纲.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80
14. 何虎生. 蒋介石大传. 华文出版社, 2007
15. 黄仁宇. 黄河青山. 台湾: 联经出版社, 2001
16. 黄天才. 林海峰围棋之路. 台湾: 联经出版社, 2006
17. 黄修荣. 国共关系七十年. 下卷.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8
18. 黄元彬. 金圆券的发行与崩溃.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选辑. 第8辑. 文史资料出版社, 1965

19. 江南. 蒋经国传. 香港: 南北极月刊社, 1975
20. 蒋经国. 十年风木. 近代中国社, 1985
21. 蒋孝严. 蒋家门外的孩子. 九州出版社, 2006
22. 黎东方. 蒋公介石序传. 台湾: 联经出版社, 1976
23. 黎东方. 平凡的我. 台北: 传记文学社, 1969; 台北“国史馆”印行, 1998
24. 李敖编著. 蒋介石研究, 第一集. 台湾: 天元图书公司, 1985
25. 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 台北: 世界书局, 2000
26. 李立侠. 金圆券发行的一段旧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选辑. 第55辑. 文史资料出版社, 1965
27. 李宗仁口述, 唐德刚撰写. 李宗仁回忆录. 南粤出版社, 1986
28. 林桶法. 大撤退: 蒋介石及政府机关与人民迁台经过之探析. 台北: 辅仁大学出版社, 2009
29. 刘红. 蒋介石大传. 团结出版社, 2006
30. 刘凤翰. 国民党军事制度.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9
31. 刘瑞林编. 温故之五: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上). 广西大学出版社, 2005
32. 刘绍唐编. 民国人物小传, 二十集. 台北: 传记文学社, 1977—1999
33. 刘绍唐编. 民国大事日志, 四集. 台北: 传记文学社, 1986
34. 刘仰东. 梦想的中国: 30年代知识界对未来的展望. 西苑出版社, 1998
35. 刘雍熙. 蒋经国在台州年. 香港: 大联印刷公司, 1985
36. 陆仰渊, 方庆秋主编. 民国社会经济史.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1
37. 茅家琦. 蒋经国的一生和他的思想演变. 台湾“商务印书馆”, 2003
38. 民政部编. 中国灾情报告(1949—1995).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5
39. 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馆藏民国台湾档案汇编. 九州出版社, 2007
40. 潘君祥, 王仰清主编. 上海通史(8)“民国经济”.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41. 漆高儒. 蒋经国的一生. 台北: 传记文学社, 1991
42. 钱屿. 金银货币的鉴定. 远东出版社, 1993
43. 钱宗灏等. 百年回望.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5
44. 冉光海. 中国土匪. 重庆出版集团, 2008
45. 邵毓麟. 胜利前后. 台北: 传记文学社, 1967



46. 邵毓麟. 使韩回忆录. 台北:传记文学社,1980(1981年元月著者题赠于洛杉矶)
47. 孙文学主编,李碧如副主编. 中国近代财政史.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0
48. 汪新,刘红编著. 南京国民政府要员录. 春秋出版社,1988
49. 汪日章,王正元等. 在蒋介石宋美龄身边的日子. 团结出版社,2005
50. 王松. 宋子文传.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51. 王东原. 浮生简述. 台北:传记文学社,1987
52. 王绍斋,章君谷. 俞鸿钧传. 台湾:圣文书局,1986
53. 汪士淳. 千山独行——蒋纬国的人生之旅. 香港:天下出版社,1996
54. 文剑编撰. 蒋家王朝. 华艺出版社,2000
55. 文思主编. 我所知道的蒋介石.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
56. 吴兴镛. 黄金档案——国府黄金运台·一九四九年. 台北:时英出版社,2007
57. 吴雅纯编. 厦门大观. 新绿书店,1947(厦门大学图书馆萧德洪馆长提供)
58. 萧公权. 问学谏往录. 台北:传记文学社,1972(著者题赠于西雅图)
59. 徐中约. 中国近代史.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
60. 许涤新,吴承明.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第三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61. 杨荫溥. 民国财政史. 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
62. 杨者圣. 随同蒋经国的西北之行——情报英雄熊向晖.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63. 叶飞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1988
64. 叶邦宗. 蒋介石秘史:我在官邸的日子与一段遭到留白的历史. 台北:四方书城有限公司,2002
65. 于宗先总主编. 台湾货币与金融论文集. 台湾:联经出版社,1975
66. 袁颖生. 光复前后的台湾经济. 台湾:联经出版社,1998
67. 詹方冠. 台湾金融版图之回顾与前瞻. 台湾:远流出版社,1997
68. 詹特芳. 蒋介石盗取黄金银元及外币的经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



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选辑·第93辑. 文史资料出版社, 1958

69. 张令澳. 侍从室回梦录.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8

70. 张铁君. 遽然梦觉录续集. 台北: 学园月刊社, 1974

71. 赵长天, 孔良. 中国的大门(关于上海海关的报告).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0

72. 赵既昌. 财经生涯五十年. 台北: 商周文化事业, 1994

73. 周宏涛口述, 汪士淳撰写. 蒋公与我. 台湾: 天下远见出版社, 2003

7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中华民国史档案历史资料汇编. 第五辑.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

二、未正式出版图书

1. 曹圣芬. 怀恩感旧录. 1950(著者2001年题赠)

2. 陈舜畊, 陈引川. 铁氏外传. 台北: “松柏之家”印行, 1989

3. 董德成. 忆往事励来兹. 1989

4. 董德成. 德成七八回忆录(著者2008年题赠)

5. 蒋经国. 我的父亲(著者1956年题赠于台北)

6. 蒋经国. 危急存亡之秋(著者1959年10月12日题赠于台北)

7. 蒋经国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编. 张良任总编. 蒋经国先生全集. 第15册. 1991

8. 秦孝仪主编. 先总统蒋公百年诞辰纪念图集. 台北: “中央文物供应社”, 1986

9. 石觉先生访问记录. 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口述历史丛书(10). 1986

10. 吴嵩庆. 嵩庆九秩散记. 1991

11. 吴嵩庆私人札记

12. 俞济时. 八十虚度追忆. “国防部”史政编译局, 1983

13. 詹方冠. 台湾银行五十年. 1996

14. 张庆恩先生回忆录. 1981(95岁赠孙张凯瑞)

15. (张)圣严法师. 从东洋到西洋. 1979

16. 赵淑敏. 中国海关史. 台北: “中央文物供应社”, 1982

17. 周雍能回忆. 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口述历史丛书(5). 1984



18. 卓遵宏. 尹仲容与台湾经济的重建(1949—1953). 台北“国史馆”, 2004

三、报刊文章

1. 陈士翰, 陈维中. 一百多年前, 宋美龄持宋美林护照赴美. 世界日报(美洲版), 2009年7月10日
2. 国民党政府撤离大陆前向台北厦门密运现金一组资料.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 南京政府中央银行档案选编. 民国档案, 1989年第1期(总第44期), 第2期(总第45期)
3. 贺水金. 南京政府中央银行反通货膨胀政策及其绩效评析.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8年第3期
4. 李金铮. 旧中国通货膨胀的恶例——金圆券发行内幕初探. 中国经济史论坛, 2004
5. 刘维开. 毛邦初事件之研究. “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专题研究计划成果报告, 2006
6. 马宣伟. 蒋介石从成都逃往台湾. 巴蜀文化研究通讯, 2004年第4期
7. 童清峰. 南京到台北, 海空运黄金. 香港: 亚洲周刊, 1998年4月27日
8. 吴聪敏, 高樱芬. 台湾货币与物价长期关系研究(1907—1986). 台湾大学经济系. 经济论文丛刊, 1991
9. 吴嵩庆. 嵩庆八十自述. 台北: 中外杂志, 1981
10. 武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货币统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当代中国史研究, 1995
11. 徐柏园. 政府迁台后之外汇管理初稿. 台湾: 中央日报, 1975
12. 薛化元. 陈诚与国民政府统治基盘的奠定——1949年. 中国的关键年代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台北“国史馆”, 2000
13. 郑为元. 撤台前后的陆军整编(1949—1958). 台北: “国防部史编局”. 军事史评论, 1998年第12期

四、报 刊

1. 参考消息. 1998
2. 大公报. 上海, 1949

3. 胡愈之主编. 东方杂志. 上海, 1933
4. 华商报. 香港, 1948—1949(10月停刊)
5. 联合报. 台湾, 1951
6. 刘绍唐编. 传记文学. 1962—1998(光盘版). 台北: 传记文学社, 1999
7. 刘绍唐, 成露茜等编. 传记文学. 1999—2009. 台北: 传记文学社
8. 宁乡文献. 台北, 1992年2月
9. 纽约时报. 1948—1949
10.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6年1月
11. 申报. 上海, 1948—1949
12. 时报周刊. 台北, 2008
13. 世界日报. 洛杉矶, 1994, 1995, 1999, 2004, 2005, 2009
14. 新生报. 台湾, 1949
15. 新新闻. 台北, 2008
16. 远望杂志. 台北, 1992
17. 中外杂志. 台北, 1991, 2007
18. 中央日报. 台湾, 1975
19. 字林西报(*North-China Daily News*)缩微胶片. 上海, 1948—1949

五、档案

1. 蒋中正总统档案(即大溪档案). 台北“国史馆”藏
“俞鸿钧卅八年一月二十七日上海呈溪口蒋总裁电”(来电编号 683)
“俞鸿钧卅八年二月三日上海呈溪口蒋教育长经国电”(来电编号 B222)
“宋子文卅八年二月九日香港呈溪口蒋总裁电”(来电编号 A-75)
“陈诚卅八年二月廿三日上溪口蒋总裁丑文台二电”(来电编号 A-893)
徐堪 1949年6月27日呈“当前库存情形等由”. 财政: 金融. 第四卷. 第五号
“库存(黄金、美金硬币、银块、银元)数字(截至1949年10月7日止)”(“中央银行档案”). 数据电子档
“吴嵩庆呈蒋中正保管之奖恤金黄金支拨情形”(#2080109016012). 1949年12月5日
“台湾银行黄金收付表(截至1949年12月22日止)”(“中央银行档案”).



数据电子档

“厦门分行代付拨交联勤总部吴署长嵩庆黄金数量”(简称“厦行拨交吴嵩庆黄金”,“中央银行档案”).数据电子档

“吴嵩庆呈蒋中正阎锡山请核示三十九年度军费概算”(#2028102033002).
1950年1月6日

“蒋总统引退与后方布置——陈诚呈蒋总统尤电(1950年5月)”.第29册
经济类.第八卷.1950年2月

“中央银行运台保管黄金收付及存余数量表”.财政:金融.第四卷.第二号
俞鸿钧1950年6月3日、11月11日签报“中央银行收付情形及台湾银行发行准备情形”.财政:金融.第五卷.第五号

俞鸿钧1955年7月27日呈送“中央银行及台湾银行库存黄金数量报告表”.财政:国库.第十卷.第五号

2. 蒋介石日记(1925—1945).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藏,2008年7月公开
阅览

3. 蒋介石日记(1946—1955).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藏,2008年7月公开
阅览

4. 广东省人民政府调查统计委员会.广东综合统计(1950年).1951

5. 美国国家档案纪录局文件(National Archives & Records Administration).

1950年3月9日

6. 杰赛普(Philip S. Jessup)等.白皮书(美国与中国关系).美国国务院.1948
年8月5日

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大事典.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

六、外文著述

1. William J. Lederer, Eugene Burdick. *The Ugly American*. W. W. Norton & Company, 1958

2. Iris Chang(张纯如). *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Publisher: Penguin, 1997

3. Jonathan D. Spence(史景迁). *To Change China*. UK: Wylie Agency, 1969

4. Sterling Seagrave. *The Soong Dynasty*. Harper Perennial, 1986





5.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1996
6. Edward Kann. *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Chinese Coins*. 1966
7. *Letters of Robert Hart, Chinese Maritime Custom, 1868—1907*. Edited by John King Fairbank, Katherine Frost Brunner, Elizabeth MacLead Matheson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Lester K. Littl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人名索引(按姓氏笔画顺序)

二画

- 丁同原 145
刁培然 265, 275, 340

三画

- 于右任 23, 244
于德昌 151, 187, 249, 252, 259, 330, 337, 338
万中选 265
万武樵 122
卫立煌 14, 372
卫格林(William L. Green) 319, 325
习贤德 293, 294
马子香 232
马步芳 197, 232, 235, 241, 387, 388
马鸿逵 197, 387
马超俊 252
马歇尔(George E. Marshall) 19

四画

- 王三聘 320
王云五 15, 16, 23, 24, 37, 48, 124, 373, 374

- 王公达 182
王文成 300
王方舟 267
王世杰 24, 48, 374
王世真 序 3
王东原 122, 124, 135, 308, 359—362, 381
王永涛 62, 149, 151, 293, 294, 297, 299, 341, 342
王尚义 1, 314
王征萍 266
王绍斋 38, 100
王树德 141—143, 158
王陵基 234, 265—267
王逸芬 62, 111, 120, 149, 151, 293—295, 297, 298, 313, 339, 341—343
王翊群 62
王惕吾 40, 62, 120, 293—299, 342, 343, 345
王瑞钟 295, 296, 345
王新标 341
王纘绪 234, 267
王耀武 18

瓦 因(George Vine) 28,32
毛人凤 83,292
毛邦初 64,91,199,212,355
毛庆祥 114,115,354,357
毛福梅 112,350—352,355
毛瀛初 212
方 天 198
方先觉 345
尹仲容 10,76,163,183
巴 金 113
邓小平 249
邓洪仪 261
邓锡侯 234,267
邓演达 47
孔令伟 21
孔令杰 21
孔令侃 21,24,94
孔祥熙 12,21,24,37,48,117,348,
349

五画

艾奇逊(Dean Acheson) 45
石 觉 156,217,312,355
石祖德 62,106,151,162,178,341,
345
叶 力 164
叶 飞 244
叶邦宗 295,342
叶良光 111,124,151,256,275,336,
350,358
叶春景 335
田可高 129
田家丰 96,156
史沫克勒(Edward Smuckler) 317

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 121
白崇禧 15,27,40,54,83,104,105,
107,108,112,113,123,181,
183,187,373,375,380
乐嗣钟 117
司徒雷登(John L. Stuart) 177
圣 严(张圣严) 320,321

六画

老 舍 113
师枢安(Robert C. Strong) 300
朱乃欣 314
朱光润 313,314
朱自清 113
朱绍良 225
任世桂 295
任显群 125,126
华国琦 80
刘王爱生 330
刘公武 122
刘文辉 234,267
刘玉章 244
刘存才 152,153
刘光禄 41,137,140,145
刘华伦 43
刘自然 127
刘庆生 151
刘安琪 243
刘攻芸 (又名刘驷业)
5—7,10,37,41,50,55,57,
60,71,81—88,90,92,94,
96,97,99,100,106,163,
174,175,179,180,188,191,
193,198,234,246,299,3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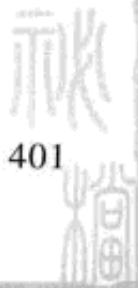
- 348—350, 375
- 刘伯承 249
- 刘绍唐 3, 137, 330, 346, 379
- 刘航琛 203
- 衣复恩 85, 86, 178, 254, 255, 299
- 关吉玉 243, 265, 266, 377
- 江 杓 160
- 汤恩伯 3, 49, 69, 90, 95, 98—100, 102, 103, 156, 159—161, 189, 196, 199, 217, 225, 300, 301, 312, 344, 376
- 安仲英 145
- 安震宇 71, 72, 145
- 许世巨 111
- 许朗轩 9, 195
- 许廉夫(C. Shreeve) 126
- 许嘉栋 283
- 阮毅成 184
- 孙中山 16, 47, 287, 289
- 孙立人 60, 78, 356
- 孙作仁 151
- 孙 科 15, 23, 25, 47, 190, 349, 374
- 孙 震 234
- 七画**
- 苏晓虹 169
- 花埃特(Harry D. White) 172
- 劳 第(Genl. Rodi) 116
- 严家淦 10, 48, 108, 191, 193, 208, 225, 226, 233, 280, 347
- 严啸虎 267
- 李友仁 43, 97, 98, 185
- 李文范 252
- 李白曼(Henry R. Lieberman) 181
- 李立侠 42—45, 57, 60, 92, 99, 172, 175
- 李汉仪 294
- 李汉魂 203
- 李光烈 4, 63, 64, 75, 147—151, 154, 162, 164, 170, 195, 197, 200, 222, 256, 260, 264, 265, 270, 271, 283, 302, 303, 326, 330, 334, 338—340, 358
- 李光彩 156
- 李光朝 96
- 李良荣 213
- 李国鼎 129
- 李昌钰 161
- 李宗仁 3, 11, 14, 15, 27, 37, 40, 54, 60, 64, 65, 69, 79, 82, 86, 101, 104, 146, 174, 181, 183, 187, 227, 242, 243, 272, 303, 373, 375, 377, 385
- 李 弥 224
- 李承晚 4, 230, 231, 292, 373
- 李 度 (Lester Little) 36, 41, 42, 44, 45, 137, 158, 366
- 李 敖 1, 4, 61, 189, 245, 330—332, 334
- 李浩民 161
- 李惟果 22, 357
- 李 鸿 22
- 李登辉 8, 133, 135, 155, 157—159, 161, 281, 283, 314
- 李馥生 17, 49
- 杜月笙 17
- 杜圣楷 118



- 杜聿明 27, 53, 54, 60, 74, 77, 356, 375
- 杜威 (John Dewey) 24
- 杜绳武 156
- 杜鲁门 (Harry S. Truman) 24, 40, 378
- 杨开慧 360
- 杨荣志 152, 153
- 杨炳熙 96
- 杨继承 339, 358
- 杨森 234, 254, 257—260, 263, 264, 267, 288, 336, 337
- 连震东 359
- 吴于艳秋 131
- 吴士珍 151
- 吴中相 257
- 吴化文 18
- 吴本一 95
- 吴本景 43, 72
- 吴吉三 108, 380
- 吴兴柔 364
- 吴兴镛(兴蓉) 321, 326, 327, 381
- 吴沛宁 117
- 吴纳孙(鹿桥) 320, 322
- 吴林焯 361, 364, 380
- 吴国桢 21, 45, 160, 280, 343, 344
- 吴忠信(字礼卿) 89
- 吴俊升 135, 359, 380
- 吴铁城 48
- 吴嵩庆(散见全书各章,索引略)
- 吴稚晖(敬恒) 46
- 邱清泉 27, 53, 54, 375
- 何应钦 23, 37, 106, 119, 265, 349, 355, 375, 376
- 何香凝 46
- 何善垣 38
- 何键 360
- 何骧 41, 137
- 余纪忠 299
- 余程万 224
- 谷正伦 234
- 应昌期 275
- 冷欣 334
- 汪子柔 60, 61, 151
- 汪日章(荻良) 112, 114—116, 264, 354, 355, 357, 381
- 汪守芝 178
- 汪奉曾 295
- 汪淮 178
- 汪精卫 47, 282
- 汪燮 67
- 沈祖同 141, 158, 346
- 沈彝懋 146
- 宋子文 6, 13, 32, 37, 46—48, 65, 72, 81, 83—85, 88, 89, 91, 170, 172, 173, 175, 180, 182, 183, 188, 274, 280, 299, 385
- 宋子良 178
- 宋达 266
- 宋庆龄 19, 47
- 宋希濂 217, 234, 249, 254
- 宋美龄(美林) 21, 25, 39, 40, 91, 116, 182, 354, 355, 374, 378, 381, 383
- 张公权 36, 37, 349
- 张申府 113
- 张申福 142, 1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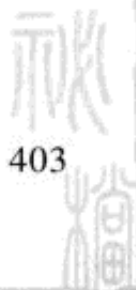
- 张圣严 320,321
 张光明 73,74
 张庆恩 388
 张纯如 296
 张国兴 181,182
 张学良(汉卿) 346
 张治中 360
 张盈盈 296
 张铁君 296
 张梅颖 325,326
 张群 14, 23, 37, 123, 234, 238,
 254,267,372
 陆大声(铿) 2,359
 陆根泉 159
 陈人望 151
 陈大庆 32,155,156,357
 陈子豪 43
 陈友仁 46,47
 陈布雷 24,88,357,374
 陈仪 95,300,378
 陈立夫 47,48,79,203,302,353,354
 陈延祚 38,99,137
 陈庆云 355
 陈志坚 112,352,353
 陈芳武 320
 陈岗陵 261
 陈希曾 178
 陈良 (字初如)
 62, 82, 119, 160, 245, 249,
 254—258, 260, 265, 266,
 343,344,352,381
 陈纳德(Claire L. Chennault) 117
 陈果夫 78,79,112,344,352,353
 陈明仁 224,231
 陈诚 (字辞修)
 14,15,18,20,46,49,59,72,
 73,75,77,105—107,122,
 128,143,163,164,183,189,
 191,195,198,199,201,208,
 209,218—220,225—227,
 232,233,251,272,280,288,
 295,296,308,320,331,342,
 346,347,357,360,373,
 374,381
 陈洁如 46
 陈济棠 116,288
 陈铭枢 115,116
 陈康华 151
 陈景韩 21
 陈舜畊 48, 111—115, 216, 291—
 293, 307, 341, 350—355,
 358,380,381
 陈鼓应 321,322
 陈锦昌 155
 陈毅 281,376
 陈履安 320
 邵毓麟 359
 八画
 范元健 139,140,157
 林可胜 293
 林宏达 325
 林国珪 361,363
 林语堂 113
 林祖涵(林伯渠) 47
 林海峰 361,363,364
 林海涛 364
 林崇墉 81,83,84,156,349



- 林 森 16,310
 罗 列 265
 罗郁纯 151
 季里诺 4,222,292
 竺枝珊 128,353
 竺培风 128,264
 金尧如 326,327
 周至柔 22, 75, 82, 85, 91, 94, 95,
 100,107,124,199,299,311,
 312,355,357,363,381
 周佛海 372
 周宏涛 5, 10, 65, 67, 84—86, 104,
 174, 175, 178—180, 186,
 188,222,234,246,271,276,
 300, 304, 305, 313, 314,
 341,385
 周鸣宇 116,117
 周恩来 130,177,344,360,378
 周联彬 111
 周雍能 47,48,112,354
 周福成 19
 郑远剑 156
 郑治明 281
 郑洞国 22,53
 郑振铎 113
 郑清怀 151
- 九画
- 赵志华 4, 86, 103, 150, 189, 275,
 276, 278, 290—293, 300,
 302,303,315,330,339—341
 赵君迈 345
 赵敏恒 182
 赵淑敏 36
- 赵聚钰 343,345,346
 郝亦尘 275
 郝柏村 2
 郝树铭 84
 荣鸿元 17
 胡宗南 12, 195, 197, 224, 234, 242,
 243, 248, 261, 262, 264—
 267,340,347,388
 胡 适 136,220,374
 胡 珪 243,244
 胡愈之 113
 查良鉴 135
 柏 杨(即郭衣洞) 322
 柳亚子 113
 钟时益 151
 钟福林 139,140
 俞飞鹏(字樵峰) 119,344,352,355
 俞叔平 21
 俞国华 359
 俞济时 39, 83, 178, 239, 254, 295—
 297,341—345
 俞鸿钧 2,3,5—7,12,15,17,21,25,
 36—42,44—49,52,53,55—
 57,59,60,65,66,70,81,
 83—85,87,88,92,99,100,
 104,107,110,112,134,136,
 137,141,144,146,157,174,
 179,182,183,188,193,200,
 221,241,243,245,246,276,
 280,299,303,332,346,349,
 350,354,373—375,385
 恰伯特(John M. Cabot) 45
 洪兰友 9,195
 宣铁吾 21



- 费正清(John K. Fairbank) 36
 费素娥 354
 费雪(Delbert A. Fisher)
 317, 323—325
 贺国光 234, 267
 贺楚强 294
 十画
 埔修 71
 袁颖生 276
 莫衡 356
 获良 114
 桂永清 20, 36, 72, 82, 140, 149, 154,
 155, 157, 334
 夏功权 178, 291, 341
 夏晋雄 99
 顾正秋 126
 顾祝同(字墨三)
 164, 233, 240, 254, 261, 267,
 334, 336
 晏玉琮 254
 钱大钧 234
 钱煦 320—322
 倪文亚 359
 徐凤鸣 334
 徐立 133
 徐永昌 91
 徐传缜 155
 徐柏园 48, 193, 238, 239, 241, 276,
 280, 305
 徐厚善 96, 156
 徐堪(字可亭)
 7, 24, 37, 55—57, 66, 82, 83,
 87, 123, 180, 190, 191, 193,
 197, 198, 201, 202, 207, 208,
 211, 212, 216, 218, 220, 222,
 225, 227, 234, 240—243,
 278, 287, 288, 290, 303, 348,
 374, 376, 377, 381, 385
 徐源泉 53
 殷海光 296, 321
 奚寿康 151
 翁文灏 15, 23, 25, 37, 48, 373, 374
 翁忠展 165
 高光汉 96, 156
 高梦男 275, 341
 郭旭 160
 郭衣洞(即柏杨) 322
 郭忸(字悔吾)
 55, 58, 81, 82, 89, 106,
 107, 202
 席德懋 10, 59
 唐式遵 234, 267
 唐传宗 129
 唐爱陆 117
 浦薛凤 135
 陶希圣 297
 陶定梁 153, 154
 陶峙岳 197, 224, 240
 十一画
 黄少谷 336
 黄礼逊 46
 黄百韬 24—26, 40, 374
 黄光锐 355, 381
 黄孝先 25
 黄杰 53, 224
 黄季弼 116
 黄秉衡 355
 黄炎培 92



黄珍吾 127
黄竞武 92
黄朝琴 359
黄辉亚 155
萧公权 14,373
萧树琴 261
萧德洪 167
萧毅肃 267
曹圣芬 105,178,292,387
盛文 261,267
康心之 248
鹿钟麟 120,381
鹿桥(见吴纳孙) 320,322
章君谷 100
阎锡山(字伯川)
37, 203, 249, 265, 266,
268,376
梁赤新 157
梁漱溟 113
十二画
彭麦良 155,156
彭孟缉 295,296,342
彭晨 184
董显光 199,301
董德成(字松坡)
60—64,124,149—151,175,
183,198,200,214,216,231,
242,253,268,270,275,293,
302,303,330,332—336,
338—341
蒋介石(中正)(散见全书各章,索引略)
蒋先云 354
蒋廷黻 24,374
蒋坚忍 265,354

蒋经国(散见全书各章,索引略)

程邦藻 151
傅作义(字宜生) 14,372
傅斯年 24,374,379
童清峰 147,340
谢少初 156
谢冰莹 113

十三画

蒲立德(William C. Bullitt) 282
雷诺(Robert G. Reynolds) 127
雷震 9,195
詹特芳 2—4,6,58,60—62,64,65,
72,75,86,88,147,150,151,
163,170,215,218,242,245,
246,256,260,301—303,307,
330—335,338,339,361,385

十四画

蔡元培(字子民) 113,354
廖耀湘 19
熊丸 178,292,293

十五画

黎东方 171,172
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172

十六画

薛岳 251

十七画

戴季陶 88
戴笠 20,115,151,354
魏曾荫 42,43,86,144,145
魏德迈(Albert C. Wedemeyer)
121,172

作者郑重声明：

本书稿酬全部捐献给“中华世纪黄金教育基金”，以增进两岸交流、人民教育为宗旨。

The Chinese Secret Archives of Gold

他在父亲逝世多年后无意间发现其留下的绝密“军费日志”，于是开始了十余年探寻真相的历程，其间他发现了惊人的“秘中密”——蒋介石隐藏的军费黄金，深锁在厦门城外风光秀丽的鼓浪屿上的一个地下金库里，用来支撑内战后期国民党军队在东南沿海、西南地区、新疆与兰州的作战。而深获蒋介石信任、负责经手管理这秘密黄金的人，不是黄埔的嫡系，而是作者的父亲——一位有抱负、有操守的法国巴黎大学留学生吴嵩庆，当时担任中将财务署署长，管理军费。作者以细腻剖析的笔法，让证据说话，把1949年上海国库黄金分四批运台湾事件的来龙去脉首次忠实完整地还原在读者眼前。

ISBN 978-7-214-06078-5



9 787214 060785 >

定价：48.00 元